C.B.J.J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

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ON THE DICHOTOMY IN GEOPOLITICS

李义虎／著

[世界政治研究丛书]
SERIES OF WORLD POLITICS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

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ON THE DICHOTOMY IN GEOPOLITICS

李义虎／著

【世界政治研究丛书】

SERIES OF WORLD POLITIC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李义虎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
(世界政治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2627-1

I. 地… II.李… III.政治地理学-研究 IV.K90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28416号

书　　名: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
——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著作责任者:李义虎　著
责 任 编 辑:胡利国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12627-1/D·1842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ss@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出版部62754962
编辑部62765016
印 刷 者: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18.75印张　256千字
2007年9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8.00元

序

梁守德

李义虎教授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一书磨砺多年，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是在由我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论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基础上写成的，在指导论文的过程中，我与作者经常就地缘政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因此对本书的选题立意、基本观点、主要思路和写作特点，我都十分熟悉。特别是，作者多年来潜心于国际关系基本理论的研究，对建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颇多心得和见解；从地缘政治学角度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只不过是作者多年来研究历程的一部分，但开拓了新视角。

我认为，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大量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原著被翻译成中文，使国内学者在进行自己研究的同时能够随时追踪国际上的学

术和理论动态,掌握西方理论的基本观点和体系特征;另一方面,中国学者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结合国际社会的新实际,顺应世界历史的新潮流,在借鉴西方有价值的理论的同时,开始推出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不断努力,开拓创新,比较从容地进行自己的理论建设。应该说,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不能缺少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起步虽晚,但只要这两个方面的工作结合得好,就一定能看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成型和成熟起来,自立于世界学科体系。

当然,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并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仍然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和几代人的努力。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完成这项系统工程,可以选取多项研究题目,多个研究领域,多种研究角度,来进行,来努力。不仅可以对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流派作研究,也可以对国际格局、地缘政治、国际制度、国际法及全球治理等进行研究,也可以选取国际经济、军事安全、科学技术、国际文化及宗教文明等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总之,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进行研究,都是在给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添砖加瓦,铺路架桥。

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需要明白“己学”和“彼学”的关系。我们不仅要知己知彼,而且要由彼及己。前者是一个重要的了解过程、学习过程和借鉴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对“彼学”有准确的和充分的了解,才能对“己学”所处的位置和环境有足够的把握。对“彼学”该学习的学习,该借鉴的借鉴,该扬弃的扬弃;这是建立“己学”的必要步骤,鉴于西方的“彼学”比我们的“己学”形成的早,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了,这一步甚至是绕不过去的。但是,现在更应该强调的是后者,因为仅仅了解、学习和借鉴“彼学”是不够的,我们的最终落脚点是“己学”,因此后者更加重要。可以说,后者是一个创新过程、创造过程,甚至是原创过程。只有当“彼学”能为“己学”所用,也就是完成了由彼及己的过程,才能塑造成功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

李义虎教授的新书是从地缘政治学角度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其中

不乏创新的观点和有价值的研究路数。在某种意义上讲,虽然它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西方的“彼学”,但它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是中国“己学”,在“知己知彼”和“由彼及己”方面做了十分重要的尝试,就此而言,该书对于国内学者的同类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示范意义。

是为序。

2007 年 2 月 8 日于蓝旗营小区

自序

本书由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论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略作修改而成，该论文于 2001 年 12 月完成并通过答辩。随后，还获得了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奖项，由北京大学图书馆收入馆藏。在成书之际，我还想就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题目进行研究说几句话。

首先，就个人旨趣而言，研究地缘政治学的理论问题并非偶然。地缘政治学和均势学说被视为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的两大支柱。本人曾专门钻研过均势学说，写就《均势演变与核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和《国际格局论》（北京出版社，2004 年）两书，本书乃是对现实主义学派研究和探讨的继续。当然，就目前我个人的研究重点和范围而言，不独现实主义一说，亦涵括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诸种学说，它们将成为我下一步研究的方向。我以为，在构建国际关系

理论中国学派的努力中,完整地了解和研究西方理论(包括主流理论和非主流理论),借鉴和消化其中的有益成分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

当然,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尚处在由"拿来主义"到独立创建的转型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翻译引进和介绍综述西方有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必要的,但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立之前,我觉得至少还应该有两件事情要做:一是要对西方理论进行带批判精神的"双重阅读"。"双重阅读"包含着追述和评论等重复性研究,这可类同于对他人"理论建构"的同步建构;但更重要的是,它也包含着解构他人已经建构起来的理论,在终极意义上,解构不仅仅是一种颠覆,更是一种创新和再造①。对我们而言,需要对西方理论做"双重阅读",双重阅读重在第二次阅读,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西方理论的第一次阅读上,更不能停留在对原文原意的理解上。在中国的理论建设方面,两种阅读的区别在于,第一次阅读的重心仍然受到西方原论的强烈吸引和制约,故此译介综述显得重要;第二次阅读的重心则已经事实上发生偏移,其"质"的部分或者说内核构建开始从西方理论转移到中国理论。二是需要以中国学者自己作为研究主体,提出中国式的概念、范畴、命题以及系统的理论观点和解释模式。应该说,这种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具有中国学者自己(甚或个体)"人格化"的研究过程,其理论成果可以打上"中国制造"的标识。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型阶段,上述两种研究工作都是值得提倡的,但研究者应在心中明白的是不失去自己作为研究主体的资格。

---

① "双重阅读"是一种解构主义的文本阅读策略,根据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文本阅读理论,"文本不是一个已完成了的文集,不是一本书或书边空白之间存在的内容,而是文字之间互为参照的'痕迹'。因此,阅读决不是寻找原初意义,理解决不以作者为中心。以把握原初意义为特征的现代主义的阅读方式和理解方式必须让位于对作品的解构活动"。见(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家堂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译者的话,第3页。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对"双重阅读"策略所作的评述,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208页。

其次，再说到本书的研究特点。本书属于纯粹的理论研究，而非策论式研究或简单的应用性研究。之所以说是纯粹的理论研究，是因为本书以地缘政治学这一学科本身及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在这一意义上，它或许带有“元理论”研究的特点。所谓“元理论”研究便是以某一学科为对象所展开的研究。虽然本书也试图兼顾地缘政治的某些现实问题，包括论及中国的地缘政治问题，但它仍然首先观照于地缘政治学的学科性质、理论结构和基本特征。在国内的理论研究中，对“元理论”的研究是缺乏的，因而研究的价值和空间都是很大的。同时，本书对西方理论（当然是西方地缘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兼具第二次阅读和中国本位的双重特点，虽然我参考了大量西方地缘政治学的原著，甚至自己直译了其中的部分原文以供研究之用，但我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这些原著的观点上，而是努力以一个中国学者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式对它们进行第二次阅读，其用意是尽量提出中国学者自己的概念、观点、命题和解释框架。

从论文写作到本书成稿，差不多过了5年多。之所以放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公开出版，是因为本书涉及的问题确实是国际关系基本理论中的重大问题，不能等闲视之。我想用时间检验一下书中的观点和立论是否站得住脚。应该说，经过一段时间的重新思索，我认为把论文整理出书，还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至少可以有与学界讨论和争鸣的价值。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2006年我获得了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的出版资助，这不仅是本人在学术上的一项荣誉，也是本书进行修改的直接动力。从整体上说，本书保留了论文原稿的风貌，立意和框架都没有做太大的改动，只是在文字上做了若干校正和润色。书中大的修改是有关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总结部分（第八章和第九章），另外根据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办公室所汇集的专家意见，对最后一章即关于中国在地缘政治中的选择问题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第十章）。

需要借此机会表示衷心感谢的是我的导师梁守德教授,他对我论文从立意构思到全文写作给予了全面的指导。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同行都知道,梁老师一直倡导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为此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正是我对理论问题保持很高兴趣的重要源泉。在梁老师的悉心指导和教诲下,我努力把自己的理论研究与重大的国际关系理论问题联系起来,并选择了地缘政治学的理论角度来进行一项自认为有意义的研究。

此外,在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潘国华老师、方连庆老师、王杰老师、邱恩田老师和叶自成老师都给予了难得的指导和帮助,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这使本人获益匪浅。军事科学院前副院长糜振玉中将、国防大学教授汪江淮少将在本书写作的关键阶段给予了非常有价值的指教,他们以军人特有的洞察力对地缘政治所作的精辟分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将成为我继续向他们请益的开端。在本书资料搜集阶段,教育部李军司长将自己收藏的一些珍贵资料慨赠与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资料室的潘京初老师在我借阅和使用书籍时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在这里,我对上面各位老师和专家表示谢意。

李义虎

2007 年 1 月 10 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人类社会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存在和发展的，作为一种天赋的和恒定的因素，地理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和面貌。黑格尔（Georg W. F. Hegel）说过，人类历史具备地理的基础[①]。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地理因素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一，对不同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会产生极大的制约作用。同样，国际关系和作为国际关系主体角色的国家以一定的地理空间为活动舞台，地理因素构成了国际关系的空间条件。所谓地理因素，主要包括国家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也包括国家的疆域幅员、自然资源、地形地貌、气候、人口以及交通状况等分布性条件。在一般情况下，由地理因素所产生

① 参见〔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历史的地理基础》，上海世纪出版集团1999年版。

的各种对应关系既可能限制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也可能给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提供可资利用的条件。当地理因素所产生的作用超越于纯自然层面而上升到政治层面时,便形成了地缘政治。作为国际关系中的客观存在,地缘政治表示各个国家、特别是那些大国依托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而产生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关系,这种关系是在地理空间中所形成的结构性关系。从历史上看,国际关系总是具有一定的地理空间特征,国际关系存在着地缘政治分布的基本特点,地缘政治决定着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的基本方面。

地缘政治学先驱们说过:"伟大的政治家决不应缺少对地理的热情,当一个人谈到健康的政治本能时,通常意味着他对政治权力的地理基础有一个正确的估价。"①正是由于地理因素对国际关系持久和深刻的影响,19 世纪以来,人类开始直接应用地理学方法理解和解释政治问题和国际问题,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地理基础和条件,由此出现了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地缘政治学的起源与契伦(Rudolf Kjellen)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后经过 20 世纪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麦金德(H. Mackinder)、豪斯浩弗(Karl Haushofer)和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乃至于当代的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和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等的构造和发展,地缘政治学变成了一门显学②。所谓"显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地缘政治学具有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作为独立学科门类的重要性,已经积淀下丰富而坚实的学术资源;二是在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发展脉络上,地缘政治学始终处于长久不衰的基础性地位,是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支柱

① G. R. Sloan, *The Geopolitics of Anglo—Irish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s Century*, London: Washington, D. C. ;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55.

② 地缘政治一般被视为国际关系中的"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涉及国际政治、安全和军事问题;而"低级政治"("low politics")则涉及国际经济、社会、科技、能源、生态和文化等问题。地缘政治学即属于研究"高级政治"的特殊学问。参见 Klaus Dodds, *Geopolitics in A Changing World*, Harlow, England; New York: Prentice Hall, 2000, p. 6.

之一;三是地缘政治学对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产生过长期而重大的现实影响,任何国家在制定战略决策和诉诸行动时都必须以地缘政治为考虑的前提,因而都必须借鉴地缘政治学的理论成果及其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总之,正是基于这些理由,研究者一直在对地缘政治学进行着不间断的探讨,并从不同角度开辟和拓展新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也正是本书对这门“显学”加以研究的重要背景。

第一节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地缘政治学是地理学和政治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国际关系理论传统积淀的重要结果。这门学问已经存在一百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理论遗产和众多的研究成果。但是,当我们今天在审视它时仍然会发现,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以单一视角作分析的居多,以整合视角作分析的甚少;尤其是缺乏对各种地缘政治学理论的整合式总结和对地缘政治的规律性现象的理论反映。实际上,地缘政治学主流理论经历长期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了某种相当的一致性,甚至形成了其内部的“理论结构”,但对此人们尚未有充分的挖掘、整理以及系统的说明。因此,从整合的观点出发来研究多种多样的、可能立论迥异的地缘政治学理论流派,揭示出其内部的“理论结构”及其与此相关的理论发展规律,已经具有了毋庸置疑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书便承续地缘政治学思想史和理论史的丰富遗产,在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的意义上,对从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豪斯浩弗到杜黑(Giulio Douhet)、德塞尔斯基(Alexander de Seversky),再到科恩(Saul Cohen)、戈尔什科夫(Sergei Georgievich Gorshkov)、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以及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地缘政治学理论领域最主要代表人物的的基本理论和观点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本书认为,如果以整合的观点看,他们的基本理论和观点以地理差异和政治差异为主要研究

对象,以海陆(空)差异作为最大的地缘政治差异,延续出了一条地缘政治学基本理论的二分论(dichotomy)主脉,从而形成了地缘政治学这一特殊学科的“理论结构”。这一主脉主要体现在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海权和陆权的对立,第二层次是“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对立,第三层次是将地缘政治上的二分延续到地缘经济上,形成了“核心区域—边缘区域”之间的划分,第四层次是在此基础上所展示的地面空间和空中空间的区分,出现了空权和海权、陆权的对应。在空间分析的意义上看,前三个层次适应了地球平面空间的现实,后一个层次适应了地球立体空间的现实。虽然后来的广义地缘政治学理论在二分的基础上还较多地发展出了一种多元的倾向,但地缘政治学作为一种以平面空间为主,兼顾立体空间来分析有关国际政治问题的理论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鉴于地缘政治学发展的如此历史情形,海权论和陆权论、“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核心—边缘学说”及空权论与地面权力体系理论的二分,实际上规定了地缘政治学的基本性质,即该学科的主流是二分论的;它们也形成了地缘政治学的结构性特征,即该学科的理论结构是二分对应式的。对此,我们用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来加以概括,并认为它具有某种高度抽象和简约的理论特征。

所谓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涉及到该学科的研究主题、理论内容、理论体系特征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就研究主题而言,二分论是指对国际关系主题的地理学诠释,它把国际关系的主题看成是海权和陆权之间、“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之间及地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它们形成了地缘政治中的基本矛盾。就理论内容而言,二分论倾向于把海洋和陆地之间、海权和陆权之间的竞争和较量看成是贯穿整个国际关系历史的主要内容,因而也是地缘政治发展演变中最重要的内容,“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之间、地空之间及地缘经济的“核心—边缘”的关系不过是它们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反映。就理论体系特征而言,海陆二分、“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二分以及地空二分等使地缘政治学理

论形成了二分对应的逻辑，出现了海权论和陆权论、“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地面空间权力理论和空中权力理论及“核心—边缘学说”等相互对应的理论范式和概念群，从而在地缘政治学整体上形成了二分的理论体系或理论结构。而就研究方法而言，二分论主要以地理差异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侧重强调某一方面的地理因素和特性，较为忽视另一些方面的地理因素。当然，它也暗含着海陆关系和地空关系的研究视角，只不过它们没有被充分地揭示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讲，海权论和陆权论、“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以及空权论和“核心—边缘论”等都带有孤立静止的研究特征，距离动态的和全面的空间分析方法仍然很远。

理论是对规律性现象的科学概括和总结，研究前人的理论需要对他们进行“扬弃”和超越，需要进行新的理论构建、理论升华和理论创新。本书所主要解决的问题是：

1. 对一百多年来地缘政治学的学科主题、理论内容和特征作了高度的抽象概括，提出了“二分论”这样的概念，它使得对迄今为止的地缘政治学整体状况进行最简约有力的说明成为可能。

2. 从地理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的双重角度论证了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学科基础，而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大多数地缘政治学家提出和论述地缘政治的二分事实时所欠缺的(第二章)。本书认知到地理学的研究重点是地理差异，这是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学科基础。由于每一个国家都处于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由于不同国家之间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是有重大差异的，所以国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地理差异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国家潜力及其政治行为也会因此而形成某些相互区别的惯性模式。地缘政治学便总是试图依此对地理差异因素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探讨，并对各种国际关系复杂现象的空间分布及其发展规律进行探讨。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地理学对地理差异的研究对地缘政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其很难脱离这种

影响。延续着这一传统,地缘政治学二分论虽然对国际关系中的地理差异进行了必要的结构性阐释,因而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但它过分强调、突出和扩大了地理学对地理差异的研究倾向,使得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在理论上被发展到极致。本书还认知到,地缘政治学在对地理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时,主要把地理差异所带来的政治差异作为研究的重点,倾向于认定那些显然存在的地理差异会造成不同的地缘政治现象。所谓地理的差异和政治的差异,都蕴涵着空间的结构性差异,当它们统合在地缘政治时就是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差异。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在理论上对这种结构性差异作了充分的反映,并且与现实主义主流学派的国际政治二分法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对应关联。根据以上认知,本书对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学科和理论背景进行了完整的厘清。

3. 本书着重对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陆权论与“心脏地带学说”、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学说”、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论”、杜黑等的空权论以及科恩的“冷战世界分裂图示”、沃勒斯坦的“核心—边缘学说”、布热津斯基的“欧亚大陆黑洞”理论和亨廷顿的“文明断层线”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但并没有局限于他们的理论本身,而是揭示出他们的理论如何在总体上构成了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尤其是把他们对海陆关系(和地空关系)的基本理论观点和倾向作为研究的重点,从而有可能看到海陆关系(和地空关系)对国际关系现实的影响和人们是如何在理论上作出观照的。

4. 本书在对二分论进行总结的同时采取对其超越的态度,对“地缘政治和地缘政治学都是二分的”这一传统命题提出了挑战。既认为二分论是对迄今为止地缘政治学所涉及到的全部理论和方法问题的高度简约概括和说明,是对其中所蕴含的某些规律性“理论要素”的整合性演绎;但又认为它过分强调了地理差异因素,而忽视了对地理差异因素的整合。由此,二分论仍然局限于理论的结构主义的静止或静态含义上,缺乏对地缘政治动态过程的必要解释,因此必须指出的是,真正的地

缘政治学研究，真正对地缘政治现象的解析，需要在超越二分论的基础上进行。这也就是本书以《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为题的缘故，其意在先研究前人的理论成果及其这些成果的特征，再提出自己的可能提出的东西（第八章和第九章）。

5. 正因为如此，本书以回顾和超越二分论的理论逻辑，分析和研究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地缘政治战略，提出了应该从地缘位置的一分为二（认清海陆二分的地缘政治现实）到地缘选择的合二而一（兼顾和整合海陆关系），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进行新的定位（第十章）。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本书追述了西方地缘政治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观点，但是本书的基本概念、主要观点、研究角度、逻辑论证和最后结论都是作者本人提出的。本书以批判和思辨的思维导向深入地研究了地缘政治学基本理论和方法，并对其进行了新的理论概括和系统说明。概言之，作者写作本书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从一种全新的理论体系、结构方法和研究角度重新审视我们所熟悉的地缘政治学，重新审视我们所熟悉的某些地缘政治学的重要论点和结论，同时将某些带有规律性的部分加以适当的总结，并由作者自己对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互动规律进行一定的探索。

本书认为，研究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对于准确地认识地缘政治学这一重要学科的性质和面貌，对于提高地缘政治学的学科清晰度，对于正确理解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互动，对于合理把握地缘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关系，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就学术价值而言，理清和总结地缘政治学基本理论的主要脉络，可以使这些主要的、但长期以来被掩盖着的和模糊的理论发展脉络清晰化，使我们重新认识地缘政治学乃至国际关系学，从而真正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对外政策研究提供比较厚实的基础和清晰度相对较高的视野。就现实意义而言，我们知道，直到今天，在现实国际政治中不管你怎么看待地缘政治和地缘政治学，它们都是客观的现实存在；重视这种现实存在，可以使我们在观察和解决问题时，有

一个比其他方法更管用的方法,有一整套强有力的针对国际行为的“奖惩机制”,有一种国际政治中的“法则力量”,因为它正如市场法则一样是一只“无形的手”。特别是,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在实践层面已经长期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现实和国家的地缘政治行为,这是我们必须加以注意的所在。正因为如此,本研究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显然是同等重要的。此外,对地缘政治学二分论进行科学和系统的分析,可以为作为“边缘地带”最重要的大国之一、而又必须处理好海陆关系的中国的地缘战略选择,提供直接的理论参考。这是本书的最主要的潜在含义。

需要强调的是,本书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立场出发,对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和豪斯浩弗等的“地理决定论”倾向和对抗性思维及其政治目的性予以否定,虽然他们并未像孟德斯鸠(C. Montesquieu)和拉采尔那样直截了当地把地理因素说成是决定历史发展和社会演变的唯一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将对地缘政治学的基本理论进行比较充分的研究和讨论,对其理论中所反映出来的某些规律性的现象和有价值的信息予以高度重视和理论观照。本书的研究试图证明,地缘政治学不是“模糊的”学科,而是有着相当清晰度的学科。

第二节　概念与学科的界定

在进行本书的整个研究前,我们还需注意到一个事实,即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对地缘政治学这样一门显学如何进行适当的学科定位,还是个比较有歧义的问题,学科定位的歧义可能会导致地缘政治学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混乱。因此,这些是我们必须先加以厘清的问题。

关于地缘政治学的学科定位存在着如下的几种观点:

一、地缘政治学是人文地理学的分支

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最初把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看成

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①],但实际上他在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中就已经把地理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综合到一起了,并且曾经在称呼上使用了“人类地理学”(anthropo geographie)的概念。就学科内容而言,人类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基本上是相等的概念,而后者是使用频率更高的一个概念。在西方地理学界,人文地理学指研究人文现象,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人口的现象的那一部分地理学,质言之,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及其活动的空间分布[②]。其研究的宗旨是“把地球作为人类的家”(The Earth as Humanity's Home)[③]。后来,在人文地理学中派生出一门新的学科——政治地理学[④],它把国家和世界当作一种具有一定空间生命的有机体来加以看待和研究。因此,政治地理学从空间角度研究各种政治行为过程产生和发展的因果关系,研究它们在地理空间中分布的一般规律和特征,也就是研究它们的地理空间变化。换言之,政治地理学就是研究“时空中的政治格局”[⑤]。至于地缘政治学,它显然受到人文地理学与政治地理学学科关系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大体上是将人文地理学与它的关系视为种属关系,国内外学者在将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同等看待时,认为它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即研究国家与地区内部和相互间的政治行为过程的地理分布的一门科学,主要任务在于研究国际政治关系的地理背景,以正确认识许多国际问题的发生、发展的根源和趋向。更激进的看法认为,地缘政治学一度是人文地理学中最为活跃的一个分支。但也有人认为,地缘政治学或政治地理学原本是(自然)地理学的一个分支,“自然的和社会的理论区

---

① F. Ratzel, *The Territorial Growth of States*, 转引自〔美〕G. R. Sloan, *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 1890—1987*, Suxas: Weitershief Inc. 1988, p. 26.

② Michael Bradshaw, *World Regional Geography: The New Global Order*,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p. 8.

③ H. J. de Blij, *Human Geography: Culture, Society and Space*,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6, p. 19.

④ 有时人们也使用“地理政治学”的概念,其英文为 geographical politics。

⑤ 王恩涌等:《政治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 页。

分,使地理学分裂为两个部分”,是麦金德将二者合而为一,他的理论在地理学的自然和人文两方面的“裂缝”上起到了“桥梁作用”[①]。

二、地缘政治学是政治地理学的一个分支

本来,政治地理学是地缘政治学缘起和发展的前身,从这一意义上讲,政治地理学提供了地缘政治学直接的理论渊源,地缘政治学是沿着政治地理学的学科逻辑来发展的。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二者在某些场合是可以互相通用的概念,在某些场合则需要加以区别。例如,就学科产生的时间来说,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概念早就由拉采尔和契伦等提出,地缘政治学只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国际关系发生极为重大变动时才形成了学科的概念,所谓重大变动是指国际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这时地缘政治学具有了作为一门单独学科并拥有专门的学科名称的必要性。在研究范围和领域上,政治地理学主要是研究国家级政治地理,包括国家的空间特征、国内的政治区域划分、政党和选举地理、国内人口结构等。政治生态学派代表人物鲍曼(I. Bowman)和范根堡(V. Valkenbury)主张,政治地理学主要研究人类所组成的社会集团如何从政治地理上适应其所居住的区域自然环境。而地缘政治学主要是研究国际级政治地理[②],研究作为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国家之间的政治地理分布,研究国际范围内国家权力的地理基础。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以地缘政治学的观点看,地理

① 〔英〕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页引言,引言作者E.W.吉尔伯特。麦金德在《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一文中指出,“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的第一个问题是:地理学是一个,还是几个主题?更确切地说,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是一项研究的两个阶段,或者它们是用不同方法进行研究的独立的主题,一个是地质学的附庸,而另一个是历史学的附庸?”见〔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第19页。

② 见《政治地理学》前言对国家级地理学和国际级地理学的区分。

因素是影响国际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地缘政治”一词是表述国际关系空间关系的简明概念。这种观点为国际关系理论所吸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形成了一种说明和解释国际政治和地理现象，进而在国际关系中利用地理知识来支持和指导国家决策的一个特殊的理论分支①。这意味着，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都把国家当作地理的有机体或一种空间现象来认识，例如，拉采尔、豪斯浩弗和契伦共同意识到，二者均是对国家这个有机体所作的空间及其结构的研究；但毫无疑问，二者在概念上又有所区别而不应混淆；当政治地理学突破了国内政治的范畴而延伸到国际政治上，它就发展成了地缘政治学。另外，二者的一个不同是名誉和命运的问题，政治地理学从 20 世纪初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时起，就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学术上的好感；但地缘政治学因为曾经服务于侵略战争和激进意识形态的缘故曾一度被打入冷宫。

三、地缘政治学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

例如只有个别学者认为它曾经来自于政治学而不是地理学②，或认为权力政治学为这门国际关系的“显学”奠定了直接的基础③。持这种观点的人非常少，但也不无理论渊源。麦金德就曾否定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存在，认为它完全从属于政治，从而把地缘政治学纳入了政治学科的范畴，认为它“对制定合理的战略战术规划是很必要的”，“因此它是一门政治学科”。按照麦金德的说法，地理的统一首先在于，所有地理问题——自然地理，生物地理，社会地理问题都从属于政治的影响④。虽然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麦金德的理论具有“地理决定论”的色彩，这似乎与他对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学科定位有些矛盾，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18 页。
② 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3 页。
③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7 页。
④ ［苏］B·A·阿努钦：《地理学的理论问题》，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第 77—78 页。

但他对政治的强调实际上是他的“陆权说”和“心脏地带学说”的逻辑基点和展开线索[①]。而直到今天,西方不少地缘政治学家仍然认为,地缘政治是“做政治决定的坚实基础”,与政治学的基本逻辑是相当一致的,并且常常在政治学的理论中汲取自己的营养[②]。因此,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对地缘政治学这一学科的挑战是使地理与政治结合的能力,它尤其反映在一系列的令人迷惑的事物进程和事件中[③]。

本书首先提出地缘政治学的概念和学科定位问题,对于全书的论述并非没有意义。这是因为我们所要研究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恰恰与在哪一个学科的意义上去认识它有关。本书认为:

第一,地缘政治学是从政治地理的角度,以国家和各种国际行为体为基本单位,以它们的活动为主要内容,研究它们与国际政治现象在空间配置上的规律和特性的科学。其中,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是两个最重要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是地缘政治学之所以区别于地理学和其他与地理相关的学科的主要界标。如同地理学主要研究自然物体或实体的位置和空间及其关系一样[④],地缘政治学主要研究的是国家和各种政治实体的位置和环境及其对应关系。地缘位置表明的是国家和各种政治实体的政治地理位置,地缘环境表明的是国家和各种政治实体等相互之间的空间关系。当然,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包括自然地理位置、国土面积、地形、地貌及其所载有的资源等因素,但不对它们作过多的单领域的涉及,因为那样的话地缘政治学就不成其为地缘政治学了,而变成了地理学了(如果从军事角度过多涉及它们,就变成了军事

① 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帕克认为,麦金德的理论是有条件的决定论。参见〔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7 页。

② Colin S. Gray and Geoffrey Sloan, *Geopolitics, Geography, and Strategy*, Chichester; New York: Published in association with Scott Polar Research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by J. Wiley, 1997, p. 10.

③ *Geopolitics in A Changing World*, p. 149.

④ 几乎所有的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著作关于地理学研究对象和基本概念的表述,都是这样的。

学或军事地理学了)[1]。质言之,对这两个概念的肯定,是地缘政治学成立的前提(下一章将对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这两个概念加以系统解释)。在明确这一点后,从国际政治角度看待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及其互动关系,从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及其互动关系的角度看待国际政治,就成为地缘政治学研究的重点。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的空间结构和形态特征是保持地缘政治学的地理学基质的纽带,其中海陆位置和海陆关系是地缘空间结构和形态特征的主要内容;以国家等政治性实体为基本单位,以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的政治结构和形态特征为内容,是地缘政治学具有国际政治学素质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所以,概括地说,地缘政治学是在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统合或结合的基础上对国际政治空间现象所做的系统研究,作为一种理论,就其延伸影响来讲,涉及到国际关系的政治地理因素和国家对外政策(包括军事战略)的地理因素。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不同,地缘政治学提供了观察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的独特理论、知识和方法。

由此知晓,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国际政治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所探索的重点为国家行为在不同类型地域的地理空间分布、组合及发展规律,其中特别包括海陆位置及权力分布对国家地位和国际格局的影响。由于"地理学的明确主题"是研究地理差异[2],例如,有关地理环境结构(geographic environment structure)的概念便强调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和差异性,整体性是其各组成要素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所结成的一个整体,但更重要的是其中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差异性,它可以表现为地带性的差异和非地带性的差异。所以,地缘政治

① 这就如同地理学和地质学的区别一样:地理学家关心的是地球表面,而地质学家感兴趣的是地表下面的的世界。见 A. G. 史密斯:《地图的由来》,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5 页。

② 赫特纳认为,"从最古到现在,地理学的明确主题是认识地理区域之相互差异。"哈特向也指出,地理学是"研究地区差异的科学"或"地区差异及其关联的科学"。见《地理学性质的透视》,第 13—14 页。

学特别看重地理差异所导致的政治差异,认为这些地理差异及其在空间上的关联对国际政治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直接造成或导致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差异的最主要的因素,而这就是国际政治和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的核心部分。正是由于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的差异,导致了国际政治行为体在其中的活动表现出各种形式,导致了国际政治在空间上分布和发展上的变化,从而在国际政治中形成了具有极大差异特征的地理空间[①]。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地缘政治学不仅包括对国际政治空间的研究,还包括对一定的空间中国际政治过程的研究。正如斯皮克曼所说的那样,地缘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的转移所决定的一些区域",换句话说,"地缘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形势而不是静的形势"[②]。在这方面,最需要注意的是,在二维空间意义上的海陆关系分布以及在三维空间意义上的地面与空中关系的分布,就是一种最显著的、也是最大的"地理差异";由此造成的国际政治的差异和动态过程,深刻地影响了地缘政治的形成和演变,也深刻地影响了地缘政治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因为基于地球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的特性,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及其互动关系更多地受到海陆关系分布和地面与空中关系分布的制约;因此,国际政治的空间和过程主要体现在海陆关系的演变和地面与空中关系的演变上。西方学者认为,地理世界的差异与不平衡特征,是追求、维护并扩张权力的地理基础。任何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强国都是依靠

① 《地理学与地理学家——1945 年以来的英美人文地理学》一书甚至认为,地理学要求有一个新的研究焦点,这一新的焦点已经围绕着对"空间差异"和"空间体系"的研究而形成。"现代人类生存的最重要的事实,是社会的空间差异,而不再是自然界的空间差异。正是不同地方的人群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创造出人类占据地球表面的种种模式,从而为人文地理学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课题。"因此,地理学要"关注空间布局或者说空间结构——人类活动中的地区差异和由此产生的空间相互作用"。参见〔英〕R. J. 约翰斯顿:《地理学和地理学家》第四章,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② 〔美〕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第 15—16 页。

了地理条件，利用了地理上的差异所带来的国际政治效果。例如，“地理因素决定的帝国主义类型，在欧洲列强获取欧洲大陆支配地位的政策中得到了最清楚的体现”，并由大陆的地理局限所决定[①]。那些善于利用陆地优势的强国一般都是作为陆上霸权出现的，那些善于利用海洋优势的强国一般都是作为海上霸权出现的。陆上霸权的典型有法国和俄国，它们的地理位置注定了会深深地持久卷入欧洲大陆的事务；海上霸权的典型有英国和荷兰，它们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对海外殖民地的扩张。历史地看，“传播文明的使命”（法语）、“阳光下的地盘”（德语）和“命定说”（英语），似乎都带有海陆关系的特征，特别是可以作为海陆差异的不同关系类型。

第二，地缘政治学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就此而言，地缘政治学在研究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基础上把国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是以国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作为人与地理环境关系的放大形态（不少学者把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概括为“人—地关系”或“人—境关系”，国家作为个体人的放大，可被视为“国家人”）。换言之，在人与地理环境关系基础上对国家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是本学科的核心命题，而国家战略考虑和制定的基点，就是地理差异和政治差异的因果关系，就是人们如何因势利导地在这种因果关系中处理国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依据这种辩证的观点，地理环境不仅包括“纯”自然要素，同时也包括人及其活动的结果，它是多种性质不同要素的综合体。正因为如此，一些地缘政治学者认为，地缘政治学“是从国家安全的需要出发，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研究战略力量布局条件及特点的规律性和方法论的科学。”[②]他们还认为，国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存在着因果关系，而且在国际政治中存在着国家与地缘因素的特殊因果关系。在这种因果关系中，国家间关系在地缘政治意义上既具有空间结构的内容，又具有空

① 〔美〕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5、86 页。
② 陈力：《战略地理论》，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 页。

间过程的内容。人和国家的活动表明了地缘政治的动态性质,人和国家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赋予地缘政治过程的含义。因此,地缘政治包含着人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包含着国家之间的空间与过程关系;换言之,它说明了地理空间分布的基础作用,又说明了人的主观作用和国家行为的模式。地缘政治学所要研究的恰恰是人、国家与地理环境中的相互关系和由此产生的因果变化规律,注重的是三者关系的协调。

第三,地缘政治学是地理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的综合,同时也是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结合,因此说它是一门交叉学科是十分合适的。实际上,很多学者都把地缘政治学看成是一门交叉学科,认为地缘政治学虽然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但它同时又是一门介于政治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①。例如,西方有的学者把人文地理学分为政治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等等,地缘政治学即是前者②。苏联有的学者侧重强调地缘政治学属于社会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一部分,认为政治地理是社会——经济地理研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另有的苏联学者认为,地缘政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又是一门政治科学,同时还是一门地理科学;如果只强调前二者可能会弱化该学科的地理学性质,因为该学科研究各国的地理位置和世界政治经济地图的变化,强调国际政治的地域特征;如果只强调后者则可能使该学科失去很多国际政治经济等综合因素的特征。所以,这门学科是"国际政治经济联系的地理学"。中国学者认为,由于地缘政治学"主要研究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及其过程与地理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它属于地理学和政治学相互融合的学科③。综合以上各种说法,可以看出,地缘政治学研究的范围从广义上所涉及到的学科有: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还涉及到国际关系理论

① 《政治地理学》,第2页。
② Doreen Massey, John Allen and Philip Sarre, *Human Geography Today*, Polity Press, 1999, p. 1.
③ 《政治地理学》,第2页。

和战略学等，明显表现出是一门交叉学科。因此，地缘政治学不是一门封闭的学科，而是一门开放的学科，这门学科与各个学科门类相互交叉，在本领域内出现了许多"结合部"。从狭义上讲，地缘政治学在以上各个学科中主要是从地理学和政治学结合的角度提出研究对象问题的。

第四，地缘政治学在学科上的融合性质使它成为国际关系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地缘政治学本质上属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它同有关国际关系格局的学说（例如均势理论）共同构成了这一学派的基础。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地缘政治学本能地倾向于现实主义的视角，最少有"幻想"色彩①。西方地缘政治学从权力政治学中吸收了很大的营养，因此它与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内涵和逻辑上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同样，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学（包括中国、前苏联、东欧国家或日本等）也都被赋予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并且实际上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加以演绎。需要强调的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理论背景和学科定位，地缘政治学与现实主义学派两个基本概念"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强调地理位置和空间以及由此上升到政治意义上的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对国家核心利益和国家权力及其潜力的影响，强调由此而产生的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例如，具体的地理位置和环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生产方式、生产效率等，从而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产生重要影响；地理因素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国土防御形式，从而又对国家的生存利益产生重要影响②。正如布热津斯基所用地缘政治、地缘战略乃至战略等词的含义，是指那些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情况的地理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相互结合，从而对国家利益所产生的影响一样③；我们认为地缘政治是确定、界定国家利益的一

① 《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 85 页。
② 薄贵利：《国家战略论》，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87 页。
③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竞赛方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8 年版，前言。

种有效方法和工具[①]。与此同时,地缘政治与国家权力存在着更为紧密的关系。美国地缘政治学家科恩认为,"地缘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国际政治权力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地理条件是国家权力和综合国力中拥有非常大影响的要素,国内外学者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国内学者或者认为地理条件和人口是国家权力和综合国力的两大基本因素,或者认为地理环境和领土面积是国家权力的两大要素,或者认为地理条件和人口状况、自然资源是国家权力和综合国力有形构成位居前列的三大要素,或者认为地理是"国家强权的最稳定因素"。[②] 需要注意的是,在国家权力的构成中,上述所说到的几大要素都被看做是地缘政治的因素。在国外学者方面,例如在马汉、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阿隆(Raymond Aron)、斯皮克曼的著作里,地理均是位列第一的国家权力要素,甚至"广阔的地缘政治空间同国家权力是同义词"。在马汉所列举的6项国家权力要素中,地理位置和与其相关的领土结构、国土面积、人口等要素异常显眼。在摩根索所列的9项国家权力要素中,就有地理位置和与其有关的自然资源,他认为地理是国家权力的要素,地理形成了国家权力的地理基础,也是国家权力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③]。在雷蒙·阿隆所列的3项国家权力要素中,有"政治单位占据的空间"和资源2个[④]。在斯皮克曼所列10项国家权力要素中有领土状况、边界特征、人口规模、原料多寡4个。柯林斯(John Colins)在《大战略》一书中更特别详细地谈到了构成国家权力的地理成分,地理因素被认为是国家权力中最重要的

① 现实主义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立论的起点是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概念。可参考〔美〕汉斯·J.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一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参见如下教科书:畅征:《国际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冯特君、宋新宁:《国际政治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页;冯特君:《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版,第5页;程毅等主编:《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③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国家间政治》,第152页。

④ 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1966, p. 191.

组成部分[1]。总之,地理因素(以及上升到政治意义上的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是国家权力和综合国力中的最基本的构成成分。

应该看到,广义上的地缘政治学同这里所说的从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意义上理解的地缘政治学有所不同,因为前者会涉及到战后60年代和70年代发展起来的环境理论(包括“人—境”二分的理论),但既然我们把地缘政治学的学科范围限制在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那么环境理论就实际上被划为另外一种理论范畴。这样做的重要结果,是我们这里使用的地缘政治学概念限于狭义的范畴。它具备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主要以国家行为体作为能够从事地缘政治活动的单位,以国家行为和地理因素为主要变量,从中揭示国家利益、国家权力与特定地理条件之间的变量关系。在内容上,它主要包括海权理论、陆权理论、空权理论、生存空间理论和“大陆心脏地带学说”、“边缘地带学说”以及关于国家地缘位置、谋求合理的国际地缘环境的有关理论与战略学说[2]。

第五,地缘政治与国家战略的基本选择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地缘政治学也是以国家战略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它主要探索国家战略受到地理因素影响和制约的条件,探索国家战略如何根据地理条件加以制定。中国古代即有“地者,兵之助也”的名言,把在地缘上“知己知彼”看成是战略的先决条件,认为观察和审视天下大势必须服从“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客观规律。所谓“知己知彼”实际上是知天知地,所谓“地利”指的是地理位置、地理环境和其他自然条

① 〔美〕约翰·柯林斯:《大战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78年版,第312页。柯林斯所指国家力量的地理成分包括以空间关系、主要的陆地形态、气候、天然植被为主要内容的自然地理和以资源(包括农业与森林资源)、工业、人口数量和分布、重要部门的分布、交通网、通信网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与人文地理。

② 有机组织学派(代表人物拉采尔、豪斯浩弗和契伦)、政治景观学派(代表人物惠特莱西和哈特向)、政治生态学派(代表人物鲍曼和范根堡)的观点都从侧面印证了地缘政治学的研究特征。D. Whittlesey, *The Earth and the State*, New York, 1944, p. 3;《政治地理学》,第2页。

件,它与战略行动的时机把握(天时)、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团结程度(人和)被并列为争夺天下、巩固天下的三大要素[①]。美国战略学家柯林斯也认为,地理因素是制定成功战略的首要条件之一,“战略大师们善于巧妙利用自然环境,趋利避害,既承认受其制约,又尽量使大自然为自己服务。”[②]因此,地缘政治因素是国家进行战略选择的空间条件和社会条件,是形成国家战略的重要客观基础,甚至是国家战略执行方面“首先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在分析国家战略形势时,既要考虑到其他国家所可能采取的战略,也要对自己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情形和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联系进行仔细的分析。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对它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有着直接的和重大的影响,所有的战略选择都要与地缘政治状况相适应。正是由于不同的地缘政治条件对战略选择的制约,才会有中国长城、法国马奇诺防线以及以色列巴列夫防线等不同的战略选择结果。正是由于很多国际政治活动均具备地缘政治的背景,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大国,在制定重大对外战略策略时,没有不讲地缘政治的。“那些没有正确理解和错误地利用或忽视地理对国家安全事务的重大影响的、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战略家,往往在国家的威望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之后,才痛苦地吸取教训。”[③]总之,地缘政治的禀赋是影响国家战略和外交活动方向选择的经常性因素,它所反映的不是国际关系中表层的,而是深层次的东西,是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科技和能源等各个方面的因素通过空间联系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及其形式的集中和汇集;这一切因素只有在地缘政治上加以考虑和观照才能变成国家战略选择的基本动力。作为历史学家的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就承认,孤立地看待各种工业产量数字是

① 吴松弟:《无所不在的伟力——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② 《大战略》,第311页。

③ 同上书,第311页。

没有意义的，只有把它们放到特定的历史或地缘政治背景下考察，才能取得实际的价值①。亨廷顿也提出，地缘政治的地图对理解国际政治，进而实施国家战略是必要的②。

有鉴于此，作为研究国家战略与地缘政治关系的特殊理论，地缘政治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它自身充满了很浓厚的“实学”色彩，与那些高谈阔论的玄学恰成对照。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文献中，我们发现“地缘政治”是战略家、外交家和将军经常使用的术语；当他们强调地缘政治学作为国家战略思考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时，他们都知道“地缘政治”一词所处的实际语境是什么，这就是：如果国家在战略选择中忽视地缘政治及其作用，它们就必然受到“地理的报复”。基于此，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和研究国家的对外战略及其相关行为，将地缘政治纳入国家战略的考虑，很久以来就是地缘政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霍尔斯蒂（K. J. Holsti）认为，从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决策理论（the theory of decision making or decision theory）来说，决策过程虽然包含着主观因素，但它也可以作为一种客观过程而存在。就后者来说，它起码包括了对国际系统结构和地缘政治的通盘考虑。而按照德国地缘政治学者豪斯浩弗的说法，地缘政治学是利用地理知识来支持和指导国家政策的一门艺术，它是认识国家的地缘政治特点，认识国际政治格局和形势时所应该使用的基本工具。毫无疑问，如果说均势是国家在认识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方面的“政治导游图”，那么地缘政治学的性质则意味着，它是国家在认识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方面的地理方位图，它可以为各个国家制定和执行自己积极的整体战略确立清晰而有效的地理坐标。

①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45 页。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重建》，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 页。

第二章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学科基础

第一节 地理学:地理差异性

康德(Immanuel Kant)认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物体和现象在空间的配置"[①]。所谓物体和现象,是指地球上的事物,它们的存在形式在本质上与空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它们是以空间实体的形式存在的。所谓空间的概念在一般意义上表示的是事物存在的广延性,地理学上的空间概念则指的是地球上的空间,即以地面为基准,人类活动所能达到或延伸到的范围。因此,地理学的主题是探索地球表面事物的一般排列和存在形式,包括研究地球表面自然和人文要素的分布规律和空间关系;它决定了地理学研究的实质和特

① 《地理学的理论问题》,第51页。

征：第一，严格地说，一切地理的形态在空间上都是三维的，它们在度量上由长、宽、厚三个维度组成，事物的实体形态便表现为三维空间的形式；所以，“地理学是在地球表面三维空间和时间等四个尺度上”，全面和综合地研究地理环境与事物的关系①。第二，正是在三维空间的意义上，地理学把地理差异对地球表面事物排列的影响作为研究的重点，因为地理要素(geographic component)——即地球表面事物排列和分布的空间条件——通常是指那些在空间分布上有着显著差异性的条件，它们决定着地理类型和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在地理环境特征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第三，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面，即人类赖以生存和生活的地理环境的科学。这门科学与人类社会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和人类一般历史的联系，比之其他大多数科学部门要更明显一些。它是关于地表的知识，人们对于它的认识以及由此而采取的行动构成了世界史内容的极大部分”②。同时，由于“地理学是一个公认的具有悠久发展历史的学科，拥有丰富的方法论和具体的工作文献，它是地理工作者长期以来所创立的，大部分性质似乎很难迅速改变”；所以，“世界政治，世界交通，世界经济，世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地理现象，如果不想犯大错误，必须用地理学的观点去研究并阐明它们”③。

地缘政治学的学科基础之一是地理学，其理论形态显然受到地理学主题的影响④。特别是，由于地理剖面的差异性塑造了地球的基本形态，决定了其上载层的基本性质，它对于地缘政治具有天赋的决定性的意义，也影响到了地缘政治学这一学科的基本性质。地理要素的分布规律，特别是地理差异的显著事实对地球三维空间里事物排列分布的制约

---

① 《地理学报》，第34卷第3期，1979年3月，第187页。

② 〔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页。

③ 〔美〕R·哈特向：《地理学性质的透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页；《地理学的理论问题》，第180页。

④ 《历史的地理枢纽》，第5页。

是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客观前提,地理学对地理差异的系统研究是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重要学科基础。至于所谓地理差异,它(们)在三维空间意义上首先反映在海陆之间在地理空间上的平面差异。在地球总面积约51000万平方千米中,海洋的总面积为36000万平方千米,占地球表面的71%[①],陆地的总面积为14900万平方千米,占地球表面的近29%。这便是地球三维空间的第一面含义。在此基础上,地面空间和空中空间在地理空间上又形成了立体差异。这便是地球三维空间的第二面含义。当然,人们对地面空间和空中空间相互区分的认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航空和航天科技)的发展而加深的,在不具备这些认识手段之前人们对空间的理解更多的是局限在地面空间的意义和范围上(这一点特别反映在地缘政治学领域)。由于地球的表面空间范围主要以陆地和海洋两个部分划分,即主要存在陆地空间和海洋空间[②];又由于地球的地面和空中形成了特定的对应关系;所以地缘政治学认识地球空间的基本观点是"世界按地理一分为二",地缘政治在现实世界中的二分是被决定性的和被赋予性的[③]。因此,在自然意义上,地缘政治活动的地理基础或者说空间范围是"地球表面三维空间和时间等四个尺度上"的时空限定。这意味着,迄今为止人类活动、包括国际政治活动的主要空间领域是陆地、海洋以及所能延伸到的内层空间和外层空间。人类就生活在这样的地球三维空间里,国家的行为和国际政治也被限制在这样的范围,地缘政治更是在这样的范围内被决定了它的种种特性。而我们上面所讨论的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其基本性质和基本形态只能受限于地球三维空间和地理学主题的约束。

这里,需要对海洋与陆地的地理差异做进一步的探讨,用以揭示地

① 海洋在地球表面 5.1×10^{8} km^{2} 中占77.4%。《政治地理学》,第329页。

② 例如,所谓"地图"是个大概念,实际上包括地图和海图两种。见《地图的由来》,第1页。

③ 《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总编译组:《战争与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页。

理学主题对地缘政治学性质和特征的影响。正如擅长于分析地表差异的地理学家所指出的,地表上最大的差别是陆地和海洋之间的差别。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均认为这起源于地壳内部构造带有根本性的矛盾运动,只不过对这种矛盾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性质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解释。如"大陆漂移说"即"大陆移动说"的提出者魏根纳(Alfred Wegener)认为,大陆与海洋的区分表明地壳的均衡;而中国古地理学家周廷儒则认为,大陆和海洋的区分表明地壳的不平衡性。尽管如此,他们都着重说明,二者在结构方面根本不同,对自然状态和自然现象的影响也不同。从地壳的演变来看,正是二者的矛盾形成了不同的地理圈,并以相互间的差异对自然界施加影响,从而造成各种自然界的现象[①]。例如,特征和影响各异的气候(尤其是季风)是由陆地、海洋、空气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形成的,也是陆地与海洋冷热差异的结果。虽然就自然界的造化来说,陆海各自的地理形态和分布的形成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它们之间的差异是有机生命赖以生存和演变的地表上最大的一种差异,因为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差异比这更大和更重要。也就是说,海洋与陆地的分隔是最重要的地理结构,造就了最显著的地理形态;而且,这种分隔造成了自然界中多种多样的地理现象,其分隔程度越大,所带来的差异效果和悬殊作用就越大。

因此,"地理学着重描述和解释地球表面的地区差异"[②],其基本思想是根据其空间的差异性,根据空间划分为大陆和海洋来理解地表,这里面包含着地球上各种地理现象间的需要独立出来的因果关系。到处都相同的现象不列入地理学的研究范围[③]。也就是说,一方面地理学必须探索存在于地球空间的各种地理现象,另一方面它必须根据由此产生

① 〔德〕阿·魏根纳:《大陆与海洋的形成》,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5 页,第 363 页;周廷儒:《古地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3 页。

② 〔英〕大卫·哈维:《地理学中的解释》,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9 页。

③ 《地理学的理论问题》,第 241 页。

的所有现象的地理特性去理解各个空间,特别是大陆和海洋。进一步地说,由于地理学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地理学从地球要素的无限变异性中选择那些人类重要的变异性的结论,同样亦解释了地理学研究范围限于作为人类世界的地球外壳的历史事实";"地理学是描述和解释作为人类世界的地球各地方之间变异特性的科学。"①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极力主张,地理学的焦点是区域差异,即地球表面上各个景观的嵌合。因此,地理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它要对已发现的世界的区域差异的事实作出解释,所谓区域差异不仅仅是某些事物在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差异,而且包括每个地方上现象的总体组合与任何其他地方上现象的总体组合之间的差异"。"所以,地理学的目的是提供关于地球表面上变异特征的准确的、系统的及合理的描述和解释"。而且它"力图获得对世界的区域差异完整的认识,因此要从世界不同部分因地而异的各种现象中分辨出仅具有地理学意义的(亦即与区域总差异有关联的)那些现象。对区域差异有意义的诸现象具有地区表现。地区表现虽然不一定是就地面自然范围而言,但它的确是有其范围或多或少确定的某个地区的特征"②。总之,地理学通过揭示地球上的地理差异来研究各地区之间在因果关系上的差异,世界上的事物因地理差异会表现出不同的因果关系;它对地球表面差异现象及其由此产生的因果关系的研究,被自然界和历史的常识证明是正确无疑的。毋宁说,地理学是一门关于世界地理差异的学科,其研究的逻辑基础就是因地理差异而导致的各种可变因素的因果关系。

应该说,地理学思想以关注和解释地理差异为特征,这种观念也渗入其他学科,并在其他学科中获得了更加具体和有针对性的表达。黑格尔曾从历史哲学和社会文明发展的角度指出,地域范围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孕育出了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多种形态:蒙古高原和阿拉伯沙

① 〔美〕R·哈特向:《地理学性质的透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7—48页。
② 〔英〕R.J.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5页。

漠、由大江大河所灌溉的平原地区（即中国等四大文明地区）以及地中海沿岸代表了三种风格迥异的地理形态，衍生出了三种不同特征的社会文明和法律关系[①]。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地理差异促使地区间表现出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方式，同时由地理差异所形成的空间条件是促使世界性交往的重要条件。基于地理学是地缘政治学的学科基础，基于地理学的焦点已围绕着对空间差异和空间体系的研究而形成，惠特莱西（Derwent Whittlesey）和哈特向均主张，“地球表面不同地方的政治现象的差异是政治地理学的本质。”[②]由于地球空间最大的两个部分是大陆和海洋，这两个部分甚至形成了地球的形状，所以，地缘政治必然受到二者之间差异的影响，从而造成不同国际关系现象的空间差异。正如国内学者所指出的，在地理位置所指的国家或政治实体在地球上的空间位置关系中，尤其重要的是海陆关系；它决定着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差异，而这正是由地球基本性质决定的[③]。当然，也正是由于地球地表上以海陆差异为最大差异，不同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因此而有重大区别；所以国家凭借地球作为施展其本领的基本舞台，或以海上斗争，或以陆上斗争，或以海陆斗争，给国际关系历史注入了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内容。于是，首先以海陆关系为主、后来扩展到地空关系的地缘政治，包括在此空间结构中的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就成了各国考虑和制定自己国家战略的地理基准，也就是地缘政治学的基本要素。

地缘政治的现实反映到地缘政治学中自然影响了它的形成和发展，影响了它的理论内容和理论结构的特征。鉴于地缘政治学首先要涉及到关于地球的概念，地球的性质和地球上的空间特征决定了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起点和展开逻辑；又鉴于在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源头和线索上，地

①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历史的地理基础》，上海世纪出版集团1999年版。
② D. Whittlesey, *The Earth and the State*, New York, 1944, p. 3.
③ 《政治地理学》，第124页。

缘政治学是地理学中人文部分与政治学的结合，地理空间的差异导致了政治空间的最大差异；所以，地理学关于各大陆之间的空间关系，关于大陆与海洋之间的空间关系和地球表面与空中之间的空间关系，也就成了地缘政治学必须首先面对的探讨对象。因此，实际上地缘政治学在它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延续了以海陆二分及地空二分为主题的理论主脉，也就是延续了二分论的理论主脉。

从地缘政治学的基础——地理学看，这种二分论的思维导向早就已经存在并得到相当系统的阐释。早期希腊地理学中的米利都学派（被认为在唯物史观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就以地中海一带海洋与陆地的情况作比较，这种对比研究对地理学形成一门整体学科起了重大作用。特别是这个学派的哲学家泰利斯（Thales）关于地球的概念、各大陆间的空间关系概念和地中海海岸线性质的概念，可能是当时最正确的认识。而这来源于对地球的基本特征即海陆关系的认识①。地理大发现主要是就海陆关系进行了新的探索并进行了新的定位。哥伦布（Columbus）通过海洋去发现新大陆，从而加深了对海陆关系的认识，推动了社会进步、生产力发展和世界性联系，也促进了地理学的现代化。按照恩格斯的话说，由于地理大发现，古老的地球疆界被彻底打碎了，“地球才开始成为圆的”②。19 世纪，李特尔（Carl Rittler）从地理范围上将世界进行了两个层次的二分，第一层次是陆半球和海半球的二分，第二层次是陆半球上旧大陆和新大陆的二分。这种二分的主题后来成为德国地缘政治学的主要传统。而拉采尔依据进化论和自然科学法则，把空间和位置看成是影响国家的两个重要因素，认为位置赋予国家所占据的空间以独一无二的特色，人的活动和国家活动都被他说成是空间的产物。基于这种认识，他重点考察了大陆区域的情况，把大陆区域与政治实力联系在一起，宣称人需要有大的空间以及有效地利用大空间的能力，这

① 《地理学的理论问题》，第 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509 页。

将是20世纪国际政治的宣言[①]。所以,后来有人认为拉采尔的地理学思想有着明显的"陆权"倾向。依据大陆与海洋的地理差异,比其他人更明确地提出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思想的是麦金德。他认为,海陆差异对人类社会影响甚大,世界历史基本上是陆上人和海上人之间的反复斗争的过程。虽然在解释历史发展的世界体系时,一些地理学家不同意麦金德的以海上和陆上为基础分为两个对抗的世界体系的观点,但所提出来的划分仍然很本能地回归到麦金德的分析方法上。如利奥·艾默里(Leo Emmeri)的著名三部分划分是:内陆大草原、边缘农业区和临海沿岸区;但在边缘地带经常发生的是陆上人(landsman)和海上人(seaman)之间的斗争。与此相类似的是,有些学者还提出,海上列强和大陆列强——"草原强盗"和"海洋强盗"之间的斗争,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就存在的主题。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其他的一些地理学家(包括后来的地缘政治学家)也充分地认识到海洋世界和大陆世界两个部分并存的事实,并提出了海洋世界和大陆世界的二分法[②]。

以上事实和理论说明,全球地理的基本情形转化成地缘政治的事实,自然会折射到地缘政治学的观念和理论上,地理学基质的不同更会促使地缘政治学形成不同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因此,在我们所要探讨的地缘政治学主流理论中,我们会看到,从马汉和麦金德开始到斯皮克曼和豪斯浩弗,乃至于到今日的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他们的理论本身都体现了一种世界观念,一种对世界历史的地理学解释。在这种历史观和世界观之下,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和学术著作(包括与它相关的地理学和政治学)贯穿着两条主要线索,一是陆权思想和对陆地重要性的认识,一是海权思想和对海洋重要性的认识。以《武经七书》(尤其是《孙子兵

① 李特尔和拉采尔的观点可分别参见《国家战略论》,第184页,《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第42页。

② 参见《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7页,第33—68页。陆上人和海上人是指与以农业文明为主的民族相对的游牧民族和航海民族。

法》)为代表的中国地缘政治思想和以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欧洲地缘政治思想都主要论述了陆权的思想和陆地空间在人类活动、特别是军事活动和战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这样的一条理论发展线索,在麦金德、斯皮克曼和豪斯浩弗那里,变成了"历史性的有力回声"。而最早的地理学和政治学著作都曾研究海洋的位置和海岸线的性质对各国人民的生存方式和民族性所发生的影响①。这样的一条理论发展线索,在马汉和戈尔什科夫等人那里,则发展成为关注海洋在全球战略和国家战略中作用的理论。由此观之,把地缘政治概念引入地理环境与政治过程相互关系的分析都贯穿了一条线索,即关心海陆位置和由此产生的空间差异因素在大国不断进行的政治性角逐和争霸斗争中的意义。对地缘政治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主要人物,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对此进行了极为生动和详细的描述。极而言之,他们在自己的著述中都试图说明世界历史可以在地缘政治上得到解释,其中突出的就是陆权与海权的对抗贯穿了世界历史。

应该看到,地缘政治学中以海陆二分为主的二分论命题在马汉和麦金德那里达到了极致,在斯皮克曼和豪斯浩弗那里获得了重要的发展。他们开始用地缘政治学的逻辑和语言,而不是地理学的逻辑和语言讨论海陆二分的问题,在这样的基点上,也就产生了地缘政治学自身关于海陆二分的一些基本概念。例如马汉的海权理论、麦金德的陆权理论和"大陆心脏地带学说"、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学说"以及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理论",都是这样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它们代替了传统的"陆地"和"海洋"、"陆上人"和"海上人"争斗的主题和概念。就本质特征来讲,地缘政治的现实和理论都具有二分论的性质,这一方面体现在海权和陆权的二分,或过度强调海权的重要性,或过度强调陆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体现在"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二分,或过度强调"大陆心脏地带"的重要性,或过度强调"边缘地带"

① 〔澳〕J. K. V. 普雷斯科特:《海洋政治地理》,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7 页。

的重要性。应该看到的是，这些主要结论所形成的二分对应关系，对地缘政治学中各个学派的后来人是影响巨大的。例如，"谁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世界"和"谁控制大陆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以及"谁控制边缘地带，谁就控制世界"的简明格言，几乎形成了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固定模式，深刻影响了国际政治的进程和性质，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基本理论和对外政策，也深刻地影响了国际政治的思维品质，并且至今仍保持着很大的影响。而在现实国际政治中，地缘政治一分为二的倾向，如大陆与海洋，"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内新月形地带"与"外新月形地带"，陆权与海权，东方与西方，中心与外围，遏制与反遏制，包围与反包围，扩张与推回等，所形成的极为明显的互相对应的关系，也似乎印证了上述几种理论的"二分对应性"[①]。而上述好几个相互对应的概念群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对外政策中通过不同的语汇被人们经常表达着。

第二节　国际政治学：现实主义的二分法

地理学所说明的地球上最大的空间差异是海陆差异，这既是地理性的差异，又是政治性的差异。地理性差异和政治性差异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人们以二分论的视角看待地缘政治。然而，在指出这一点的同时，我们还需看到，地缘政治学作为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也受到其研究传统，尤其是现实主义基本假定的影响。具体地说，其二分论所具有的国际政治学学科基础，来源于国际政治学理论中长期以来就存在并且影响甚巨的现实主义二分法。

我们知道，在西方国际政治主流理论那里，无政府状态被视为国际

① 一些战略学包括军事战略学的著作，在分析战后地缘政治时也支持了这种二分的观点。

社会的基本前提,由于国际社会不存在世界政府或权威力量,而是由分散的主权国家组成的,所以人们非常重视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的根本性差异,从而在国际政治学理论中形成了积习已久和很难被撼动的"国内—国际二分法"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二分法是无政府状态逻辑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也是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政治的分析工具。雷蒙·阿隆(Raymond Aron)、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和沃尔兹(Kenneth Waltz)等著名的现实主义学者便经常告诫人们,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间的关键差异是国际政治的研究起点,它对各种流派的国际政治学理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①。特别是,沃尔兹在对无政府状态进行系统论述时严格区分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这样,他把国际政治学理论中的二分法推演到了极点②。

现实主义的二分法暗含着"国内类比"的理论逻辑,它把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集中在有没有政府问题上,由此延续下来一种把国际政治简单地比附于国内政治的研究传统。国内政治存在中央政府,国际政治没有世界政府,没有什么差异比这更大。因此,二分法的理论后果是使人们对国际政治的认识停留在无政府状态的单一性含义上,对所有国际政治现象的解释都由此来展开。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指出,"无政府状态具有将国际政治与一般政治相区别的特性",而国际政治研究与国内政治研究的前提假设的不同主要在于缺少政府体系③,它带来的是集权化与分权化的问题,集权可以带来秩序,分权则容易造成秩序的缺乏。对二分法进行最明确论述的沃尔兹,更把这看做是无政府状态假设后果的最明确的逻辑表述。在他那里,无政府状态和等级制是两种理想的类

① Raymond Aron, "What Is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XXI(2), p. 190; Stanley Hoffmann, *The State of War*, New York: Praeger, 1965, chap. 2;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13.

② 〔美〕罗伯特·O. 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310—311页。

③ Martin Wight, *Power Politics*, Harmondsworth, N. Y.: Holmes and Meier, 1978, p. 102.

型，但却不是一个统一体，无政府状态更适合于国际政治而非国内政治，国内社会的等级制则正好相反①。在国内社会领域，中央政府集中了权力、制度和法律；而在国际社会领域，权力、制度和法律是非集中化的和分散的，各种行为体在考虑自己利益的时候并不必然遵守规范，因而这一领域体现的是权力、斗争和协调。也就是说，国际社会是权力政治盛行的领域，制度、法律等规范的作用十分有限，权力政治的逻辑排斥着制度、法律等规范的逻辑。与国内社会既有政府又有秩序的情况相比，国际社会可能充满着混乱和无序。可以看出，由于二分法突出了国际社会中缺乏政府与国内社会中存在政府的单一对比，当其逻辑被延伸到国际社会时，囿于以世界政府为国际秩序形成的终结点的倾向，它一方面很自然地把“无政府”引申到“无秩序”这样一个逻辑上，从而使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完全等同于在世界政府缺位情况下不存在任何国际秩序的情形；另一方面，在不存在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如果要建立和维持国际秩序就只能依靠均势和地缘政治的结构力量。而我们知道，所谓均势理论和地缘政治理论正是现实主义学派的两大理论支柱，它们的理论阐释和理论发展也受制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二分的政治性差异。

二分法在解释国际政治各种问题方面的盛行，产生了如下影响：第一，它发挥了无政府状态下的普遍命题，如“国内类比”和对世界政府的迷思以及因无政府而导致无秩序的逻辑。它一方面在复制国内政治方面走得很远，包括康德的世界国家思想和洛克的社会契约思想都未能脱离这种认识。既然把建立世界政府作为促使秩序出现的直接目标，就需要把这一目标的实现作为最终事业，为了完成这一事业，国家应该放弃主权。但另一方面，以世界政府作为确立秩序的终结点，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实际情形。这又使人们可能转向另一个方向，即因世界政府难产所

① 〔美〕大卫·A. 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4 页；〔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五章。

导致的拒绝秩序的倾向。长期以来,认为无政府状态与国际秩序不相容的观点尤为盛行,它否认了国际社会加强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等创造稳定与和平、进而造就秩序的努力,把均势和地缘政治看成是没有世界政府的必然产物。这样,均势理论和地缘政治学完全符合国际政治学二分法的假设前提,并充当了后者的派生型理论。

第二,二分法如果发展到极致容易产生将国际政治理解为权力政治的倾向。由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世界政府缺位的情况只能由国家间的权力政治来替代。权力被夸大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国际政治就是权力政治。而且,无论是对作为个体的国家还是对国家间的关系来讲,权力政治本身是它们战略追求的唯一目的。按照这种逻辑,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把谋求权力、扩张权力和显示权力当作确定性的内容。不管有什么样的长远目标,获得权力总是国际政治活动的直接目标。摩根索说过,"理性的"政治家就是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积累越来越多的权力,权力被视为是目的本身。应该说,除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观之外,即使是对前者进行了一定程度改造的新现实主义(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也未能摆脱权力政治的窠臼,按照某些新自由主义者的看法,沃尔兹的结构概念反而把二分法发挥到了顶点。因为最简明的结构理论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体系只拥有一个单一的权力结构①。在这种现实主义的理论环境中,地缘政治学受到了国际政治学二分法,特别是权力政治学的驱动,并且成为权力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解释工具。追求和积累更多的权力,需要地缘政治方面的权力,这也成为国家战略的努力方向之一。于是,地缘政治学自然成为了权力政治学的一个亲兄弟,并且处处受到其基本假定和理论逻辑的影响。

第三,二分法忽视了国际关系的过程和动态性,倾向于以静态的方式解释国际政治。由于习惯于在有没有政府的问题上对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进行静止和僵硬的比较,二分法的一个弊端是否认无政府

①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154页。

状态下的国际政治作为一个过程是变化的，由此把判定国际政治性质的标准仅仅放在某些固定、凝固的因素上，其中不变的地理因素便是一个常常被拿来衡量国家地位和实力的标准，它也是常常被拿来当作衡量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基本要素。由此，地缘政治受到格外重视。虽然国际社会如同国内社会一样也显然有着动态的特征，它同样会受到多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并会产生各种非常数的和次类型的关系；但地缘政治学与现实主义学派一样，仅只关注国际政治的某种结构性因素，特别是那些凝固不变的地理差异性因素，而不太在乎国际政治过程中产生的多元因素及其动态性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讲，地缘政治学与现实主义二分法是一脉相承的，并且从后者沾染和沿袭了结构主义的静态理论特征。

第四，应该看到，二分法逻辑对国际政治学理论产生了普遍和深远的影响，它在国际政治学理论领域的无限延伸，使对国际政治中的许多问题的认识产生以“二分”划界的倾向，结果导致对国际问题的许多解释都以国际社会中不存在政府作为必要的前提，很多问题被认为是这一前提派生出来的。这样，除了在对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作区分外，人们还容易对善与恶、国家与社会、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权力与道德、混乱与秩序以及战略上的敌人与朋友等问题进行区分。在现实主义理论中，这些区分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是其假定的全部。当国际体系变得不稳定或不确定性增加时，更容易强调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这种对应性的区分①。属于现实主义学派的地缘政治学理论也在自己的发展脉络上深深地印下了这种痕迹，海权与陆权的二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二分，乃至于地缘经济上“核心—边缘”的二分，都是以二分作为划界标准的典型做法。

第五，二分法不仅造成了“无政府状态下的问题群”，而且在这些被进行“二分”的问题群中，问题的另一端，即人性恶、政治、战争、冲突、权

① 〔日〕星野昭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7 页。

力和混乱等问题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结构,它们常常被当作强调的主题和重点而充斥着国际政治理论的许多领域。相反,人性善、经济、和平、合作、道德和秩序则只被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加以讨论,是无须强调的次要问题或者可以忽视的所在。其结果是,上面那种狭隘的"二分",使得国际关系在性质上倾向于对抗,国家行为模式以零和博弈为特征:一方的胜利就是另一方的失败,一方的所得就是另一方的所失。这一点也对地缘政治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尤其在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得到了明显的反映。甚至,地缘政治学这个特殊的理论领域把零和博弈的游戏规则和逻辑表现得更加充分。

长期以来,有关无政府状态的理论使二分法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并在国际政治学理论中得到广泛沿用,地缘政治学就是一个二分法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领域,当国际政治学的二分法与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相遇时,二者自然会产生某种融合的"理论关系";国际政治学的二分差异与地缘政治学的二分差异在这个特定的理论领域形成了"理论分析上的链条"。就生成关系来说,国际政治学的二分法也是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后者的基本理论中所试图说明的最主要的概念,如海权和陆权、海洋空间和陆地空间、"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等等,都是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的国际政治空间形态化的各种具体表现,都是表明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之间差异的空间概念,也都是超脱于地理学的范畴而具有国际政治学素质的重要概念。当然,在指出地缘政治学的这种发展特征时,我们仍然需要强调,二分法存在着严重的弊端。随着国际政治学理论的发展,二分法也受到了理论界广泛的质疑和批评。批评者认为,它使人们无法正确认识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政治问题,严重限制了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融合性理解,使得二分的偏执观念形成了国际政治学理论僵化静止的痼疾,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束缚了它的发展。对这些批评性观点和言论,我们在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中是常常会看到的。

第三节 地缘位置与环境：天赋性、致命性、差异性和可变性

前面我们说过，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是地缘政治学中两个最主要的概念，既然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海陆二分的地理学基础，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看看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这两个概念。

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和斯皮克曼的《和平地理学》都将地缘位置作为研究的起点和重点，斯皮克曼认为这是“阐明安全问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依据”，他的地缘政治理论和给美国政策所提供的建议就是建立在对美国地缘位置和与世界其余部分的空间关系的研究基础上的。斯皮克曼认为，“地缘政治学的分析方法因而仿佛是这样一种思想活动，它牵涉到选择位置和了解空间关系的性质”。“要衡量一国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根据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一国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对决定它的安全问题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地理位置限制和影响其他的一切因素，因为在世界上的位置确定气候带，从而决定经济结构，而区域位置确定潜在的敌人和盟国，也许还决定一个国家作为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参加国能承担多大的任务。一幅鲜明的地理位置图，加上这个国家所在地区的地形情况的说明，就会对了解安全问题提供一个轮廓。”①

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历来是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空间，是国家存在的客观基础和自然条件，也是国际政治发展演变所依赖的必要的环境基质。在国家的地缘政治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它所处的地缘位

① 《和平地理学》，序第2页，第14页，第41—44页。这些观点也得到了国内多数学者的认同，如把国家第一位的要素看成是“位居于地球上某个特定的位置”。见《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第28页。

置。就一般意义而言,这里所说的地缘位置与地理位置是一致的,是指地表上国家与其他地理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通常用方位和距离来表示。当然,如果细分的话,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可分为数理地理位置(即天文地理位置)、自然地理位置、经济地理位置、政治地理位置和军事地理位置等①。其中,数理地理位置和自然地理位置一般是稳定不变的,它们的自然属性比较突出;而经济地理位置、政治地理位置和军事地理位置等则常常受制于国家权力和国家行为过程及其各种因素的变化,它们的社会属性比较突出。需要强调的是,国家的政治地理位置表明它在政治上、军事上与邻国或邻地区相处的相对位置,以及由此所确定的其在政治或军事战略地图上的方位,这实际上是地缘政治的首要基础。当然,上面几种地理位置也可以概括为国家的绝对位置(absolute location)和相对位置(relative location)两种。国家的绝对位置包括数理地理位置和自然地理位置,它是以国家在地球表面的位置作为参照的,标明绝对地理位置的数量关系是很难改变的;国家的相对位置则是以其他政治区域的位置及其互动水平作为参照物的位置。探讨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基础需要对绝对位置的战略意义和相对位置的战略意义作出充分、全面和有深度的评估②。

---

① 数理地理位置以赤道和本初子午线为标志,表明国家在经纬网上的方位。自然地理位置以海陆、地形、平原、山地、江河和气象等自然地理要素为标志,表明国家在自然地图上的方位。经济地理位置以具有经济意义的自然条件或经济事物,如交通线、经济或文化中心等为标志,表明国家在经济地图上的方位。见北大地质地理系《世界地理》编写组:《世界地理》,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第 1 页。国内学者还有的认为,地理位置可分为自然地理位置、交通地理位置和国防地理位置等。自然地理位置是指某一国家与地球上的陆、海、山、河等自然物的空间位置关系,尤其是海陆关系。见《政治地理学》,第 124 页。

② 对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的概念和特征的研究,还可参照 Michael Bradshaw, *World Regional Geography: The New Global Order*,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p. 8; Edward F. Bergman, William H. Renwick, *Introduction to Geography: People, Places, and Environment*, Prentice Hall, Inc. 1999, p. 8. 地理位置的相对性问题,可参考陈力:《战略地理论》,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81 页。

地缘位置是个具有限定意义的概念，乃是指以政治地理位置为中心，但综合了绝对地理位置和相对地理位置二者关系的政治地理空间；它是足以对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产生影响的地缘限定因素，这些地缘限定因素包括国家的疆域结构、领土形状、面积大小和地理位置，以及在这样的范围内所拥有的自然资源、气候条件和人口；但更重要的，它还特别包括由这些条件和因素派生出来的更多的具有国际政治素质的地理因素，如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区域在一定地理空间中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表明国家的地理特征与国际政治某些特征有着密切的关联，与国家权力的大小和国家行为的变化相适应。实际上，每个国家所处的地缘位置都是特定的，它们可能会产生出特定的地缘政治特点及潜力，或者给该国以某种天赋的优势，或者给该国以某种天赋的劣势，从而对其基本生存和自身命运产生致命性的影响。例如，美国受到世界两大海洋3000到6000英里宽水域的天然保护，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缘位置，不仅将它与其他大陆和强国隔开，很少遭到外敌的入侵，甚至确定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同样，苏联的领土面积占了地球陆地面积的七分之一以上，其雄居"心脏地带"的天然位置，使之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在历史上挫败拿破仑和希特勒那样的大规模军事征服。而相反，那些与大陆接壤的国家，就没有这种优势。波兰与两个大国即德国和俄国相邻的地缘位置使它在历史上多次遭到瓜分和入侵。保罗·肯尼迪指出，地缘位置曾经"引起欧洲均势、陆军和海军两个方面的力量对比的动荡变化。……同时它还表明了地理因素的重要性。这里所说的地理因素不仅包括一个国家的气候、原料、农业生产力、可以利用的商路等因素，尽管这些因素对一国的全面繁荣强盛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指每个国家在这些多边战争中所处的战略位置这样一个关键问题。"[①]总之，一个国家的地缘位置优越，可使它在国际关系中占尽战略优势，并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主动的地位；而一个国家的地缘位置不利，则往往使它在战略上低人一等，

---

①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页。

在国际关系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同理,就一般意义而言,地缘环境和地理环境也是有着一致之处的,只不过二者的限定意义有所不同。地理环境是地球表面各种地理要素长期互相作用的产物,是由无机环境(天体、地形、土壤、气候、自然力、天然产物)、有机环境(植物、动物、自然界的生物作用)和人口状况组成的复合的和完整的系统。但国家的地缘环境则被限定在政治意义上,它特别表明一个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空间关系状态,表明它们之间互为参照的空间条件,从而表明国际关系的空间形态。也就是说,这里所谓的地缘环境,是指国家这一主体和由这样的主体构成的国际关系所面临的各种空间背景和条件的总和,它与我们常说的国际环境实际上是相同的。因此,地缘环境比(自然)地理环境的内涵更狭义,但也更复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条件下,地缘环境对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但都对后者拥有无法抵触的制约性。国家在地缘环境中所进行的活动既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又可能表现出相似的特点,从而会引起国际关系在空间上的分布和发展方面的差异特征。我们把足以影响和制约国家战略,并对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产生直接、间接影响的环境,称为地缘环境或地缘政治;作为一个复合的和完整的系统,它与地缘位置一样也是任何国家制定和实施战略时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在历史上,地缘环境由于受到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权力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也就是说,某些人为的因素可以对地缘环境施加某种作用,从而引起它的相应跟进变化。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地缘位置不仅表明国家间的相对地理位置产生的利害关系,而且是复杂的国际关系在地理空间中的表现;地缘环境则表明这种复杂空间关系的动态性质。综合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地缘政治的基本特性在于,它具有天赋性、致命性、差异性和可变性。

地缘位置的最基本特性是它的天赋性，"尽管时间在流逝，历史在演变，国家的地理位置是恒定的。"[①]国家的地缘位置是天然的客观存在，而非人为设定的，也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因此，在一定的天然地缘范围内，地缘位置具有一定的不可更改性和不可选择性。中国学者把地缘位置的天赋性称为客观性或相对稳定性，并认为它是"国家强权最稳定的因素"，在任何时候都会影响国际关系[②]；同时与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比，地缘位置等因素对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是较为直接的，也是比较确定的。西方有的学者则把地缘位置的基本特性称为"地理惰性"[③]。地缘位置所具有的天赋性说明，国家只能在一定的空间范围中从事内外活动，国际关系的组合变化也只能受到各种各样的空间条件的制约。例如，国家位居陆地、濒临海洋或是岛国的空间状况都是不能移动的，与别国接壤或隔海相望的情况及边界领海问题也都受到天生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的地缘位置所限定的空间范围内，国家的疆域结构和形状及自然、气候、资源等的分布都是与生俱来的，它的资源分布不平衡和气候、地貌条件的差异影响着它的潜力。马汉就说过，人们可以在位置适合之处积聚力量和资源，但无力将一个地点的本身并不优越的位置予以改变，因而位置应成为首先关注的所在。力量和资源可以被人为地供应或增加，但移动一个位于战略影响范围之外的港口却不是人力所能胜任的。若将直布罗陀搁在大洋中间，那它的力量也许会四倍

① 陈洁华：《21 世纪中国外交战略》，时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 页。

② 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68 页；《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第 27 页。

③ 麦金德就认为"地理惰性"，即地理制约性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地理位置是由"地理惰性"决定的，可被视为初始位置。它的作用会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增长。人口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没有意志的群体，他们完全受"地理惰性"规律的力量左右。这里，麦金德把地理位置的作用吹得过高，甚至进而提出了他那著名的三段论式的断语。参见《地理学的理论问题》，第 77 页。在《历史的地理枢纽》第 62 页中，麦金德也指出，"在计算时，地理的数量比起人文的数量来可以更好地测定，更接近于稳定不变。因此，我们应当期望能找到既可用于过去历史、也可用于当前政策的公式。"这实际上是强调地缘位置的相对稳定性。

于今天，但在军事上它将一无所用①。特别是，地缘位置所受到的陆地与海洋之间差异的影响，更是它本身具有的天然传承性的表现。在这方面，值得重视的是，国内外学者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地理（主要指海陆地缘位置）是构成国家力量的一个长期不变的最稳定的因素。摩根索说过，一国权力所依赖的最稳定的因素，显然是地理，因为它决定了该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无论其他因素在历史的过程中如何改变它的重要性，两千年前重要的东西今天仍然重要，并且所有关心外交活动的人都必须考虑到这个因素。"②即使那些强调权力政治的西方学者也承认，权力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帝国是短暂的，正像对于个人一样，谁的支配地位也不能永久保持不变。但权力自身是牢固地植根于世界的自然性质之上的。现代国家的力量来源于它所安身立命的领土③。而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们常常认为"力量对比"或"权力均衡"是重要的，但何时达到力量对比的平衡或权力的均衡，各方各执一词，唯有地缘政治的标准是恒定的、显见的和明摆着的。它是考虑国家权力的重要基础。正是由于国家所处的地缘位置是天赋的而不是人为的，所以，国家所从事的国际和国内活动都受制于它所在的一定的地缘位置和由此限定的空间范围，换言之，一定的地缘位置和空间范围会制约着其各种政治行为及其展开。国家构成的首要要件之一就是领土范围即整体空间要素，这里就有一定的地缘和地域范围要素的限制。

进一步地说，地缘政治的天赋性使它对于国家的基本命运来说具有致命性。地缘位置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国家的大多数活动都是依托一定的地缘位置进行的，它所具有的稳定性或不可更改性都会对许多国家的存在方式产生致命性的影响，是它们在生死存亡高度上必须

---

① 〔美〕马汉：《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50 页。

② 《国家间政治》，第 152 页。海陆地缘位置也被认为是构成国防的基本要素，参见王普丰主编：《现代国防论》，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 页。

③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 1 页。

考虑的问题。如若对此稍有疏忽，就会置自己于任人宰割或欺辱的境地。在这个意义讲，地缘位置决定着一个国家最起码的生存需求，是影响国家利益变化的首要因素。另外，国家所拥有的特定的地缘位置，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国内部的发展，而且也影响到它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如果忽视这些，同样会对国家造成不利的影响。实际上，各个国家的战略或国家集团的战略都受到地缘位置的根本性影响，它们都会根据这一点来考虑自己的战略制定和推行。

在具有天赋性和致命性的同时，地缘位置的另外一个基本特性是它与参照物相比所表示的地缘差异性，地缘差异性的历史性积合和沉淀，导致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不同地缘性质的国家和政治区域，导致了不同性质的权力因素和权利因素的汇集，使国家间因相对的地缘位置产生相对的利害关系和权力对比关系，从而显示着国际关系在空间上的不同结构和特征。如果仅仅根据国家的地缘位置划分，国家的地缘类型可分为内陆国家、沿海国家、海湾国家、群岛国家、大陆国家。其中，有全部位于海洋中的岛国（日本、英国、古巴、马耳他），也有位于大陆内部、不邻海洋的内陆国（蒙古、瑞士、玻利维亚、赞比亚），有全部位于高山之中的山国（瑞士），也有全部位于平原的低地国（荷兰）。这些表明国家地缘差异特征的概念和分类，是研究因地缘关系所引起的国际问题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国家战略中地缘因素的重要依据。尽管这些地缘因素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会受到其他各种因素的推动和制约，但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参照系数，常常受到人们的重视。地缘政治除了强调国家和政治区域的地缘位置固定差异的重要性外，还特别强调它们在国际政治结构中的差异位置，它表明国家或政治区域的地缘特征与国际政治基本特征有着密切的关联。实际上，从地缘位置和国际政治位置相结合的角度，国家类型又可以依据二者共同的差异性而区分为陆权国和海权国，政治区域类型可以区分为“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姑且不论如何评价陆权学说和海权学说、“大

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人们都承认依托于大陆和海洋、"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等地缘差异因素所形成的陆权和海权确实对国际政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国际政治中形成了陆权和海权两种极为稳定的国际权力或国际影响力,从而也使国际政治形成了不同性质和特征的政治区域和空间分布。在某种意义上说,地缘差异性也就是国际关系中的空间结构性的一种反映。

与地缘位置不同,地缘环境具有一定的可变性,或者从后结构主义地理学的角度看,地缘政治空间等人文空间是与物质空间不同的"可塑的空间"(plastic space)①。这种可变性或可塑性对国家的战略选择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如前所述,地缘位置是天赋的、固定的和不能移动的,但地缘环境则是变化的和动态的。由于地缘环境是由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心理、历史等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要素互相交织、互相联结、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而共同发挥作用;在这种作用的推动下,地缘环境会发生多种多样的变化。战争的爆发可能使地缘环境巨变,和平时期的联盟也可能使地缘环境发生与前者不同的变化,而经济全球化则可能使地缘环境更多地受制于经济要素流动的情况。在一定条件下,地缘环境可能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在另外的条件下,地缘环境又可能发生突变式的变化。无论发生哪种变化,都会对国家战略造成重大的影响。尤其需要说到的是,当把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联系起来时,前者所表示的地缘地位和潜力也具有某种动态的性质。可以举出三个例子来加以说明。第一个例子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地中海一直是欧洲通往其他地区和联结东西方的主要通道,但好望角的发现使地中海丧失了这一优势。而作为战略要地的好望角,又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其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价值骤然下降。第二个例子是:曾经长期被英国视为地理优势的岛国位置和具有阻挡外敌入侵的天堑——英吉利

① Marcus Doel, *Poststructuralist Geographies: The Diabolical Art of Spatial Scienc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18.

海峡，随着海底隧道的开通，其原有价值部分地丧失，英国岛国地位的优势作用也就此大打折扣。而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和美国实现对其控制，使美国的疆界在事实上被推进了数千英里，并使美洲国家的政治体系更为紧密，美国的战略地位就此大大改善了。正是基于此，马汉认为，加勒比海成为美国控制力的天然来源。第三个例子是：在 1967 年阿以战争中，关闭苏伊士运河严重影响了通过该运河的海运航行，但却大大优化了欧洲西部北部沿海国家的经济地理地位，相形之下，欧洲南部便大受其负面影响。这是因为，作为物化形态的地缘位置虽然是不变的，但地缘环境是可以改变的，在地缘环境即地缘位置的外部条件变了之后，地缘位置的基本素质也会随之受到影响，人们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更是经常发生变化。因此，虽然地缘环境的核心是国家的地缘位置，但它更多地表明与国家地缘位置有关的多种外部空间条件。地缘环境不仅含指那些凝固静态的因素（如领土和地理位置），而且更主要的是涵盖国家之间在空间上的动态关系。

不过，与地缘位置所具有的第三个特性一样，地缘环境的可变性中最主要地受到地缘差异性的影响，地缘差异性使地缘环境的变化既多种多样又显然受到一定不变因素的制约和牵制，尤其是海陆之间的差异会给地缘环境带来重大的区隔性的不同，又使各自的地缘环境呈现出自身不可更改的特质。例如完全的大陆地带与濒海地带就有性质上的区隔，当大陆地带的地缘环境发生变化时，它不会脱离大陆地带的基本地缘素质。濒海地带同样如此。又例如，在许多地区冲突中，虽然有其他原因，但强者与弱邻这种比较确定的差异关系仍然是原因之一，尤其是邻接和靠近地区性强国的国家常常遭到入侵。这是难以改变的事实。但无论如何，地缘环境所呈现出的是一种较之地缘位置更为错综复杂的局面，虽然地缘位置是不可变的，但地缘环境常常会随着国界的改动、战略联合、结盟、势力范围划分和缓冲地带的建立而发生变动。斯皮克曼认为，专门的地缘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

一方面由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的转移所决定的一些区域。他还说,“因素有许多,有永久性的和暂时性的,有明显的和隐蔽的;除了地理以外,还有人口密度,国家的经济结构,人民的种族结合,政府的形式,外交部长的心理状态和爱好以及人民所持的理想和价值,这些都是因素。”①由此可以看到,地缘环境具有可变性、多变性或因地缘变化引起的非必然性。地缘政治的实质性变化最终会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变化产生影响,使各个国家处于和平的环境或战争的环境。一旦地缘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对于许多国家来说都是致命的,特别是一些国家如果不能适应那些突发性的变化,就会处于极其不利的处境。

地缘位置既定,地缘环境可变,因而地缘政治是不变性和可变性的统一。美国著名政治地理学家索尔·科恩认为,“地缘政治分析的实质问题,是国际政治大国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但地缘政治观点又是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这种变化性质的认识而改变的。”因此,地缘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它探索的是国际政治现象空间组合的地理轨迹,其主要特点就是研究因地缘差异性所带来的动的形势,而不是静的形势。国际关系中地缘差异性的存在和由此引起的地缘条件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可能进一步影响到结局。其中,无论如何,正因为地缘政治学以空间的、横向的眼光考察国际关系,所以国家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制约关系是具有一定规律性的。地缘政治虽然复杂多变,但并不是混沌无序的世界,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来运行的。地缘政治学家认为,地缘政治的世界是“一个巧妙结合而成的机制”,地缘政治学则是要研究这个“机制”如何运转以及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②。

从其所具备的国际政治素质和自身的基本特征来看,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对国际政治的现实影响是:第一,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对国家地

① 《和平地理学》,第15—16页。

②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3页。

位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一方面在于，国家利益深深植根于地缘政治的条件之中，国家利益的实现和国家权力的构成必须以其为基础；另一方面在于，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足以产生出巨大的国际政治潜力和能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国防上都有着重大的价值。从一般意义说，只要国际政治的活动被限制在地球空间，一个国家的地缘位置就会影响该国的自然资源拥有量及分布，从而影响到国家的力量和潜力。国家的地缘位置，特别是海陆分布，会影响到它是否能够获得国际政治的资源和潜力，以及能够获得多少国际政治的资源和潜力，从而可能决定它作为强国或弱国的地位。因此，在综合国力的评估中，地缘位置非常重要的国家要加分，如日本因占有重要的海洋战略位置多加 90 分，埃及、南非、土耳其各加 5 分①。在历史上，地缘位置本身就对国家战略产生重要的影响，它既可能为一个国家提供某种机会和条件，也可能严重地限制一个国家的某些政策和活动。在和平时期，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因素与国家地位和国际政治的变化息息相关，在战争中更是如此。

第二，地缘政治对于国际关系整体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地缘政治要素是国际关系的基本构成要素。这一是在于它首先强调国际关系的地缘基础，国际关系本身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要依托于一定的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作为活动的舞台和范围。对于国际关系中的各种角色来讲，没有地缘条件，就像演出时没有舞台依托一样；没有地缘范围的限定，就没有相互之间的固定关系和活动性质的判断。同时，没有相互之间关系的距离感，也就没有国际关系分布的格局，因为所谓国际格局，就是一种国际间的地理与政治相联结的构图，就是一种由国家建立在地缘政治基础上的相互联结的结构。所以，非常清楚，国际关系存在着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的结构性分布的基本特点。构成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都是处于一定地缘位置和空间范围的力量角色，包括联盟也是在这样的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并受到这种范围的限制甚至牵制。二是在于具体而

① 黄硕风：《大较量》，湖南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9 页。

言,地球上海陆位置及其相互关系是国际关系得以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基本空间,是国际关系的结构得以内构的主要前提,也是国家等国际主要行为体从事活动和进行选择的主要背景。地球上海陆位置的确定性与资源和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性,共同对国际关系的内在结构发挥着相对稳定和持续的影响,并使国际关系在地缘政治上形成了"陆地政治地理格局"和"海洋政治地理格局"两种主要结构[①]。三是在于能够成为国际关系中主要角色的国家或其他角色,应该具备较强的综合国力和一定的地缘政治优势这两个最重要的条件。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发达国家,而且国土面积很大,但它们不是地缘政治的主要势力,因为它们不具备地缘政治的优势。当然,作为反例的希腊地缘位置重要,且是一个伟大的海洋民族,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船队,但它不是一个重要的地缘大国,因为它不具备强大的综合国力。所以,只有像美国、俄罗斯、中国这样的国家,才具备着上述双重条件,是典型的地缘政治大国,可以充当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力量。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地缘政治的优势,乃是在于它们能够较好地驾驭和处理海陆空间关系。

第三,它们对国家战略的影响是很大的。正因为地缘政治具有天赋的或先天就有的性质,也具有在这种天赋性质基础上的一定的可变性或可塑性,故而无论哪个国家,要准确地制定和有效地推行国家战略,都必须首先客观地认识和把握自己的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凡对此认识有偏差或草率行事的国家,都必然造成国家战略上致命的失误。作为一个巨大的现实,地缘政治是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人们对地缘政治的改组,只能在这种天赋的或先天就有的性质和其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超出这种性质和范围进行地缘政治的改组,是不可能的,也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摩根索就指出,"权力均衡在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都受到地理限度的制约"。征服如果是毫无限度的,那它就可能成为征服者

---

① 《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第35页,第37页。该书还认为,除了这两种主要的"地理格局"外,还有一种"战略要地格局"。见该书第40页。

的包袱而不是资产[1]。同时，地缘政治的差异性也可以使人们充分利用地缘政治中的优势和避免地缘政治中的劣势，具体而言就是充分利用海洋空间和陆地空间的差异所可能导致的优势和避免这种差异所可能导致的劣势。就此而言，衡量一个国家的战略选择是否得当，主要看它是否能够成功地适应它自己所处的地缘环境，特别是自己所处的海陆空间环境，同时要看它是否能够在这种环境中获得发展。对于国家战略来说，地缘政治的优势取决于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的统合，取决于空间和权力的对应关系，取决于海陆关系的很好处理。从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及其对国家对外政策的指导作用可以看出，地缘政治对国家的决策存在着重要影响。它既是确定和界定国家利益的一种有效方法，又是推行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界标和手段。对地缘政治的清醒认识是在外交上纵横捭阖的一个认识基础和政策源头之一，实际上很多外交行为是从地缘政治环境中物化出来的。在这个坐标下，国家和作为国家人格化体现的各国政治领袖才能取得在国际关系中的“意志自由”——因为虽然它(他)们都怀有地缘政治上的抱负，地缘政治甚至是他们治国安邦的工具，但他们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善用地缘政治的条件。

① 《国家间政治》，第433页。

第三章 海权和陆权的二分

第一节　海权论与海陆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以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7—1783》等著述，首先提出海权论（或称"海洋优势论"、"海军制胜论"及"海上战争论"）。这一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是，地理大发现已经大大促进了航海业的发展，工业革命对西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蒸汽机车和铁路将少数欧洲最发达的国家连接起来，但在世界性范围的联系方面，海上交通起着无可替代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汉阐述了一个与陆权论完全相反的看法，即海洋这条"伟大的公路"一直是历史的主导成分，而且是国家富强和实力地位的基本决定因素。这一事实扩展到对国

际政治的影响上，就是海权（sea power）成为拥有国际政治权力的关键：谁能有效控制海洋，特别是控制世界上具有战略意义的海道与海峡，从而取得海权，谁就会成为世界大国。正是根据海权论，马汉曾预言一战中德奥匈必败。这一点被后来的事实所证实，但一战爆发那一年恰好马汉逝世，他自己没能看到协约国对同盟国的胜利。尽管如此，马汉的著作在其身后“几乎已经被认定是走向康庄大道的天赐良缘的指路标”[①]。

马汉的分析是以海洋历史的发展为依据的，他认为，在历史上，海洋是自然界赐予人类的通衢大道，其作用无法用陆路取代[②]。相对于大陆自然条件的破坏性和严酷性，海洋是创造性的和进取性的，具有人类善用的便利之处。特别是在近代，蒸汽动力的使用增加了海上交通的通达性和机动性，使人类在利用海洋方面具备了更好的手段。正因为如此，海洋的重要性随之增加，它就像一条面朝四方而且四通八达的宽阔马路，人们在选取行动的方向上不仅不会遇到任何障碍物，而且是完全自由的。尽管人们也许会意识到海洋的风险，但由于海运比铁路占有优势，它对各国间贸易、交通和政治联系的价值很难被人怀疑。与海洋相比，依托陆地的“心脏地带”（主要是俄国）自然条件恶劣，而这很难由陆地版图的拓展予以抵消；相反，陆地版图的庞大还增加了行动的困难。例如，即使俄国接近海洋或取得出海口，由于这些地带与其核心部分相距甚远，其间又需经过充满自然障碍的广阔的陆路地带，因而俄国无法抵御自身所具有的地缘局限性。无论怎样，在历史上，海洋曾经充当着权力政治中的支配势力，海洋国家是人类的先驱和不断产生进化活力的所在。例如，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战争就说明海洋的天然便利之处使海权容易攫取战略上的优势，海权在战争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因此，“当海洋不仅成为边界，或者四面环海，而且还将一个国家隔开成两个或更多的部分，那么对于它的控制就不再仅仅是众望所归，而且也是绝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5—16页。
② 《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对必需的了。这样一种自然状况要么产生和增强海上霸权,要么就使得国家变得软弱无力。"①

马汉认为,海权拥有毋庸置疑的国际政治权力价值。虽然长期以来占据陆地空间和掠取陆地资源被视为国家权力和声望的象征,但在那些海洋国家看来,这与占据海洋空间和获得海上利益相比要逊色得多。它们所得到的历史告诫是,衡量国家的繁荣与强大的主要标志是能否获得海权。法国人曾经迷恋于聚敛大陆上的财富而轻视海洋的价值,这不仅使它难于取得海上强国的地位,而且使它逐渐丧失了在欧洲大陆的强势。而具有利用海洋能力的国家比大陆型国家更有潜力获得大国地位,例如那些岛国比内陆国家就处在更优越的战略地位上。由于大陆地块都被海洋所包围,由于海上活动针对陆上活动的固有优势,海权比陆权更便于控制世界。马汉指出,就影响一个国家海上实力并决定它能否取得海权的主要因素而言,有六个指标值得重视,即: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陆地形状、领土结构、人口、民族特征和政府品质。在前三个条件中,海岸线的长度和港口的质量起着很大的作用,它们比领土范围更重要。同时,所谓海权不仅包括海洋上的军事力量,也包括和平时期的贸易与航运能力②。

海权论无疑意味着,海权在地缘政治中拥有最重要的作用,要取得海权必须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马汉认为,海上力量曾经对于历史产生过巨大的确定性影响,在现实中要控制辽阔的海洋,就必须建立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强大的海军并以海军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主要军种,以海军发展为决胜之本。与陆上力量相比,海上力量具备更强的机动性,它不仅可以在国家本土和周边发挥作用,而且可以把影响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地区;它不仅能够有效地从事战争行动,而且还能够达到商业控制的目的。因此,海上力量发挥作用的范围比陆上力量更广泛,也更有效,其

① 《海权论》,第40页。

② 参见上书,第29—58页。

影响甚至可能跨越洲际和涵盖全球。就此，马汉进一步指出，凭借海洋商业和海军优势控制海洋意味着在世界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不管陆地能产出多么丰厚的财富和强势的权力，都不足以产生像海洋那样的巨大效果①。在终极意义上，夺取海权是战争的基本规律和制胜的必要条件，它也是和平年代成为大国的必要条件。

马汉海权论的分析基础是英国的实例。作为欧洲岛国的英国，控制海洋霸权和欧洲霸权分别长达两个世纪和一百多年，并且成为当时最强大的世界帝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具备六个成为海权强国的条件：第一，是岛国。这一点与法国不同，保卫国土不需要维持强大的陆军力量，因此能够集中国力建设海军力量。第二，拥有良港。与荷兰一样，英国国内资源匮乏，但有许多良港，这些良港培育了船员、商人和殖民者。第三，拥有与海岸线的长度成正比的人口。第四，有大量从事海上工作的人民。第五，人民定居于殖民地，并开发其资源。第六，政府一贯坚持建设海上力量的政策②。虽然英国与荷兰和西班牙相比曾经是后起的大国，并在地缘政治竞争的开始阶段处于劣势；但相对于西班牙的雄厚力量，护国主克伦威尔的海洋政策十分重视海军力量，并将之视为长期的国策。马汉认为，英国的崛起是以它成为海军强国和拥有强烈的海洋意识为前提的，英国的地理位置有助于它扩充力量，它曾经控制了除巴拿马运河之外几乎所有的世界重要海道，包括多佛尔海峡、直布罗陀、马耳他、亚历山大、好望角、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以及圣劳伦斯入口。这意味着，世界的主要航道成了其“内部交通线”。“可以指出的是，如果一个国家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上，既用不着被迫在陆地上奋起自卫，也不会被引诱通过陆地进行领土扩张，那么，由于其面向大海的目的的单一性，与一个其四周边界皆为大陆的民族相比，它就具备了一种优势。这一点，作为一个海洋强国，英国就拥有对于法国与荷兰的巨大优势。”

---

① 《海权论》，第 375 页。
② 〔日〕伊藤宪一：《国家与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4 页。

"就其自身而言,地理位置可能会达到提升或分散海上军事力量的地步。在这一点上,英伦三岛再度拥有法国的优势,后者的位置,除了濒临大西洋以外,也伸向了地中海。尽管这有其长处,然而,总体上而言,却是海上军事力量薄弱的症结所在。"同所有的欧洲国家不同,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距离适中,这样它既可以对陆上潜在的敌人实施有效的攻击,又可以使自己免于入侵的威胁,英国的舰队还可以从其战略基地方便地集结以进行防御或对大陆港口实施封锁。在马汉的分析中,一个优势强国的地理位置需要兼具政治、军事和心理各个方面的优点,"英国的状况就每每与此相符"①。这些优越的条件使英国在处理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时占尽了上风。除了保持一支强大海军以保全自己外,英国还绝对不会放弃海上的主宰地位,这也是"生死攸关的事情"②。因为英国和其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使它必须保卫后者。不过英国不需要在其殖民地所处的海域都保持海军优势,只要将这种优势集中于欧洲地区即可,因为针对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而言,欧洲依然是采取攻守行动的基地所在。在这样的国家战略之下,英国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权国家,"在蒸汽与钢铁的时代中,它保持在风帆与木材的日子里所拥有的那种优势。"③

虽然英国的历史记录不免被后人戴上了一顶"海上帝国主义"的帽子,而且其欧洲霸权在地缘政治上的主要表现被认为是谋取海上霸权,但它至少给人们带来三个启示:一是海洋作为世界的公共地带,是国家走向强盛的必由之路和生命线;谁离开了这块公共地带,谁就会丧失国家权力和强国地位,包括英国这样的帝国也会退缩为撒在地球上的"列岛的粉碴"。二是谁能够保持强大的海权,谁就能掌握和控制大陆地区内部的均势,从而对陆权保持一定的优势地位。三是强大的海军力量、便捷的商业和航运能力以及遍布世界的殖民地,是保证海权的基本条件。

---

① 《海权论》,第29—30页。
② 同上书,第150页。
③ 同上书,第48页。

值得注意的是，与对英国的看法大为不同，马汉对美国运用地缘政治的能力评价并不太高。但马汉对美国地缘政治的论述重点在于以海权论警示当时的美国人要增强地缘政治的观念，这也是美国后来成为主要海权国家的历史注脚。马汉总结说，美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弱点在于：第一，当时它不具备十分接近海外贸易中心的港口，更谈不上控制世界上的主要航道；因而比它没有充分认识到海洋的商业价值更为严重的是，它没有能够实际利用海洋的商业价值。虽然美国在面临敌手的贸易时并不会那么脆弱，但无法成功地抵御别人的商业破袭。与美国不同，英国是上苍安排的这样一个国家，它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公海，控制着世界航运的咽喉要道。对海权和海洋利益的清醒认识与其地理位置的战略价值几成正比。第二，美国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沿海军事防御的能力很低。两相对比，美国在一段时间之内甚至可以说处于地缘政治上的“空防”状态。第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没有明确的意识去建立和发展海洋及其与海洋相关的职业部门，因而竟然缺乏建立和谋求发达海权的一个重要基础。第四，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缺乏谋求海权的战略意识和国民性格。对多数美国人而言，长期以来他们的眼界并未因面临海洋而伸展到海洋，因而并没有产生过多少关于海洋和海权的意识；甚至他们对国际问题都抱以无人理睬的态度。这是导致美国在外交上采取孤立主义的重要原因，也是其在地缘政治上忽视海权的重要原因。第五，美国的海军力量尚不够强大。马汉抱怨，美国所具有的优势来自于天然的禀赋而不是睿智的准备。美国可悲地无法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发挥与其在该地区的利益相匹配的影响，美国还没有足以在该地区冲突中发挥作用的举足轻重的海军。美国海军只是能够执行护卫自己海岸的任务。在加勒比海之内及其四周，美国没有占据像许多其他强国所拥有的地盘。美国在墨西哥湾甚至没有构筑一个海军码头以作为美国的行动基地。美国不是缺乏建立和欧洲大陆国家各主要海军同等强大的海军的办法。可是，事实是，尽管美国有着大量的收入盈余，但对

应于海岸长度和暴露地带,它依然显得贫穷[1]。基于以上几点,美国尽管有着天赋的地缘政治之利,但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美国很难高枕无忧,因为它存在着地缘政治方面的显著问题,尤其是对海陆关系还缺乏必要的应对战略。这就给美国造成了很不利的结果,即很难说美国是北美大陆的陆上强国(充其量只是一个二流国家),也很难说它是一个海洋强国,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如果其他拥有优势海军的国家控制了加勒比海、特别是在地峡之间,就会给美国带来安全上的致命威胁,其太平洋沿岸地区显然将遭到更大的灾难。由于美国没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和海外基地设施,它不仅很难保卫近海和海岸,而且还可能招来欧洲列强的方便入侵。如此,哪里谈得上去夺得海权和成为海权强国了。

就此,马汉提倡文明代表者的尚武精神,把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看成是决定政策效果的最重要前提。鉴于当时美国还缺乏一支足以肩负起重任的海军力量,它需要把建立一支强大海军的潜力转化为现实。"要显示强大的实力,必须建立一支相当力量的海军。没有海军,美国在紧要关头所表达的国家意志也就仅仅成了一个泥足巨人所做的笨拙无用的姿态而已。"[2]马汉强调,"以战争为其表现天地的海军是国际事务中有着最大意义的政治因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根据时代和国家所处的环境,美国应给予其海军应有的关注,大力地发展它以使之足以应付未来政治中的种种可能。"[3]他还说,"不管发生什么,海权在当今年代将扮演它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扮演过的角色;而美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必定成为向文明世界的海权提供动力的前沿地带之一。"[4]为此,需要为这个国家缔造一支强大的海军,并应该使其影响无所不在。既要能够以武力手段阻止其他列强在美洲大陆上扩张地盘,又要能够保护自己

---

① 《海权论》,第 301 页。
② 同上书,第 289 页。
③ 同上书,第 396 页。
④ 同上书,第 375 页。

的海外利益。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应该妥善处理海陆关系,争取在国际关系中做一个兼具海陆优势的强国。

应该看到,马汉不仅是海权主义者,也是一位在对外政策领域的思想家。马汉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存有甚大的忧虑,但是这显然是智忧。因为在当时美国政界流行的政治教条是外交上的孤立主义和军事上的保守防御思想。而他大力破除了美国保守主义(孤立主义的国内兄弟)的教条,也破除了"只是为了防御"的战略思想。他强调,应该高度关注所有其他一流文明大国身上普遍存在的前冲势头。"我们的国家受缚于、沉迷于我们自己的18世纪传统之中,为对于和平和富足——也就是要有充足的面包——的大量要求所包围,紧抱着孤立主义理想不放,拒绝承认整个欧洲文明世纪必须以一致的利益为基础来企盼、迎接未来。"对此,马汉的态度是,应该把在美国大多数人身上所体现的前冲势头挖掘出来,并抛弃给这种势头人为设置的种种阻碍[①]。而他提出的海权论恰恰是促发美国人对国际事务采取更加积极姿态的一副清醒良药。

如果说马汉在英国和美国问题上对海权的战略地位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从而强调了海权论的基本思想,那么,他对亚洲问题的分析,则加强了对地缘政治海陆二分的论述,因为他分析了他的理论的对立面——陆权,而且特别地论述了海上强国英国与欧亚大陆强国俄国之间的关系。人们知道,在世界各地没有比亚洲局势更能体现地缘政治的二分结构了,19世纪英俄之间所进行的"世纪大角逐"就发生在亚洲的"边缘地带",它们分别从海洋一面和大陆一面向这一地带挺进,严重影响了当时亚洲的地缘政治布局,并使海陆二分的矛盾关系变得格外突出。马汉认为,亚洲和欧洲国家的地缘状况和相对力量,包括政治经济力量和陆军与海军力量,也包括亚洲大陆交通的线路和质量,可能会形成包围亚洲大陆的环境[②]。马汉重点分析了俄国和英国在亚洲问题上的矛盾关

① 《海权论》,第418页。
② 同上书,第214页。

系,认为俄国属于陆上力量,它的对外扩张主要是在陆上进行的。虽然俄国因内陆广阔、缺乏出海口与自然条件恶劣等原因而具有天生的不安全感,但俄国在欧亚大陆上的领土扩张是在短时间内快速完成的。它在正南向朝中亚推进,在正东向朝远东甚或中国东北进军。这两个方向的扩张行动都取得了实际进展,自然使人们认识到"心脏地带"的重要性,即由于它在相当程度上由一个面积巨大的帝国式国家盘踞,具备向四周无限制伸展的活动空间和调动一切力量的条件,因而很难想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它形成一股由内而外的扩张势力。

从当时的地缘政治情形看,如果确实要对俄国的行动施加限制,只能针对上述地带的侧翼或由此向内进行。马汉即指出,把俄国看成一个对应于亚洲中心地区的浑然一体的国家,它的扩张是从两翼而不是从中间进行的。也就是说,俄国的地缘政治扩张以由北而南为走向,但主要是呈南北扇型推进的态势。因此也只有通过主要针对俄国两个侧翼的南北方向回推,才能有效地遏制俄国。这种遏制足以取得显著实效的原因,一是在于侧翼回推将在两个方向上阻止住俄国的空间扩张,二是它有极大可能封锁住俄国的海岸,堵住其出海口。这两个方向的行动如果奏效,将切断俄国"心脏地带"与"沿海边缘地带"的稳定联系,使其失去从中获取战略优势的基本条件。其结果,必然是拥有海权的强国独得地缘政治的先机。因此,对俄国地缘扩张的主要阻力是来自海洋的力量,即英国那样的海权国家。如果这样的国家意识到俄国行动的危险,它们就会采取实际的行动加强海权抗衡陆权的作用。与俄国面临的地缘政治情形不同,英国是一个拥有海权的国家,它的对外扩张主要是在海上进行的,它正是从海上窥视然后伸向欧亚大陆的。从地理形势看,英国远离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它只能从外围即"边缘地带"以由南而北的进取态势进入欧亚大陆。并且,只有在没有受到任何阻碍的情况下才能占据对欧亚大陆核心强国的优势。但是,英国在自己对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扩张中遇到了俄国的强势阻力。当这两个分别是海上强国和陆上

强国的国家相遇时，一场著名的地缘政治大角逐开始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亚洲地区存在着东西延伸的分裂地带，但围绕着它所发生的地缘政治运动则是呈南北方向的。这种东西分割而南北摆动的现象常常造成所经地区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只要想象到突厥斯坦、坎大哈、喀布尔和满洲这样的名字就能迅速感到它们是与爆炸性的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它们与欧亚大陆上东西摆动却呈南北走向的地缘政治争夺密切相关，并隐含着一系列的复杂因素。实际上，在亚洲东西向断裂带的地缘政治线索上，俄国从北部扩张，英国则从南部扩张，二者并且通过不断建立势力范围来巩固自己的地缘优势，这是共同构成南北方向的地缘政治运动的根本原因。而就其扩张路线来说，北向扩张和南向扩张在逻辑上是相对的，与俄国从北边进行的扩展相对应的是来自分割线以南的扩张。不过，南北之间无论就程度还是就本质来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因为就北向而言，俄国依据“心脏地带”的天然条件可以把领土和权力及各种资源高度集中在一起，从而足以充分发挥出地缘政治的潜力。而就南向而言，那里国家的人口和军事力量处于分散的状态，而且南亚半岛与中亚地区相互间缺乏必要的地缘联系。正因为如此，印度并不是英国的主要政治和军事活动场所，而只是进军中亚的一个起点。正是由于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特殊地理条件，围绕着亚洲地区东西方向的断裂带，由南北方向发生的海权与陆权的较量十分激烈，造就了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在欧亚大陆上，俄国从北面进行扩张，而英国从南面进行扩张，二者不可避免地在“边缘地带”的空间里相遇。这是陆权和海权在“边缘地带”角逐的典型例子。在分析英俄矛盾关系时，马汉十分精彩地讨论了陆权和海权的问题：“一目了然的是交通主要可分为两种方式——海路和陆路。这种区分令人想到今天正稳固地盘踞在亚洲土地上的两大欧洲强国的本质不同。这些事情将愈发清楚地表明，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之间的新一轮多重较量又出现在我们面前。”“陆权的使用受离海洋远近的影响；与此相对应，在任何海陆交汇

之处,陆上环境也制约着海权的使用,使其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而在性质上受制于陆权的大小强弱。"[①]正是因为马汉在提出关于海权决定性作用的论断的同时,也对陆权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所以西方地缘政治学家说他的见识是"一种把内陆的黑暗变为光明的观念"[②]。

在论述欧亚大陆上海权与陆权的角逐时,马汉的视角是十分广阔的,甚至扩及超出欧亚大陆的范围。他认为,以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为界的北部陆半球因其活跃的贸易和政治活动,是世界权力的中心。其中,马汉尤其关注于亚洲,特别是北纬30—40度之间从中国到地中海的广阔地带,他称之为"争执中的和可争执的中间地带"。他声称,这片地区乃是一片地缘政治上的无人区,它过去是、而且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是陆上强国俄国与各海权国家(特别是英国)争夺并发生冲突的地带。而在当时,在上述两条纬线的南北方向,俄国和英国分别握有主宰性的、稳固的政治权力。这两个国家不仅分别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和海军,从而把军事力量的作用典型地体现在它们身上;而且还拥有世界上最强势的陆权和海权,从而把地缘政治上陆权和海权的竞争表现得淋漓尽致。马汉之所以把俄国和各海权国家作为对立的两极,是因为他看到前者主要以陆地为根据地,后者主要以海洋为依托,使得19世纪的地缘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被陆权和海权之间的对抗所左右。在北半球最重要的部分欧亚大陆内部,俄国的自然条件使它拥有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不受阻止地向四周扩展它的力量,从而主宰世界。相应的,由于海上运动对陆上运动的固有优势,对俄国扩张进行遏制的方法是由英美结成联盟控制亚欧大陆边缘的战略基地。但是,马汉感觉到,要全面遏制俄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较为可取的出路是建立一种陆上力量与海上力量之间的平衡。特别是,鉴于海陆关系对欧亚的地缘政治形势

① 《海权论》,第222—223页。

②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6页;B. Tuchman, *The Proud Tower*, Hamish Hamilton, London, 1966, Chapter 3.

会产生根本的影响，所以，欧亚大陆问题的和平与永久解决的两个条件之一，是取得陆权和海权之间某种均衡的趋近态势[①]。

虽然马汉是海权主义者，过度强调海权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马汉在其著作中依然明显贯穿了海权与陆权争斗的理论线索，他的一些重要观点和论述应该说是海陆二分思想的发轫，并为后来的地缘政治学家进一步地扩大这一思想提供了很好的起点和基础。基于这一点，马汉才被认为是“地缘政治学家”（geopolitician），而不仅仅是海军将领[②]。在《欧洲的冲突》一文中，马汉以英国与法国、英国与德国及英国与俄国的例子作分析，就主要描画了地缘政治海陆二分的具体情景。例如，他对英国与法国、德国关系的说明，就重点讨论了法国大陆扩张政策对它的资源储备的消耗，因而有可能削弱其陆权的原因和过程，同时也讨论了英国海军优势与德国陆军优势之间的抵消关系。他提出，“目前而言，海洋强权的中心压倒性地位于西方，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然而，如果出现了控制黑海盆地——目前为俄国所有，占有出入地中海通道的机会，影响海洋霸权的现在战略条件就将全被改变。”[③]这显然是对地缘政治中海陆二分关系的典型论述。

对马汉的“海权论”可以总结出这样几点：第一，马汉的理论虽然开始涉及到世界范围的事情，但主要还是立足于“欧洲中心论”。在这一点上，马汉没有后面的麦金德那样具有全球眼光和信念。不过，马汉的论点仍然具有一定的历史感，这使他的著作被称为“海军的圣经”，跻身“影响人类进程的16部经典书籍”之列。马汉最具历史感的著述是《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这是在他只是位海军将军、而不是专业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情况下完成的。正是这部著作使他有资格就地缘政治学

① 《海权论》，第227—228页。

② Colin S. Gray and Geoffrey Sloan, *Geopolitics, Geography, and Strategy*, Chichester; New York: Published in association with Scott Polar Research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by J. Wiley, 1997, p. 39.

③ 《海权论》，第14页。

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提出权威性的观点和理论。

第二,马汉的分析是从海洋看地缘政治的,他把海上利益置于首位来考察海权的作用,并且颇多实例研究(case study)。其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以海制霸",海权是阐释国家成功原因时最重要的因素。构成海权的要素和从这些要素中衍生出的原则"属于不变的,或无法改变的规律",因而它们形成了他所说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尽管马汉意识到来自陆权的危险,但他似乎毫不怀疑海权在获得世界权力方面的终极效用[①]。在他的逻辑里,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掌握了世界;海权是世界性权力的基本来源。

第三,马汉也认为,陆权和海权二者缺一不可,在强调海权的重要性时,他不免论及到陆权的作用。当强调陆权对亚洲中心地带——北纬30度与40度之间的未来影响时,虽然他从历史角度认为这是长期以来俄国与海权国家进行地缘政治较量的主要场所,但他没有忽视陆权的存在和可能发挥的影响。在范围上看,东面的中国、西面的土耳其亚洲部分和中间的波斯都是海权与陆权之间争夺的重点,也都涉及到陆权的因素。在马汉的眼里,陆权强国和海权强国之间的对抗具有历史的惯性,并且表现出了固有的特点,例如俄国地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位置,使它"特别偏爱实行领土独占","凭借着实行全面主宰,俄国得以在海权作用范围的极限之外随心所欲地施展力量"。而海权强国则偏爱采取渐进的方式或以贸易等温和方式攫取自己的利益[②]。马汉特意指出,当时海权与陆权之间的斗争是在亚洲中心地带的两翼进行,而且"心脏地带"的俄国和来自海洋方向的各种力量之间较量具有历史的持续性。这样,马汉对19世纪地缘政治的论述实际上切入了地缘政治海陆二分的主题。其所涉及到的陆权与海权的较量、大陆国家与海上国家的对

① 〔英〕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

② 《海权论》,第227页。

峙、亚洲与欧洲的关系、俄国与西方的冲突,都是对这一主题的发挥。在《欧洲的冲突》、《亚洲的问题》和《美国的利益》几篇著述中,马汉既对军事问题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又实际上对国际关系进行了成功的说明,因而其著述涉及到国际关系和军事问题两个方面。但在这样做的时候,马汉的主要观点和分析都贯穿了地缘政治海陆二分的线索。

马汉认为,陆权和海权两种权力意味着世界存在着海洋民族和大陆民族两大民族,它们不仅拥有不同的利益,而且拥有不同的地缘政治要求。前者在海洋方面占有优势,但在陆地上则占有劣势;而后者正好相反。在亚洲所进行的地缘政治竞争证明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自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①]。尽管海权的固有优势是明显的,但能否很好地利用它是另一回事。这取决于扩张实践中的运用能力,既包括对海上力量的有效使用,又包括对海上力量与陆上力量的得力协调。例如,在海陆交汇点上,陆地的自然状况是制约海权运用的重要条件;一旦这种制约作用发生,海权就不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东西,它也会受到陆权的显著影响。而且,对海陆关系的处理常常出现不平衡的现象,而这对海权所产生的影响不是局部的。因而,依托海权并不意味着脱离海陆关系,使对海权的追求失去依靠。当然,陆权要想发挥同样出色的作用,也受离海洋远近的影响,因而实际上也是受制于海陆关系整体的。因此,海权和陆权斗争的结果,可能是一方占上风,例如海权就可以凭借其天然优势取得对陆权的上风;也可能是达到海权和陆权之间的平衡,例如在亚洲大陆的东翼,中国就可能是使二者达到这种平衡的一个关键因素。为此,马汉建议将中国纳入西方海权影响的范畴。但另外一种平衡的可能性更大,这就是以俄国与西方海权国家为代表的两种势力之间的对抗,不断加剧陆权和海权的矛盾,并不断滋生大国之间的纠纷。实际上,这是一种动荡的平衡。正因

① 《海权论》,第 234 页。

为海陆关系对地缘政治所产生的影响是重大的,马汉提出,在考虑海陆关系时,如果把所有的因素——陆军和海军力量、陆上的和海上的地缘状况、内外联络、商业活动和利润——都考虑在内,对海陆关系处理所产生的影响将是级数意义而非分数意义的①。而这是地缘政治学家和政治人物都必须审慎对待的。应该说,从海权论很快就能与麦金德的陆权论和"大陆心脏学说"产生对应关系来看,地缘政治学理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确实进入了它的全面发展的成熟阶段,而其主要标志就是地缘政治学中海陆二分的倾向更为明显。

第四,同陆权论一样,海权论曾经对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战略和外交实践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它们在20世纪初扩张海上力量,谋求世界霸权的对外政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一战期间,海权论的影响最大,马汉理论一度成为地缘战略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海外殖民扩张和国际贸易的需要,使得控制海洋交通要道和世界各地的战略位置的斗争变得异常激烈,而这对那些西方列强来讲,就需要在自己手里掌握海权和海上势力范围,或曰海上霸权。海权论强调海权处于最重要的战略地位,强调海洋地理和海上势力范围的重要性,恰恰适应了西方列强国家的政策需要。于是,马汉的海权论就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西方海权国家的海外扩张行动注入了政策性的源泉。西方列强的全球殖民扩张和海上贸易活动都至少闪动过海权论的影子。在军事政策方面,海权论对海权的强调还直接促使了海军作为国家主要军种和军舰作为武器系统主干的发展,也促使把建立海军基地当作掌握海权的主要手段的努力。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之间的海军力量竞争,到20世纪冷战时期美苏对国外海军基地的争夺和极为重视自身军事力量在世界海域的存在,都可以看出大国在政策上对海权的高度重视。海洋曾经是大国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重要场所。

第五,当然,需要特别指出,马汉海权论有专门为美国谋求世界大国

---

① 《海权论》,第222页。

的战略献计献策的特殊含义。从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过程看，美国地缘政治学的问世是在告别弱国地位和走向世界强国的重要时期，而马汉在海权论中对海权重要性的最关键定义和评价是对着美国自己说的。例如，他所说的“政治问题和军事战略包含着地理因素，各国的地缘状况是它们力量与行动的基础”①，以及“海军在力量运用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没有海军的强大，在海外使用其他形式的力量就无从谈起。而且，海军须具备根据需要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要求它发挥作用的地区出现的能力”，等等②，都是他从地缘政治上解释美国的“地理困境”，并给出地理处方的特殊话语。在后来的时间里，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显然印上了马汉海权论的痕迹。例如，二战中美英首脑共同发表的《大西洋宪章》确定了两个主要海权国家的战略合作原则，被史学家视为马汉理论的“进一步体现”；而英美加组成的“北大西洋三角”把海洋世界团结起来，成为抵抗三个法西斯同盟国的地理政治焦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从不同方向采取了海上军事行动，充分显示了海上力量的强大。海权战略思想还对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产生过重要影响，它在夏威夷、关岛、波多黎各、菲律宾、维尔京群岛和巴拿马取得基地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马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从地缘政治学本身的发展看，强调海权在全球战略和国家战略中的作用是一回事，强调海权论在该学科中的地位是另一回事。由马汉、斯皮克曼和戈尔什科夫等的著作把海权论作为一条重要线索贯穿在地缘政治学的主流位置上，成为该学科发展的一个显著的重要特色。当然，由于除了海权论之外，还存在着陆权论以及后来的以陆权论为基础的“边缘地带学说”，马汉的海权论还不得不面临着被其他理论冲击的事实，其所讨论的海陆二分的思想线索还不得不面对以陆权论和“边缘地带学说”为基础所作出的有力回应。

---

① 《海权论》，第214页。
② 同上书，第159页。

第二节　陆权论与海陆关系

世界大战的结果并没有进一步促使海权论的盛行,在一战和二战之间陆权论开始占有头筹;提出陆权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也并没有来自传统的陆权国家例如俄国、法国或德国,而是来自典型的海权国家,他们是: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美国地缘政治理论家尼古拉斯·约翰·斯皮克曼和鲍曼(I. Bowman)①。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在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之际的英国,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程度尚且落伍在欧洲内陆之后许多年(在这里,地理学已经取得了与哲学、历史学同等重要的学科地位);然而,英国向地缘政治学界贡献了影响甚巨和流传后世的地缘政治观念,麦金德在活跃的地理政治思想运动中成为现代地缘政治学的最重要的集大成者。他在一战前后出版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和《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两部著作,系统地提出了他的以陆权论为主要特征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并在一战后成为地缘政治学的主流,影响之巨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这种理论强调的当然是陆权(land power)的重要性和陆上国际力量分布的绝对价值取向,强调的是大陆地理要素对于国际关系及其结构的影响。陆权的重要性还体现为必须建立和发展强大的陆军力量和以进攻性陆上武器为主干的武器系统。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如果仅仅从军事意义上讲,麦金德的陆权理论与《孙子兵法》倒是有不少相通之处②。

陆权论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19世纪末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陆路交通发生了质的变化,“马和骆驼的机动性”已经被“铁路的机动性”所代替。特别是20世纪更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

① 当然,陆权论者还有德国的拉采尔和豪斯浩弗,克劳塞维茨(Carl P. G. von Clausewitz)则从军事理论上探讨了陆权的价值

② *Geopolitics, Geography, and Strategy*, p. 17.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便已展示出来陆路交通的优越性和更趋有利的前景。铁路和公路等的日趋现代化和机动化,使陆上交通取得了针对海洋交通的优势,加强了欧亚大陆国家的优势地位,由此陆权的价值再次凸显,并衬托着海权的局限性。麦金德强调,"现在横贯大陆的铁路改变了陆上强国的状况;铁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闭塞的欧亚心脏地带,像在没有木材或不能得到石块修筑公路的广大地区内所发挥的这种效果。"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麦金德比其他人更早和更充分地认识到跨越大陆和跨越洲际的铁路已经成为陆权发展的最重要条件[①]。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陆权理论得到了系统和成熟的发展,并几乎达到了其所能达到的顶峰。在陆权理论中,最为著名的是麦金德的"大陆心脏学说"。这一学说是由麦金德在1904年发表的《历史的地理枢纽》论文中首先提出的,这篇论文虽然很短,后来与其他几篇论文合在一起翻译成中文也不过100页,但是思想深刻,观点尖锐,论述精辟,因呼应了当时显见的现实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曾经被列为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潘恩的《常识》等15种著作并列的"改变世界的16本巨著",因为它"是首次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就是试图以某种程度的完整性去发现更广的地理归纳和更长的历史归纳之间的相关性"。麦金德的著作还权威性地宣布了"哥伦布时代"(Columbian Era)的结束,而哥伦布对世界的探险和地理表述,在此之前的五百年时间内一直是世界政治模型的结构基础[②]。

在这篇论文中,麦金德提出了"枢纽地带"(Pivot)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以后更加著名的"心脏地带"概念的前身。麦金德认为,世界资源及其战略潜力的不均衡分布是造成战争的基本原因。在世界政治中存在

① 《历史的地理枢纽》,第59页;*Geopolitics, geography, and strategy*, p.21.

②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7页;Felix Driver, *Geography Militant: Culture of Exploration and Empire*,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1, p. 199; H.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Geographical Journal*, 23(1904), pp. 421—444.

着一个恒定的“枢纽地带”，“欧亚陆地中心的内陆和冰洋水系的遥远地区是世界政治的枢纽”，它包括从东欧平原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亚平原的宽阔地带，中国北方的大部分位于其内，特别是新疆和蒙古西部[①]。当然，在最初提出这个概念时，麦金德把它看成是与沙俄帝国的领土范围大致重合的地域。就此，他论述了俄国在地缘政治上的优势，认为它几乎占据了欧亚大陆上半个大陆的广阔地域，处于“战略中心位置”；而一群西欧国家则版图狭小，地缘政治的伸展空间和优势十分有限，因而欧洲政治地图形成了一种在地缘政治上最明显的强弱对比。这意味着，后者可能会受到来自前者的安全威胁，而由于前者是一个从海上进不去的实际上的铜墙铁壁的区域，在其范围内自然资源足以自给，铁路交通线、资源和人口分布都具有明显的重要性；因而使陆权占据着天然的优势。而且，从自然与社会的关联来看，在自然环境与政治组织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联系，不仅俄国的欧洲部分与东欧平原之间有着地理上的天然联系，而且它们长期以来都一再表明在政治组合上存在着与世界其他地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倾向。由于看到这些优势条件所蕴涵的巨大潜力和能量，麦金德认为德国和俄国成为强大的陆地国家，并进而控制海上世界是最值得担心的前景。在发挥“枢纽地带”这一概念时，麦金德还指出，在“枢纽地带”以外，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共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内新月形地带”；而英国、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则共同构成了“外新月形地带”。在当时的力量对比状况下，“枢纽地带”的俄国与四周地区很难产生一种对等的关系。别的强国不可能直接地，而只能间接地通过俄国来影响欧洲的力量对比[②]。按照麦金德的逻辑，“枢纽地带”所提出的地缘政治上的严重问题是，任何能够打开这个核心地带的门户，特别是能够从西边征服该地区的国家不仅将控

---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 25 页。有人批评麦金德放过了作为一个世界因素的两个美洲大陆。

② 参见《历史的地理枢纽》，第 46 页，第 61 页。

制“枢纽地带”，而且最后将控制全世界。因此，相关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协调自己生存的地理环境。

“大陆心脏地带学说”的进一步系统化，是由麦金德于1919年发表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所完成的。在这部著作中，麦金德首次提出了“心脏地带”(Heartland)和“世界岛”(World Island)的概念，“心脏地带”取代了“枢纽地带”的概念，并大大扩充了地理范围，它与“世界岛”一起成为“大陆心脏地带”学说的两个理论支点。应该说，麦金德的理论把地缘空间和地缘位置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其中使世界的大陆部分获得突出地位。在他看来，整个欧亚大陆与非洲(即包括亚、欧、非三洲)是地球上的“世界岛”，它们并未因分别属于三个大洲而被分开，恰恰相反，它们不仅在地理上毗邻，而且一直是人类最集中的居住地区，共同形成了一个同质的地理空间。而西半球不过是这个“世界岛”之外的一个小岛，在幅员比例、人力和资源上都逊色得多。麦金德坚持认为，“世界岛”是世界政治斗争的轴心，是世界强权的真正支柱；其他地区都只是世界政治的附属地带。在“世界岛”上，处于中心地带的欧亚大陆更为重要，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地，也是一块在地理特征上“连续的陆地”，面积等于北美洲的三倍以上，其北部为冰块所围绕，其他三面为水域所包围。其中位居欧亚大陆中部，从东欧到西伯利亚平原的这片内陆地区，为俄国叶塞尼亚河、中亚高原地带和山系、黑海与波罗的海所环绕，地域广阔，但河流体系极少注入世界主要海洋而是流向北冰洋和内陆地区，而北面的北冰洋又是一片冻土，在战略上可视为一个庞大的天然要塞。麦金德把它称为国际政治的中枢地区，也就是所谓“心脏地带”。从地理范围来看，“心脏地带”比“枢纽地带”更大，按照帕克(Geoffrey Parker)的说法，与“枢纽地带”相比，“心脏地带”最重要的是增加了东欧腹地和中亚地区，当然还主要增加了中国和印度巨大河流的上游[①]。

① 《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137页。

从《历史的地理枢纽》到《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麦金德指出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是世界政治的轴心，控制世界上最大陆地的心脏将是统治世界的基础。他提出了那个被后人熟知的地缘政治公式：“当我们的政治家在与被打败的敌人谈话时，一些活泼的小天使必定会时时地向他们这样窃窃私语：

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
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
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主宰世界。”
(Who rules East Europe commands the Heartland;
Who rules the Heartland commands the World-Island;
Who rules the World-Island commands the World.)①

根据这样的逻辑，既然东欧是通向这个核心地带的门户，那么任何能够征服西部俄罗斯的欧洲强国不仅将控制这个“心脏地带”，而且最后将控制全世界。麦金德认为，陆上强国（不管是俄国还是德国，甚或是中国）完全有可能控制这个枢纽地区，对海洋世界进行翼侧包围。

以麦金德的陆权理论解释，“心脏地带”是陆上力量的中心，长期以来欧亚大陆本身的地缘政治优势没有发生过改变，它占据着地缘政治的战略中心位置。尽管海洋方面的机动性是“大陆心脏地带”的马和骆驼的机动性的天然敌手，但该地带的陆权优势表现在：在军事上范围极其辽阔，几乎与外界隔绝，是从海上和“边缘地带”几乎很难发起进攻而易于本身防守的陆权堡垒，其战略上的重要性和安全性可想而知；在经济上，它拥有巨大的潜力，能提供能源、黑色及有色金属、原材料和粮食，人力物力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是陆地资源的天然宝藏；在交通上，历史上长期以来“马和骆驼”驰骋在大陆上，是海上力量的天敌，而今日益发达的

① 《历史的地理枢纽》，第13页。

铁路交通网把这片土地越来越紧密联系在一起,陆上力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纵横机动性。所有这些加上地理保护和强力支撑,使之不仅成为免受侵扰的地区,而且更显示出它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枢纽"作用。面对"心脏地带",麦金德发问,"当我们考虑对这个广阔的历史潮流所作的迅速回顾时,不是觉得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地理关系的持续性吗?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麦金德由此得出了最后的结论:"心脏地带"具备了成为世界权力中心的巨大潜力,而现代化的铁路网和通讯系统恰恰提供了发挥这种潜力的史无前例的条件。在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带铁路交通的发展会像自成一体的"心脏地带"那样有效。毫无疑问,这里会当仁不让地取得未来的世界权力。而且,由于"心脏地带"的巨大潜力,从战略上讲它具备无懈可击的陆权优势,世界权力均衡的重心由海权转向了陆权[①]。麦金德一方面从历史角度论证说,在"马和骆驼的时代",马其顿人打败雅典人,罗马人战胜迦太基人,是历史上两轮成功的陆权国家对海权国家的挑战。在以铁路为主的陆上交通系统成为欧亚大陆上最大的大动脉之后,陆权国家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利的机动性和优势。正如他所说的海洋的机动性是"大陆心脏地带"的机动性的天然敌手一样,陆上的机动性同样是海洋机动性的天然敌手,而且更加致命。正是在20世纪,大英帝国的衰败再度反映了海权国家的没落。在他的眼里,英国作为海岛小国,是一个"贬值遗产的继承人",并且将面临大陆国家的挑战。另一方面,他断言,"心脏地带"是海权国家即使通过巨大努力也难以达到的,这一论点因海上大国未能对这些地区施加过多的影响而得到了证实[②]。特别是,当陆权国家强大时,黑海和波罗的海就

① 《历史的地理枢纽》,第56页;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138页。

②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70页;《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137页。

成为陆权强国的内海，完全可以排斥海权势力的进入。当然，麦金德同时也看到了“心脏地带”所对应的“边缘地带”，他指出了在这个“心脏地带”的东面、南面和西面是呈巨大新月形的“边缘地带”，由海路可以到达，但重要性显然不大①。

从这里可以看出，陆权和海权二分法的基本论题被置于讨论的中心，虽然其内容和术语有重大变化。欧洲、亚洲和非洲现在是“世界岛”，其面积广阔，是世界历史基本舞台的所在。权力的自然位置是：“心脏地带”全部是大陆的，“外新月形地带”全部是海洋的，“内新月形地带”部分是大陆的、部分是海洋的。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主要是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之间的对比，或者说主要是陆权和海权之间的对比。在海陆关系中，欧亚大陆拥有明显的陆权优势，拥有海权优势的主要是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其中，陆权比海权显示出更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尽管蒸汽机和苏伊士运河的出现增加了海上强国的机动性，但横贯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大铁路更增加了陆上强国的机动性。就欧亚大陆上的陆权变动而言，麦金德把东欧视为通向“心脏地带”的大门。他认为，从东向来看，如果德国和俄国结成联盟，或者德国能征服俄国，那么征服世界的基础就可奠定。从西向来看，德国已决定性地代替俄国而成为英国安全的主要危险。自19世纪末“东欧的重心已从彼得格勒转移到柏林”。日耳曼人和斯拉夫民族历史上的敌对源于前者控制东欧的顽固欲念，而现在看来这也是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德国这种东进的渴望不可避免地把它引向“心脏地带”，因而它可能取代俄国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强国②。虽然在欧亚大陆上，德国和俄国都面临着两线作战的问题，搞不好会使二者陷入灭顶之灾；但在存在这种欧亚大陆内部的矛盾的同时，更为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欧亚大陆与外部的关系，即陆权与海权之间的对抗。

① 《历史的地理枢纽》，第56页。
②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23页。

如果“心脏地带”能够稳定地把握陆权的优势，那么它在海陆关系的处理中将会稳操胜券；二是“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关系。麦金德认为，“心脏地带”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扩张，会使力量对比转过来对它有利，这将使它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海军舰队，那时这个称雄世界的庞大帝国也就随之出现了。如果德国与俄国结盟，这种情况就更可能发生。正因为“边缘地带”是国际政治矛盾的交汇点，大陆国家如果能够由此控制海洋，将会具有更强大的战略潜力。因此，这样一种事态的威胁，必将推动法国与海上强国联盟，于是法国、意大利、埃及、印度和朝鲜就会成为众多的桥头堡，外部的海军可以从这些桥头堡支持陆上部队来迫使枢纽联盟也部署陆上部队，从而阻止他们集中全力去建立海上的舰队①。

在分析一战的性质时，麦金德就认为这实际上是一场以法兰西半岛面向陆地的前线为主战场的海上人和陆上人的战争。俄国的崩溃和1917年美国的参战使战争的海陆对比关系更为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参战双方都有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德国按照它的枢纽区政策，在短时间内曾经占领东欧和俄国的很多地方；另一方面，战争的结果表面上是陆权国家失败，海权国家再度崛起。乍看起来这个局面至少好像是证实了马汉的乐观态度，但是麦金德并非那么容易就接受表面现象。他拒绝从实质上背离他的观点，陆权国家尽管受到重大的挫折，但优势的平衡仍然在它的一边。这是由于它在战略上的无懈可击、领土邻接成片以及丰厚的自然资源。铁路网把上述条件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被一个善于组织的种族有力地支配着。当“心脏地带”拥有了在质量和数量

① 《历史的地理枢纽》，第61—62页。马汉认为，在北半球最重要的部分欧亚大陆内部，俄国占有统治欧亚大陆的地位，很难被外界攻破。不过，这种内陆封闭的地理条件利弊并存。亚洲在北纬30度和40度纬线之间的地带，将是陆上大国俄国和海上大国英国冲突的地带。他预言，由于海上运动对陆上运动固有的优势，英美联盟可以从围绕欧亚大陆的关键的陆上基地保持对世界的控制权。甚至预言，有朝一日，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将形成联盟，共同对付俄国和中国。

上足够强大的守备力量时,将会变成世界权力的中心。战争决没有改变这一局势的基本要素。德国再度崛起证实了麦金德的观点,它又一次惯性地构成对海上强国的威胁[1]。就此,麦金德进一步说明,虽然德国首先是一个陆权国家,但如果它致力于发展海军并控制海洋,就会使陆权势力更加强盛。而德国这个特殊的国家具备这样的地理基质。因此,虽然一战的结局对世界历史进程具有深刻的影响,人们力图使它从麦金德所预言的可怕命运中扭转过来,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麦金德陆权理论的另一个主要线索是依据海陆关系对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进行了二分,这一线索关心的是陆权与海权之间均势的变化。麦金德认为,有两个同轴的新月形地带,一个是"内新月形地带"(Inner Crescent),一个是"外新月形地带"(Outer Crescent)。欧亚大陆上的"心脏地带"被欧洲大部、中东、土耳其、印度和中国等边缘国家构成的"内新月形地带"所包围,而整个"世界岛"又被英国、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外新月形地带"所包围。"内新月形地带"实际上就是欧亚大陆的沿海"边缘地带",因此它的准确称谓应该是"边缘新月形地带"。周围一系列把大陆和大洋分隔开的边缘海和地中海,构成一条圆周形的海上大道。这里是欧洲、中东、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所在地和四大人口居住地,其天然条件便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外新月形地带"则是一些重要的岛国,这些国家在马汉那里曾被称为海权国家,而该地带的准确称谓应该是"海岛新月形地带"。根据这种划分,麦金德认为20世纪主要的国际争端、尤其是在近东和远东,是由于"心脏地带"和"内新月形地带"之间在这些地区所形成的不稳定的均势状态而造成的[2]。与"心脏地带"的地位比较,麦金德断言,"内新月形地带"即"边缘地带"极易受到"心脏地带"的攻击,在历史上它就多次遭遇来

---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24页。

②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9页;*Geography Militant: Culture of Exploration and Empire*, p. 199.

自草原的机动力量的扩张势力。而“心脏地带”则由于海权国家无法进入得以保持安全，他认为这是历史上一再被证实了的事实。麦金德特别指出，欧亚大陆其他的“边缘地带”，也像欧洲的情况一样，有着早期被入侵的记录。中国不止一次地屈从于从北方来的征服者，印度则多次被来自西北方的征服者征服。又例如，“近东地区”（实际上是今天的中东和西非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兼有欧亚大陆中心区和边缘区的一部分特征，但主要是一个边缘区，“因为它的各个海湾和通海的河流对海上强国是敞开的，并且允许从这里施加海上威力”①。由此，实际上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理论也就涉及到了海权的那一面，因而在总体上海陆二分是麦金德理论的主脉。

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的时候，年过八旬的麦金德根据世界形势的演变在地理范围上的反映，对“大陆心脏地带学说”进行了重新的、也是最后一次的界定。其中，最主要的是为其学说的核心概念——“大陆心脏地带”作了空间范围上的新说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使苏联得以在地缘政治上大幅度扩张，“心脏地带”在范围上就首先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他认为，苏联本身就是“心脏地带”，如果它再控制东欧，那么他自己在世纪初的预言就真的应验了。但是，在他关于“心脏地带”的第三个版本中，他排除了勒拿地区，即叶尼塞河以东的广大地区。这样，新的地缘政治形势的划分方法是：“心脏地带”由苏联乌拉尔山脉以西的苏东地区，外加部分北欧地区组成；中部海洋盆地地区，包括西欧、英国和美加及拉美东部地区，中部海洋是指大西洋。在这两个地带的外围是所谓的沙漠及荒地组成的“环型地带”，这个地带包括的地区有非洲北部马格里布国家大沙漠地区，中亚沙漠地带、伊朗北部、中国西北、内蒙古和东北地带、苏联西伯利亚和美国、加拿大的北部地带。“环型地带”内所围住的是与“陆中大洋”（Midland Ocean）即北大西洋联接在一起的重新确定的“心脏地带”，它形成了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实

① 《历史的地理枢纽》，第55—56页。

力均衡的“孪生体”。这个“孪生体”被他看作是“第二地理概念”[①]。此外，最外围的“边缘地带”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中亚南部、南亚地区、中国腹地和东北、东部地区、印度支那和东南亚、澳大利亚、拉美大部分地区。麦金德把欧亚大陆和非洲仍然称作地缘政治理论中的“世界岛”，因为它对陆地强国苏联和海上强国美国都具有重大的安全意义。他认为，在欧亚大陆的两大陆地强国苏联和德国之间的东欧地区对苏联抵御德国的控制是一个强有力的缓冲地带，正是在这个前提下，他的那个著名的三段式公式才可以应验[②]。

尽管世界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麦金德相信他关于“心脏地带”的观点比20或40年前更加有效和有用。“心脏地带”仍被视为陆权的最大城堡，是最容易聚集陆上力量的关键所在。它的重要性使得陆权成为在国际关系历史上发挥根本性影响的因素，而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后来，中亚的迅速发展和苏联向东加速开发使人们对“心脏地带”的概念有了新的认识和想象。苏联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由此苏联的经济重心很可能东移。这对于苏联自身和整个中亚都具有深远的意义[③]。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的地缘政治形势来说，麦金德依据其陆权论作出以下论断：“考虑到所有情况，不可避免的结论是如果苏联在这次战争中以德国的战胜者出现，它必然会被列为地球上最大的陆上强国。而且，它还将是处于战略上最强防御地位的强国。心脏地带是地球上最大的自然碉堡。在历史上它是第一次布置足够数量和质量的驻军。”他还认为，战后处置中的主要问题是削弱德国的侵略势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29页。

② 梅尼格(Meinig)以相反的极端提出了一个规模更小的“心脏地带”。实际上他把这个地带严格地限制在亚洲的正中央，地域范围的构成主要是山脉和沙漠。他继续考察了“边缘地带”的特征，基本上按照斯皮克曼的定义，把“边缘地带”划分为大陆型的和海洋型的两部分。前者内向大陆，后者外向海洋。这种划分被看做是功能性的而非凝固性的。见《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38页。

③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28页。

力，清除纳粹意识的“污染通道”，但这些问题只有通过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之间的联合才能圆满地得到解决。这里的海权国家是指美英法“这三大海陆两栖的国家”，它们都有各自的特殊作用。“心脏地带”东边的陆权国家与其西边北大西洋东部的海权国家联合起来，将形成两道坚不可摧的战线，“这样德国鬼子……定会被活活困死”[①]。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麦金德根据其修订的“世界地缘政治战略图”所提出的关键性看法是，形成对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地国家苏联最有效的对抗力量是美英法的战略联盟，因为苏联和美国之间产生了新的政治—地理关系。

综上所述，麦金德的“大陆心脏地带”理论具有如下的特点：第一，麦金德强调地缘政治是地理与政治的高度结合，是第一位具有全球眼光的地缘政治学家[②]。他把地理学思想直接地应用于国际政治，率先从全球角度考虑世界政治地理的结构，对世界上大陆与水域分布的政治意义提出了独到见解，在此基础上他首创了“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在以地缘政治分析世界权力方面，大概没有哪一位地缘政治学家能够比得上他。正是从这种地理与政治高度结合的观点出发，麦金德的理论实际上从地理的角度探讨了国际政治的相互依存关系，他把地理因素与国际政治结合起来对欧亚大陆形势所进行的研究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其结论至今仍然令人深省。由于麦金德对世界问题的看法是在20世纪的头十年，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逐渐发展形成的，全球现象的总体包含着一个获得验证、并且易于合理解释的空间进程。因此，可以说，麦金德是以全球战略眼光追踪地缘政治的变化，进行世界形势整体分析的先行者。例如，麦金德的陆权学说和“大陆心脏地带”学说把世界以欧亚大陆为中心划为四大部分：一是“心脏地带”，即苏东地区；二是外围的“内新月形地带”，包括西欧、中东、南亚和中国；三是

---

① H.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Peace", *Forgein Affairs* Vol. 21 (1943), pp. 595—605;《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29页。

② *Geopolitics, Geography, and Strategy*, p. 11.

"外新月形地带",包括英国、非洲大部分和日本、印尼等;四是最外层的"岛屿新月形地带",包括北美洲、澳大利亚等。这样,由欧亚大陆开始,全球范围的地缘政治现象和分布都被容纳在内。而且,作为第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地缘政治学家,他实际上还把陆权战略和海权战略联系起来,并进行了比较分析。后来,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也强调了由麦金德开创的那种全球地缘政治研究的思路,他认为,在研究"一个真正全球性体系在历史上首次出现"时,要采取"地理中心"的方法,而不是采取"民族中心"的方法。而在国际关系的实践领域,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rnich)和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所留下的传统外交常规注重的是后者,这个常规必须加以改变①。全球体系观念和宏观的世界史视野是麦金德以陆权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坚实基础,它们也使得地理学变成了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重要辅佐。"麦金德在强调大陆国家成长的重要性的同时,并不否认海洋大国的作用。他认为,海洋大国仍作为富有活力的世界大国而存在,当然,它对宽广的陆基的需求,比19世纪时的必要性更大。他断言,在20世纪,控制心脏地区乃至世界岛的国家会变成一个带头的海洋大国;虽然它首先是一个大陆国家,但事实上会最终获得对海洋的控制。"②这一从全球观念出发引出的看法,对那些国家的决策者来说不无启示。

第二,强调陆权的重要性,使人们在地缘政治上高度重视欧亚大陆及其相关的国际政治问题。新大陆的地理发现曾经使地理学界强调海上强国的优势,并认为海权比陆权重要,但麦金德认为,在哥伦布时代之后,优势开始有利于陆上强国。海洋给航行带来的机动性曾经是几个世纪以来海上人的法宝,而现在受到由于铁路的发展而带来的陆上机动性

① George Modelski, "The Promise of Geocentric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XXII, No. 4 (July 1970), p. 633.

② 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6页。

的挑战，由于和中心大陆的邻接，当枢纽国组织起来后，就要觊觎“边缘地带”并向这里进行扩张。如果这种设想一旦发生，那么海上国家就很可能从立足不稳的“边缘地带”被赶走，“世界帝国”将会出现。而俄国显然是这一枢纽国的候选人。早在1890年，麦金德就已推断“地理上的优势平衡很可能已经向不利于英国的位置倾斜，而它只是靠惯性来维持自己的地位罢了”①。在麦金德那里，陆权在国际政治中始终具有明显优越的价值，与拉采尔等陆权论者的观点不同，他并不把陆权看做是个别国家在有限地理空间中寻求生存或扩张的手段，而是把它看作世界政治中不断重复出现的、甚至带有规律性的国家行为模式。与其他陆权论者的另一个不同是，麦金德对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及其分布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他的“大陆心脏地带”学说使欧亚大陆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十分引人注目。从地理上看，欧亚大陆（也叫亚欧大陆）是欧罗巴与亚细亚的合称，因两洲存在重大的地理差异，所以分为二洲。但是，在地缘政治上，欧亚大陆却在陆权的意义上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它所引起的地缘政治问题长久以来就是国际关系历史的本质内容。例如，“大陆心脏地带”学说中对东欧的论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都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印证。东欧既是俄国从“心脏地带”进入中欧的媒介，又是德国进入“心脏地带”的通道，其重要性可想而知。虽然这也可能导致地缘政治上的“宿命论”，但麦金德的那个著名的“三段论”警言直到今天仍无法被人忘记。另外，中亚地区是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英俄两个帝国之间在亚洲的对峙，彼此都高度关注着对方在各自势力范围内的那些中亚缓冲地带的军事调遣，特别是它们对陆权的影响。从陆权对地缘政治的重要影响看，这也使得中亚地区成为与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局势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今天想来也是不容忽视的所在。

第三，麦金德把陆权和海权之间的反复较量和对抗视为贯穿历史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9页。

的基本主题,而且他把这一观点上升到世界史的地理观高度①。在麦金德看来,鉴于双方的利害关系和力量对比所产生的结果,陆权和海权的较量将是长期性的和历史性的,并且会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和人类历史的核心内容。帕克认为,麦金德的基本地缘政治主张是,世界历史基本上是陆上人和海上人之间的反复斗争的过程,换言之,世界的历史可以从地缘政治理论的角度解释为海权和陆权的对抗,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这种对抗进行了历史的回顾和有力的分析。按照麦金德的逻辑,两个对抗的主角始终存在力量的此消彼长,但是,两者之间又总是存在一种固有的均势,因此任何一方都无法获得对另一方的绝对优势地位。它们各自都具有某种优势,藉此它们可以重建均势②。正是海权和陆权之间的长期斗争,正是二者之间均势的循环出现,才促使地缘政治在一种矛盾运动中不断地发生变化。麦金德曾经具体描述说,陆上霸权最有力的中心总是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正是在这里,亚洲人的大锤不断地向外击打着面向大海的"边缘地带"。在欧亚腹地的中心形成一座庞大的天然要塞,海上人不能深入。围绕着欧亚的南部和西部边缘,是一个巨大的"新月形地带",在历史上曾是一个薄弱环节,陆上人通过这里就能侵入到"海上新月形地带"。实质上正是来自东方的这种威胁和压力激励了欧洲人海上活动的卓越发展。当欧洲人迅速地扩展到海岛和大陆半岛,就到了能够创立摆脱陆权国家制约的新欧洲的时候③。应该说,麦金德第一个严格和细致地区分了陆权和海权,并指出了由此带来的地缘政治关系中的某种惯性。海洋在地理上的便利和航海业的发展,是海权最终统一的地理条件,海权控制的范围是陆权难以达到的地方;同样,陆权始终存在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技术的最新进步增加了它的重要性。这就导致了这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7页。
② 《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31页。
③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7页。

样的政治效果,即陆权与海权之间存在着相互间的威胁,也存在着相互间通过均势所达到的抑制。此外,麦金德指出,现代的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在思想根源上的差异不少于机动性上的物质条件的差异。这就使得人们可以在世界历史和人类思想的水平上加强对地缘政治主题的认识。因此,麦金德与马汉如出一辙的是,他也以陆权与海权二分论作为地缘政治学的前提,他把人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吸引到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相互斗争的主题上。在这种世界观中,陆权与海权的彼此交替成为世界权力的转换动力和实现机制,俄国和英国之间的地缘政治角逐便说明了二者敌对历史的实质,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再次证明这一历史的真实性。

第四,在地缘政治学理论的核心层,麦金德坚持海陆力量二分论。虽然他对自己的理论作了一些颇具与时俱进精神的修改,但在实质上他一直强调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划分方法。在麦金德看来,世界的政治力量可分为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主要是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的对比。后来他在"心脏地带"和"世界岛"的概念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陆上力量主要出现在由欧洲、亚洲、非洲组成的"世界岛",海上势力则出现在从欧洲环绕非洲到印度洋的海域所组成的"世界海角"(World Promontory)。在内容上,陆上世界出现了两个"心脏地带",一是亚洲的多山地区,另一是东欧地区。前者特别指中亚的山地地区,是海权很难到达的地方,尽管这里的水系大部分通向海洋①。后者是欧亚大陆的唯一通道,是联结黑海和波罗的海、易北河和亚得里亚海的中心,把东欧地区结合起来是麦金德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同时他认为通过分割东欧可以使欧亚大陆的政治力量得到平衡。这些理论上的"修正",丝毫没有改变其所一以贯之坚持的理论内核和演绎线索,恰恰相反却进一步发展和延伸了他的逻辑起点。而且,特别应该看到的是,麦金德的陆权论更全面地阐述了陆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20页。

权与海权二分的关系,弥补了马汉海权论的不足。斯皮克曼认为,麦金德以"大陆心脏地带"的陆上势力与大不列颠的海上势力之间的关系来规定东半球的实力地位。后者的安全有赖于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之间保持一种均势。如果其中之一获得优势,整个大陆和轴心地区就会被一个单一的强国所控制。以这个辽阔的地块作基地,就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海上强权,轻而易举地把大不列颠打垮。因此,不列颠外交政策的使命就是防止在欧洲大陆上出现统一的势力,尤其要注意绝对不能使德国和俄国结成有效的军事联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要防止中国和俄国之间出现类似的事情[①]。而对于前者而言,同样存在着一种陆权与海权之间均势的问题,如果对此处理不当也会遭受不测的危险。这些比孤立的陆权论或海权论视野更宽阔的海陆关系理论,对那些面临地缘政治严重问题的国家来讲是具有持久影响的。当然,对麦金德理论的批评也是存在的,因为他的地缘政治学理论成了国际政治中的"两极斗争"或"两种势力对抗"的催化剂,一些国际政治学者把他的"陆权与海权之间斗争"的观点,转化为"两大阵营"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势力分布的国际政治二分论。正因为如此,人们把在陆权和海权之间建立某种均势看成是两极格局的原因。

第五,麦金德注重技术对地理的战略含义,强调技术因素与地理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强调在其他的陆权理论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因为它们同样都十分看重"心脏地带"铁路交通线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海陆二分的划分,而且使这种二分更为明显和突出。一方面,蒸汽机和苏伊士运河的出现增加了海上强国的机动性,但另一方面横贯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大铁路更增加了陆上强国的机动性,而且欧亚大国囊括了最雄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技术和资源的结合将产生难以想象的巨大力量。麦金德认为这些都是证实他的论点的证据。曾经有过这样的意见,认为空中力量的出现破坏了麦金德观点的确

---

① 《和平地理学》,第65页。

实性，因为“心脏地带”的北极海岸不再像在1904年那样难以达到。麦金德也承认基督教世界掌握了“最广大的除飞翔以外的活动能力”，但是空中力量的出现，特别是它对地理的战略含义的影响可以支持他的以往论点，因为空中力量是以陆地为基础的，他预言以陆地为基础的空中力量将使地中海在战时不能航行，因而有利于“心脏地带”。在他看来，除了陆上传统的优势外，空中力量这个新技术因素不过是陆权国家的另一只臂膀，是一种“新型的两栖骑兵”，足以干扰敌人的海上交通。因此，海陆二分的传统没有被破坏，在空权重要性日益上升的同时反而得以强化。应该说，麦金德重视地理与技术的密切关系，认为20世纪技术的发展将武装起大陆强国并将使之取得支配地位，英国将面临来自前者的直面挑战。此外，他还指出了其他一些值得重视的因素：“在任何特定时间里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当然一方面是地理条件——既有经济的又有战略的，另一方面也是对抗双方国民的相对数量、活力、装备和组织的乘积。随着对这些数量正确估计程度的提高，我们可能不必诉诸武力去调整差异。在计算时，地理的数量比起人文的数量来可以更好地测定，更接近于稳定不变。因此，我们应当期望能找到既可用于过去历史、也可用于当前政策的公式。”①可以想见，在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地缘政治的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必须兼顾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各种结果。

第六，正如西方学者刻意说明的那样，麦金德代表了一种地理结构，在这个结构内，政策决策者都理解在其中如何进行选择②。确实，麦金德的陆权理论对于大国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实践确实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而将以陆权为主的地缘政治二分思想渗透到政策和实践领域。麦金德在其理论中曾经直接论及了有关国家在维护陆权基础上的外交政

① 参见《历史的地理枢纽》，第16页，第62页；《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24页。

② G. R. Sloan, *The Geopolitics of Anglo—Irish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s Century*,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55.

策。例如,他曾谈到,沙俄占据着"大陆心脏地带"的中心位置,并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防止"心脏地带"坐大的努力,最重要的是阻止它被一种势力所单独控制,在这方面具体言之就是一旦出现德俄联合的局面,"心脏地带"将对整个欧亚大陆产生致命的影响。这恰恰是因为德俄两个强国代表了一种复杂的海陆关系,它们既是强大的陆地国家,也有可能成为海上强国。为此,应该在这两个国家之间以分而治之的政策将它们隔离,最好的办法是营造出中小国家组成的缓冲地带。例如,三个波罗的海国家,连同芬兰和波兰,可以形成一个宽阔的缓冲地带。这实际上表明了麦金德对欧洲外交界经常担心的德国和苏联结盟的忧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麦金德重新评估和修改了他的地缘政治理论,把大西洋共同体包括进来。他认为,苏联在战后成为全球最大的陆权国家,并占有最稳固的战略防御地位。北大西洋两岸国家正在形成一个均衡的力量。英、法、美联合起来,既可以防止德国东山再起,又可以平衡苏联的力量膨胀。应该说,麦金德的预言还是有一些"先见之明"的,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认为,他的上述思想对现实有着相当的参考价值。在当代地缘政治的复杂演变中,俄国(以及苏联)、德国、法国和中国这些大陆型国家,或者说比较注重陆权的国家,仍然可以从麦金德的理论中获益匪浅;因为其"地缘政治思想对于争取和平的任务是适合的",人们凭借它并不是去"预测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广阔未来,而是制定一个能适应任何政治平衡的地理公式",这个公式可以使人们相信世界的未来取决于维持边缘地区和膨胀的内部力量之间的力量平衡。当然,另一方面需要指出,麦金德的理论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政策也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这就是他的基本观点被扭曲成"主张占有欧亚大陆从而主宰世界"的论调。总之,如果说在发表《历史的地理枢纽》时,麦金德更多的是一位地理政治学者,那么,在《民主的理想和现实》中,他更多地把自己当作一名政治家来论述"心脏地带",并且谋求把"地理学作为能对治国和战略起帮助作用的东西"。

第四章 『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对立

以海权论和陆权论为代表的二分论并未终结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地缘政治学的深入发展，同样将海权和陆权的二分与地缘政治演变复杂而具体的情形结合起来，再进行其他类型的对应划分，并在理论上作出新的概括。因此，在海权论和陆权论盛行一时后，又出现了“边缘地带学说”与“大陆心脏地带学说”的二分对应。根据这种二分对应的逻辑，不少地缘政治学家认为，在全球范围的地缘政治中，“边缘地带”和“大陆心脏地带”是一种更为重要的区分，因为它包含着更多的海权和陆权较量的成份，并使这种较量体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而这种情况对国际政治权力的组合关系及其格局的影响是深刻的和深远的。

第一节 “边缘地带学说”的突起

“边缘地带学说”作为“大陆心脏学说”的对立面,斯皮克曼作为麦金德的批评者出现在地缘政治学领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人尼古拉·斯皮克曼是最有影响的地缘政治学家,英国人詹姆斯·费尔格雷夫(James Fairgrieve)也是与他同属一派的代表人物,但影响稍逊。斯皮克曼被一些人说成是马汉理论的直接继承人,而归入海权学派;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的理论是麦金德理论的变种,并把麦金德的陆权论作了进一步的完善;还有人把他的理论说成是“对马汉海权论、拉采尔的空间论和麦金德陆权论的综合,同时有所修改、发展”①。但实际上,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学说”只是恰好在形式上是作为“大陆心脏学说”的倒式出现的,而在理论内核方面它吸收了麦金德理论的精华。因此,也有不少人认为“边缘地带学说”是在“大陆心脏地带学说”的基础上提出的,只不过斯皮克曼没有同意麦金德的结论。而且,非常明显的一点,麦金德和斯皮克曼,“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的共同点,就是把陆上力量与海上力量的对抗视为世界历史的主题,只不过斯皮克曼对这个主题的描述是这样的:“历史上的阵营总是某些边缘地带的国家和大不列颠对抗另一些边缘地带的国家和俄国,或者是大不列颠同俄国一道对抗一个统治边缘地带的强国。”②二是斯皮克曼的理论开始把地缘政治学中的“欧洲中心传统”转变为“美国中心现实”。一方面,虽然过去一段时间里,与英国和德国的地缘政治学的发达状况相比,美国的地缘政治学总是处于边缘的地位,但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地缘政治学的重镇已经从德国转向了美国。在美国那些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眼里,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是陈腐老朽的论说,美

① 《和平地理学》,出版说明,第1页;《国家战略论》,第187页。

② 《和平地理学》,第78页。

国则当之无愧地成为地缘政治学思想和理论的新发祥地。与学术重镇的这种显著变化相吻合，斯皮克曼的学说也将美国放到了地缘政治学的中心位置。例如，在使用地图投影技术时，他选择了以西经100度为中央经线，把美国放在世界投影的中心，从而把马汉、拉采尔和麦金德等人的世界观和地理分布观念颠倒过来，试图把"腹背受敌"的美国变成牵制全球的美国。斯皮克曼还通过他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圆筒投影地图，说明美国现在是一个海洋型和大陆型兼备的国家，由铁路和巴拿马运河把它连成一体，因而它的东西海岸有跨过大西洋和太平洋达到欧亚大陆东西两侧的便利通道①。

在众多的地缘政治学家中，斯皮克曼对"地缘政治"概念有着独特的见解和解读。他认为，这个名词至少有三个不同的含义。首先，是这个概念曾经被一些德国学派的学者用来作为全部历史哲学的体制和国家性质的学说，以此来说明领土扩张的合理性。在批评理想主义理论的同时，他指责以豪斯浩弗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充斥着形而上学的论调，企图给"生存空间"的概念罩上道德的光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地理形状在道德上比另一种地理形状优越的问题。也不能认为国家是一个活的有机体，一定要扩张强大起来，而为了它的什么神秘的利益，就可以无限度地使用武力以达到这种目的。地理位置和实力是国际关系中必须考虑的事项，并且有更好地了解这些事项的方法。"其次，它曾经被用来作为政治地理学的同义词，这样它就成为地理学的一支，专门描述个别国家的结构和世界政区的划分。但事实上地缘政治学并非简单的是这样，因为它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和多方面的因素。最后，这个名词也可以应用于根据地理因素来筹划一个国家的安全政策。它所要解决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某种地理形势下，要保证安全，最好应该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地缘政治学的分析方法因而仿佛是这样一种思想活动，它牵涉到选择位置和了解空间关系的性质，这是在任何

① 参见《和平地理学》，第2页，第32页。

方面制订政策和执行政策之前所必须进行的思想活动。"①在定义的有效性方面,斯皮克曼倾向于把"地缘政治"更多地限定在第三个含义上,而其理论的实用性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注脚。

斯皮克曼认为,地理位置作为一项要素可以具体分为世界性和区域性两类。世界性位置以海陆分布、气候带等条件作为划分标准,大致包括内陆、岛屿和边缘三种;区域性位置主要根据邻国间的相对关系和实力地位来划分,大致也可分为较强、较弱和相当三种。斯皮克曼对各种不同的位置组合都进行过讨论,其中最受重视的是被说成统治世界"钥匙"的"边缘地带"(Rimland)。在斯皮克曼的概念中,所谓"边缘地带"是指欧亚沿海陆地,实际上指的就是欧亚大陆的边缘区,包括欧洲近海地区(苏俄除外)、中东、小亚细亚、伊拉克、阿富汗、印度、西南亚、东南亚、中国、朝鲜半岛以及东西伯利亚地区。"边缘地带"与麦金德所称的"内新月形地带"大致吻合,但在概念的范围上有所扩大,因为它事实上把"内新月形地带"的覆盖面扩展到了包括波罗的海—黑海西侧的整个欧洲大陆、亚洲的山地中心和整个中国。这一地带人口众多,经济发达,财富盈饶,资源丰富,能利用内海航线,并且是"心脏地带"与海洋之间的通道,在它的周围有"一条与整个所谓海权国家聚集区相联系的环绕大海的交通线"。在它的外面有英国、非洲、东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等临近大陆的陆岛。斯皮克曼指出,环绕欧亚大陆的一系列边缘海,给欧亚沿海平原的一些国家提供了彼此往来的便利的和廉价的交通路线,大大地帮助了这些国家的发展②。在历史上,它曾经存在过世界的几大文明,具有实在的世界权力特征;现在,它应该是争夺世界和控制世界的锁钥。从海陆间隔的角度讲,"边缘地带"居于海洋边缘与"心脏地带"之间,既与大陆"心脏地带"保持一定的近距离的关系,又邻接海洋,是陆

---

① 《和平地理学》,第14—16页。

② 参见上书,第46页,第71页。斯皮克曼自己认为"边缘地带"是一个更准确地表明这一地带性质和特征的名称。

权和海权之间的广大缓冲地带[1]，或者它应当被看成是二者的“中间地带”。从海陆对抗的角度讲，正因为它处于“心脏地带”与近海国家之间，所以是海上强国与大陆强国发生冲突的地带（中国即在此范围内）。历史上，它不得不同时面对陆上势力和海上势力的逼近，必须从海陆两个方面保卫自己。海陆条件的双重性是其地缘政治问题的真正实质，同时它也可以起海陆双栖的作用。基于这种形势，一个国家为了实现战略扩张的需要，总要寻求进入海上的通道，支配接近交通要道的战略要点，控制大陆的“边缘地带”。而为了防止一个国家的扩张，别的国家同样也必须首先控制“边缘地带”。历史经验表明，“边缘地带”具有向外扩张遇到阻力最小的优势。从这样的预设前提的分析逻辑中不难发现，斯皮克曼对妥善处理陆权和海权之间的关系极为重视，他特别突出了“边缘地带”在妥善处理这二者之间关系中的关键性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说，斯皮克曼一改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之前以海洋或大陆为单一基准的海陆二分论，而直接提出了兼顾海陆关系的“边缘地带的分化论”；他用几乎与麦金德相同的断语式口吻提出了一个麦金德命题的反命题：

“如果说旧世界的强权政治需要一个口号的话，就必须是：

> ‘谁支配着边缘地带，谁就控制欧亚大陆；
> 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
> (Who controls the Rimland commands the Continent;
> Who controls the Continent commands the world.)[2]

斯皮克曼认为麦金德高估了“心脏地带”的作用。根据对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形势的分析，他质疑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统治世界的中心既不在海洋，也不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而在介乎二者之间的结合部，即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海权国家和

① 《和平地理学》，第 76 页。
② 同上书，第 78 页。

陆权国家都瞩目这一地带并视之为控制世界的必然途径,这是导致在这一地带产生持久冲突的基本原因。由于临近海上机动通道和具备陆路交通的方便条件,“边缘地带”内部和周围的机动性比海上交通和纯粹的陆上交通都要强一些。因此,如果“边缘地带”出现联盟的组合将给世界造就一支震慑性的力量,足以撼动世界的均势并走上世界权力的颠峰。其结果对传统的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都同样会产生致命的威胁,因而在阻止“旧世界力量中心的统一”方面两类国家存在着共同利益。这句话所指的当然是某种潜在的力量占据“边缘地带”的危险性,然而斯皮克曼也认为某一强国成功地控制该地带也许并非坏事。对于在“边缘地带”所出现的冲突,斯皮克曼提出了与麦金德不同的看法,认为至少有三种情形可以用来质疑或推翻麦金德的陈述。一是历史上多次出现“心脏地带”由内向外施加政治控制和军事入侵的现象,古代游牧民族(即“草原人”)通过征服“边缘地带”的部分地区,建立过几个庞大的帝国;条顿民族与斯拉夫民族为争夺东欧中间地带而进行过上千年的斗争;俄国为了到达印度洋,曾在近东地区与土耳其、不列颠相对抗。虽然“心脏地带”对“边缘地带”的侵略曾经引人注目,但更主要的冲突发生在“边缘地带”本身之内。二是麦金德强调陆权势力与海权势力之间历史性对抗的不可避免性,但事实上证明这是错误的断言。实际上,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三次著名战争(即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俄国都是站在一起反抗拿破仑、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所领导的“边缘地带”的侵略国家的。换句话说,从来不曾发生过单纯的陆权势力与海权势力的对抗。历史上的阵营总是某些“边缘地带”的国家和英国对抗另一些“边缘地带”的国家和俄国,或者是英国同俄国联合起来对抗一个统治“边缘地带”的强国[1]。也就是说,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也有可能共同反对某个介入“边缘地带”的强国,或者一些“边缘地带”的国家与另一些“边缘地带”的国家分别联合陆权和海权进

① 参见《和平地理学》,第78页,第96页。

行对抗。故而,麦金德的三段论式的名言是错误的,应该把旧世界的强权政治的口号修正为他的新三段论。三是在历史上大陆"边缘地带"的一些国家总是周旋于英国和俄国之间,或者同英国结盟或者同俄国结盟,目的是反对要支配"边缘地带"的列强;而对于海洋大国来讲从未发生过它们为反对大陆国家集团而实行结盟的情形。因此,在欧亚大陆存在着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即"边缘地带"和"心脏地带"中,海洋方向所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前者而不是后者。19 世纪以来的世界政治格局反映在地缘政治上,就是"边缘地带"成为海洋方向和"心脏地带"之间进行斗争的主要场所。曾经出现过海上通道周围以英国为主的海上力量与试图冲破包围圈并寻找出海口的以俄国为代表的陆上力量相互间的对抗,其目的主要是争夺"边缘地带"的主导权,防止对手成为这一地带的主宰,而不单纯是海权和陆权的斗争。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时候,世界最大的两种势力之间的斗争实质上仍然"是一场争夺欧亚边缘地区沿海地带控制权的斗争"①。也就是说,历史和现实的地缘政治较量都说明,"边缘地带"一方面可以发挥海权与陆权之间冲突的巨大的缓冲地带作用;另一方面,控制"边缘地带"的斗争恰恰是引发大规模世界性冲突的根本原因。

此外,斯皮克曼还指出了"边缘地带"的另一种可能的发展前景,即假如欧亚大陆周围,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达到高度工业化,苏联在中亚地区的位置重要性将减少。因此,苏联的力量仍将存在于乌拉尔山以西的欧洲,而非中部的西伯利亚区域。这一前景促使他对与麦金德相反的结论或倒转逻辑,即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较"心脏地带"更为重要的论断深信不疑。斯皮克曼提出,如果新工业中心和新交通枢纽沿着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发展,这里在战略上将有可能比"心脏地带"更为重要,尽管处在"心脏地带"的俄国仍然是"最强大的陆上

① Spykman, *The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Harkert Blais Inc. 1942, pp. 182—183.;《和平地理学》,第 83 页。

势力”，但它依靠单独的力量也无法扭转这种战略态势。总之，斯皮克曼的学说改变了马汉把对海洋的控制和麦金德把对“大陆心脏地带”的控制视作世界历史基本动力的观点，而转以“边缘地带”取代前二者的地位。

在论及“大陆心脏地带”的不重要性时，斯皮克曼谈到了俄国经济和地理的现实情况。他认为，从地理条件看，占据“心脏地带”的俄国地处内陆，气候恶劣，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特别是，它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工农业布局很不合理。所谓巨大粮仓的说法，因农业生产中心在西部、不在中部而大大折扣。而作为现代工业动力的煤、铁、石油和水力的储藏，大都分布于乌拉尔山的西面而很难实现对整个“心脏地带”的供给。再就交通和技术条件——这是麦金德提出“心脏地带”重要性的主要根据——来说，也无法印证“心脏地带”的重要性。斯皮克曼指出，并没有事实表明“心脏地带”现在或不久的将来是世界交通、机动和潜在实力的中心。虽然铁路和空中飞行意味着它可以利用原先没有过的全新的机动性，但它在通达性上却是相当差的，因为正是地域空间过于广阔，它在四面都面临无法逾越的通行障碍。寒冷的气候和众多崎岖的山路，使人们完全可以想象依靠陆路从事扩张活动的艰难程度。如同过去那样，实力与距离的反比例规律仍然会发挥作用。虽然俄国的好处是可以利用内部交通线，与英国利用外部交通线相比仍具有便利之处；但是必须指出，内部交通线起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而不只起一个方面的作用。如果圆周线上的一点转变为另一交通圈的中心，则中心和圆周线之间的关系就很容易随着变化。例如“心脏地带”对于英国的战略含义，只有假定英国在“边缘地带”聚集了足够的军事力量才是真实的。如果“边缘地带”是由当地的战争工具控制着，整个内线和外线的意义就改变了；特别是，如果“边缘地带”的某些势力（如中国和印度）完全能够依靠自己，那么它们必须依靠英国海军保护的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此时，除非俄国中亚地区的

实力足以与“边缘地带”相匹敌，否则它的力量仍将留在乌拉尔以西，而不会以压倒的优势来对付“边缘地带”①。所有这些意味着，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成为世界潜在力量中心的观点，由于自然因素、经济发展因素及其地理上的障碍，可能减少其理论的可靠性。“心脏地带”的整个陆块从未形成过一个完整的整体，在政治上也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势力，而是始终处于被分割成好几股势力的分散状态，要设想对它进行像样的整合在事实上是相当困难的，即使付出一定的代价也是很难奏效的。

当然，就陆权重要性而言，斯皮克曼同意麦金德的观点，因为实际上他也是一位陆权论者。即使面对当时海军和空军力量的发展并显示出战略上价值的情况，斯皮克曼仍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证明，海军和空军脱离了陆地的支撑很难达到明显的效果，军舰和飞机没有陆上基地是不能起作用的；因此，基地力量就始终是决定性的因素。“空军不仅仅是飞机而已，而是飞机加基地。反过来说也是正确的。”②基于此，他把海空力量视为在陆地取胜的辅助手段，并认为海空力量即使在“边缘地带”也不能单独决定胜负。这些观点意味着斯皮克曼并不认同海权论和空权论的绝对化倾向，而是把陆权视为一种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此外，斯皮克曼对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也是基本上苟同的，他以美国为例进一步阐发了这个著名理论，即对于海权国家来讲，“世界岛”是提供力量平衡的关键，保持与其有关的力量均衡属于海权国家的根本安全利益。美国在短时间内被迫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目的，就是要防止“世界岛”落入某一强大势力的手中。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斯皮克曼提出了他的著名论点，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决定着其安全问题的性质，由此决定着它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行动。应该说，斯皮克曼以批判的态度进一步发展了麦金德的陆权理论。从斯皮克曼

① 《和平地理学》，第 74 页。
② 同上书，第 85 页。

的主要观点看,他虽然强调"边缘地带"的战略意义,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有关陆权的地缘政治学理论。

与麦金德一样,斯皮克曼特别重视欧亚大陆在地缘政治和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在这块世界最大的大陆上,历史上存在着"心脏地带"向外压迫"边缘地带"的一般情形。俄国正是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寻求走出去的出海口,但也正是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遇到主要障碍。海上强国则从海洋方向包围欧亚大陆,以此来奠定自己的世界权力地位。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亚大陆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因为世界大战的两个主要战场欧洲和远东都在欧亚大陆,它们成为决定战争结局的关键部位。虽然它们都具有各自的区域独立性,但就依托欧亚大陆的位置来说仍是整个战场上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就需要妥善处理和全面兼顾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所经常面临的海陆关系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布局上,"每一个战区都有两个海陆两性的边和一个大陆边。这种形势中的第一个要点是:俄国和美国对这两个战场所处的地位有极大的相同之点,也有极大的不同之处。苏联介于两个战场之间,但是有完整的陆地领域;美国也居于两个战场之间,但是有大洋的阻隔。"与此相比,德国和日本却因能够有效利用内线供应而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只不过后来它们因没能克服陷入两线作战,即进行大陆战争和海陆两栖战争的原因才不免失败的命运。苏中美英的共同参战,迫使德国和日本穷于同时应付海陆作战[①]。但是,对于反法西斯国家来说,海陆问题的严重性也是存在的:一方面,俄国的力量和战争重心集中在西部,中国的力量和战争重心集中在东部,因此既不能在战略上形成有效的呼应之势,又不能满足战争的物资供应。另一方面,如果苏中两国在战争中失败,那么美英很难依靠加在一起的力量去打败德国和日本。而且,给美国造成的最严峻事实是德意日结成了军事同盟,使其有可能处在整个欧亚大陆的联合势力所构成的包围圈中,这样它不得不单独面对东半球实力

① 《和平地理学》,第89页。

中心的压倒性优势。因此,可以说美国曾经遭受过自己安全上的致命威胁,它在处理海陆关系时也有力所不逮之处。只不过在欧亚大陆上存在苏中两个战略潜力很大的国家,美国自己才幸免于战争的不幸结局。

当然,斯皮克曼在强调欧亚大陆的重要性时,关注点仍然是其"边缘地带"。他认为,"边缘地带"和"心脏地带"的关系,特别是前者内部的实力分配,关乎整个东半球势力冲突的谁胜谁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关头实质上是争夺欧亚边缘地区沿海地带的控制权的斗争。就此,他更加关心美国在这种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和所应选择的战略: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曾经造成了某一强国或强国联盟控制"边缘地带"的现实前景,这不仅是对美国的最大威胁,而且也是美国参战的根本原因。因此,美国的基本目标和采取行动的方向始终应该是阻止某些霸权势力统治"边缘地带",为此完全可以不惜使用武力。这不仅是国际关系的性质决定的,而且是美国地理位置所包含的安全条件决定的。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应采取的战略,斯皮克曼强调,由于美国在地理上被欧亚大陆及非洲和澳洲包围着,它的战略宗旨应该是维护欧亚大陆的均势,不允许欧亚大陆出现一个统一的压倒其他所有国家的权力中心。为此,他主张美国必须积极干预欧亚大陆事务,控制该大陆的"边缘地带"。从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在地缘政治上所采取的战略来看,它们都对斯皮克曼的建议十分重视。战后,美国沿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建立军事基地和势力范围,对属于另外一个阵营的苏联和中国进行围堵,便是明证(我们今天依然可以从布热津斯基的"美国深入欧亚大陆腹地"和进军中亚的主张,以及克林顿、布什的中亚政策中看出问题的实质)。而美苏两极之间的竞争和对抗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斯皮克曼的观点。虽然苏联与美国相比力量仍然逊色,本质上是一个陆地强国,但它雄居欧亚大陆,并不断把触角伸向"边缘地带"。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所做的"南下暖洋"努力和入侵阿富汗的行动,便证明它对"边缘地带"的高度重视。因此,美苏之间作为世界两强所进行的较量仍然说明,陆上强

国和海上强国会从各自的地缘政治条件出发，会追求不同的地缘政治利益；但它们对“边缘地带”战略价值的理解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应该说，这种差异点和共同点都是冷战时期美苏冲突的根源。

斯皮克曼在强调陆权重要性的同时，也谈及过海洋的重要性和海权问题。他一方面指出，世界陆块地理的这些主要因素，是一切战略和安全问题中必须加以考虑的极端重要的因素。政治的和经济的结论规定对政策的最后决定，而政治和经济的结论首先受到陆块分布和地形性质的限制和约束。另一方面，他也承认，“显然，海洋在旧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中起最重要的作用，海洋也规定了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的关系。东半球与西半球之间最重要的接触是由海上交通进行的。只有利用海上交通，美国的势力才能影响欧洲和远东，而欧亚各国的势力，也只有越过海洋才能实际上接触我们。尽管除了运送最特殊的项目外，在运输一切物资方面占压倒优势的仍然是航行在大洋中的船只。”[①] 进一步地说，不仅海洋对交通和技术存在重要影响，它对地缘政治本身也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斯皮克曼认为，海洋是新型地缘政治结构的基础，这与历史上以控制毗邻陆地为基础的陆上强国，如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和沙俄帝国是不一样的。由于海洋的通达性极强，它造就了拥有强大实力和空间形态巨大的权力结构。英国、法国、日本和美国都促进了现代世界的成长，而这个世界是政治势力发生相互作用的单一场所。正是海洋把欧亚大陆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单元，而海权支配着新旧世界之间的关系[②]。当然，斯皮克曼所说明的海洋重要性是具有限定意义的，这就是他在观照海陆关系时仍然强调“边缘地带”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当海上力量对“边缘地带”发动进攻或海上力量与陆上力量在此相遇时，这个地带的地缘政治价值会骤然上升。他强调，“心脏地带”的强国始终存在着寻求出海口以支配海上通道的强大动力，这些国家认为只有如此

① 《和平地理学》，第47—48页。
② 同上书，第65页。

才会达到控制世界的目的。而控制"边缘地带"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途径。同样,海上力量也始终存在着控制"边缘地带"以占取针对"心脏地带"优势的动机,它们认为在这一地带上所采取的行动具有向外遇到阻力最小的优势。这便是"边缘地带"不断发生冲突的历史动因,也是它具有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的所在。

斯皮克曼另一个有关海陆关系的著名观点是关于对世界权力中心的分析。在斯皮克曼的世界观中,世界权力的主要中心几乎都处在中纬度地区的沿海"边缘地带",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仍是如此。在这一空间范围内,已经出现了三个或四个权力中心,即北美太平洋沿岸地区、欧洲沿海地区和欧亚大陆的东亚沿海地区,后两个地区与麦金德所称呼的"内新月形地带"大体一致在斯皮克曼的定义中属于狭义的"边缘地带";第四个中心可能是还不太显眼、却有发展能力的印度。世界权力中心分别对应着海上世界、陆地世界(即"心脏地带")和介于二者之间的"边缘地带"。当然,斯皮克曼强调了后者的显著地位,认为对于世界主导权的争夺就表现为包括南北美洲大陆的西半球与包括"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欧亚大陆的战略性对抗,它决定着大国的命运和前途①。在欧亚大陆上,并不是"心脏地带"反而是"边缘地带"构成对海上力量的主要威胁,对它的控制足以奠定统治世界的基础。一旦"边缘地带"落入某一个强大势力之手,只有其他两个力量中心联合在一起的力量才能抵挡。因此,海上世界和陆上世界都设定"边缘地带"是获取权力的基础,也是它们加强自身力量的基本源泉。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出发,斯皮克曼认为美国必须对这一地缘政治的结构此作出及时而有效的反应。鉴于德国与日本的结盟意味着这两个国家有可能控制上述三个世界力量中心进而控制整个世界,美国要保证自己的实力地位,就只能与英国结成同盟。因为美国自己的最根本利益是决不能让任何单一势

① Spykman, *The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pp. 182—183;《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14页。

力获得独自控制“边缘地带”的机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自己可以与某些“边缘地带”的强国建立联盟,或宁可与“心脏地带”的强国实行联合。正是根据这样的逻辑,斯皮克曼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英苏的战略联盟表示拥护,并认为这是以实际行动对“边缘地带”重要性的认可。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应采取的地缘政治战略,斯皮克曼认为,由于美国自身不具备单独抗衡联合的欧亚大陆的完整实力,最好的做法是维持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均势。如果欧亚大陆上的强国(主要是俄国和中国)结成联盟,那么对美国安全所造成的威胁不亚于德意日联盟。“一个从乌拉尔山到北海的俄罗斯与从北海到乌拉尔的德意志是一丘之貉”。他还预测,美国在亚洲可能会面对一个现代化的、充满活力的和军事化的中国,它不仅威胁到日本的地位,而且会削弱西方世界在亚洲的利益,因此,美国要像从前两次主动援助英国一样,在安全上给日本一把保护伞,以维持亚洲的均势。从此可以看出,斯皮克曼的理论完全从现实主义假定出发,把地缘政治和均势完整地结合起来,一方面认为一个“本质上不稳定的、不断变位的、不停变化的”均势是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①];另一方面,他所讲的“均势”实际上主要是指大国之间在“边缘地带”所产生的均势,均势具有地缘政治的确定含义,或者具体说它必须确实反映地缘政治分布性的现实特征。特别是,其论述明显地暴露出来在陆权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地缘政治海陆二分的主导倾向,并以“边缘地带”的重要性和对世界权力中心的划分加强了这种主导倾向。这是他的理论遵循传统二分论和进一步扩大二分逻辑的很好注脚。斯皮克曼在自己“新世界观”(new world-view)的基础上,把世界权力的中心划分为“海上世界”(the maritime world)和“陆上世界”(the continental world),与“海权”和“陆权”的概念正成对应之势[②],只不过他以“边缘地

①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107—108页。

② 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Washington: Pinter, 1998, p. 119.

带"学说又作出了"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二分的进一步区分。

第二节　斯皮克曼与麦金德之比较

从麦金德到斯皮克曼,虽然不能说理论的发展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但至少也显现出发展脉络有致的特点。这主要在于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少相同点。斯皮克曼与麦金德一样,基本上持有类似的全球观点;两个人作为具有全球眼光的地缘政治学者,都突破了地缘政治学传统的狭隘视野来看待国家权力与地缘政治的互动。不过,两相比较的话,麦金德的全球视野带有明显的从"大陆心脏地带"由内而外的推延式思维倾向,在斯皮克曼那里则呈现出一种完全覆盖全球的横向联系思维倾向。他认为,"现代国家不论是在战争时期或和平时期都要以全球的观点来进行政治的和战略的思考,才能保持住它们的实力地位。因此,凡是健全的地缘政治分析,都是以反映有关的一国或几国在地球上位置的世界地图为基础的。"[①]虽然斯皮克曼是从西半球看东半球的,东半球主要就是欧亚大陆,但"以西半球为中心的圆筒投影地图,给我们提供了一幅美国的地理位置与世界其余地区关系的图景";虽然他强调新世界在地理上被旧世界的一些地块所包围,但新世界和旧世界的结合是一幅更完整的全球世界的景观。就此,斯皮克曼提出,全球和平植根于对整个世界地理,包括地表所有区域的理解。

斯皮克曼认为,麦金德的后期观点在内里对"边缘地带"理论是有所妥协的。由于地缘政治全球范围所显示出来的重要意义,这种妥协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他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十分明确地显示出欧亚大陆关乎全球势力均衡的重要性。麦金德对"大陆心脏地带"这个概念的最近表示,已承认了"边缘地带"的卓越重要性,承认了英、美、俄为了防止德国势力在这个地区成长而进行合作的必要性。因此,他修改

① 《和平地理学》,第20页。

了他的观点,把"大陆心脏地带"的分界移到叶尼塞河,缩小了中西伯利亚草原地区的重要性。现在苏联的实力中心,是在它的实际地理中心所规定的地方,即在乌拉尔以西。"大陆心脏地带"变得不像"边缘地带"那样重要了,而能够控制欧洲沿海地区,从而左右世界主要实力关系的,则是英、美、俄陆海势力的合作①。虽然麦金德和斯皮克曼分别提出了同样著名的"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两种学说,虽然由欧亚沿海所环绕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在事实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正是因为地缘政治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二者反而具有了很大的相互补充性。

应该说,麦金德和斯皮克曼都属于现实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理论方面也都主要以陆权和海权的政治较量作为论述的基础;两人都属于陆权学派,且是该学派重要的头面人物,二人学说从地理因素角度分析了陆权对于国际政治的重要影响,斯皮克曼强调"边缘地带"的战略意义,完善了麦金德的陆权思想。当然,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学说"是"大陆心脏地带学说"的"著名的倒式",但这种倒式实际上使人们对陆权和海权相互关系的理解更加完整。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上:一是"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二分,二是"内新月形地带"与"外新月形地带"的二分,地缘政治学的陆权理论因发展出这两条主要线索而变得更加深刻、深化和全面。特别是,就其"边缘地带学说"的理论内核而言,第二个二分特别具有重要性。因为麦金德在其陆权论中已提出"内新月形地带"和"外新月形地带"的二分思想,也讨论了它们与"心脏地带"的关系;但对这个命题作系统展开的是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理论在麦金德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内新月形地带"和"外新月形地带"的划分作了发展和扩大。这些对理解"边缘地带"的性质和形态都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当然,如果说两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只能说斯皮克曼的"边缘

① 参见《和平地理学》,第79—83页。

地带"学说质疑和翻转了麦金德的"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在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上提出了相反的结论。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大不同点,而这已经在上面作出过详细的分析,此处不再赘述。二人理论的另外一个不同,反映在理论对政策和现实领域的影响方面。麦金德的理论确实影响了一些西方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政策选择,但主要是德国;斯皮克曼的理论则受到更多国家的重视,特别是美国。严格地说,在地缘政治学理论中真正获得应用的理论是斯皮克曼的理论。麦金德、可能还有马汉,他们所给出的地缘政治格言至今仍然为人们所熟知,但他们的理论只是提供给人们观察和分析国际政治现象的某种方法和工具,对一些国家的政策产生了某种微妙的影响,并未直接被采用;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学说"则在战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了直接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长期推行的冷战与遏制战略及控制"边缘地带"的霸权扩张政策就从这一学说中找到了直接的"政策依据"。"边缘地带学说"的实用性和现实主义品质从斯皮克曼自己给地缘政治所下的定义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地缘政治主要是研究国家地位、安全问题的基本方法和尺度,"研究如何以地理因素为基础来制定国家安全政策";"如果不考虑地理因素,那就忽视了阐明安全问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依据。"[①]这一定义使地缘政治与对外政策密不可分,其联系逻辑是:地缘政治决定国家维持安全的方式,包括动用武力来确保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方式;因为政策和实力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因此,在解读国家的对外政策时,首先要了解其在世界所处的地理位置,而地缘政治学可以提供国家行动的地理方位、坐标和方法。鉴于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最根本问题仍然安全问题,在这方面必须运用地缘政治分析的方法[②]。

应该说,虽然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具有全球视野,但其主要注意力仍然是朝向美国自身的。斯皮克曼围绕"边缘地带"所作的地缘

① 《和平地理学》,序第2页。
② 《和平地理学》,第5页。

政治分析,对美国战后的战略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有影响的主要观点是:第一,美国有权利参与世界事务,参与世界事务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斯皮克曼认为,"从地缘政治分析的观点看来,美国受到了地理上包围。实力资源的分布,给旧世界(欧亚)提供了施展实力的可能性要比给新世界(北美)的大。"①而在政治上讲,美国和北美大陆的安全正在受到来自大洋彼岸整个半球联合力量包围的威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限的世界地理空间内,美国要使自己免遭包围和失败,就必须在孤立主义和干预主义之间进行有力的选择,而斯皮克曼的政策主张虽然体现了一种给美国决策者敲警钟的"逆向思维",但其政策用意十分清楚,即美国应该积极地介入世界政治,不惜使用征服手段来阻止超越太平洋和超越大西洋的两个地区之间的统一,而这需要它在全球范围内采取有效的、实质性的行动。与此相联系的是,斯皮克曼比别人更强调奉行实力政策的重要性,认为实力扩张是真正能够推行美国政策的有效工具,奉行实力政策可以使美国在地缘政治上取得可以见得到的成就,而美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推进不过是实力扩张和增强的直接表现。由此,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的实力政策和具有明显的实力色彩的地缘政治政策,深深地影响了战后几十年以来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

第二,"边缘地带"在美国战略中占有关键的位置。由于美国在地理上被欧亚大陆以及非洲和澳洲包围,所以,"边缘地带"是与美国有着最直接利害关系的区域。斯皮克曼的分析试图证明,如果整个欧亚大陆联合起来形成一股统治世界的力量,那么美国就将面临最大、最现实的危险。他认为,如果"边缘地带"被其他大国威胁或控制,尤其是如果美国自己面临已经控制欧洲大陆的某个强国或联盟的直接进攻,它在北美大陆的强势地位就可能发生动摇,甚至连生存利益都会出现不可预见的变数。斯皮克曼指出,为了确保美国的国家利益,对付这种可怕的前景的条件取决于两个:条件之一是不列颠舰队完全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

① 参见《和平地理学》,序第7页,第108页。

而美国又能利用不列颠诸岛作为前进基地以对付欧洲大陆；条件之二、也是最重要的条件是美国控制"边缘地带"，同时防止由一个敌对国家统治欧亚大陆。美国要高度关注谁能控制欧洲和亚洲的"边缘地带"，"要是这些地区落到与美国为敌的一个强国或几个联合起来的强国手里，那么由此造成的包围形势就会使我们处于严重危险的局面中，不管我们的陆军和海军的力量如何强大"。因此，"在美国的安全形势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谁控制欧洲的和亚洲的边缘地区问题。"①在斯皮克曼看来，在"边缘地带"（包括欧洲沿海、远东沿海和可能成为中心的印度），对美国来讲最具重要性的是欧洲沿海地区。"边缘地带"的地理特征和其内部的分布性特点，决定了美国只能与英国联盟，否则美国将处于一种易于被挫败的地位。因为即使美国变得强大，它仍然不能单独抵挡住所有其他中心的联合。为了作为一种世界性力量生存下去，也为了"美国心目中的世界和平"，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主动寻求英国的帮助。同时，为了限制德日联盟势力的扩张，为了避免德日在"边缘地带"建立强国，美英还必须与苏联结盟，通过三者联盟可以建立欧亚大陆力量的稳定均势②。当然，斯皮克曼也率直地强调，美国要保持对战后世界的控制权，必须意识到苏联对"边缘地带"的现实威胁并采取直接的对策。因为一旦这个已经占据"心脏地带"的庞然大物推进到"边缘地带"，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美国应该把遏制苏联对"边缘地带"的蚕食和扩张视为当务之急，这是保持全球力量均势和世界和平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必须在"边缘地带"保持优势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

第三，从西半球对东半球的战略对比看，欧亚大陆的战略价值应当引起美国的高度注视。过去，每当某一强国眼看要控制欧洲大陆的时候，美国都不得不被迫参战进行阻止，并且只有在付出沉重代价的情况下才达到这个目的。问题是由于美国没有能认识到自己在世界上所处

① 《和平地理学》，第4—5页。
② 《政治地理学》，第12页。

的地理位置的含义。战后仍然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西半球实力中心能够为一种联合起来的欧亚潜在实力所压倒,欧亚联合起来的潜力拥有十倍于美洲的人口和两倍半的土地。即使目前新世界的工业生产力几乎与旧世界相等,但美国一旦面对联合起来的欧亚边缘地区,仍将会发现自己无可奈何地被一个优势的力量所包围。因此,它的主要政治目标,不论是在战争时期或和平时期,必须是防止旧世界几个实力中心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利益。”[①]尤其是,要防止欧亚大陆出现一个占有压倒性优势的统一权力中心或潜伏一个有压倒性优势的潜在势力。这是攸关美国生存与安全的最基本利益,因而是其在地缘政治上的最主要目标。由于欧亚大陆的势力分布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时都具有明显的严重性质,他建议美国必须积极干预欧亚大陆的事务和介入相关国家的政治生活。这意味着,建立和维持欧亚大陆的均势,决不允许在欧亚大陆出现与美国匹敌的强国,是美国战后的主要目标,美国可以不惜用征服手段来达到这一目标[②]。

应该说,斯皮克曼是美国现实主义学派中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的“边缘地带学说”对美国的冷战政策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成为杜鲁门主义和凯南遏制理论的重要来源和基础。这种影响有些至今仍

① 《和平地理学》,第84—85页。

② 当然,斯皮克曼认为,美国对远东出现为一个单独的强国所统治的局面也应十分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主要危险可能来自于反美的欧亚实力中心的联合。因此,制止这种局面的重现在将来是非常重要的。他预示到法国、德国和东欧之间为了在欧洲寻求支配地位将会发生一场实力争斗,其中德国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很可能成为胜利者。在远东,他预见到中国作为强大势力的出现。为了英国或美国的利益,这两种情景都不应该允许发生。为了对抗这种局面,美国应该在欧洲支持法国,在远东支持日本。如果英美苏采取一致行动,确保充分均衡的实力对比,那么这种支持会非常有效。苏联自身的向外压力,尤其是对中国的压力,可能构成战后世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参见《和平地理学》,序第6页;《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20页。同样,按照斯皮克曼的逻辑,对于美国利害攸关的是,防止中苏(俄)结盟也是最大的天然要求,因为这种局面将对“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关系的变化影响重大。根据这一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大三角关系有助于避免欧亚大陆上的两个最大的陆地强国取得和解。

值得高度关注。战后以来，美国在“边缘地带”推行了一系列的编织军事同盟网络的计划，其主要矛头指向位居欧亚大陆中心的苏联和处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双重位置上的中国，最终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广阔“边缘地带”上形成了遏制苏联和中国的包围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斯皮克曼“边缘地带学说”的精髓的，因为这种做法实际上把斯皮克曼的理论演绎成了这样的现实：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保持美国的军事和政治优势，阻遏苏联对“边缘地带”的推进和向海权国家发起挑战的可能性。同时，美国高度重视同“边缘地带”外围的西欧、日本建立联盟，只不过斯皮克曼在世界三大权力中心基础上提出的美英苏联合预想在战后变成了美德日联盟，德国和日本被美国视作制约苏联控制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企图的重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政策从冷战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杜鲁门的“遏制”和“包围圈”政策，尼克松——基辛格的均势政策和里根针对苏联的“推回战略”，以及布什借口“9·11”事件将美军开进中亚地区的做法，都鲜明地印证了斯皮克曼“边缘地带学说”的实践含义。正如一份材料所证实的那样，1986年2月，美国海军部正式宣布要控制世界上16个海上航道咽喉点。所开列的名单有：北至格陵兰——冰岛——联合王国之间的海峡，南至非洲以南航道；近至佛罗里达海峡和巴拿马运河，远至东南亚的马六甲海峡。所列诸点遍及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和北冰洋，最远的地点距离美国本土有万里之遥。美国的地缘战略目标是：对海上航道的控制是加强对“边缘地带”控制的主要步骤，而控制“边缘地带”是要“变苏联为一个孤立的岛，以便美国控制余下的世界”①。这些都是斯皮克曼“边缘地带学说”的直接应用。而无独有偶的是，苏联虽然没有公开使用地缘政治这样的概念，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它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争霸和所推行的对外扩张政策明显的是受地缘政治的逻辑支配的，如以中东地区侧翼包抄西欧，南下印度

① 参见《战略地理论》，第166页，第324页。

洋,入侵阿富汗,在越南金兰湾建立海军基地,对北方四岛紧紧抱住不放,等等,都与沙俄帝国由内而外的地缘政治扩张的路数暗暗相合,特别是它们都对应了"边缘地带学说"的要旨。

总之,斯皮克曼地缘政治学说的命运标志着,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和地缘政治要求相一致,第二战次世界大后地缘政治学研究的"心脏地带"转移到了美国,先前那些该领域的重镇则退位为"边缘地带"。斯皮克曼的学说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国际关系学者的观点和著述,尤其是现实主义学派的学者。因此,斯皮克曼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学派的大师级人物,他的理论也被称为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支柱"。与此同时,斯皮克曼的论说成为美国历届政府制定超级大国战略和进行美苏对抗的重要理论依据。

第五章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重要流变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到，海权论和陆权论、"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已经为地缘政治学基本理论奠定了二分论主脉的坚实基础。不过，除了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之外，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豪斯浩弗应该说也是一位有着较大影响的人物；而除了海权论和陆权论的几位主要先驱之外，空权论的提出者杜黑、兰纳、德塞尔斯基和米切尔也是值得提到的人物。在延续和伸展地缘政治学基本理论的二分论主脉方面，他们的学说和观点都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而成为这一理论线索的重要分支。"生存空间论"在范围上扩大了对陆权和海权之间较量的认识，空权论的出现促成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空中力量加强了陆权针对海权的优势，一种是空中力量加强了海空力量的配合，不利于陆权。因此，这里之所以把主张陆权论的豪斯浩弗和主张空权论的其他

几位人物相提并论,只是基于他们的论说在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发展过程中具有某种重要的流变形态这样的意义。

第一节 “生存空间论”:海陆关系的扩大化

问题又要回到陆权国家的德国,这是一块曾经养育了多位著名地缘政治学家的土地。这固然是由于先前就有拉采尔等地缘政治学先驱的缘故,他们给不断延续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拉采尔认为,人类活动的基本方式是永无止息地争取生存空间(Lebensraum)。一个国家的领土面积象征着它的权力份额,每个国家都为扩大其领土疆界而努力奋斗。因此,国家在性质上不过是一种可被视为“空间有机体”的存在,它们的疆界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经常会出现移动或变更的现象。在他的学说里,“生存空间”和“能动的疆界”(dynamic frontiers)是由“空间有机体”衍生出来的两个重要概念,对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思维和理论逻辑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生存空间”意味着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所应具备的地理基础,特别是足以供养其人口的土地面积和自然资源;“能动的疆界”则意味着“生存空间”这一概念的动态性质。拉采尔强调,一个国家要保持自己的强大地位,仅仅需要看它能否成功地适应自己的地理环境和能否通过拓展“生存空间”来扩大可支配性的力量。与达尔文(C. R. Darwin)的进化论一样,拉采尔给国家的扩张行为赋予了弱肉强食和适者生存的特征,国家就像自然界的动物一样也会为安身立命而进行无情的斗争,并且永远处于循环往复的过程。如果一旦失去扩张动力或缺乏采取行动的力量,它们就可能被其他强手所侵吞。按照这种逻辑,强国可以吞并相邻的弱国,也可以主动征服具有战略和经济价值的无主地。因此,拉采尔的“生存空间”理论实际上充满了权力与空间紧密契合的观点,他以地缘政治学的概念来表述国家政治权力的地缘基础,系统地发展出一

种说明和解释政治现象与地理因素，人类政治行为与自然环境的理论。应该说，拉采尔的观点显然具有社会沙文主义和领土扩张主义的特征，德国的地缘政治学理论深受其持久的影响。特别是，豪斯浩弗“生存空间”和“泛区”(pan regions)理论不仅以其为重要的思想来源，而且在直接承续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系统演绎。

在豪斯浩弗的时代，一方面是德国地缘政治学理论已经具备丰厚的土壤，另一方面是作为欧洲中央之国的德国长期面临的地缘政治问题反而给它提供了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动力和机会。对于拓展“生存空间”的地缘政治潜力来说，德国多数地缘政治学家意识到，围绕“中欧核心”会造就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新国家，在控制中欧和把所有德语民族统一后，德国将具备与真正的世界强国竞争的必要条件。为此，德国所需要的不再是一个歌德，而是另外一个恺撒。然而，德国也始终面临着地缘政治方面的艰难课题，例如中欧悬而未决的地理条件以及在自己的崛起过程中如何使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地位与地理条件相匹配。直到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它开始着手解决自己面临的地缘政治问题。这直接刺激和促进了它的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并给它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0多年间，德国曾一度成为地缘政治学这一学科的重镇，并且从一开始，德国地缘政治学就兼具科学加艺术的特征，即同时使用推理和直觉的方法。除此以外，它还具有实用理性这样的特征，即把本学科直接服务于国家的利益和战略目标。例如，德国地缘政治理论家发展了一门与战略有关的地缘政治学，即地缘战略学(geostrategy)，它成为一门从地理和战略角度出发，发展速战速决的闪电战攻击的军事理论。正因为如此，有些人认为，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充满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味道和北欧日耳曼民族的英雄主义精神①。总之，拉采尔的“生存空间象征着权力”的说教给豪斯浩弗以思想的熏陶，德国地缘政治学在“欧洲候审室里”的修炼处境则给他以现实的刺激。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55页。

在德国现代地缘政治学理论中,著名的当推豪斯浩弗提出的以陆权思想为背景的"生存空间"理论。豪斯浩弗是一位具有将军和地理学家双重身份的人物,对他来说,地缘政治所着重解释的是地理与政治现象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空间与权力之间的相互对应和经常变动。地缘政治学家便需要致力于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他们关心的焦点是地理现象对政治和文明的影响。就此,他区分了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的不同,认为后者只是在地球表面的区域分布意义上关心国家的行为,而前者研究的则是"整个自然空间中的政治行为",尤其关注如何来"对政治实体进行更科学化的保护"①。按照他的基本概念,地缘政治学是一门科学,但它是一门与德国地缘政治利益密切相关的"科学",其研究的重点是如何给德国提供有利的地理形势。由于他认定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显然与对地理条件的错误认识有关,因此地缘政治学就被他看做是能够使德国重新成为强国的基本工具。

豪斯浩弗的理论一方面来源于西欧、特别是德国已有的"生存空间"理论,他继承和发展了契伦和拉采尔的地缘政治学概念和命题,在哲学上遵循着"物竞天择"的思维导向。他把地缘政治注释为"政治行动艺术在国家有机体争取生存空间的生死斗争中的科学基础",并进一步系统论述了"生存空间"的理论。他强调,国家拥有占据天然疆界即自然形成的边界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可以用"泛区"的概念代替国家疆界的狭隘概念。鉴于德国虽然天然地作为欧洲中央之国,但被夹在海陆强国之间的地缘位置,"生存空间"的核心概念意味着,"在德意志帝国领导下的广阔而强大的中欧罗巴,居住在欧洲中心或其周围的其他日耳曼和非日耳曼民族都要在这只新普鲁士雄鹰宽展的翅膀下寻求保护。这样就会产生充足的力量以抵挡正在围困威胁着德国的其他列强的掠夺野心。从更广的范围来看,也唯有如此才能防止潜在的最可怕的灾难,即把德国人从俄国和英国(这两个20世纪初的庞然陆怪和巨大海

① 《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43页。

兽)的势力范围之间排挤出去"[①]。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以德国为首的"泛欧区",从而奠定控制世界的基石。从这里可以看出,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理论和"泛区"理论均与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固有传统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是新版的"生存空间"理论。当然,豪斯浩弗的理论与德国传统的地缘政治思想也有着一个重要的不同,这就是在他那里,地理因素的重要性超过了种族因素。地缘政治更多地取决于自然环境的特性而不是国家的种族属性。他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环境决定论与纳粹种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强调决定民族命运的主要因素是地理空间而不是种族归属。地缘政治学的使命便是以一种理论结构来解释权力的空间动态[②]。因此,与种族主义在对外扩张中表现出的狭隘的"种族优越感"和狂热的"种族仇视"不同,豪斯浩弗对地缘政治行为的解读是以更大的雄心实现"空间权力"的目标,它必须同时具备洞察和运用地缘政治现实的能力。虽然种族主义常常会阻碍这种目标的实现,但必须极力避免它的作祟。

另一方面,豪斯浩弗的理论还来源于麦金德的陆权思想,他喜欢的一句拉丁谚语是"从敌人那里学习是我们的职责"。正是基于此,他非常欣赏麦金德———位具有德国的传统敌国英国国籍的学者——的理论。豪斯浩弗接受麦金德关于陆权和海权作为世界冲突主题的论断,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坚定有力的乐章",反映了"地缘政治上的一个最普遍的现象"。他十分愿意采用麦金德的枢纽地图,以此证明陆权和海权的世界性对峙。特别是,他还从麦金德的理论中汲取了适用于德国的部分,并把它们塑造成另一种形式的陆权理论。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对时代的看法和理论学派相同,但豪斯浩弗的政治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却与麦金德大相径庭。豪斯浩弗是忠于和自觉维护德国国家利益的人物,

① 〔美〕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475—476 页;《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 56 页。

②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 66 页。

他认为,由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的对立对它更加现实,必须赢得陆上力量针对海上力量的优势,以改变德国的现实处境。而强调陆权重要性的麦金德恰恰是试图挽救和维护英国海上霸主地位的策士。这似乎说明,地缘政治学理论是没有国界之分的,但地缘政治学家都是忠于祖国的,他们都有各事其主的本分。总之,豪斯浩弗对契伦、拉采尔和麦金德的理论进行了重新的构造,并适应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世界现实,特别是用"生存空间论"的独特观点,从陆权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当时的海陆关系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只有德国才能恢复欧洲大陆传统的中心地位,给世界的"心脏地带"带来活力。

在某种意义上,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理论和"泛区"概念的提出,对陆权论和以陆权论为背景的海陆关系进行了更大范围的探讨,这涉及到在全球视域中确定德国的"空间权力"。以豪斯浩弗为代表的地缘政治学德国学派的主要论点是:世界上存在着不断更新的国家和日益腐朽的国家,前者是德国和德俄日联盟,后者是大英帝国。像德国这样的不断更新的国家,一方面要使自己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程度,排除对国外产品的依赖。另一方面需要以不断进行的领土扩张来扩大"生存空间",其目标是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而任何有力量扩大"生存空间"的国家,可以忽视没有力量开发自己领土的所有者的权力,也就是强大国家可以从弱小国家那里攫取自己的"生存空间"。豪斯浩弗认为,国家的疆界是经常变动的,德国这样的强大国家的疆界是"能动的疆界"。根据这种说法,一国可以而且应当争取在自己的边界即"生存空间"的周围,建立一个居民稀少的缓冲地带,借以把自己同其他强大国家分隔开来。一句话,国家有权提出占据"天然疆界"的要求,并在实际上采取相应的行动。就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的具体范围所指来说,中欧和东欧与德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是"生存空间"的必然部分。鉴于德

①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 36.

国在成为陆上强权的时候，它仍然可能受到其他陆上强权和海上强权的威胁，所以它东面的广阔地域是德国必须争取的“生存空间”。为此，德国需要采取东进政策，完全突破凡尔赛和约所设置的重重障碍，将那些东欧小国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他的地缘政治学理论认定：东欧小国和德国有一种天然的共生共灭的关系，它们可以共同组成一个同质的地缘政治体系。

与“生存空间”的理论相联系，豪斯浩弗甚至提出用“泛区”的概念代替国家疆界的概念，因为后者在他看来过于狭隘。他认为“泛区”概念代表了“在空间中寻求显示其自身存在的超民族的全球性思想”①，其定义是被拓展开的更大的“生存空间”，在范围上应该是跨越国界而具有大陆规模的地缘政治组合。在他的规定性描述中，未来世界将由四个“泛区”组成：以美国为中心的泛美地区(PanAmerika)、以日本为中心的泛亚地区(PanAsien)、以德国为中心的泛欧地区(PanEuropa)和以苏联为中心的泛俄地区(PanRussia)。其中，每一个“泛区”都由一个强权控制，“泛欧地区”需要德国的领导，它的界限止于俄国的西端，是把地中海、中东和整个非洲联合在一起的广泛区域。就此，“欧非大陆”(Eurafrica)这一用语在豪斯浩弗的头脑里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德国天然索取的更大的“生存空间”形态。虽然世界列强的目标是希望通过某种形式把德国和苏联隔开，战争的结果就以中间地带的建立达到了这一目的；但苏联也是德国生存空间战略所要获取的最大目标。根据“泛区”的设想，豪斯浩弗曾经设计了一个以德国为核心的德俄日联盟，建起一个从北海延伸到太平洋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以打通一条“非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整个欧亚大陆的横贯通道”。在这样做时，“东进”是实现“泛区”目标的主要路径，夺取这里的“生存空间”成为必然的选择。就推进“泛区”的实施步骤来说，德国需要地缘政治的结盟而不是四面出击，其终极目标是组织一个为完成有效扩张所要求的新的具有地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76页。

理中心地位的大国。

当然,"泛区"的概念也涉及到海陆关系,德国的地缘政治扩张必然需要面对和处理这种关系;而且,德国既需要对付陆上强国,又需要对付海上强国,这就更增加了海陆关系对德国的特殊含义。帕克指出,德国地缘政治学家鼓吹的欧洲战略是在海上列强和大陆列强即"草原强盗和海洋强盗"支配世界的背景下推行的。这两大列强都是德国远大抱负的天敌。两大列强都认为它们有责任把大陆中心转为欧洲的破碎地带,一起去阻止德国实现其向西的寻求出路之企图和向东的扩张领土之要求。根据麦金德的论点,这两大势力都在从事各自的空间扩张,特别是在东地中海、中东和南亚等地区。正是由于这种根本性的矛盾,有理由相信,由于陆权势力和海权势力结为暂时的联盟会给德国造成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艰难时势[1]。因此,德国面临的致命威胁是其他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共同联合起来,使它遭遇海陆强国联盟而自己陷入疲于奔命且又最终失败的境地。对此,豪斯浩弗明确强调,德国应以获取陆权为战略上的首要考虑,首先占据"命定空间",即陆权堡垒"心脏地带"所能伸展的大部分地区。不能设想这一地带被其他大国占领或被分成几个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为了防止这种对德国极为不利情形的发生,它应该实行向中欧和东欧同步推进的政策,完全获得对这两个地区的控制权力。这是确保德国陆上霸权的必要条件。进而,虽然德国的扩张限度可能被阻止在中欧的最东端,但其地缘政治的野心绝不能仅限此处,它还必须放眼到苏联境内核心部分的广大空旷地带。正如1918年《布列斯特和约》将苏俄100多万的领土裂解出来那样,德国的势力深入到苏联的西部和南部,恰恰可以奠定德国陆上霸权的最后基础。在德国向"命定空间"推进的过程中,它可以以分割领土、划分势力范围等划分和占据陆权优势的方式进行,也可以配合采取相应的外交手段。例如,1922年和1939年德国和苏联前后签订的两个条约,即《拉巴洛条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68页。

约》和《苏德条约》，便通过外交途径满足了德国东进的要求。同时，豪斯浩弗还注意到，德国和苏联两个陆上力量之间的冲突足以保证海上力量坐收渔利并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因此德国所要吸取的教训是防止自己失当于处理海陆关系，重点是谨慎处理与东面苏联的关系。在把东欧、中欧和苏联欧洲部分统统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后，未来德国可以着手建立一个在空间上与中东、俄罗斯和中亚紧密呼应的庞大帝国，以便通过对世界陆地和海洋的控制，建立起最安全的地缘政治保护结构并使自己控制世界成为可能。于是，德国有理由把夹在大陆强国和海上强国之间的中间地带纳入到自己的控制体系。也就是说，德国的终极目标是用一个海陆两栖的全新权力结构取代对它威胁最大的海上权力结构。就其对陆权和海权二分关系的论述而言，豪斯浩弗的观点是赢得“生存空间”将有利于陆权占据针对海权的优势，同时也有利于陆权向海洋方向拓展；欧、亚、非大陆（特别是欧—非地带）人口最为稠密，处于陆权和海权结合最紧密，也是陆权和海权最强大的地区，具有统治世界的潜力，将来有可能控制世界[①]。这应该是德国极力拓展自己“生存空间”的主要方向，并且只能顺沿经度方向而不是纬度方向伸展。显然，这些是与豪斯浩弗对于海陆关系的认识有关的。

正是在对德国“生存空间”的论证中，豪斯浩弗视陆权和海权之间的矛盾为长期以来就反复出现的地缘政治课题。它们在地缘政治演变中都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但各自的张力限度也是显见的；关键是如何发挥应有效果的问题。海权在空间上具有机动的跳跃性，但陆权如果运用得当也足以换来更大的势力范围。例如，拥有“心脏地带”可以为同时利用陆权与海权的作用建立复合式的有效机制。就此而言，豪斯浩弗给予了麦金德很高的评价，认为“心脏地带”的概念实际上给出了那种如何进行世界性扩张的有力答案，因为这个概念蕴涵着怎样去实现“生存空间”目标的地缘政治结构和路径。在麦金德的语汇里，“心脏地带”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 64 页，第 76 页。

是“征服世界的奇异出发地”,这一说法应该受到重视。当然,以国家利害关系考量,“心脏地带”会给英国和德国带来不同的地缘政治结果,即对英国来说它是最大危险的滋生地,而对德国来说则是产生更大权力的发动机。德国如果要通过获取“生存空间”来奠定控制世界的基础,就必须把“心脏地带”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这需要以陆权为先决条件,配合以掌握海权才能实现。如果能够有效地利用陆权和海权的复合式机制则可能给德国创造地缘政治上的更多和更好的先机。

基于对海陆关系的整体认识,以陆权论为基调的德国地缘政治学理论,也一直潜存着认知德国既应该是陆权国家又应该是海权国家的看法。这种看法在“生存空间”论中,进一步演绎为德国控制下的“心脏地带”必须同时拥有陆权和海权的双重性逻辑。豪斯浩弗曾经引用拉采尔的话说过:“只有海洋才能造就真正的世界强国。跨过海洋这一步在任何民族的历史上都是一个重大事件。”他相信,“陆权的势力通常在它的领土边界上结束,但是海权的势力可以扩大到整个地球。”[①]然而,另一方面,豪斯浩弗坚信,尽管海权具有人们可以想见的重要性,但针对于海权,陆权具有毋庸置疑的先决性,只有先建立起稳固的陆权基础,才能谈到去谋求建立海权。取得陆权优势先于海权优势,既是德国在地缘政治上必须确立的有益目标,也是它推进地缘政治的实际步骤和顺序。

进一步地说,虽然豪斯浩弗强调陆权对于海权的重要性,但他所论述过的海权问题那一部分确实扩大了他的全球视野,并使他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具有兼顾海陆关系的双重含义,特别是具有海陆关系可以发生相互转化的动态内容。豪斯浩弗推断,最理想的是一个国家要具有在陆域和海域彼此相当的力量,能够使它对陆地的控制成功地转向对海洋的控制,进而把自己的势力推进到世界范围。具体到德国,由于地理上的双重特性,与海洋的联系可以使它从事海上扩张活动并成为一个海权国家;而因它位于巨大“心脏地带”以西的地区,加上人口稠密等因素,它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62—63页。

至少可以成为一个把“心脏地带”组织起来的中心力量。最理想的情况便是德国成为同时具备海陆优势的国家。豪斯浩弗的认识对后来的德国地缘政治学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地缘政治学家深化的一个认识是，为了消除英国海上力量的威胁并取代其地位，就应该把建立德国的海权力量作为紧要使命。争取“生存空间”的东进政策，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获取额外的土地和资源，而且是要把德国从居于内陆和背靠海洋的不安全感中解脱出来。基于此，这种政策的目标是寻求一种可替代的地缘政治体系，它必须在全球视野的海陆关系上来加以理解。历史上，德国所犯的重大地理错误是未能处理好海陆关系，这曾使它面临过灭顶之灾。例如，德国对苏联的入侵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严重错误。豪斯浩弗认为，如果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关于处理海陆关系的忠告被采纳，那么德国就不至于遭受失败。

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尽管豪斯浩弗的论述涉及了海陆关系，但他基本上仍然属于陆权论者，这在他对空中力量与大陆、海洋的关系论述上可以看出。他认为，陆上交通工具的发展，促使了陆权的扩张，但随着航空时代的到来，空中力量在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之外成为另一支重要的力量。与空权论、同时也与海权论不同的是，豪斯浩弗延续了麦金德的一个论点，即空中力量的出现不仅没有削弱陆权、反而有利于加强陆权，因为它更加有利于陆权的超越时空的机动性，这种机动性恰恰是海权的天敌。因此，尽管这时已经出现了空权论，但对空中力量发展的评估，反而促使豪斯浩弗巩固了有关陆权重要性的思想。豪斯浩弗认为，欧洲大陆的中心地区仍然是陆权的城堡，在空中力量出现后，大陆国家而不是海洋国家取得了更有利的战略地位，因为空中力量能使大陆国家去进攻以前被认为是陆基力量的攻程范围之外的薄弱环节。即使像英国这样的海洋强国，由于空中力量针对海上力量的明显优势，它在面临传统的陆上威胁之外，还面临着来自大陆空袭的新威胁。因此，空中力量的发展是英国面临的另一个不利因素，海权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脆弱

点虽然集中在中东和南亚,但英国自身也已成为陆权与空权结合而实行直接进攻的目标。这使得它结束了在"古典均势"中的那种不受攻击的岛国的天然优势,英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变得与某些大陆国家相类似。豪斯浩弗根据英国衰落的事实所归纳的主要论点就是,地缘政治已经超越以海权制胜的可能,地缘政治的天平已经倾斜于陆权方面[①]。而且,英国以海外殖民地控制世界的空间结构,并不再能显示海权的固有优势;相反,它的地理空间过于膨胀,战线过于漫长,因而可能会发生与国力不适的衰亡。也就是说,那种不顾地理距离到处冒险的行为根本经不住已经出现的地缘政治布局的冲击。地缘政治变化的结果是英国式的均势让位于某种全球式的均势。

总结起来,豪斯浩弗的理论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他比别人更倾向于彻底的"地理决定论"思维,把地缘因素解释为政治行为和国际行为的最大根源。实际上,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家普遍认为,麦金德的教条始终有一种瓦格纳思想风格所向往的终极性,"心脏地带"的概念便具有先验论的成分[②]。而这一点在豪斯浩弗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在以"生存空间论"解释海陆关系方面,在陆权与海权的二分方面,在大陆与海洋的历史性对抗方面,在"泛区"的划定方面,他都用"地理决定论"来加以说明。这实际上是德国早期地理学思维的再一次过度膨胀。

第二,也恰恰是这一点,引致德国地缘政治理论继续延伸了地缘政治学海陆二分论的发展脉络。豪斯浩弗强调陆权与海权的较量可以被解释为地缘政治的"最普遍和最广泛的现实"[③]。在其理论发展的高峰期,他更固执地瞄准大陆与海洋对抗的主题,并且从地理学的角度解释,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的对抗实际上是德国、俄国这些以陆地为基础

① 《二十世纪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74—75页。

② 同上书,第85页。

③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 33. 拉采尔曾经先于麦金德揭示了海权与陆权相互较量的主题,认为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强国,都无法摆脱两种权力的诱惑。当然,他强调海权是赢得世界的捷径。

发展的国家同海权国家之间的对抗的继续。德国地缘政治学界的一个流行观点是，英国是德国两大天敌中首先需要对付的一个，特别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海上力量对陆上力量的胜利告终，英国的普世主义将会更便利地确立其世界霸权，将其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推向整个世界，特别是所谓"盎格鲁—撒克逊"所代表的英国和美国的联合，会构成对德国生存的致命的威胁和发展的主要障碍[①]。为了对付这种威胁，德国需要通过扩张寻求到自己的"命定空间"。德国地缘政治学家所说的"命定空间"就是要占据欧亚大陆的中心部分，并形成整个欧亚大陆地理上和交通上的密切联系。建立这一"命定空间"的目的是直接与海权国家对抗，并在对抗中取胜。豪斯浩弗从麦金德的"世界岛"中看到了德国领导新"世界秩序"的空间结构，其借助"世界岛"的目的有两个：控制俄国以实现对欧亚大陆的统治，摧毁英国海上力量以实现对"世界岛"的完全控制。为此，豪斯浩弗的具体建议是建立俄、德、日三国同盟。显然，豪斯浩弗和其他德国地缘政治学家的理论是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重要流变形态。

第三，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理论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他比别人走得更远，在他的理论中，地缘政治成为强权政治的代名词。在德国地缘政治学家的眼里，地理学本身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预测性的，它可以为国家政策提供必备的知识。而如果说地缘政治学可以被称为科学知识的话，那它应该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豪斯浩弗把地缘政治学研究直接与德国的侵略扩张战略联系起来，使希特勒在策划和发动战争时找到了难得的"理论依据"。其对现实和政策影响最大的观点，是他从"生存空间论"角度为当时德国侵略欧洲、征服世界的战略目标和步骤作了十分具体和详尽的规划：首先，德国需要巩固在"心脏地带"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并在德国的领导下统一"心脏地带"，在足以钳制苏联的前提下，确立一个以德国为首的、涵盖德国、苏联、日本、中国，甚至印度的

① 参见《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 68 页，第 70 页。

联盟。鉴于苏联与德国同样属于大陆型中央国家,且苏联在欧亚大陆上的版图比德国更加辽阔,因而具有深度的防御性,在对海权国家产生威胁的同时对德国也有一定的威胁。这就决定了德国和苏联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上存在着陆权领域的争斗,是德国称霸首先需要克服的难题。其次,为了很好地处理德国面临的海陆关系,豪斯浩弗强调德国控制中西欧和建立非洲殖民地的重要性。对中欧的军事政治控制可以分别进行,并可采用经济手段;对西欧的控制最重要的是掌握“边缘地带”;对非洲的控制对德国占据“世界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是豪斯浩弗“生存空间论”比别的陆权论在范围上得以扩张的所在。最后,豪斯浩弗强调征服世界不仅要通过陆权的较量完成,而且更需要通过海权的较量完成。德国征服世界的决胜结果将主要通过与英美对海权的斗争来取得。因此,德国需要全力以赴对付英美的海军,在与苏联可能出现的陆权之争的同时,德国必须与英美在争夺海权的斗争中一决雌雄。唯有最终夺取海权,德国才能完全地统治世界①。豪斯浩弗的这些观点后来被印证在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整个过程中,特别是德国在处理海陆关系方面。例如,在希特勒发动侵略的武器库中就有地缘政治学这样一个特殊的工具,特别是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理论。欧洲不少人都意识到,豪斯浩弗的理论在相当程度上是德苏条约的一块铺路石,他与纳粹德国副元首赫斯过从甚密更加深了这个看法。当然,另一些人认为他对政治现实的影响具有神话色彩。不过,德国地缘政治学达到鼎盛的时期,恰恰是与德国的侵略扩张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德国地缘政治学家的某些概念和命题确实被希特勒物化为现实的侵略扩张行动。

第二节　空权与海权、陆权的对应

实际上,当人类通过征服海洋实现了“地理大发现”时,就意识到了

---

① 《政治地理学》,第10页。

解空际世界的迫切性。但由于受限于传统的地理知识,他们仍然停留在对平面空间意义的海陆关系的认识上。于是,海权理论和陆权理论都曾盛行一时,并且今天对国际政治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影响。但伴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和航空时代的到来,空权论应运而生,开辟了地缘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并成为一种有代表性的学派,其代表人物有朱里奥·杜黑、兰纳(Raner)、米切尔(William Micheal)和亚历山大·德塞维尔斯基。空权论提出的历史背景是,飞机以及更多的可以进入外层空间的航空器已经出现,使全球范围内的交通运输观念和现实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是转折性的变化,时间的距离和空间的距离都趋于缩短。更为重要的是,飞机这一新技术的运用引起了战争样式和形态的革命,空军成为新的武装力量,空中战场成为新的战争领域,空中战争成为新的战争样式。杜黑认为,"航空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活动领域——空中领域,结果就必然形成一个新的战场",造就新的战争形式①。当然,这给地缘政治学增添了全新的视野,也带来了新的重大问题。"技术再一次发挥作用,改变特定的地缘政治关系的意义。正像马汉和麦金德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缘政治理论一样,朱里奥·杜黑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发表论著,认为飞机为进行战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可以用来打击那些迄今为止不受攻击和摧毁的目标。只要人类的活动局限在地球的表面,就一定受到地形的限制。虽然海洋的特性是固定不变的,但人往来于海洋之间的活动能力受到包围海洋的海岸线的限制。空中活动则不存在这种局限性。"②

杜黑最早对航空时代的到来作出反应,他及时地提出了空权论(也被称为"空军制胜论")。1921年,杜黑的著作《制空权》在意大利陆军部赞助下出版。在该书中,他坚持认为,独立空军的重要性将迅速增大,

---

① 〔意〕朱里奥·杜黑:《制空权》,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②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73页;Giulio Douhet, *The Command of the Air*, Dino Ferrari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42, pp. 10—11.

而陆军和海军的重要性将相应减小,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同样,杜黑认为,在人们充分意识到掌握海权的重要性时,不要忘了不久空权(air power)将变得同等重要,它本身的机动优势对战争的结局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所谓掌握空权,在他看来就是"表示一种态势,能阻止敌人飞行,同时能保持自己飞行"①,拥有空权的一方能阻止敌人重建其空中力量,因为它能破坏物质资源和制造场所,这等于是最终控制了天空。具体到国家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制空权会带来以下优势:1. 它防护一国领土领海不受敌人空中进攻,因为敌人已经无力发动进攻。因此,它保护了国家物质和精神的抵抗力不受敌人直接可怕的攻击。2. 它使敌人领土暴露在我方空中进攻之下,这种进攻极易进行、因为敌人已不能在空中活动。它能对敌人的抵抗给以直接可怕的打击。3. 它能完全保护本国陆、海军基地和交通线,反而威胁敌人的这些方面。4. 它阻止敌人从空中支援其陆、海军,同时保证对我方的陆、海军给予空中支援。"②

杜黑是第一个呼吁人们重视空中战争问题的人。在比较陆地、海洋与天空的重要性时,杜黑说:"人类主要生活在地面,自然也在这里开始打仗。"由于战争行为受限在地球的表面,在陆地上作战,人们必须考虑地形、地貌等地理因素的制约;在海洋上行进,人们必须考虑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利用海岸线的问题。国家的战略和军事行动常常就是在这样的范围里付诸实施的。而当飞机和其他航空器出现后,人类所能采取的行动可以不再受限于陆地的范围,也完全能够冲破海洋的制约。针对海权论对海洋技术优越性的强调,杜黑认为,"我们不知道,当他首次在海上航行时,是不是认为海战仅仅是陆战的补充。但我们确实知道,自史前时代以来,人们就在海上进行独立的作战,虽然是与陆战配合的。今天,对于住在地球表面的人类来说,天空比海洋具有更大的重要性。"③

---

① 《制空权》,第19—21页。
② 同上书,第148页。
③ 同上书,第2页。

因为在有了飞机之后，人们在行动方向上拥有完全的自由，可以采取随机性更强的行动。飞机能够缩短行动的时间，获得达到目标地的最佳捷径。通过飞机投入战场，人们可以迅速到达所需征服的陆域和海域。显然，飞机是采取战争行动的最便捷和最机动的手段，它可以以时间换取空间。相形之下，即使是射程最远的大炮和机动性极强的军舰，在飞机面前也显得十分逊色。因此，以飞机为主的空中力量破坏了上千年以来战争的特点，出现了新的值得注意的战争因素。杜黑就此指出，“不了解许多战争因素，不及时检查思想体系和方法，是不慎重和危险的”。这种检查的直接结果，一是必须认识到天空是一个同等重要的战场，甚至对取得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二是必须掌握空权，获得空权就意味着胜利，否则就意味着失败，而且它不仅意味着军事上的失败，更意味着政治上的失败，其结果是接受敌人的所有政治条件和听任敌人摆布①。因此，掌握空权显然含有必须取胜而绝不能失败（即不成功便成仁）的含义，杜黑甚至把这称为一条“公理”。而由这条“公理”所作出的两个主要的推断是：“一旦发生战争，为了保证国防，必要和充足的条件是能夺得制空权。第二个推论：为了保证国防，一个国家所做的一切都应为着一个目标；即在一旦发生战争时掌握最有效的手段夺取制空权。”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必须依靠一支强大的独立空军，“除非拥有一支在战争中能夺得制空权的空军，充分的国防不可能得到保证。”②在谈到独立空军成为取得空权、进而在政治上成为制胜的最重要因素时，杜黑进一步认为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必须能够赢得夺取空权的斗争，第二，一旦夺得空权，必须能够加以利用，有力量摧毁敌人物质和精神上的抵抗③。

杜黑的空权论主要涉及面是军事战略问题的领域，对政治问题所谈

① 《制空权》，第17页。
② 同上书，第22页。
③ 同上书，第77页。

不多。尽管如此,他还是从实行国家总动员的角度提出,为了达到掌握空权的战略目的,“文明国家”将做好准备,在经济力量和国家力量的限度内展开竞争,也就是说空中力量领域将成为这种国际竞争的主要领域。就政治分析而言,他提出未来战争的特点和要求意味着,它将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斗争,并将直接影响到全体国民。而在战争中赢得空权,将享有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决定性优势,因为它对敌我双方的国家物质和精神的抵抗力具有致命性的影响。因此,“既然夺得制空权具有决定性意义,必须立即创造条件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支能进行空中作战的独立空军,它应是在一国人力物力可能范围内最强大的。为此必须动用国家的全部现有的资源。”[①]在给自己的国家意大利的军事战略献策时,杜黑有意识地指出,“如果我们在海洋事业上利用了在地中海的地理和政治地位,那就更有理由要求在空中利用这种优势”。“控制我国天空意味着控制地中海天空”[②]。这一论点意味着,控制制空权对意大利来说具有地缘政治的重要意义,尽管杜黑不怎么使用地缘政治这个词;这就需要从政治和国家总动员的高度认识制空权并就此采取战略上的行动。

“独立空军”是杜黑强调确立制空权的关键力量。在杜黑提出他的理论之前,世界上第一支独立空军即英国空军诞生在1918年,欧洲其他大国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到30年代之间组建了独立空军或强大的陆军航空队。这说明当时还有一些国家的作战飞机属于陆军管理,只是在后来才组建空军这样的独立军种。针对这种情况,杜黑认为,建立一支与陆军和海军并列的独立空军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未来战争中夺取制空权绝对重要,夺取制空权只能依靠独立空军。对于独立空军一词,杜黑解释说,它“并不是能进行任何军事行动的任何空中力量,而是指能够夺得制空权的一支空中力量。所谓‘制空权’,我指的也不是高度

① 《制空权》,第149页。

② 同上书,第61页,第160页。

空中优势或航空兵器的优势，而是这样一种态势，即我们自己能在敌人面前飞行而敌人则不能这样做。有了这个定义，下面的论断就成为不证自明了：制空权为掌握它的人提供优势，能保护自己整个领土和领海免遭敌人空中进攻，同时能使敌方领土受到我方进攻。"这意味着，以"独立空军"来掌握制空权将会产生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巨大力量，"能够夺得制空权的空中力量，即独立空军，是保证胜利的适当手段，只要它能以充分力量夺得制空权，则不问其他情况如何都能保证胜利"，因此，建立独立空军来赢得制空权是保证胜利的最好方法①。在谈到"独立空军"所需满足的必要条件时，他进一步说明，必须从国家总动员的意义上认识建立"独立空军"的必要性，这支力量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国家整体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当然，在强调"独立空军"的特殊价值后，杜黑还提出了后来被各国军界普遍认同的观点，即现代战争要求陆、海、空三军实行协同作战，它们应该听命于一个统一的统帅核心，以发挥相互协调的最佳效果，目的是为了共同的目标即取得最终的胜利。

杜黑的许多预见被后来的事实证实是有先见之明的。虽然他对空权的重要性和性质的判断也有失之偏颇的地方，例如，他把空权和空军的地位和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有些论点缺乏科学的论证，从而产生了不少偏执之见，得出了许多有误的结论。但他创立了最初的空权论，这一理论以空权为中心，从战略高度论述了有关空军建设和作战使用方面的许多问题，对理解和研究航空时代的军事、政治和地缘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杜黑的著作，一些地缘政治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评价道，它是西方空军军事理论的奠基性著作，"《制空权》是历来出版的论述空军力量的最重要的一本书。它完全可以与马汉论述海上力量和克劳塞维茨论述陆军作为帝国工具的著作并列"②。特别是，杜黑的空权论为现代战略轰炸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① 参见《制空权》，第75—77页。
② 见该书英译本出版说明。

在空权论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米切尔所著《空中国防论》曾被认为是与杜黑《制空权》齐名的著作。但米切尔的学术地位不如杜黑,所以西方把"空军的马汉"的褒词给了杜黑。不过,米切尔比杜黑更着重地强调,空军是决定性的力量,陆海军将丧失它们以往在战争中的地位①。值得提到的是,米切尔首先为"空权"这一概念作出了经典性的、至今仍然被奉为神明的定义。在《空中国防论》一书中,米切尔在两处为空权下了定义:一处表述为"在空中做某种事情的能力",另一处表述为"在空中或经过空中执行某些任务的能力"。米切尔对空权所下的定义虽然简单,但却是经典性的。这种定义一直沿用到20世纪60年代。德塞尔斯基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空权——生存的关键》一书,以及他为《美国人民百科全书》所撰写的条目"空权"都是依照米切尔的意思加以解释的。米切尔和杜黑都被认为是主张"空中制胜论"的,但是米切尔主张用驱逐机夺取空权,杜黑主张用轰炸机袭击敌方航空基地来夺取空权。这两种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曾使用过,但驱逐机空战则是主要的②尽管如此,米切尔空权论的影响还是不如杜黑、以及后面将要提到的德塞尔斯基等人的空权论大,在有关地缘政治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书籍和文章中,很少把他视为专门性的学者,人们更多的是把他看成是一位有学术素养的典型军人,只是在军事领域或战略领域的著作中才能看到他的名字及其有关的观点。

当然,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米切尔刻意区分了"大陆时代"、"航海者时代"和"航空时代"。他认为,人类祖先经历的是"大陆时代",现在是"航空时代",未来是"航海者时代"。在大陆时代,人们"巩固了他们对陆地的控制能力,发展了陆上交通工具和贯穿陆上或接近陆地沿海的交往"。在航空时代,"现在的竞争将是争夺无阻碍地通行和控制最广阔、最主要和从地球延伸最远的天空或包围着我们的大气层的权力。"

---

① 参见〔美〕米切尔:《空中国防论》,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中译本序,第5页。

② 有关米切尔的思想可进一步参看《空中国防论》一书。

而在“航海者时代”，人类将展开对海洋航行权、商业和交通的竞争，这种竞争使在大陆时代创立的陆上力量受到抑制和约束[1]。顺便提到的是，这里面从历史的纵向角度潜存着海陆空双重二分的思想。

与杜黑把空权与军事行动相联系不同的是，兰纳更多的是把空权与地缘政治、特别是世界权力中心相联系。早在1942年他就提出，航空线已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较小的第二个盎格鲁美洲“心脏地带”联系起来，穿过北极冰原，在北半球形成了一个新的扩大的“心脏地带”。这个新的“心脏地带”位于北纬大约30度至60度之间，穿越中纬度的巨大环带状地区。它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其中的北极冰原被当作中心，两侧的欧亚大陆部分和盎格鲁美洲部分彼此都容易受到对方的攻击。但这个枢纽地带也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提供了穿过北极的内部空中、海上、陆上通道；北极作为运动的舞台可能会成为控制“心脏地带”进而控制世界的关键[2]。由此看出，兰纳十分重视北半球的地缘政治意义，但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也容易被看做是北半球的沙文主义者。帕克指出，这些北半球的沙文主义者由于他们囊括了北美和苏联内陆，因而具有压倒大陆边缘论者的优势，而这一点从20世纪晚期来看也使他们在多方面处于一种更加现实主义的地位[3]。

根据杜黑的著作和米切尔将军的思想，二战中美国人德塞尔斯基在其《空权：生存之关键》一书中提出了后来被称为“飞行员的全球观”（airman's global view）的理论，进一步发挥了空权的思想。该理论认为，航空科技的发展使飞机的飞行距离呈现扩张之势，活动范围更加扩大，活动方式更加机动。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德塞尔斯基的观点与杜黑一样，均是属于“飞机时代”的“飞机型空权理论”，而区别于二战后的“导弹型空权理论”。德塞尔斯基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交通概念

① 参见《空中国防论》，第5页，第12页。
② 《国家战略论》，第187页。
③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88页。

已经从陆权、海权扩展到空权,后者已经成为构成国家力量的更重要的因素,完全属于一种不同的,但功能更强的权力基础和实力组织。由此,国家战略必须对空权作为一种国际政治权力的事实作出必要的反应,必须充分认识到长期以来流行的地缘政治观念大部分已经失效,取而代之的是影响深远的"空中观念"(air view)。否则,落伍的国家将失去战略上的主动性。与麦金德强调空中力量加强了陆权的观点不同、而与斯皮克曼强调空权的重要性超过海权的观点接近的是,德塞尔斯基认为,由于以飞机为代表的航空时代的到来,空权的重要性已经让海权论者的观点黯然失色,它与陆权、海权一样复杂和重要。世界强国必须在"控制地球上的空中大洋"和彻底失败之间作出抉择。基于此,德塞尔斯基坚决主张美国在战略上关注的重点是空权,而不是海权和陆权。只有空权可以帮助美国取得针对苏联的绝对优势,由于美国的实力、资源和所能采取行动的范围都是有限的,在其他方面建立庞大的军事力量会产生许多掣肘的因素①,唯有空权可以帮助美国自己想要实现的战略目标。

在强调空权的决定性影响的基础上,德塞尔斯基的"飞机型空权理论"还涉及了地缘政治的一些重要问题,这主要反映在他的空权论世界构图上。这是以北极为中心的等距方位投影图,西半球位于北极以南,欧亚非位于北极以北。在该图中,整个地球被分为以美国的"工业心脏地带"和苏联的"工业心脏地带"为主的、两个实力对比大体相当的空权势力圈,但苏联的"工业心脏地带"涉及到"世界岛"的更大部分。这两个"空中势力圈"是世界权力的"决定性区域"(area of decision),德塞尔斯基在1952年进一步提出在这一地区二者都处于彼此战略导弹的射程之内。谁在这个区域内占据优势,谁就可能获得更多的世界权力。美国的以北美为基础的"空中控制区"在范围上包括拉丁美洲,苏联的以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为基础的"空中控制区"在范围上涵盖南亚、东南亚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40页;Alexander de Seversky,*America: Too Young to Die*,New York:McGraw—Hill Companies,Inc. 1961,pp. 36—37.

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北美"空中控制区"和苏联"空中控制区"重叠的中间地区,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这些焦点包括盎格鲁美洲、欧洲心脏地区、欧洲近海地区、北非和中东。双方在这里的争夺,对于最后控制空中霸权和世界权力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获得空中霸权和世界权力的主要手段是空中大国之间进行的全面空中战争,为此必须建立最强大的空军和空中武器系统。总之,德塞尔斯基的核心主张是,对于大国来说更重要的是空权而非海权和陆权,它对地缘政治已经产生了某些人们意想不到的影响。德塞尔斯基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把空权作为衡量"枢纽区"的重要指标,但他的错误也正是以空权的重要性来抹煞其他指标的作用[①]。所以,后来有人指出,尽管二战期间和战后"空中观念"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德塞尔斯基的理论是以二战前的飞机射程为根据的,而这些射程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核武器和导弹的威力面前迅速削弱了,它也很难解释核时代的战略问题。因此,他的理论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既有时代原因,又有对技术发展趋势的认识不全面的原因。自然,这些在当时都是很难避免的。

有些人认为,空权论不应算入地缘政治学理论,而只能狭义地归人某种军事或战争空间理论的范畴。但这里认为,航空时代的到来使得地缘政治真正地从平面空间发展到立体空间,所以应该承认空权论对地缘政治学的贡献。空权和海权、陆权都是"空间权力"(space power)[②],它们对地缘政治的影响虽然是以不同的空间形式施加的,但空间差异并不抹杀各自的重要性,相反空间差异意味着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不可替代性。作为空权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杜黑、米切尔、兰纳和德塞尔斯基的观点和理论表现出如下的特点:第一,在以上四位人物中,杜黑、米切尔等的观点和理论强调空权的重要性和空军的制胜作用,但是完全从军事角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40页;陈洁华:《21世纪中国外交战略》,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② *Geopolitics, Geography, and Strategy*, p. 63.

度来说明问题,具有缺乏从地缘政治角度说明问题的不足。兰纳和德塞尔斯基的理论涉及到地缘政治问题,但没有特别多的展开,也不可能像海权论和陆权论那样具备完善的地缘政治学的学科性质。因此,这里需要区分的是概念体系的问题。孤立而简单的空权概念、特别是和“空军制胜”联系在一起的空权概念,确实只能属于军事理论的范畴,而海权和陆权及“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等相互之间联系而且对应的概念,则具有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属性,超出军事行动范畴而在地缘政治上加以阐述的空权概念当然也可以被赋予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属性。由此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导弹和反导弹问题今天是国际政治中最引人注目和最敏感的问题之一,但空权论的影响不如海权论和陆权论,其理论厚度和学术价值也都不如海权论和陆权论。杜黑、德塞尔斯基等人也未获得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和豪斯浩弗那样的崇高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不过,虽然空权论与海权论、陆权论相比显得相对薄弱,但它却是最为专业、最为技术化的一种理论,一些军事理论家和技术专家成为这一理论的研究者和开拓者。

第二,空权论的地缘政治学属性实际上意味着它开始涉及了地面空间与空中空间的关系,从而为在海陆二分基础上的更大空间的二分提供了可能。例如,德塞尔斯基所说明的空中争夺空权的问题,特别是他的空权论世界构图,实际上还是从空中看到了海权和陆权之间的冲突关系。这说明,空中力量的任何发展仍然受制于地面的力量配置关系,特别是海陆二分的因素。但是,遗憾的是,德塞尔斯基和空权论的其他主要代表人物都没有特别展开他们的论述,也没有提出系统和成熟的新二分理论,以充分解剖地面空间与空中空间的二分关系。这一工作实际上更多地留给了后面的研究者。特别是,在当代,空中的概念已从内层空间延伸到外层空间,引起了许多新的国际关系问题,使地缘政治更趋复杂。现在,有些问题已经在法律上和国际政治上得到解释和解决,但有关这些问题的空权论和地缘政治理论还未出现,

因此，空权论仍然是地缘政治理论中的一个最后出现的、也最薄弱的领域，也就是说，它已经大大落后于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发展，是一个需要结合现实去加以发展的理论领域。其中，最主要的是需要以地面空间与空中空间的二分关系作为着眼点建立和发展系统和成熟的空权论。

第三，空权论主要在20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提出并拥有一定的影响，但限于当时的历史和技术条件属于“飞机型空权理论”，在今天则需要发展出“导弹型空权理论”。“导弹型空权理论”包括导弹问题和反导弹问题两个方面，也涉及到进攻和防御关系的新的二分（特别是在全球范围内）。所以，对于以上四位空权论重要代表人物的观点，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从时代背景发生变化的角度加以考察。应该看到，牛顿提出“冲破地心引力”概念后的世界是陆地和海洋的平面空间，飞机出现后的世界是立体空间①。完整意义上的三维空间是客观存在的空间，在人能感知它并能与它互动后，它必定对人类生活和国际政治的活动方向、范围和形式产生无法摆脱的影响。在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方面，自从飞机出现后，航空器的发展有两个时代的划分。一是以飞机为主要标志的时代，一是以导弹和反导弹为主要标志的时代。在飞机时代，人们在行动和方向上拥有了完全的自由，各国一旦掌握空权，就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超过陆上和海洋交通的机动力量和能力，原有的陆权和海权概念必然受到挑战。而在导弹和反导弹时代，随着现代航空器和航运交通更快的进步，核武器、导弹、远程飞机及潜水艇等进一步打破了马汉的概念，也使麦金德的理论显示出了一定的局限性。它们改变了地缘政治学的许多论点，使新的地缘政治观必须与“空中观念”挂钩。如果说飞机对于机车和军舰而言是一次革命，导弹对于飞机而言是又一次革命，那么反导弹对于导弹而言是一次更具有意义的革命。况且，人类的宇宙空间综合利用能力正在逐步接近或逐渐超过海洋综合利用能力，更

① 〔法〕马尔索·费尔当：《空间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揭示了空间领域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前景。上述革命性的地方就在于它们改变了地缘政治的时空,飞机、核武器和导弹使地缘政治的空间骤然缩短,与之有关的时间的价值含义已不同于过去,导弹和反导弹的对峙使地缘政治空间再一次一分为二。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人类的命运将在空间决定"①。

第四,需要注意的是,应该以空权论所包含的历史和技术内容重新看待海权和陆权、"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二分的关系。从飞机等航空器开始到核武器和导弹的出现,地理空间的缩小使几个大洲紧紧集拢在一起,武器扩大了的射程和威力空前巨大的增强威力,使地球上每个国家增加了易受攻击的程度,并降低了它们的安全性。特别是,正如美国著名战略分析家鲍德温(Hanson W. Baldwin)指出的那样,空军力量和导弹力量现在能飞越"边缘地带",并可能由此对"心脏地带"发动攻击②。这样,"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对它们的威胁可能并不来自于过去那种对方的直接进攻,而是来自于某个大国控制空权后所产生的危险。就海权和陆权的关系来讲,在拥有核武器之前,太平洋和大西洋是天然屏障,利于掌握海权的资产,但现在它们的作用被打了折扣。而陆地屏障在敌手以核武器和导弹发动的攻击面前,也已无法发挥过去的那种阻挡效果。应该说,陆权运用的技术条件有了令人意外的改观。这些实际上都说明,"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关系的变化,海权与陆权关系的变化,都与空权及其所代表的新技术力量无法分开;它们对地缘政治所产生的影响应该予以充分的估计。虽然有些学者对此持有较为极端的看法,如认为"在一场全面的核战争中,由于城市被地面上的核导弹摧毁,其放射性微粒的回降污染了乡村,所以心脏地带、边缘地带、陆权和海权都将是没有意义的用语"③;但是,这些观点

① 《空间战争》,第8页。
② 〔美〕鲍德温:《明天的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9页。
③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34页。

及其所隐含的事实确实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是存在的。因为尽管"心脏地带"或"边缘地带"仍然是一种实力基础，但在地缘政治空间扩大的情况下只能作为众多权力因素的一个。当然，在这样强调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尽管技术革命确实压缩了空间距离，空间距离在导弹时代也改变了原有的含义，然而它并未完全失去本身所能发挥出来的作用。鲍德温认为，各种地形、甚至海洋，作为天然的屏障已不如过去那样重要，但地理却没有变化。尽管超音速、时间、空间因素已经起了革命性的变化，同时武器射程已可达到地球上任何一点，但"丛林、河流、山岳仍然支配着地面部队；海洋，包括上面的天空和下面的海底，仍然控制着海军的作战"①。国内军事专家也强调，地理因素是采取任何战略行动的必要前提，因为它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脱离不了地理空间的限制，谋划战略的方案都要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即使是空中军事斗争和夺取空权的行动也不例外，例如地缘位置和活动范围仍然是空权的依托，只不过这相互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复杂而已②。可以看出，在现代战争中，地理条件对作战的影响既有减弱的一面，又有增大的一面，但无论如何它仍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国内外军事观察家都注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事基地和军队配置的地理位置，在主要方向上仍然符合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建议，局部战争仍然表现出它的地理特点，因而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理论仍然发挥着应有的基本效用③。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对解决欧亚大陆"黑洞"问题的重视和对中亚地区的觊觎，说明它不会完全单相思式地依赖 NMD。而"9・11"事件使美国早就极力鼓吹的 NMD 计划面临使不上劲的尴尬局面，更说明以导弹和反导弹为主的空中力量对垒不能解决

① 《明天的战略》，第 59—60 页。

② 陈鸿猷主编：《防空战略学》，解放军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8 页。

③ 斯皮克曼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从欧亚大陆周边的海军基地赢得胜利，所以海军和空军只是在陆地上决定胜负的辅助力量。《和平地理学》，第 87 页。还可参见〔苏〕沙夫罗夫：《局部战争今昔》，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6 页，第 37 页；《明天的战略》，第 59 页。

国际政治的许多问题。

第五,空权论,特别是上述四位人物的理论基本点,都强调发展空军力量的必要性,也都强调夺取空中控制权对掌握世界霸权的重要性。因而,与海权论和陆权论一样,空权论也对一些大国的战略产生了重要的现实影响,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战略都高度重视空权的战略价值。前苏联的军事思想强调,夺取和控制空权不仅具有军事意义,也可以转化为地缘政治上的资产。一些前苏联军事领导人和军事学家认为,"空军必须夺取制空权,尤其是战略制空权。"①为此,前苏联在军队建设中不仅大力发展空军力量,还特意组建了战略火箭军,把它列为独立的军种。美国是很早就重视空军发展的大国,并把核武器、导弹的发展与空军力量紧密结合起来。它还极力发展自己的反导弹武器系统,以便完全地掌握空权和天权。从里根时期的 SDI 计划到克林顿和布什时期的 NMD 系统,太空武器已使战略的边疆进一步扩展,未来战争的空间将会从三维战场向四维战场过渡。这就使掌握空权有了更加明显重要的价值,而它们已经反映在一些大国的战略部署上,尤其是美国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地面与空中的对应关系、尤其是空权问题在地缘政治学中并没有得到特别充分的论述,这一对应关系在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和研究,例如核威慑理论、有关导弹和反导弹的讨论和一些有关空间战争的理论中倒是得到了较多的、而且非常专业的论述。尽管如此,空权论的提出,已经使地缘政治学在海陆二分论主脉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地空二分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地缘政治学所具备的海权与陆权的二分,"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二分,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只不过,在这几对概念群之外,又增加了空权的概念。而空权与海权、陆权的对应恰恰反映了地空之间的二分关系,因为海洋和陆地都是地球地面的"载层",它们构成的海洋空间和陆地空间也就是地球

① 〔苏〕科罗特科夫:《苏联军事思想史》,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64 页。

地面空间，它们是共同与空中空间相对应的。同时，导弹系统和反导弹系统的对应关系更使人们在看待海陆两极对应关系时，必须转换视角和方式。现代国家、特别是那些大国，除了把自己的战略边疆锁定在陆地和海洋之外，还正在向太空发展，它们知道从那里可以获得巨大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其结果是，当代国际格局在空间和地域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这种突破直接体现在当代国际关系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了，政治互动更趋频繁和紧凑，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和直接，信息传递十分快速和有效，文化观念的传播迅速而生动，武器系统的涵盖范围几乎是全球性的。由此，当代国际关系的内容被大大丰富了，并趋向复杂化、多样化和多元化。基于此，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已经有了极大的局限性，地缘政治学的概念必须重新加以规定，必须树立新的立体感很强的和更加生动的地缘政治观，特别是要让这种地缘政治观注入原有的地缘政治二分论，并最终取而代之。

第六章 二战后广义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延续与变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一个国际政治发生大转变的时代，现实的多样性变化必然反映到地缘政治学的思维和理论层面，使其开始从过去“狭义的”理论范畴朝着“广义的”理论范畴转型。由于受到国际关系实践和各国外交活动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影响，地缘政治学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融合进许多新的要素，表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例如，广义上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包括所谓环境理论，而广义上的环境理论既包括“人—境关系理论”、生态理论等，又包括地缘政治理论、海权论、“心脏地带”学说、空权论、“生存空间”理论等。正如专门研究地缘政治学思想史的帕克所指出的，地缘政治学新的发展的种种迹象表明，战后新一代地缘政治学家确实存在着一种对过去传统的反叛[①]，他们拓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65页。

展了地缘政治学新的研究领域,提出了地缘政治学许多新的命题并试图进行解答。但是,无论如何,在战后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中还是存在着科恩(Saul Cohen)和戈尔什科夫(Sergei Georgievich Gorshkov)这样比较鲜明地讨论地缘政治问题的人物,他们分别提出了"分裂的世界图式"和苏联版的"海洋理论"或海权论;同时还有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这样的学者,实际上从地缘经济角度,以南北二分为基轴和内容,来研究世界问题或全球问题,他提出了著名的"世界体系理论"。此外,中国学者开始进入地缘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前沿,提出了自己有代表性的理论和观点。总之,虽然地缘政治学变得更加"广义",但是国内外学者的地缘政治学基本理论都延续了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主脉;只不过在外观形式上有一定的变形,狭义的形态变成了广义的形态。

第一节 "分裂的世界图式"与冷战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曾经出现过行为主义学派的理论,但其概念过于抽象,也很难解释现实问题。在地缘政治学理论领域,情况也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脱离了现实主义轨道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很少能引起人的注意。因此,这里首先值得提及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就是科恩的"分裂的世界图式",它具有地缘政治学理论那种一以贯之的主题鲜明性,对问题的讨论常常能切中要害。应该说,在战后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发展中,它是少有的得到重视的理论。

科恩的理论从地缘政治学角度反映了世界格局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修改和调整自己理论的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缘政治并未出现麦金德所预想的在北极附近由陆中大洋与"心脏地带"组成的环形地带,从而实现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为持久和平组成的联盟;也没有出现斯皮克曼所预想的美苏英三大国间的均势,以实现国际上的有效的安全制度。相反,地缘政治出现了新

的对立,国际关系中的两极结构与地缘政治上的两极结构紧密配合,形成了分裂的世界[①]。这正是科恩提出"分裂世界图式"的主要历史背景。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英三大国间就实力对比来说形成了一种均势,但它是以新的形式出现的。美国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采取了积极介入的做法,组建了包括该地带内许多国家的军事条约网并保持着规模很大的军事存在。这似乎意味着美国注意到了"边缘地带"的重要性,从而有现实可能来延续海权与陆权之间的传统对抗。但更为重要的事实是,美苏作为两个超级大国相互间出现了新的尖锐对立,它们各自领导着庞大的联盟体系,形成了冷战中在地缘政治上的两极体系。这便是一个"分裂的世界",它不仅反映了传统的海权和陆权之间的对抗,而且也反映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之间的对立;苏联需要面对美国和北约集团联合起来的力量,同时美国的欧洲盟国也暴露在苏联的核武器威胁面前。根据这一分析,科恩设想了一个由三大实力集团构成的世界,即苏联领导的欧亚集团、由中国连同阿拉伯和日本领导的亚洲东方集团和包括澳大利亚、南部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内的西方—美国集团。因为在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为首的集团与美国为首的集团之间存在着重大矛盾,故这个三足鼎立的秩序出现了二元性。这种二元性意味着一种地理事实所产生的特殊结构,即在原来被视为一个整体的欧亚大陆西端,由东西德之间的边界形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实际地理分界线。尽管美国的西欧盟国与苏联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严重不同,在战略利益上也十分对立,但它们无法回避与这个巨人近距离的共处,因而美国的扶植政策和军事存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即使后来在"心脏地带"发生了中苏分裂的重大变化,但美国和西方仍然认定危险来自于东方。因此,科恩的新理论一方面是"为了寻求构造一种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环境相吻合的全球体系",另一方面属于"经过修正了的心脏地带理论"。而且,"它们利用先前诸理论中的泥灰和砖瓦试图为新

① 《政治地理学》,第231页。

的世界秩序重建一个理论框架。目的在于改造和加强这些理论,使之能够经得起世界性的大震荡。"①在这种新理论中,人们看到的仍然是"一个分裂的世界",而且是"一个两极分裂的世界"。地缘政治的二分和均势的二分从来没有像这时被结合得如此紧密,与之对应的是美苏之间、两大联盟体系之间完全隔绝对峙的结构,以及冷战中支配着世界的冲突观念。毫无疑问,科恩的所谓"分裂的世界图式"仍然含有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脉络。

不过,后来科恩特别指出,中苏的分裂、东欧的不稳、法国的独立外交、第三世界的不结盟,使先前那种简单的两极地缘政治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中国和联合的欧洲也许会成为美苏之外可能崛起的新的地缘政治力量。这意味着,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地理外壳有被冲破的可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这种内部结构的蠕动与东西方世界之间的僵硬外壳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可以把"结构的灵活性"引入世界体系,放弃那种单靠攫取地缘政治优势去支配世界的做法。基于这一观点,科恩认为,依据海权和陆权、"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划分所采取的政策,都是十分武断的和没有实际意义的。它不仅不会给大国带来看得到的益处,相反可能成为难于摆脱的包袱。他断言,"自由世界已成了一个神话的受害者,这个神话是,如果统一的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部分联合起来,那么,世界岛就形成了内在的统一。它附含的意义是,除非海上国家能够维持对全部欧亚沿海地区的控制,否则它们无法确保其地位"②。因此,应该说科恩的观点对"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二分持有一定的保留,尽管他仍然不能完全摆脱麦金德的影响。正是由于科恩既分析了"分裂的世界"(即两极世界),又注意到美苏之外的其他大国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 149 页,第 172 页。

②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 182 页;Saul Cohen, *Geography and Politics in A World Divided*, London: Mydune Inc. 1964, pp. 55—82, pp. 285—287;《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 175 页。

或力量中心的存在,特别是他的"区域构建"理论(较国家为单位更大的结构框架),使得他更倾向于认同多极化的世界,而不是两极化的世界。

科恩把世界分为两种类型的区域,即"地缘战略区"(geo-strategic region)和"地缘政治区"(geopolitic region)。他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地缘战略区"只有两个,即依靠贸易的海洋世界和欧亚大陆。在两个"地缘战略区"中,海洋世界包括美洲、加勒比海、欧洲沿海和马格里布、南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还包括亚洲沿海地带和大洋洲;这一认识似乎与斯皮克曼的概括颇为近似。大陆世界仅包括连带东欧的"心脏地带"和东亚这两大"地缘政治区"。每一个"地缘政治区"可以由一个大国,亦可由一批小国组成,实际分界线不一定是特定的国界线。就对冷战期间全球两大"地缘战略区"所作的划分而言,科恩实际上认为它们分别是以苏联和美国为中心的区域,二者的关系恰恰对应于陆权和海权的力量对比。他着重指出,"心脏地带"的真正势力集中在苏联的欧洲部分,北美大陆的真正势力集中在美国的东北部。这才是陆权与海权之间对峙的主要区域。应该说,科恩的这种划分提供了地缘政治海陆二分的另一种背景。当然,他还提出了另一个概念,即在"地缘战略区"之外还存在被称为"地缘政治区"的区域类型。科恩认为,他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预测我们时代地理态势的理论框架",这种态势大多与"地缘政治区"的势力发展相关联。由于以上两个"地缘战略区"是由若干不同的"地缘政治区"组成的,前者可以分解出多个后者,所以,科恩倾向于世界两大"地缘战略区"之间寻求均衡的观点,他认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建立一个具有内外调整功能的机构,即可以导致确立"地缘政治均衡"的均势结构①。

当然,在两大"地缘战略区"的分析中,最可能引起注意的是出现第三个世界。根据科恩的推测,在未来有可能出现第三个"地缘战略区",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 151 页;《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 115 页。

即印度洋南亚区。这个区域很可能从英联邦和欧洲前殖民地的废墟上出现,但可能并不具备一个真正世界大国的资格。20世纪80年代,根据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的进一步变化,科恩对"世界图示"进行了修改:由于西欧、日本和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地位的提高,及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制约与平衡作用,可以将它们确定为新的世界大国。其他"地缘政治区"存在着几个二级强国,如印度、巴西、尼日利亚和其他27个国家等,接下去的是第三、第四和第五级强国。应该说,这种分析是其在延续地缘政治海陆二分前提下所说明的地缘政治多元化的内容,也就是说,他的理论在论证过地缘政治海陆二分的同时也对其有所突破,包含着与二分并行的并且表现十分明显的多元化倾向。正因为如此,一些人认为科恩持有多中心的世界观,即世界权力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或两个中心,而是更可能采取多中心的标准形态,三极世界意味着在两极冲突中插入了第三个实体的特定变形。它既不同于地缘政治中的"破碎世界",也不同于地缘政治中有待统一的"分裂世界";在相当的意义上,它实际上是一种各种力量相互牵制的"均衡世界",是在单一世界体系与绝对混乱之间的一种适当的选择。正是基于全球缺乏和谐的状况,"均衡世界"的有效功能,一是在于它可以阻止任何势力变得过于强大而获得对世界的统治,二是在于它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允许权力现实发生动态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原来只限于欧洲范围的均势被运用到了全球水平,两极世界则被多中心观贬低为一种在特定环境下的暂时现象①。正是根据这种二分与多元相结合的逻辑,实现各国的和平共处与实力均衡是必要的。科恩认为,如果世界仍将生存下去,那么和平共处和相互均衡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必须如此,这件事的大前提就是,全球政治体系在各等级之间和较大区域之间的关系特征上具有一种类似生态学的动态平衡。现在人们把这一体系视为四大实力的多中心体系。它们是美国、欧洲沿海国家、苏联和中国。虽然他承认中国脱离苏联后,地位明显提

① 《政治地理学》,第233页;《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177页。

高,但是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仍然可以在地理政治上连成一片,两个地缘战略区仍然与过去一样。科恩在这个大理论框架内坚持认为全球均衡的保证在于世界权力核心的多极化,而不是两极世界[①]。

正是由于二分论蕴涵着多元化成分这个缘故,科恩提出了后来广被重视的“破碎地带”(shatter zone)的观点。他认为,随着世界矛盾的发展,两大“地缘战略区”的分离处可能出现“破碎地带”。例如,在两者之间就存在着南部非洲、中东和东南亚这样的“破碎地带”,这种“破碎地带”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它们在历史上属于那些地缘政治大国的殖民地,在摆脱这种地位后,当地内部各种势力之间始终存在着冲突。而且,它们尽管花费较大的努力,但都未能达到它们所企及的区域一体化。科恩把这种失望的形势归咎于其内部存在着“自然分裂”的现象,这种现象无法塑造统一的地缘政治核心。就外部原因来说,他认为这种失望的形势来自海权和大陆“地缘战略区”所施加的持续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民族主义运动(尤其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正是对那种使这些地区成为“破碎地带”的不稳定局势的抗拒[②]。与“破碎地带”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科恩对东亚地区所进行的分析。他认为,东亚地区的情况同样存在着内部和外部因素所导致的切割现象。虽然雅尔塔体制所建立的两极格局主要焦点在欧洲,但东亚也深受其影响。其结果,便是它不仅没有被人当作“地缘政治区”,而且两个“地缘战略区”之间的界限人为地将它切割成两半。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属于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区”之内,而东亚沿海地区则属于海洋世界“地缘战略区”之内。当然,对东亚地区的分析并不能完全算在“破碎地带”的范畴之内,但它对认识可能出现的类似情况有着一定的益处。1994 年,根据“后冷战时代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化”,科恩进一步修改了他的“图式”,主要变化反映在对“破碎地带”的界定上。他认为,“破碎地带”只剩下了中东地区,东南亚和非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 154 页。

② 同上书,第 150—154 页;《政治地理学》,第 13 页。

洲的“破碎地带”已不复存在。特别是,中东地区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它显著地处于东西方力量的交汇处并且威胁着双方间的均势。其中,巴以冲突和海湾战争有可能成为危机事态的“恒久的燃点”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理学的研究开始特别集中于人与自然现象在空间上的分布变化和状态组织,这种研究倾向于对“地区”的研究②。既能体现出多元化倾向又保留着二分论理论格局的科恩理论就主要表现在其“地区”研究上。科恩一方面承认,“二元”比“三元”、“四元”更加盛行,即使在具有“四元”的时候,也可以再被平分为两类③。但另一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和地缘政治学领域都出现了热衷于研究地区问题的倾向,其中明显地显露出多元化的倾向。这是科恩所认同的倾向,他认为,“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产生了大量新的地理政治思想,其中有许多思想避开各种大体系的高谈阔论,赞成一种由较小的地域单元所构成的世界。”④科恩在自己的研究中就加强了对政治区域和地区政治的研究,并在当时就对区域主义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他承认两极世界存在的事实,且认为这在地缘政治上也有所反映;但他认定两大联盟行将部分解体并会造成区域联盟出现的趋势。其结果,是国际关系中将出现一个比国家单位“更大的地域框架”。在国际关系越发达成熟的地方,区域化、而不是民族化才是真正有效的地缘政治组合形式。他还试图证明,人类的目标是尽可能使分裂的世界保持稳定,而区域主义的发展是达到这一目标的保证。他反对僵硬的、缺乏灵活性的世界体系,在这方面他对斯皮克曼与凯南式的理论多有指责,例如他指出苏联可以轻易地越过“边缘地带”的包围,从而使遏制战略难于奏效。那种两极对抗式的努力所导致的结果是“竭尽全力地去

① 《政治地理学》,第234—235页;《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115页。

② Timothy J. Fik, *The Geograph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gional Changes, Global Challenges*, Boston: McGraw—Hill, 2000, p. 1.

③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91页。

④ 同上书,第149页。

堵塞边缘地带大堤内的一切漏洞"。为了避免这种徒劳的事,他建议有必要根据形势的变迁设计出一个更加灵活的对应办法,这样的灵活性就反映在他为一个区域性世界所构想的宏图中[①]。此外,科恩还从动态的观点出发提出,世界总是处于不断进步的过程,与僵化的两极结构相比,区域性构成给世界注入了更多的活力。在此情况下,地缘政治学家的任务应该是给当代世界塑造出更好的地理概念体系。就此,他认为多极体系与两极体系并不一定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东西,相反可视为一个相互补充而非排斥的世界体系。虽然冷战中的危机可能使这种做法略显牵强,但他确信两极体系并不会不断持续下去,新的"地缘政治区"正出现在两大"地缘战略区"所组成的全球框架内,也就是说两极体系中已经存在多极的因素。虽然两极体系与多极体系的并存意味着等级之分,但多中心也是世界体系的特征。而且,它将使世界体系存在一种更大规模上的"地缘政治"的动态平衡。由于能够变化是"地缘政治生活的一个本质特征",与充满不满和动荡因素因而促使暴露解决问题的僵化体系相比,多中心世界更能保证全球的和平[②]。应该看到,科恩的理论确实与过去长期占主流地位的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等的理论不同,他更多地从多元化角度提出和论证问题,例如世界权力多中心和区域化构建的观点,都在理论上含有多元化的成分。但即使如此,我们仍可从中清晰地看见其理论的二分论格局,特别是在"地缘战略区"(而不是"地缘政治区")的划分方面明显地保留着二分论的分布脉络。这似乎同在地缘政治理论中地位甚微的"三元论"有着相似的特点,因为"三元论"虽然

---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50页;《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176页。除了科恩之外,哈斯(Haas)、多伊奇(Deutsch)和埃齐尼(Etzioni)也研究过地区一体化的过程。他们中有些人认为,新地区主义最为显著的表现在北半球,而且也正是在那里才可以找到世界实力的中心。对于大国和超级大国来讲,还有一个地区集团关系的问题。卡普兰(Kaplan)的研究,也涉及到从地区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上考察国际实力结构模型的问题。

② 《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176页。

突破了二分论的划分,但其理论形态实际上是两极论和边缘论的结合[1]。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科恩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对外政策的评价。科恩根据"分裂的世界"图示着重说明,凯南的遏制战略和"多米诺骨牌"理论没有对世界形势作出精确的分析,致使战后美国的战略目标混乱,视野褊狭,结果行动失据。与"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一样,美国政府所依赖的"理论"表现出了过分的武断,对地缘政治作了极为简化的处理。科恩直率地批评这种作为美国战略基础的"理论"不仅在学理上是极端谬误的,而且在现实中也很难行得通,因为它束缚了美国对地缘政治资源的整合和国家实力的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初,他再次论述了全球地缘政治的均衡问题,这多少刺激了其他一些地缘政治学者,他们提出了自称是"反多米诺骨牌理论"的"理论"。而科恩自己给国际关系开出的药方是,整个"心脏地带—边缘地带"的论题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多米诺骨牌理论"都应该被摒弃,代之以一个更为紧密、也更为合理的区域性世界[2]。

第二节　冷战时期的新海权论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苏联学者和中国学者在构建地缘政治学理论过程中的积极参与,是地缘政治学逐步走向完善的标志。在更严格的意义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地缘政治学中属于大陆与海洋、陆权与海权这种二分对应的理论是由前苏联的一位海军元帅提出的。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其国家利益开始向全球扩展,因而它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对外政策研究出现了较为繁荣的景象。地缘政治学在苏联比在西方国家更早地恢复了实际的作用,虽然在名分上它并不叫"地

① 《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第 73 页。
② 《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 176 页。

缘政治学”(这甚至是过去苏联人比较忌讳的)。苏联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相继发表了《国家的海上威力》和《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海军》等著作,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苏联版本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具体说是苏联版本的“海权论”。这些著作继承了马汉的海权战略思想,同时对它又有一定的发展。戈尔什科夫认为,“把利用世界海洋的手段和保卫国家利益的手段合理地结合起来构成了国家的海上力量,并以此决定了特定国的能力,即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将海洋用于本国目的的能力”。所谓海上力量要素,包括能够调查(探测)海洋、并利用其资源的手段;商船队和渔船队的状况及这些船队满足国家需要的能力;符合国家的利益的海军。这意味着,国家综合利用海洋的力量,其核心是通过海军的存在和海军的实力获得世界海洋的制海权①。

戈尔什科夫最具影响的著作《国家的海上威力》一书认为,地理环境主要是由陆地和海洋组成的,海洋几乎占地球表面的三分之二,因而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多方面价值是显而易见和毋庸置疑的。戈尔什科夫解释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地理环境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经常必需的主要条件之一,而世界海洋又是地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②。对于苏联来讲,海洋问题的重要性体现在苏联是不是海洋国家的问题上。因为在苏联是大陆型国家还是海洋型国家的问题上,大多数美国人和西方人都只认为苏联是大陆型国家而否认它是海洋型国家,例如只认为苏联是欧洲国家、或者准确地讲是欧亚大陆国家,而不是太平洋国家(这种论调今天还能听到)。尼克松就说过,“就军备方面来说,苏联的需要不同于我们。苏联是个大陆国家,而我们首先是个海洋国家,因此我们的需要就和它不一样。”对此,戈尔什科夫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无疑地,我们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陆国家,但同时,它从来是,现在仍然是一个伟大的海洋国家”。戈尔什科夫对尼克松等人的代

① 《国家与战略》,第 63 页。

② 〔苏〕谢·格·戈尔什科夫:《国家的海上威力》,三联书店 1977 年版,绪言,第 1 页。

表性论调所进行的反驳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从国家疆域状态予以对比,他认为苏联海岸线的长度几乎等于美国的2倍,等于法国的近15倍;俄国、美国和法国的海岸线与各自国界的比例大体相同,约占全部国界线的2/3,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只占1/3,但身为大陆国家却在竭力发展强大海军的德国反而没有受到指责。其次,从历史角度论证,认为俄罗斯人的祖先早在公元7世纪就开始在海上进行远征,并提出彼得大帝是一位有着海洋眼光的君主(这与马克思对彼得大帝的评价倒是相同)。因而,苏俄具有海洋大国的历史传统和丰富遗产。第三,强调没有一个民族会眼看自己的海岸和河口被夺走,这是俄国夺取出海口和成为海洋国家的主要根据①。另外,从军事技术层面上讲,戈尔什科夫强调在现代战争中,来自海洋方向的袭击能及于一切地面目标,而海上核系统本身,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因为它可以利用海域深邃和洋面辽阔来保护和隐蔽自己,不易受到打击。因而,充分利用海洋的特点和优势"防卫自己",并在国际政治和外交斗争中取得主动,是与美国已经达到战略均势的苏联应该采取的一项重要战略步骤。毫无疑问,在戈尔什科夫那里,海洋问题对于已经成为超级大国的苏联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必须加以历史性地解决的课题,而全面地处理好海陆关系也是其中蕴含着的要义。

戈尔什科夫认为,地缘政治环境会影响武装力量发展的特点和方向,并在各个不同时期对武装力量的性质和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鉴于海洋问题的重要性,戈尔什科夫认为海军已经成为执行国家战略和政策的通常工具。在戈尔什科夫的理论术语中,海军力量或海权力量被"海上威力"这样一个特殊的"革命词汇"所代替,但含义没有不同。例如,他说"海上威力"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因而也确定着这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及其所能扮演的角

① 《国家的海上威力》,第13页。

色。换言之,“海上威力”就是为国家利益最有效地利用世界海洋的能力[①]。他还分析说,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俄国就不成其为强国,克里米亚战争和日俄战争中俄军之所以失败关键在于没有重视海军的作用。研究《国家的海上威力》等苏联地缘政治学和军事著作的人发现,在谈到苏联的“海上威力”时,戈尔什科夫颇有历史感,他认为彼得大帝是俄国正规化海军的真正创始人,他还喜欢重复彼得大帝的名言:“凡是只有陆军的统治者,只能算有一只手,而同时还有海军的统治者,才算是双手俱全。”[②]这影响到了人们对他的评价,例如有人把他与马汉等相提并论,说他提出了新时代的“海权论”。尽管如此,戈尔什科夫关于“海军的主导作用都是贯彻始终的”思想却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奠定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缘政治学理论领域,尤其是在海权论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因此,尽管戈尔什科夫的理论并不认同西方地缘政治学被赋予海上霸权色彩的“海权”概念,例如他说,“苏联海军理论,不是把获得制海权作为其本身的目的,而是只作为创造某种条件的方法,以便使舰队能在特定战区和一定的时间内成功地遂行特定任务”。同时,尽管长期以来在前苏联的海军舰队中广泛采用“海上优势”这一术语;但这些并不表明,苏联海军不采用重视海权的战略思想,因为那样的话,现在讨论过去存在的海军战略思想的主流与支流、海洋国家的战略思想与大陆国家的战略思想的区别,就完全失去了意义[③]。实际上,戈尔什科夫不仅没有隔断、反而结合现代条件承续和发挥了传统的海军战略思想,特别是可以视他的“新海权论”强有力地发展了大陆型强国的海军战略思想,对与前苏联地缘政治条件相似的其他国家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例如,

① 《国家的海上威力》,第 9 页。

② 同上书,第 111 页,第 296 页。这句话还可见沙俄时期的《海军条例》,1720 年圣彼得堡版。

③ 《国家与战略》,第 72 页。

他把海战看成与陆战有着密切关系的一种作战形式，必须结合现代技术条件加以充分的考虑。海军的作战任务包含两个内容，既要对敌人的海军采取行动，又要对敌人的岸上采取行动。所谓“岸上”在范围上虽然包含着人们所通常认知的海岸或濒海地区，但在戈尔什科夫的概念里并不仅仅局限于此；因为他的更主要含义是指向“大陆型的地带”即“北美大陆”本身。应该说，虽然戈尔什科夫的海权思想潜存着陆军国家的传统认识，但它的视野决不被限制在大陆空间，而是突破了这样的空间范围，伸向了海洋与大陆所组成的整个全球空间。

对于苏联“海上威力”的特点和海军建设，戈尔什科夫还特意说明“国家的海上威力应当看作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特点不仅在于其组成部分之间存在联系，而且还和海洋这个环境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这种体系在和海洋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出了自己的完整性。”由此，应该把“海上威力看成是一个包含各种因素的复杂的综合体”。具体到苏联海军的战略目标，戈尔什科夫建议，要使苏联的海军具备远洋作战的能力，应该使苏联的海军战斗从近海转向远洋①。他说，“我国建立了现代化的海军，并把它派往大洋，以保障我国的国家利益，可靠地保卫自己不受来自辽阔大洋方面的袭击。”所以，在谈到70年代苏联海军的战略方针时，戈尔什科夫进一步地明确提出，由于美国是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的战略变化是苏联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发展所应锁定的目标。战后以来的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对苏联的军事战略先后经过大规模报复和灵活反应两个阶段，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已进入现实威慑阶段，这一阶段的实质“是要把战略进攻的主要威力转到辽阔的海洋上去”。据此，他认为，苏联海军必须根据世界战略形势的变化做出反应，把“夺取制海权”放到首要的战略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苏联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行动能力便捷的现代化海军。

① 参见《国家的海上威力》，第17页，第108页。

从戈尔什科夫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理论线索，就是强调地理环境对苏联历史的作用，强调俄国具有海洋国家的属性，强调海权的必要，强调海洋的战略价值和作用，强调海军这一军种对国家战略的意义和“责任”。戈尔什科夫的一句名言将他的“海洋理论”推到了极致：“当帝国主义的威胁出现在哪里，苏联舰队就可以开往哪里”①。正是因为如此，他被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戴上了“海权主义者”的帽子，并拿他的观点和主张与马汉强调海上力量要集中在“决定性地点保持优势”的论点相比较。对于他的理论，有人认为它很明显地附着当年马汉的影子，其著作是马汉海权论的当代翻版。但可以指出的是，戈尔什科夫与马汉还是有着比较大的不同，这不仅在于二人的世界观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在于前者不同意后者关于“制海权”的概念，他认为应该区分海上霸权和制海权的概念，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制海权是指掌握海上战区的战略控制权，而海上霸权是马汉所说的“制海权”的终极目标。世界霸权这个概念应予否定，但制海权作为“海军艺术范畴”应予肯定。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戈尔什科夫尽管被说成是“新时代”的“海权主义者”，但他还是比较强调海陆并重，强调国家战略要“具备两只手”（即海军和陆军这两只手——这实际上是彼得大帝以来的一贯思想）。因此，这位在翻译作品中被当成军事战略家，但实际上也应该是地缘政治学家的人，恰恰通过自己的著作和政策主张延续了地缘政治学中海陆二分论的主脉。这是我们需要给予必要的理论关注的。

另外，戈尔什科夫鉴于海军发展的需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洋技术的迅速发展，非常强调科技的作用，颇有“科技强军”的先见之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发展之快，已使它的发展探角伸向了外层空间和太空，但这反而没有影响他对海洋和制海权重要性的强调。通过对海洋技术和海上武器系统的了解，我们知道，从海洋方向发动的袭击可以对陆地上的目标产生极大的威胁，海上核武器的高度机动性和隐蔽性更

① 《国家的海上威力》，第13页。

是可能带来战略上的奇效。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海上的军事行动不受陆上地形障碍与国界的限制,它可将本国领海和公海都作为活动场所。其高度的机动性使海军可将本国军队有效投送到世界的任何角落。而且,海基导弹比陆基导弹更机动灵活,也更隐蔽。在常规作战和核反击中,海军力量的作用都是巨大的。毋宁说,海军力量和其他军种的结合,尤其是和核武器的紧密结合,将造就新的作战形式和战争样式,取得与以往不同的战略效果。因此,海军的作用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海洋技术对人们认识军事科技对当代国家战略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如何处理海陆关系有着相当重要的启示。

戈尔什科夫的海权论旨在强调苏联在与美国海上竞争中如何取得优势,显然是为冷战时期的苏联全球战略服务的。例如,自苏联海军拥有弹道导弹潜艇这支战略核力量后,其战略地位和作用急剧上升,传统的海上作战行动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而海军对岸上的作战行动则成为海军的主要战略任务。但戈尔什科夫的海权论仍然强调其在政治上的意义,即最大限度地维持苏联在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中的优势,仍然需要依靠海军力量在各个方面(包括海上)的运用。他认为,海军是苏联的"一只手",它的战略核力量在平时作为遏制手段和对保持战略均势的作用不可等闲视之。作为国家工具之一,海军力量具有其他军种所不具备的长处。它"在和平时期可以用来在国外显示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而在各军种中,海军最能够有效地保卫一个国家在国外的利益"。它在世界海洋的"军事存在"也是达到对外政策的政治目的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手段[①]。按照戈尔什科夫的逻辑,海军的这些战略作用,对于维护苏联的战略利益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他进一步发展海权论的主要目的就是给苏联的全球战略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最后,我们附带说明戈尔什科夫的海权论给我们的两点重要启示。

① 《国家的海上威力》,第7页。

一是就军事意义来说,由于海洋战场比陆地战场具有更大的空间范围和影响范围,海洋兵力活动比陆上兵力活动具有更大的自由度,海洋作为导弹核武器的发射阵地比陆基导弹发射并具有更强的生存力和隐蔽性①,所以海洋和海权的战略价值须臾不可忽视。当然,还需要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洋武器系统有了疾速的发展,这对海洋军事战略和获取海权目标的影响必须加以充分估计。例如,航空母舰与载有远程导弹的核潜艇已经成为对海上作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一些大国已经具备了远洋作战的能力,这些是马汉和传统的海权论所没有预见到的。又例如,正是由于海洋技术和现代武器系统的结合,狭窄的海道和海上航线已经降低了原有的军事意义,马汉对"地峡"重要性的论述也不免大打折扣。这意味着,国家战略必须回应新的海洋技术和新型海军力量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也必须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军事科技发展海权论。二是就政治意义来说,随着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发展变化,海洋的战略价值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日益增强。由于陆地资源的消耗枯竭和经济快速的发展,又由于海洋是蕴藏着丰富资源的天然宝库,所以海洋资源和海底资源无疑将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那些大国争夺的重点。例如,海洋中的油气资源就远比陆地丰富,仅大陆架石油可开发的储量就达 2500 亿吨,相当于陆地储量的 3 倍。可以说,控制海洋进而控制能源和资源,已经成为掌握世界性权力和财富的关键。同时,海洋仍然是当今国际贸易最主要的运输途径和场所,海上贸易运输量占世界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二;并且,海洋运输具有陆上运输和空中运输无法取代的优越性,仍将在全球范围的货物运输尤其是石油等关键性能源的运输中占主导地位。由于海上交通线仍是各国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和世界经济的纽带,因此,海洋问题,进而说海权问题,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转以新的形式趋于上升。现在,围绕争夺石油等海洋资源所发生的国际性矛盾,

① 参见靳怀鹏、刘政、李卫东:《世界海洋军事地理》,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4—26 页。

围绕控制海上航道所出现的国际性较量,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热点。国家战略必须对此加以考虑并作出适当的反应。根据战后海权论新的发展,国内学者认为,大国的海洋战略必须从海洋与国际政治的紧密关系出发,认识到海洋权益是濒海国家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海洋是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空间,海洋是濒海国家制定国家战略的重要依据①。正因为如此,谋求和巩固海权是不应被回避的,反而是应被高度重视的问题。

第三节 "核心—边缘":地缘经济的二分论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就像政治秩序,也有地理尺度和范围②。地缘政治学视野的扩大,不可能无限制地延续以海陆关系为主的国际政治性关系的演变脉络;它还必须将自己的理论关怀伸向国际经济问题的领域,以动态的空间思维为经济过程的横向历时分析提供一个革命性的概念框架。由此,在以世界地理视角分析国际经济问题的领域形成了所谓地缘经济方面的理论。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在这方面最出色的理论是"世界体系论"(theory of modern world system)。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全球是一个由"核心区域"(centre)与"边缘区域"(periphery)构成的整体空间,伴随着自16世纪开始的前资本主义和18、19世纪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核心区域"得以形成,并在20世纪和21世纪经历和继续经历扩大的过程。"核心区域"在地域空间上限于欧洲与北美,其领导地位曾由西欧所拥有,现在为美国所拥有,但不管谁居于领导地位,"核心区域"都一直具有这样的主要特征:在全球

① 参见《世界海洋军事地理》,第31—34页。

② Michael Bradshaw, *World Regional Geography: The New Global Order*,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p. 4.

范围内,“核心区域”的经济结构相对独立,财富高度集中和经济率先发达,占有政治和文化绝对优势,因而是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各个方面的中心区域。在“核心区域”的外围,存在着经济上不发达和文化、社会落后的贫穷国家和地区,它们是“边缘区域”。介乎二者之间还有一个归属不甚明朗的区域,即那些在世界体系三种形态中居中的国家和地区,沃勒斯坦称之为“半边缘区域”(semi—periphery)。“半边缘区域”的国家仍然与“核心区域”的国家保持依赖关系,但同时又有“边缘区域”的国家依赖它们①。按照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划分,在20世纪,南非和南欧国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半边缘模式”,东欧和中欧国家则代表了它们之外的第三种“半边缘模式”;根据前苏联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水平,它也可划归与此类似的模式。当然,除了沃勒斯坦的著名划分外,有些西方学者在“半边缘区域”中特意把新兴工业国(NIC_S)如韩国、墨西哥、阿根廷等看做是“半边缘区域”中向“核心区域”移动的部分,而在苏联集团是“边缘区域”或“半边缘区域”这一划分上他们与沃勒斯坦具有共识②。

在世界体系所体现的地缘经济意义上讲,沃勒斯坦认为,在全球范围存在着以欧美发达工业国家为中心的“核心区域”、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半边缘区域”和以欠发达的落后国家组成的“边缘区域”。它们既说明了世界体系的地理特征,又说明了现实中存在的国际经济和分工关系;而且,这三个区域的同时存在是一种经济关系和经济地理的共存现象,如果缺少其中的哪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可能不复存在。当然,在沃勒斯坦的概念中,“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是最为重要的概念,或者说是地缘经济空间方面一对最重要的概念群。他认为,“核心

①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冷战后的世界体系》,《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8期;*World Regional Geography: The New Global Order*, p. 5;关于“核心区域”、“边缘区域”和“半边缘区域”的历史和经济根源,可参考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二章和第六章。

② *World Regional Geography: The New Global Order*, p. 5.

区域"和"边缘区域"之间通过"不等价交换关系",使得欧洲资本主义最终得以变成全球性的世界秩序。在马克思那里,剩余价值是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转移的,剩余价值最终被转移给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但在沃勒斯坦这里,剩余价值是在"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之间转移的,即剩余价值由"边缘区域"转移到"核心区域"。这正是"不等价交换"的地理空间流向。它意味着,"在沃勒斯坦这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旦产生便围绕着一种二分法运行:一是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是经济专业化的空间等级,即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①这种经济空间的二分所带来的结果是,在世界体系中,"核心区域"造就了一些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强国,"边缘区域"则聚集着一群经济和政治方面仍然落后的弱国。前者相互间不断进行着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可能导致出现世界霸权的特定现象;而后者对前者的反抗则产生了世界体系内的"反体系运动"。就此,沃勒斯坦也特别说明了世界政治变动对他所说的世界体系区域划分的影响,例如1917年十月革命的发生,证明世界地缘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苏联成为反地缘体系的力量②。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对全球性体系和南北关系的研究有着较大影响,但在地缘政治学理论中还算不上是主流的理论(而且,事实上

① 《现代世界体系》,第98页,第194页;《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68页。

② 日本学者田中明彦曾从世界地理扩张的角度谈到核心区与边缘区的位移问题:"观察近代世界系统的变化,可见其中最显著的趋势性变化即地理的扩张。"这种地理扩张的结果带来了核心区和边缘区之间的迁移变化。16世纪西北欧是核心区,地中海欧洲、西南德意志、西班牙以环绕西北欧的形式形成次边缘,而东欧以及拉美则作为边缘纳入近代世界系统。17世纪,核心区依然是西北欧。但在这个时期,次边缘及边缘区重新改组。地中海欧洲以及南德意志沦为边缘,而以往的边缘区瑞典、普鲁士、新英格兰等则成为次边缘区。18世纪,英国成为核心,而俄国、印度及部分东南亚地区作为边缘地区被纳入近代世界系统。19世纪,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美国以及德国加入核心区的行列,19世纪下半叶,俄国和新被纳入近代世界系统的日本成为次边缘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以中国为首的其他亚洲部分以及非洲作为边缘区被纳入近代世界系统,至此近代世界系统发展到全球规模。〔日〕田中明彦:《世界系统》,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

他的理论被叫做地缘经济学理论倒是合适的)。不过,从沃勒斯坦的理论脉络看,他的基本理论带有明显的经济空间的二分论特征。"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是一种在世界经济空间整体上的二分,这使得人们更加注重到南北关系的对立,国际经济旧秩序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矛盾,以及富裕与贫困的不和谐。沃勒斯坦的全球视野是与他的这种二分论相联系的,只不过与过去长期以来最为流行的海陆关系二分不同的是,他是从地球的南北方向进行二分的。正是如此,著名地理学家泰勒(Taylor)评价说:"沃勒斯坦对世界经济的探讨,为政治地理学家们重新回到全球性分析提供机会,而没有对麦金德加以任何效法。如果说麦金德指出了东西方之间的对抗(这是他久负盛名的基础)以及核心区内部的对抗,那么沃勒斯坦的探讨方法则是把南北对抗放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①并且,就沃勒斯坦十分愿意讨论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跨度大的问题来说,他实际上延续了麦金德以来的全球视野,并与马克思看待人类社会问题的宏大历史观非常类似,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位富于创造性思辨力的学者,他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更是历史思想家和社会思想家"②。而他主张把地球整体作为唯一有效的研究单位,这又与全球化研究的视角颇为接近。正因为如此,新现实主义者吉尔平(Robert T. Gilpin)认为,根据"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的划分,沃勒斯坦进行了真正使世界经济长波和世界政治长波联系起来的尝试。近代世界系统产生于16世纪,它始终拥有"中心—次边缘—边缘"的三重结构,其间在扩张和停滞(在地理上、经济上)循环往复中得到发展③。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沃勒斯坦重点论及到南北关系,意味着地缘政治学说中的地理重心发生了转移;与过去长时间内东西方关系主宰地缘政治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69页。

② 《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中译本第一、第二卷序,第7页。

③ 〔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

学不同的是,南北关系与东西方关系取得了一种实际上的平衡,而这种平衡与现实中地缘政治的均势是相吻合的。他们还进一步指出,如果要成功地解决第三世界的问题,就有必要让一种基于新的地理心态而形成的新世界秩序来取代颇为得势的新殖民主义①。

从方法层面看,沃勒斯坦的研究模式也值得注意,他基本上使用横向历时分析(diachronic analysis)。本来,这种分析模式可以为世界经济过程提供一种革命性的概念框架,而沃勒斯坦更把这种框架转化为一种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模式。他坚持主张地球的整体就是现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唯一真正有效的基本单元,人们不能在更广阔的背景关系之外来认识个别国家和各自单独的发展阶段。为此,他区别了三个基本的社会类型:世界简单交易型的原生社会、世界帝国式的社会和世界经济型的社会。后者就是资本主义,但与世界帝国式的社会不同的是它不具有一种全面的政治结构。它在地球上到处延伸,同化了现代世界帝国,并在实际上开创了一个单一化的世界性的社会整体。这种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运转有两个带根本性的不平衡: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不平衡、"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之间的空间不平衡。为了加强整个体系,就需要对"政治—经济结构"进行周期性的调整。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大多数地理政治思想中隐含着一种空间—时间关系,而这种横向历时分析方法为一种条件决定论铺平了道路。这种决定论源于顽强地趋向形成新空间图式的世界过程思想(the idea of world processes)。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思想已被这样一个信念所调和,那就是人类的自由意志本身也构成此种过程的一部分。这是因为,既然社会过程只有通过人类的作用才能形成,由此可以说凡是看来是必然的事物实际上都可以通过施行这种自由意志加以避免。这样就把人放到了主导的地位,尽管人不可避免地会被赖以为生的周围的"现实"高度制约着,但人类的需求和理想仍然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77页。

会被注入到这个过程之中①。

自然,除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及其对“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的划分外,我们也会想到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比什(Raul Pribisch)、埃及学者阿明(Samir Amin)和美国学者弗兰克(Gunder Frank)的“依附论”,也就是另外一种版本的“核心—边缘”理论(或被译成“中心—外围”理论)。在经济、社会区域空间划分的尺度上,应该说他们的理论与沃勒斯坦的理论是非常近似的,换言之,在模样上(即南北二分)几乎是一样的,在对南北关系的政治态度上也是接近的,虽然在内容上各有侧重。但需要说明的是,人们一般不把普雷比什、阿明和弗兰克等人的理论算作是地缘政治学范畴的理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理论没有在地理学意义上讨论问题,而是从纯经济学和纯社会学的角度讨论问题的。尽管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认为弗兰克对传统依附论的论述最为出色,并且对南北关系的分析十分精到,但不可能就此认定他的理论具有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方面的属性②。不过,归结以上几种理论,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都具有对世界进行地理二分的理论特征,虽然人们不着意认为它们都具备地缘政治学上二分的理论特征。在沃勒斯坦的“地缘经济学理论”和可与地缘经济学“攀近亲”的理论中,南北关系二分和“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或“外围区域”)的对应关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起点,也是一条无法剪断的发展脉络。这里面自然含有地理空间的意义,更准确讲是地缘经济(geo-economics)的意义③。因此,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二分论的基本脉络仍然得以有力地扩张,

---

① 参见《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 168 页,第 186 页。

② 〔美〕斯蒂芬·克拉斯纳:《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1 页。

③ 可参见:1.〔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2.〔阿根廷〕劳尔·普雷比什:《外围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3.〔日〕田中明彦:《世界系统》。《世界系统》一书提出过相同的观点,即认为世界经济分工存在着中心、次边缘和边缘三个地带,但在政治上是“多极世界”。不过,这些观点影响不是太大。可参见《世界系统》,第 36 页。

并且是20世纪大部分地缘政治学思想中的三个突出特征之一[①]。这意味着，地缘政治学极力解释的它自己所面对的变化的世界，但仍然受制于变化的世界的固有结构。

第四节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在中国的发展

在研究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时，必须看到的是，中国学者已经提出了相当具有独立性质的观点和理论。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有专门研究地理学和政治经济地理的若干学者提出了“世界政治经济地理结构理论”、“三维战略边疆理论”和“战略地理区域结构理论”等，20世纪90年代还有的学者提出“枢纽区理论”。中国学者的研究类似于国外从地理角度对“两极世界”（the bipolar world）和“多极世界”（the multipolar world）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从地理乃至于地缘政治角度进行这种研究，不能使用“两极体制”或“多极体制”的说法；具有政治内容的“体制”一词应由具有空间内容的“世界”一词取代）[②]。

“世界政治经济地理结构理论”也就是国内地理学界中比较有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作为一种地缘政治学理论，它的基质仍然是由地理学母体决定的，同时融合了世界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因素。该理论认为，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地理结构的基本格局是由它的“自然载层”——即海洋与陆地的空间分布所限定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活动都不能超出这样的地理范围，相反只能在这种地理基础上进行和展开。“人类以相对狭小的非障区（陆地）作为政治经济活动的重心区，在使用非障区资源

① Michael Cox,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Superpower Without a Missio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UK, 1995, p. 21；《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91页。

② 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Washington: Pinter, 1998, pp. 96—117, pp. 119—157.

的同时又向广大的自然障区(海洋)索取资源,并穿行自然障区而相互关联。"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地理结构的格局和分布,可以将目前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分为不同模式的"三个世界",第一世界由美苏那样的超级大国构成;第二世界由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组成;第三世界则包括整个坐落在中低纬度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三个世界的地理格局表明了其中各类国家和地区的坐落,而这种坐落又决定了具有国际关联的三个主要的地理方向:其一是主要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矛盾关联所决定的南北关联,其二是主要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政治军事集团之间产生的矛盾关联所决定的东西关联,其三是主要由东西关联引起并且带动着大量南北关联所决定的包围与反包围的关联方向。该理论针对冷战时期的世界地理形势,依据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区的类型,划出了两大主要的国际通道系统:"大陆系统"是关联着苏联、中东欧国家和蒙古的国际通道系统,其主要交通线以陆上的铁路系统为主;"海洋系统"是关联着所有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的国际通道系统,其主要交通线以航海线为主。上述两大系统在欧亚大陆交汇,从而可能回归传统的海陆之争①。

该理论还认为,在战争中,政治和经济的重心区将是敌对双方攻击的主要目标,而攻击力量则将主要依靠国际通道系统进行投送。根据这一点,提出者对20世纪80年代可能成为国际战场的地理区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和预测,指出"世界大战的危险是由苏、美斗争引起的,然而苏、美两国的重心区相距遥远,隔有众多其他国家与大洋,双方都不可能使用常规武器从本国直接向对方的重心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所以主要战场将出现在大陆通道系统各支与海洋环球通道的各个交汇处,即环球通道上的各个重心区。"由于西欧重心区是这些交汇处之中经济力量最强、距苏联重心区最近而又有众多良好港湾与港口的地区,因此主

① 陆卓明:《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地理结构》,全国经济地理学与教育研究会经济地理教学研究班论文,1982年7月,转引自《战略地理学》,第84页。

要战场最可能出现在西欧。该理论最大胆的预测是东北亚地区可能会成为第二个可能的主要战场,因为“这也是一个集结兵力的场所”。对于人们所通常以为局势最紧张、而可能会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大中东地区,该理论倒认为它不会成为主要的战场,而只可能是世界大战的引爆点。当然,该理论所说的大中东地区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中东阿拉伯地区,而是从东南欧的巴尔干向东到中亚的阿富汗,向南延伸到非洲之角的“大中东”。在这个区域内,石油及交通运输通道是强国所要争夺的主要目标,但由于区域内不存在很强大的力量,再加上争夺的主要目标都是脆弱的滞体,所以认为大中东地区不会变成居于首位的主要战场①。这一观点的潜在含义应该说还是有相当预见性的,后冷战时期的“大中东”即中亚和西亚地区已经成为国际矛盾的焦点,其所引发的国际危机和国际事件颇为引人注目。

应该说,“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理论”在区分“海洋系统”和“大陆系统”方面,是非常有眼光的,它延续了地缘政治学海陆二分论的主脉,并融合进了自己有特色的理论。由于该理论为国内著名的地理学者提出,因此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科学性。

第二种理论是“三维战略边疆理论”,这也是有关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很有价值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战略边疆”是一个不同于地理边疆的概念,是一个国家军事力量实际可控制的与国家利益有关的地理、空间界限。“战略边疆”虽然不能明确见诸于地图,但它却是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的空间,是客观存在着战略竞争的主要领域,它特别包括海洋、大陆架、极地和外层空间。实际上,当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不能有效控制属于该国的领土时,其“战略边疆”就会小于地理边疆,甚至最终失去部分领土,反之则远远超出其地理边疆。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才十分重视“战略边疆”的竞争。尤其是,在目前世界上地理边疆的划分已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各国对“战略边疆”的争夺和控制已经提到

① 以上对“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理论”的介绍,转引自《战略地理论》,第 85 页。

议事日程上来,使世界进入了第二次空间划分,即"战略边疆"的划分、而非以国家疆域为主兼顾周边环境的地理边疆划分的阶段。从经济上看,海洋是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和渔业、矿业资源的主要基地,在陆上资源已经越来越有限的时代,海洋已经成为人类主要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也是国际政治角逐的主要场所。从军事战略上看,最重要的也是争夺陆上和海洋航道之间的问题①。很明显的是,该理论具有中国式海洋理论的色彩,强调海洋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强调国家对海洋疆域及其资源的重视和控制。这一理论同国内很多主张发展强大的中国海军和重视海洋国土的观点和论述是相当一致的。在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实际上潜含着海洋与陆地二分论的脉络,但可惜未详尽展开。

第三种理论称为"战略地理区域结构"理论。它提出了从国内角度区分地缘政治区域的观点,该理论的作者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划分为"核心地区"、"重要地区"和"边缘地区"三个部分。"核心地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均具备主导和支撑作用的地理区域,该区域在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诸方面攸关国家的命运,"其边缘线被称为国家的生死存亡的安危线"。"重要地区"是集中了全国大部分人口、大部分工农业生产基地,经济繁荣、交通发达的地理区域,该区域在国家的发展和安全方面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其"边缘线被称作战争利害的变换线"。"边缘地区"是相对于"核心地区"和"重要地区"而言政治影响和军事控制较弱,而又人口较少、工农业生产落后和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的地理区域,"边缘地区"的"边缘线"被称作"国家利益的相关线",该线是"一个主权国家领土、领海和领空的边界线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的地域范围线"。在上述三个地区所构成的"战略区域结构"中,"核心地区"当然是最重要的,但"边缘地区"也是该"战略区域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三个地区共同构成一个国家整体的战略结构,"核心地区"和"重要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都会依照"能量平衡"的原理发生互动

① 徐光裕:《追求合理的三维战略边疆》一文,转引自《战略地理论》,第85页。

的关系,如果是正向的互动关系则会给国家的发展带来好处,如果是反向的互动关系则可能陷国家于不利。同时,按照“战略区域结构”理论,人们可以解释国家在外部环境中所发生的关系,即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和空间关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利益相关线可能在空间发生作用。根据其作用方式,可以判定两国的利益矛盾性质和程度”。对相关线空间关系的分析,是判断国家间战争与和平关系的重要依据。“正因为如此,战略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确定国家利益相关线所在的地理位置和范围”。确定国家利益相关线可分为两个主要的步骤和方法,即运用经济工作的研究方法和确定国家安全环境的方法,这两个方法的基本目的是找出国家经济利益的分布范围和国家安全的空间范围①。由上可以看出,虽然“战略区域结构”理论是从国内角度分析地缘政治的问题,但它的“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概念隐含着麦金德与斯皮克曼理论概念的痕迹,也与沃勒斯坦的“核心—边缘地带”理论暗合,同时其理论脉络也很像“三元论”或“三边论”对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简单扩张和延伸。当然,应该说这一理论对我们思考和研究中国的地缘政治问题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第四种理论是“枢纽区理论”,也叫“枢纽时空论”,它更带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理论的影子。根据该理论,所谓“枢纽区”,通常是指地缘政治中最关键的地带。由于一个文明大国或以大国为中心的集团是“有生命周期的”,所以会造成“枢纽区”在地理空间上的移动。“枢纽区”的移动是地缘政治中的常见现象。“枢纽大国”是处于“枢纽区”内的主要国家,成为“枢纽大国”需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1. 枢纽大国的盛衰决定于该国的文明;2. 当该国文明解决了当时代的世界性难题时,国力就强盛;3. 当该国不能解决当时代的世界性难题,尤其不能解决自身文明的内在矛盾时,国力就衰弱”②。由于“枢纽大国”的盛衰是经常发生变

① 雷杰:《国家利益与战略地理》一文,转引自《战略地理论》,第 87—88 页。
② 《21 世纪中国外交战略》,第 27 页。

化的,所以"枢纽大国"的国力盛衰变化会引起国际政治力量结构的变化,导致"枢纽区"从衰弱的大国移向强盛的国家,形成"枢纽区"在地理空间上的移动变迁。这一理论认为,"枢纽区"就对外影响的范围来说,可以分为"海洋性枢纽区"和"大陆性枢纽区"两种。"海洋性枢纽区"的对外影响是倾向海洋地区的,而海洋是与世界相连的。因此,"海洋性枢纽区"具有全球性范围的影响。"大陆性枢纽区"则向自身四周大陆产生发散性影响,带有明显的陆地局限性。该理论的提出者认为,这些特征对于在地缘政治意义上思考未来中国的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①,因为中国自己必须从"海洋性枢纽区"和"大陆性枢纽区"的双重角度解决地缘政治中的课题。此外,"枢纽区理论"还带有文明地理论的一些特征,也带有大国兴衰的历史循环论色彩;但它对地缘政治中"海洋枢纽区"与"大陆枢纽区"的划分,与地缘政治学中典型的二分论思想无异。

除了上述几种理论外,还存在着这样一些属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观点。一是区分"边缘地区"和"核心国家"的二分法。该种观点提出,"边缘地区崛起进而挑战核心国家也就是有文明以来亚欧大陆的演进史,它是动态的,力量对比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伴随着这种历史,全球大致形成东亚、北美、西欧、大陆心脏四个泛区。显然,这种理论融合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和豪斯浩弗的"泛区"理论。二是后冷战时期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二分论。专门研究国家安全地理的学者强调,由于经济、文化、政治、地理和历史原因,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最大的鸿沟也就是最清晰的地缘政治界限是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世界存在着西方与非西方两大在对立中并存的地缘政治板块②。它们形成了近10多年来的地缘政治结构。三是对传统的"大

① 参见《21世纪中国外交战略》,第8、14页。
② 参见朱宁著:《变乱中的文明——霸权终结与秩序重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3、100页;《中国国家安全地理》,第104页。

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的再评价和再肯定。一些中国地缘政治学理论学者认为,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这两种学说都不是绝对地彼此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和相互成全的。对它们进行有意义的分析和比较,可以帮助人们具体地和有针对性地理解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的重点区域,从而更好地运用海权和陆权为国家自己的利益服务。总之,上面所列举的部分中国学者的地缘政治学观点和理论,在理论脉络上明显地倾向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导向,说明了中国地缘政治学与国际上的地缘政治学诸种理论相互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和渗透关系;当然,也还有其他一些中国学者不同意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总结本章的内容,可以简单地说,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再到冷战结束前后,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出现了更多的新的趋向,融合进更多的新的内容,也极大地拓展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其中,最主要的和最显著的是多元化倾向对二分论有了重大的突破,这直接导致地缘政治学具有了更加"广义"的理论特征,因此有人认为出现了"广义的地缘政治学"。本章对科恩、戈尔什科夫和沃勒斯坦等人以及中国学者的地缘政治学理论所作的适当分析,说明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重复和延续着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主题和发展脉络,但也以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对它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充实和改造。当然,由于它们在这样做时的研究角度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关注的现实问题不同,所以应该说它们都是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重要延续和变形。

第七章 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

20 世纪 90 年代初，国际关系新的历史时期以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瓦解开局。这不仅意味着国际关系的结构今非昔比，而且意味着地缘政治的突变。只要看一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和海湾战争这些事实所引发的重大后果和持续影响，就会感觉到地缘政治的变动具有多么大的能量，因为至今国际社会还在承受着它们的震撼和冲击。同时，冷战的结束打乱了国际政治的许多游戏规则，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一点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又最为明显。不过，恰恰由于地缘政治的变动过于巨大和剧烈，许多国家的战略目标正在迷失或已经变得模糊。但也正是因此

---

① Michael Cox,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Superpower Without a Missio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UK, 1995, p. 12.

之故，为了清楚地认识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轨迹，人们开始重视把握地缘政治的律动，出现了一种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回归心脏地带”现象的回归地缘政治学的现象。一方面对冷战结束的解释是地缘政治的，另一方面人们非常关心对全球地缘政治空间的勾画。正如克劳斯·道兹(Klaus Dodds)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地区主义和地缘政治建构的进程是对地缘政治的新挑战，人们必须客观和沉稳地面对。就“全球化”问题与地缘政治的关系而言，他还指出，尽管有对现实主义的批评和新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的说明，但要记住追求国家安全和寻求地缘政治的有效安排对许多国家，如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和大中东地区，仍然是一个主要问题；对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和欧盟来说，这一主题甚至是影响自己战略的基本条件。尽管所谓全球化已经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但全球化的批评者警告过分强调全球化会削弱国家的权力及其所包含的政治性质，销蚀南北关系在地缘经济意义上根本区别的基础①。这样的告示对我们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一方面穿透力极强的地缘政治容易侵蚀、削弱甚或改变国家战略的基础，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被利用来奠定、充实和巩固国家战略的基础，关键在于如何以地缘政治为工具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尤其需要精辟的地缘政治分析。这也就是当今回归地缘政治学的基本要求。

那么，在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学理论是如何回答现实中的问题呢？历史地看，大陆与海洋、“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两极对应这种从麦金德开始的逻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被冷战时期的东西方两极对抗所代替，深刻影响了国际政治的实际进程。令人惊讶的是，进入后冷战时期，在地缘政治剧烈变动的促使下，两极对应逻辑再次在地缘政治学理论中唱起了主旋律。在地缘政治变动的现实中，地缘政治学家和地缘政治学理论寻找到了再度构造和发展自己理论的很大机会。而唱起主旋律的两个人物大家都不陌生，他们是现实主义者布热津斯基和亨廷

① *Geopolitics in A Changing World*, p. 27, p. 51.

顿,他们从不同角度诠释着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以来就存在的两极对应逻辑①。

第一节　欧亚大陆在二分论中地缘价值的凸显

布热津斯基在冷战结束前后的短暂几年里,连续写了《竞赛方案: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构想》、《大失败:20 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大失控与大混乱》和《大棋局》等多部有名的著作,而且就理论属性来说它们都是地缘政治学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从地缘政治角度对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重大国际问题,特别是对欧亚大陆在后冷战时期新的地缘政治价值进行了充分的、甚至是令人瞩目的探讨,引起了人们的高度注意,包括那些肩负制定全球战略责任的大国领导人。布热津斯基在这些著作中所讨论的重点仍然是美国和欧亚大陆大国之间在欧亚大陆上所展开的关系,在开始的论述中这个大国指的是苏联,在后来的论述中这个大国则指某一个可能新崛起的大国。在《竞赛方案》中,布热津斯基提出,他所研究的基本中心命题是欧亚大陆两个最大的强国之间的关系,这种竞争"不是某种一时的异常现象,而是一种将长期持续下去的历史性争夺。这种争夺从范围上讲是全球性的,但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的重点。美国要占据上风,就必须以一种一贯和广泛的战略观点来进行竞争"。虽然写作该书时布热津斯基还不可能预见到后来发生的

① 研究地缘政治的某些学者认为,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北半球合作带"也是前苏联地缘政治思想中一种对欧亚大陆地缘安排的政策性观点,而且在脉络上倾向于陆权学说。可参见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六章,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另外,撒切尔和老布什的"从大不列颠到乌拉尔以远的民主联盟"的构想也是向欧亚大陆中心进军的主张,他们的主张被后来的北约东扩所实践。不过,这些主张属于政治人物的政策性观点,虽然它们也与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学的一些重要观点接近或吻合。

更多事情，但他还是以争夺欧亚大陆控制权的地缘政治斗争作为其论点的出发点，以便为美国如何进行欧亚大陆的历史性的竞争提供一个完整的地缘战略纲领[①]。显然，欧亚大陆和美国与该大陆上强国之间的大国关系是布热津斯基进行论述的重点，而且他的论题实际上延续了麦金德、斯皮克曼等人对欧亚大陆地缘政治重要性的理论探讨，并且他的论述与现实和政策有着更密切的关系。

观察后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变动，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同美国在 19 世纪 40 年代对太平洋沿岸产生兴趣不同的是，美国现在的主要兴趣是欧亚大陆[②]。所以，在地缘政治学的海陆二分论思想中，布热津斯基的理论导向是重点探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问题，因而具有集中论述陆权的明显痕迹。他指出，在历史上，欧亚大陆的地缘地位就十分突出，是主宰国际格局变化的中心地带，“500 年以来，欧亚大陆一直是世界力量的中心”，“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因此，欧亚是个棋盘，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在此从未停止过”。在后冷战时期，虽然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裂变，但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并未因此而降低，相反它那种在地缘政治中的天平作用更加显著，作为地缘战略大棋盘和决定世界全局主导地位的中心舞台，它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远远超过从前。对此，布热津斯基做过这样的说明：“看一下地图就会知道，控制了欧亚大陆就几乎自然而然地控制了非洲，并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政治上成为这个世界中心大陆的周边地带。”“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将能控制世界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③]这几乎是对麦金德版本的“心脏地带”与“世界岛”关系的绝好说明，但视角已从单纯的政治和军事转向了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的综合。布热津斯基认为，欧亚大陆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凸显地位和长

① 《竞赛方案》，前言。
② Donald D. Johnso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acific*, Praeger Publishers, London 1995, p. 61.
③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2 页。

期以来盘踞的权力资源,还主要在于这块大陆集中分布着世界上几个全球性强国和地区性强国,"欧亚大陆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数在政治上非常自信和富有活力的国家。排在美国后面的六个世界经济大国都在欧亚大陆。公开的核大国只有一个不是欧亚国家,不公开的核国家也只有一个不是欧亚国家"。可以设想,这里一旦形成国际政治权力和力量的集中,就会导致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动,就会造成新的地缘交集点的形成和汇集,也就会严重地改变目前的国际力量对比关系。同时,这里拥有世界人口的75%(这意味着这个特殊地带也是人口非常密集的地方),世界生产总额的60%和世界已知能源(包括最多的战略性资源)的四分之三,存在着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的最大潜力。可以设想,一旦这里实现经济起飞,便会直接造成地缘经济的格局性变动,由此便会立即导致国际力量对比的倾斜。再有,它还是世界核力量最为集中的地方,不仅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和中国的西北部部署着大量的核武器和导弹,而且还出现了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这样的具有核潜力的地区性强国。这些都是"大陆心脏地带"所具有的天然要命之处。因而,布热津斯基把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这个连贯的大陆视为一个地缘政治的大棋局,未来大国力量的命运将取决于它们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新格局中的角逐及其结果。

另一方面,布热津斯基对于欧亚大陆的看法,还基于他对苏联和俄罗斯地缘政治观念和美苏对抗的历史分析。就前者而言,他说:苏联的世界地图会使它感到:"这个地图清楚地显示了全球政治中某些鲜明的'铁的定律':水域应当使北美的入侵者与中心大陆那些偏离正道的边缘地区分离,从而划出一条把世界分开的'自然的'地缘政治分界线。""持久不变的方向感使得苏联的对外政策具有地缘政治的实质内容。"①应该说,布热津斯基对苏联和俄罗斯的认识与陆权理论延续下来的主要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与此紧密相关,布热津斯基重点谈到了美苏对抗的

① 《竞赛方案》,第3—4页。

地缘政治性质。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传统的海陆冲突的参加者是新角色,"但它仍然是海洋大国和占支配地位的内陆强国之间的冲突,这是一种古老的、几乎是传统的、无疑也是地缘政治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是英国(以及早些时期的西班牙或荷兰)的继承者;而苏联则是纳粹德国(以及更早一些时期的德意志帝国或拿破仑一世的法国)的继承者"①。布热津斯基比较了冷战时期刚开始时与冷战即将结束时的情况,他说,冷战的开始是一个海洋大国与一个内陆大国争夺欧洲剩余地盘的斗争,而现在美苏在全球范围内的争夺,使地缘政治问题更加突出,并且主要涉及到海陆关系所能包含的一切领域。在全球范围的竞争产生于一个跨大洋的大国和一个跨大陆的大国之间前所未有的冲突。因此,美苏的争夺实际上在回归着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因素本身也许足以成为把战后两个主要国家推入冲突的原因",它们各自的地缘政治形势所提出的迫切要求是不同的,它们竞争的性质是两个帝国之间的竞争,不只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②。应该说,布热津斯基的这种对全球范围内跨大陆大国和跨大洋大国之间竞争关系的观点,是在更大的时空中对海权和陆权关系的讨论,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它们之间交叉和互相渗透关系的有力揭示。

基于此,布热津斯基认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两个主要大国(无论是美国和俄国,还是美国与中国)对欧亚大陆的争夺是一场全面的斗争,这种全面的斗争在三条中心战略线上进行:远西战线、远东战线和西南战线。在《竞赛方案》中,布热津斯基提出的美国对付苏联的战略目标是:第一,美国通过控制海洋阻止欧亚中央大陆极其重要的边缘地区落入在欧亚大陆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苏联手中。第二,如果苏联有朝一日控制了整个欧亚中央大陆,它就能够有效地对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控制权提出挑战。这是美国长期以来就必须应付的、并且必须采取

① 《竞赛方案》,第9页。
② 同上书,第10页。

得力措施加以克服的地缘政治问题。第三,如果苏联有朝一日取得了海洋控制权,那就将使美国变成一个孤立无援而且日益脆弱的国家。到那时,莫斯科就能够在西半球本身,在美国的边缘利用反美民族情绪[①]。但是,苏联解体使它不能达成这样的目标,它反而遇到了自己非常严重的地缘政治问题;相反,美国已经处于非常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中,并且可以开始部署一系列新的有利的地缘政治安排。美国不仅使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走向海洋的地缘政治条件,而且可以通过控制海洋和掌握"边缘地带"对俄罗斯施加极大的地缘政治压力,从而使俄罗斯即使在自己家门口的欧亚大陆上也失去统治地位。但是,布热津斯基实际上也意识到,在衰落的俄罗斯之后也还会有别的大国代替它的角色,而这是美国在今后需要对付的地缘政治难题。

从《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开始,布热津斯基提出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焦点问题是所谓的"黑洞"问题,这在后来的《大棋局》一书中有了更为明确和展开的论述。这一概念成为布热津斯基分析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包括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关系的一个主要概念,因为围绕"黑洞"现象的出现,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变化,传统的、即麦金德和斯皮克曼式的"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布热津斯基形容到,苏联的解体使"心脏地带"发生内部塌陷,"在欧亚大陆正中心造成了一个'黑洞'。这就如同地缘政治学家所描述的'心脏地带'突然从世界地图上挖走了一样"[②]。"苏联的分崩离析使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变为一种地缘政治上的真空状态。一度是强大帝国的所在地和全球意识形态挑战的中心,那一大片技术先进的西方和欧亚大陆东端之间的空间现在已成了当代历史上的黑洞:它的近期的未来和它不久以前的过去同样是处于争议之中的。从近期看,这一情况消除了苏联曾经对

① 参见《竞赛方案》,第26页,第134页。

② 《大棋局》,第115页。

其富裕的邻国所形成的安全威胁。但从长远看,这一情况可能是大的和新的政治危险的根源。"在《大棋局》中,布热津斯基进一步分析了"黑洞"所带来的"力量真空"的扩大问题,例如俄罗斯丢掉乌克兰的重要催化后果和高加索新独立国家给土耳其恢复其影响创造的机会。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黑洞"所导致的另外一个结果,是里海盆地乃至中亚地区总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改变①。

除了这种内部的变化之外,布热津斯基分析说,"黑洞"的出现既给外来势力、包括美国从"边缘地带"进入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大开方便之门,又给美国带来严峻的地缘政治上的挑战。欧亚大陆存在着地缘政治的真空和"黑洞",它具有爆炸性,也是漩涡波及的所在。在地缘战略上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地处心脏地带的帝国的崩溃"意味着,它40年来煞费苦心要把美国逐出欧亚大陆的努力已功亏一篑。美国不再面临这样的战略挑战,而过去如果该挑战一旦得逞,美国就可能面对着被一个敌对帝国所席卷的整个欧亚大陆。显然,将美国逐回大西洋和太平洋彼岸是斯大林冷战时期的战略目标。苏联的解体,使美国第一次能够把它的政治势力扩展到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上的各个新的共和国,一直到中国的西北边疆和主宰位于欧亚大陆南侧的波斯湾地区,甚至破天荒地掌握了打开"心脏地带"大门的钥匙②。因此,毫无疑问,布热津斯基这里所谈到的"黑洞"问题是从美国战略利益的角度出发的,他甚至看到了其中给美国提供的突然出现的历史性机会。

正是基于对欧亚大陆"黑洞"问题的看法,布热津斯基进一步论述了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地位和美国如何向欧亚大陆渗透的问题。布热津斯基认为,在后冷战时期,欧亚大陆是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这个非欧亚大国在这里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地位与它对

① 参见〔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大棋局》,第118—122页。

② 《大失控与大混乱》,第168页。

全球事务的支配直接关联。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和欧亚大陆的关系变得十分敏感,这倒不是因为北美大陆与欧亚大陆的关系变得直接起来,而是因为美国带着它的以欧洲盟国为主的北约组织向欧亚大陆展开了新的十字军式的进军(也有人把这叫做"基督教式的远征"),北约东扩将使它获得甚至可以进入整个欧洲大陆中心地带的机会。这一进程的发轫和扩展当然与它的长期对手苏联的崩溃有关,苏联解体使位居北美大陆(即欧亚大陆之外)的美国能够破天荒地成为欧亚大陆大国关系的主要仲裁者,欧亚大陆成为美国为争夺全球首要地位而继续进行斗争的棋盘。而且,诸如欧亚大陆的"黑洞"问题给美国所带来的好处,还在于美国开始可以直接地而不是迂回地介入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不是从欧亚大陆外围施加影响而是直接深入到欧亚大陆的腹地。这意味着,斯皮克曼早先所设计的美国从"边缘地带"包围和遏制欧亚大陆主要强国的战略显得有些过时,"边缘地带"固然重要、而且也不能轻易放弃,但是美国(包括北约)获得了比"边缘地带"更靠近"心脏地带"的机会和通道。这种"机会和通道"实际上是指东欧问题、中亚问题及南高加索问题等所蕴涵的战略方便及其扩散性利多。必须注意的是,美国可以利用欧亚大陆腹地的局势变化、而不再仅仅是外围的局势,将导致传统的"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这是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中的重大事态,也将是今后地缘政治的主要特征。人们看到,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围绕欧亚大陆制定了主宰两大洋,以分别有效介入欧洲和亚洲主要事务并取得整个地缘政治主控权的战略。如果这一战略获得成功,美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将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甚至可以说它将突破超出以往地缘政治范围的限制,获得大大超过早期戴高乐所说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真正的欧洲的范围。而美国的地缘政治扩张超出欧洲地区界限而伸展到整个欧亚大陆、特别是它对"心脏地带"的进攻性做法,是在全球地缘政治主线上展开的新的有战略意义的布局,必

将对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巨大和持续的影响。

当然,也有布热津斯基在给美国的战略进行谋划时所未能逆料的情况。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美国的战略产生威胁的地缘政治因素还是很多的,并不仅仅限于他所主要关注的欧亚大陆上的大国竞争所引发的问题。例如,在极具地缘政治价值的中亚地区,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势力迅速崛起,控制了该国的政权和绝大部分地区。其活动范围和政治影响不仅扩展到相邻的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而且还伸长到俄罗斯境内的车臣地区。由于"塔利班"和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在反对美国的目标上形成了统一战线,由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要通过对中亚地区实施"圣战"将其纳入伊斯兰世界的轨道,对于美国来说中亚地区这个欧亚大陆"软腹部"的地缘政治问题变得突出起来,出现了新的、还不太熟悉的地缘政治形势。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布热津斯基等许多美国人对此恰恰是没有考虑过,也不可能考虑到的。布热津斯基指出了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力量中心进一步分散化的现象,但对其"边缘地带"内部挤压出新的"破碎地带"的前景却未有充分考虑。美国既获得了进入欧亚大陆内部的绝好机会,又面临着不少不确定性的、甚至偶然的意外因素。这些因素一旦显现出其在地缘政治上的能量和爆发力,对美国来说甚至是致命的。

当然,就冷战结束前后的地缘政治形势而言,布热津斯基最关心的仍然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对美国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布局威胁最大的,可能恰恰来自于另外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在欧亚大陆的出现或崛起,同时可能来自在这块大陆上形成排斥美国的新的战略组合①。对于前者,布热津斯基用与斯皮克曼几乎同样的口吻判断说,"正是在欧亚大陆这个全球最重要的竞赛场上,美国的一个潜在对手可能在某一天崛起",它可能取代历史上那些强权的地位和势力,而对美国的战略利益产生最大的威胁。对于后者,布热津斯基怀有侥幸的心理:"所有可能在政治和/

① 《大棋局》,第53页。

或经济上对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欧亚国家的力量加在一起远远超过美国。对美国来说,幸运的是欧亚大陆太大,无法在政治上成为一个整体。”①这一情形使得谁要想在欧亚大陆上聚集组织起来的力量,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但是,布热津斯基认识到为了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必须从现在开始,高度重视欧亚大陆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总之,从《竞赛方案》到《大棋局》,在进一步扩大地缘政治学二分论逻辑的时候,布热津斯基对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重大变动给予了非常系统的考察,在这块大陆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后续影响是他讨论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变化的基本背景。按照布热津斯基的逻辑,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变动已经造成“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关系的位移:在冷战结束之前,欧亚大陆上的地缘政治竞争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竞争;在冷战结束之后,这种竞争涉及到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关系的处理,也涉及到美国如何处理同中亚一些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包括布热津斯基所强调的位于“边缘地带”和接近“边缘地带”的“支轴国家”;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任何变动还将影响到海洋和陆地之间的传统竞争,而且欧亚大陆的一些主要的“边缘地带”应被视为再度处理海权和陆权的关键。冷战结束以来,对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是在“心脏地带”和内部腹地出现了俄罗斯的衰落和中亚地区的力量真空,在其两侧是北约东扩和美日军事同盟的强化,海陆关系的结构和海权与陆权之间的关系更趋复杂化。同时,围绕欧亚大陆的这种变化,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进一步指出,地缘政治结构和形势会变得日趋复杂,可能出现多极组群:北美组群、欧洲组群、东亚组群、南亚组群、穆斯林新月区域、可能出现的欧亚组群。其重要结果就是进一步促使了布热津斯基所重视的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和格局性演变,“多极组群”表明了地缘政治的某种多元化特征,但是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结构仍然是以

① 《大棋局》,第43页。

“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海权和陆权为主的二分结构。

在布热津斯基的著作中，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逻辑还衍生出了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就是在探讨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时，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地域分布对地缘政治会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它们所带来的地缘政治较量有可能比争夺陆权和海权的较量更显重要，但其中也显然隐含着这种传统的争夺。布热津斯基指出，对于俄国和美国，地缘政治真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漩涡。目前这个漩涡由欧亚大陆的一个椭圆形地缘政治圈构成，它由西向东，由亚得里亚海至巴尔干各国，一直到中国的新疆地区边界；由南至北，环绕波斯湾，包括中东部分，南面的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和北面的沿俄国——哈萨克边界的全部中亚地区，一直到沿俄罗斯——乌克兰的边界，包括 30 个国家，几十个种族、民族和信仰不同宗教的约 4000 万人口[①]。在这个椭圆形漩涡的边缘，地缘政治可能产生的冲突交织着欧亚大陆上各种不同民族和文明之间的冲突问题。这种冲突虽然可能会带来比过去复杂的局势，但是在这些复杂的冲突背后依然保留着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的最深刻的冲突，而俄罗斯与西方势力的冲突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②]。这就仍然与地缘政治的传统谜题有关[③]。

第二节 “文明断层线”：二分论的新划分

比布热津斯基更擅长于讨论文明和民族问题的是亨廷顿。人文地

① 《大失控与大混乱》，第 176 页。

② 参见《大失控与大混乱》，第 180—194 页，第 261—265 页。

③ 在这个所谓的“危险的漩涡”中，地区内的暴力冲突可能会在多种多样的对立双方之间爆发，其分裂与对立已达白热化。全世界已获得或不久就可能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家中，有一半的国家位于这一地区内。这都是这一地区的危险所在。参见《大失控与大混乱》，第 175—176 页。

理学和地缘政治学都认为,文明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上进行分布,并可以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上获得表达①。不同的地理学家和地缘政治学家对文明的地理空间分布有着不同的解释。亨廷顿的解释应该说是其中非常有特色、影响甚巨的一种。在他那里,文明之间的冲突在国际政治中占据着更显眼的位置,并且,它本身就是一种"地缘政治"。他认为,虽然战争打破了文明的地理界限,但"文明也在地理上相互分离"②,这是文明有可能变成"地缘文明"的前提。如同黑格尔把人类文化区分为高原文化、平原文化和海洋文化一样,亨廷顿对文明之间的界限划分基本上以多种文明的存在为背景、以可能产生的两极对立为结果,也就是在实际上采取了对地缘文明的二分划分标准。他认为,文明的冲突会在地理空间上得到具体的体现,后冷战时期所出现的"文明断层线",正在变成全球冲突的中心地带和首发地带,冲突将首先发生在文明之间的断层线上,并且具有极大的扩散性。这是一种特殊的地缘冲突。所谓"文明断层线"所牵涉到的地区包括中亚、外高加索、中东、波斯尼亚、车臣、克什米尔、斯里兰卡③。在进一步的分析中,亨廷顿从地理差异跳到了民族和文化差异方面,特别指出这种差异在"文明断层线"的周围显得十分严重。依据于此,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列出了大量的图表,为人们说明了冷战后的世界秩序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不难发现亨廷顿头脑中的世界结构与传统的地缘政治学各种版本的大陆与海洋、核心与边缘的二分论对立的主脉竟然是那么一致和相通,简直可以说是以"文明冲突"的语式对后者的翻版和再造。或者说,在亨廷顿身上地缘政治学传统的二分论思想只不过换上了"文明问题"的外衣。因此,亨廷顿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在宏观层面上,最主要的是指

① H. J. de Blij, *Human Geography: Culture, Society and Space*,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6, p. 217.

②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34 页。

③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Summer 1993, p. 31.

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分裂，在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为另一方之间，二者之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冲突。亨廷顿把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和以儒家文化为特点的中华文明之间的冲突描绘成影响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他并预言说，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之下发生[①]。

在亨廷顿的观点里，文明之间的关系演变和所可能发生的冲突固然重要，但地缘政治问题可能和文明问题相联系，从而使文明和国际政治具有难以分辨的交叉性和毋庸置疑的重要性。他认为，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最重要的权力，"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西方可能更是如此。"[②]虽然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然而，文明是有意义的实体，尽管它们之间的界限难得清晰，但这些界限却是有真实的。"[③]例如，各个文明所控制的人口、领土之比就是一种地缘政治。特别是，当文明与地缘政治结合时，就将转化为一股巨大的现实力量。事实上，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都具有着地缘政治的意义，如果它们哪一个在空间上形成圈化局面，就可能向国际社会释放出很大的地缘政治能量。"西方现在占绝对优势，并将在进入21世纪时在权力和影响力方面仍保持世界第一。然而文明间的均势，也发生了一些逐步的、无情的、也是根本的变化。西方的权力相对其他文明将继续衰落。随着西方老大的地位被侵蚀，它将丧失很多权力，其余权力将在地区基础上分散给几个主要文明及其核心国家。最主要的权力增长正在并将继续发生在亚洲文明之中，中国正逐渐成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响方面向西方挑战的国家。"[④]但与中国相比，伊

① 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② 同上书，第41页。
③ 同上书，第27页。
④ 同上书，第76—77页。

斯兰教的世界性复兴运动是更现实的一个存在,这个运动“遍及了几乎所有穆斯林社会,从70年代开始,伊斯兰教的标志、信仰、习俗、体制、政策和组织就赢得了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从尼日利亚到哈萨克斯坦的全世界1亿穆斯林越来越多的信奉和支持”。也就是说,伊斯兰运动在世界几大宗教中最早和最快地呈现出地缘扩张之势,很多国际性的事件和危机都与此有关。这是人们必须注意和重视的①。

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的几年里,人们的认同和那些认同的标志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全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②“全球政治地理因此从1920年的一个世界走向60年代的三个世界,然后走向90年代的12个以上的世界”。从这种地缘文明的角度,亨廷顿进一步归纳和划分出七块地缘空间范围,也就是当代人类的主要文明所圈定的地区,它们在地缘政治上有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集中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可能存在的)③。总之,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是一个多种(七个或八个)文明同时存在的世界,从文明的多样性来看,全球政治是多极的或多文明的,不再简单地是由政治两极来划分的。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亨廷顿的“核心国家”概念,这在布热津斯基那里叫做“支轴国家”。这种“核心国家”在一定的文明圈范围内发挥着主要的领导作用,有“核心国家”做领导的地缘空间范围会形成一个特定的地缘

①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12—113页。国外有的学者认为,与伊斯兰教相似的是印度教,印度的新民族主义与政治密切互动,所以有的学者也认为印度的新地理有一个新的文化氛围。Graham P. Chapman, *The Geopolitics of South Asia: from Early Empires to India, Pakistan and Bangladesh*, Aldershot: Ashgate, 2000, p. 127.

②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页。

③ 参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9—33页,第40—41页。需要注意的是,布热津斯基与亨廷顿的一些用词略有不同。在布热津斯基的语言中,没有儒家文明这一词汇,中国文明被称为中华文明,显然有地域考虑。另外,多种文明并存的观点与国家数量将不断增加的观点有不同之处。例如,美国《未来学家》杂志早在1994年底预测,到2000年,世界将有300个国家,到21世纪中叶国家的数量将因多民族解体、民族自决和分离运动达到1000个。见该杂志1994年11月—12月号。

政治区域,当然它也是一个特定的地缘文明圈。亨廷顿认为,“核心国家起领导作用或支配作用的世界是一个势力范围的世界,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核心国家发挥的影响被与其拥有共同文化的文明成员国减轻或缓和的世界”①。所以,文明的分布与地域因素直接关联起来。正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引起了地缘政治的变化,而分布在主要地缘地带上的是文明圈的冲突②。

尽管人文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在解释后冷战时期文明的分布时倾向于多元文化或跨文化(multiculturalism)的角度③,也尽管亨廷顿认为有七八种主要文明的存在,但是他的思想的主要含义并不是文明的“多极化”,而是“两极化”。多种文明的存在,可能意味着文明的地理整合④,但其中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联合将对西方文明形成挑战,将来的冲突将出现在现在的西方和非西方之间。世界的文明冲突模式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地域性,而这种地域性的文明冲突绝不可能永远处于多种文明相互间混战的“战国时代”,恰恰相反,多种文明之间经过分化组合后,会与地缘政治学所揭示的二分论主题和结构吻合。这也就是亨廷顿在阐释文明的地缘冲突性质时的主要思想⑤。

综上所述,布热津斯基的“大棋盘”思想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均是他们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的有代表性的主张。值得指出的是,他们所撰写的几部著作完全从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出

①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68页。
② 不过,亨廷顿最近指出,“9·11”恐怖袭击事件并不意味着“文明的冲突”。但如果伊斯兰国家不与美国合作,则有引发文明间冲突的危险。见德国《时代》周报网络版2001年9月18日专访《“不,这不是文明的冲突”》。
③ Brian Graham, G. J. Ashworth and J. E. Turbridge, *A geography of heritage: power, culture and economy*, London: Arno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01—125.
④ 《变乱中的文明——霸权终结与秩序重建》,第19页。
⑤ 有关“文化地理”(cultural geography)和“文化地区”(culture region)的概念,可参照Edward F. Bergman, William H. Renwick, *Introduction to Geography, People, Places, and Environment*, Prentice Hall, Inc. 1999, pp. 200—241; H. J. de Blij, *Human Geography: Culture, Society and Space*,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6, p. 218。

发,以冷战结束前后国际政治的重大变动为讨论重点,因而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十分轻视;特别是,它们拒绝并有力驳斥了福山(Fukuyama)《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类》一书的观点,认为福山等过低估计了前共产主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动荡因素的力量,即地缘政治的力量。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和《大棋局》中充分表达了现实主义学派的地缘政治观,认为地缘政治学仍然沿着现实主义学派的轨迹发展。亨廷顿在一些文章中更率直地反击了福山的观点,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则进一步系统总结和阐述了这些观点。他们著作的主要精神就是,在世界结构已经受到地缘政治和地缘文明的巨大变动的冲击影响下,人们必须在政策上和行动上作出反应,而不能无所事事。他们的观点在西方国家许多政要和学者中颇有市场①。

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那种略显牵强的二分论不同的是,在后冷战时期到来前后,也就是在国际政治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刻,地缘政治学基本理论再度显示出"经典性二分论"的研究格局,不过它的重点不是研究生态、环境问题,也不是简单地看待能源问题,而是以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以民族和文化问题作为研究重点,注重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关系,以及民族和文明的地域性划分可能给国际政治带来的影响,从而再次开拓了地缘政治学的视野和研究领域。恰恰是冷战结束前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让地缘政治学家再次找到了用武之地。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应该说成为了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因此,从上面说到的地缘政治学可能出现的趋向和特征看,也许地缘政治学在经历它的"新的综合"的时期,这一点同其他很多学科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情景多少有些一样。新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已经把陆权论和海权论、"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及空权论共同结合起来,加以系统整合,而提出了新的综合性很强的理论。但是,同很多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不太一样的是,地缘政治学在自身"人文"色彩日趋浓厚的同时,其自身

① *Geopolitics in A Changing World*, p. 13.

的“实学”本性也暴露无遗。在为对外政策“导航”、在为外交实践“服务”方面，它可以说是尽职尽责，与现实联系得极为紧密。布热津斯基的“欧亚战略”设计和克林顿的“两洋战略”的推行，使人们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密切的呼应和契合关系。亨廷顿对伊斯兰文明世界化的预测，与美国对中亚地区的某些政策也存在着关联。毋宁说，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等人的新型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称霸战略服务的。

第八章 总结：理论层面的超越

以上从地缘政治学思想史和理论史的脉络上挖掘和揭示出二分论的主脉，这是本书所做的主要理论工作。本书的第一个意义就在于，从地缘政治学各种相互对峙的理论流派中提炼出了“二分论”这一基本概念，并以整合式的理论研究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二分论的主题和发展线索。虽然书中涉及到的各种理论流派所强调的是某一种地理因素的作用，并以此解释国际政治的现实；但本书尽量把它们摆放在二分论的理论框架中加以论述，其目的就是突破以往地缘政治学理论的既定论述和逻辑。因此，虽然前面各章均对各种流派的理论及其代表人物给予了分别的论述，但这里仍需以二分论的概括把它们集中在一起进行必要的总结和甄别。不过，还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这样做无疑会进一步阐明地缘政治学的思维品质和理论特征以及现实意义；但另一方面，本书

的日的并不仅仅限于此,因为恰恰是由于挖掘和揭示二分论主脉的缘故,我们会发现二分论本身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和局限性。由于这些可能阻滞地缘政治学的发展,所以,总结和甄别的目的在于对其采取超越的态度和做法。这显然是本书的第二个意义,就理论发展而言,它同样附带着两个含义:其一,只要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能够通过整合式研究推进理论发展的进程,那么人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有价值的;其二,如果还能进一步揭示出今后的研究方向,设置合理的研究议程,那么理论的成功发展就是有指望的了,尽管不少问题一时还很难解决。以下两章就分别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来谈如何对二分论进行超越,以便寻求地缘政治学向前发展的契机;本章首先从理论层面切入。

第一节 有关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几点总结

地缘政治学就其所显示出的二分论主脉来说,有以下几点需要予以总结性的说明:

第一,就理论发展的历史来说,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是依据深厚的理论积淀和显著的学术特征所做的高度简约和集中的概括。本书以对地缘政治学各种主流学派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推演,揭示出一百余年来该领域的发展主脉:从马汉的海权论与麦金德的陆权论之间的对立,到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学说”与“大陆心脏地带学说”的对立;从麦金德对“内新月形地带”与“外新月形地带”的区分,到斯皮克曼提出的“边缘地带”与“内新月形地带”的吻合;从以海权论和陆权论为主要标志的地面空间权力理论,到杜黑、兰纳和德塞尔斯基等人空权论为代表的空中权力学说;从20世纪60、70年代科恩分析冷战的“世界分裂图式”、沃勒斯坦划分“核心与边缘”的“世界体系论”和戈尔什科夫的海权论,再到冷战后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对欧亚大陆“黑洞”和“文明断层线”的分析,

可以清楚地看到二分论和其所包含的对应逻辑是地缘政治学主流理论中一条连贯和有力的发展脉络。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豪斯浩弗可以说是二分论对应逻辑这一主流的创立者和主要代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科恩、戈尔什科夫和沃勒斯坦等人可以说在不同程度上承续和发展了这一主流,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则在后冷战时期再次唱出了这一主旋律。应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重归心脏地带"的现象,冷战时期对"新的海权时代"的呼唤,后冷战时期麦金德幽灵的再度徘徊[①],都证明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对应逻辑是强有力的和根深蒂固的,也是延续不绝的。

第二,就理论的内在关系而言,二分论实际上形成了内构于地缘政治学深层的理论结构,这在于它深刻包含着地缘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主题、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体系,并使之在理论上被"结构化"了。海权与陆权,"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两大地缘战略区"与其他"地缘政治区"及其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都是长期以来被地缘政治学界广泛使用的基本概念,是被该学科深刻内化的概念元素。而海陆之间、"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以及"核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的对抗或对立被认为是地缘政治学的基本主题,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和豪斯浩弗等人就都认定,应该把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视为贯穿于地缘政治整个发展过程的历史性主题和"普遍现象",也应视为贯穿于地缘政治学理论演变始终的研究对象。正是根据这一主题,他们都抓住地缘政治中的二分现象做文章,从理论的高度上系统地展开自己的论述。而且,通过对这一基本主题的有力揭示,地缘政治学界的权威人物有意识地塑造了地缘政治中国家行为与国际政治互动的系统模式,并把这视为地缘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毫无疑问,二分论所蕴涵的基本概念尽管在表面上是对立的,其所揭示的基本主题和基本原理尽管在表面上意味着地缘政治现实方面的矛盾常态,但它们却都在总体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27页。

上构成了地缘政治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即以二分论为基础所形成的“理论结构”。就此,还需要特别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讲,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与国际政治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派有着天然的亲和关系。因为二者都倾向于以二分法看待国际政治现象,特别是前者从地理角度给后者提供不可多得的系统解释。由于它把地缘政治与权力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从地理空间的角度说明了权力在国际政治现实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替代性,因而对国际政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贡献良多。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把地缘政治学看做是国际政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两大支柱之一的原因。因此,就理解和研究国际政治理论来讲,在理论层面对地缘政治学进行全面和深刻的总结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很高的学术价值。

第三,就理论特征而言,需要注意的是,地缘政治学具有相当强的矛盾辨证统一性,这对我们认识这一学科的发展和未来趋势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从表面上看,地缘政治学中的各种理论一方面都对自己的对立面(或陆权或海权,或“大陆心脏地带”或“边缘地带”)极尽批评否定之能事,并极其武断地论证自己观点和论说的正确性,将自己的观点和论说置于不容攻击的绝对化地步。这样,相互间在理论的源头和发展脉络上好像是截然对峙的,并且地缘政治学各分支理论的后继者都纷纷站在两大阵营的某一方,来阐述自己的“新论”。但另一方面,它们实际上也都以对方作为自己理论的批判物和参照物,也都以其对立面作为讨论对象,就像相互间做对应式的“辩论赛”一样进行争论。这样,由于他们都自觉地以对方作为自己的对照物,在论及自己学说时不得不提到对方的观点,因而在整体上使地缘政治学理论本身就具有某种二分论的特征,这种特征切入了地缘政治的现实主题即二分,但更主要的是在理论上形成了海权与陆权,“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内新月形地带”与“外新月形地带”等相互对应的大量概念群。这实际上反映的是理论中的矛盾和对立,但也暗含着二分论的对应、统一,甚至同一。正是这种特性无形中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虽然地缘政治学给人的初步印象是

充满老式的、沉重的和经典的味道,但其实它们非常具有与时俱进的进化特征,例如麦金德三次修改自己理论的核心概念——"心脏地带",斯皮克曼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对自己的"边缘地带"理论进行了调整和完善。不少人是在他们还活着的时侯就对自己理论和观点搞了点"修正主义"的,因而地缘政治学是追踪国际政治的经常变化而做重大调整和改动最多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中所蕴涵着的矛盾辨证统一性是促使其不断进化的重要动力和原因,也给后来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议题和标本。

第四,尽管地缘政治学在矛盾中进化发展,但其实隐藏在长久以来争论中的一条重要理论线索仍然是大陆与海洋、海权与陆权、"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等相互之间的二分。马汉在论述英国和美国的地缘政治时强调了海权的重要性,其意在打破美国孤立主义的禁锢;而事实上马汉的海权论确实为达到这一目的起到了刺激和"醒世"的作用。但在谈到法国、德国,尤其是亚洲问题时,他则以相当的篇幅涉及了海陆关系问题;其中他对 19 世纪俄国和英国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上所进行的地缘政治较量,基本上是以海陆关系为主题和线索来分析的。麦金德虽然强调陆权的重要性,并提出"大陆心脏地带学说",但由于他具有全球视野,所以他的理论十分注意对比陆上力量与海上力量的机动性和优势。由此,他的理论也从历史发展和技术条件的背景对陆权与海权势力进行了二分,在理论的展开上涉及了海陆关系。就此,他明确提出海上人和陆上人,或"海上强盗"和"草原强盗"之间不间歇的斗争,是世界历史的主题。斯皮克曼在论述"边缘地带"重要性时则直接看到了海权与陆权之间的竞争关系,恰恰是需要高度重视这一地带的原因。因为"边缘地带"集中着海陆关系的全部内容,"内新月形地带"内部海权势力与陆权势力的较量,是对"边缘地带"二分的一个重要发挥。在某种意义上说,斯皮克曼是第一个真正全面集中论述海陆关系的地缘政治学家。豪斯浩弗在论述德国"生存空间"时,则进一步扩大了海陆关系的地理

范围，他刻意说明德国建立陆权势力的重要性，但也不忽视德国对出海口的控制和成为海权强国的必要性。虽然在他的概念里，陆权的确保先于海权，但德国最终夺取“生存空间”和建立世界霸权有赖于完全掌握海权。如果说缺少对海权的论述，豪斯浩弗的理论应该是不完整的。总之，以上两大理论阵营的对垒不仅没有削弱二分论的素质特征，反而在不断加强着这一线索。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在他们理论的潜在层面，实际上都不得不以海陆二分或地空二分的关系作为自己论说的现实基础，并在理论上加以塑造和升华。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各自对立面的存在，也就没有自己理论存在的价值；没有海陆关系和地空关系及其二分，也就没有地缘政治学的整体发展。另外，除了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战后和冷战后的地缘政治学理论也均把海陆关系和地空关系所展现的二分作为自己的论题，如科恩、沃勒斯坦和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人都发展了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甚至认为这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本质和内容。其中，科恩在战略上的划分以“两大地缘战略区”为命题，沃勒斯坦在经济上的划分以“核心区域—边缘区域”为命题，布热津斯基把美国和欧亚大陆的关系直接对应起来，实际上重点论及美国如何处理海陆关系的主题，亨廷顿在文明上则提出了东西方文明的二分对立。这些都为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注入了十分具体和生动的内容，并延续和发展了其线索。

第五，作为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性和工具性的理论学说，地缘政治学绝非像某些其他国际政治理论那样带有“纯粹性”。理论与政策的距离如此之近，理论与现实的呼应如此之强，大概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超过它。这自然加强了二分论的现实生命力，使其与国家战略对海陆、地空等二分要素的观照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对应关系。当然，这与地缘政治学家非常重视国际政治的现实问题有着很大关系，也与西方主要国家在制定政策时高度重视地缘政治学不无关系。在近现代国际关系所发生的多次重大转折中，那些主张二分论的地缘政治学家多次充当国家决策

的民间谋士,而某些国家的决策者也愿意在国家安全问题方面借鉴其所能提供的有用之物。当然,对二分论中那些为实现某些大国的霸权目标或对外扩张政策服务的理论和观点必须予以否定,并揭露其包藏着的“各事其主”的政治本质(多数地缘政治学家都明确意识到自己是为“祖国”服务的)。例如,马汉的海权论实际上是为美国推行海外扩张的政策寻找地缘政治上的理由;麦金德的“大陆心脏地带学说”虽然表面上谈到的多数部分是俄国,但其意图是以“逆向思维”为自己的国家英国摆脱日渐衰落的帝国地位提供现成的“反面教材”和警示性政策指南;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论”不用说是为法西斯德国实行对外扩张和称霸世界的战略服务的,他的许多主张成为希特勒扩大“命定空间”政策的思想源泉和地图指南;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斯皮克曼关于美国必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控制“边缘地带”的政策主张,在明目张胆地将自己的理论与政府的政策之间挂钩而取得实际成效方面做得最成功的莫过于此人,他为战后美国确立其充当霸主地位的世界秩序做过最有价值的地理学论证。如果说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从它的幼年时期起就有“各事其主”的政治功利性特点,那么在经过一百余年之后的后冷战时期这个“特点”甚至变本加厉。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的地缘政治学理论所研究的现实问题,更贴近美国目前外交政策的脉动,显然它们是为美国继续保持在世界上的霸权、特别是有可能保持相当一段时间的“单极霸权”的目标服务的。尽管我们不能认同西方地缘政治学理论的政治本质和狭隘性,但应该看到,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关二分论的不同主张发挥过各自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在一个极为现实的世界上,它(们)确实是一种看待世界的重要视角和方式,对我们理解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确实有着重要的启示。例如,虽然具有不同地理条件的国家可能会施行不同的地缘政治战略,也可能会偏重于某一方面的地理因素,但它们都十分重视海陆关系的处理,即使在偏重于某一方面时也会注重另一方面。

因此,就理论对现实的影响来说,这里还需要进一步阐述几点。地缘

政治学基本理论中二分论的参考价值,在于可以帮助我们在地理空间上加深对国际关系实质和形态的理解,加深对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所受到的地缘政治制约的理解。实际上,恰恰是由于地缘政治学中的二分论对应逻辑与国际政治的发展演变脉络具有一定的吻合之处,所以这一理论具有了明显的有用性或实用性。反言之,人们对国际政治现实方面的认识都会受到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中所蕴涵的“理论要素”的影响。在此,我们将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与国际政治的基本现实相结合,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以地缘政治学二分论衡量国际政治中的强国定义和标准是国际政治结构分析的基本方法,海权、陆权和空权都是国际政治中的显著权力,有能力把握海陆关系及地空关系是强国地位的重要保证。实际上,从海陆二分和地空二分的角度为世界强国下定义的学者并不少见。在一般意义上,世界强国就是“其他所有国家蜂拥而至时也能与之抗衡的国家”;而要做到这一点,基本前提是该国具备或对陆地、海洋或对空中的强势控制力,最好是兼备海陆和地空的全面优势,足以妥善处理海陆关系和地空关系并善用其中所拥有的权力资源。在具体的历史分析中,世界强国当然有海洋系统的强国和大陆系统的强国之分,同时具备海陆优势的国家是全面的“世界强国”。例如,西班牙在16世纪至17世纪初叶是兼备海陆优势的强国,瑞典在17世纪,法国在17、18世纪,德国在19世纪是欧洲大陆系统的强国;荷兰在17世纪,英国在18、19世纪是海洋系统的强国。它们都具备着较好的处理海陆关系的能力,提高这种能力会加强自己的国际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变成了在欧亚大陆上占有绝对地位的大陆强国,在海洋系统中英国的位置让位给美国[①]。美苏成为两个超级大国,说明它们不仅具备着很强的处理海陆关系的能力,而且具备着很强的处理地空关系的能力。美国学者认为,作为冷战时期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和后冷战时期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一直有在世界权力和孤立主义之间选择的问题,而摆脱孤立主

① 《世界系统》,第29页。

义、选择世界权力的主要条件,一是看美国能否处理好北大西洋三角关系,即美英加的关系(Anglo triangle)[①];二是看美国能否让西欧、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和中国和其他一些关键国家或地区在欧亚大陆强国的控制下获得自由[②]。这就充分说明,在相当程度上,世界强国的兴衰和更替会受到海陆关系及地空关系变化的重要影响,能否很好地驾驭和处理海陆关系及地空关系可以作为衡量是否世界强国的重要标准。

第二,陆权和海权谋求国际政治权力,从而对国际政治发挥作用和影响的方式完全不同,虽然它们之间不易进行简单的对比,但它们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使国际政治进入了相互区别的活动状态,却是不争的事实。地缘政治学家马尔斯(Marz)认为,陆权和海权具有各自迥异的谋求权力的方式,它们各自获得国际政治空间的方式如下:海权国家惯于使用逐点跃进的方式来拓展和控制巨大的地缘政治空间,从而获取国际政治方面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海权国家一般节俭和集约地使用力量,通过巧妙地适应现有条件来寻求以最小努力获取最大优势的途径。所以无论怎样,海权国家一般容易妥协乃至承认它的附属领地在某种程度上的自治。只要它能够通过隶属或结盟的方式来控制一块领土或海域,它就推迟对这些地方强施正式要求。但海权国家无论怎样做的最终目的是控制海权,并进而对陆上力量产生控制性的影响。与海权的运行方式正好相反,陆权国家则一般是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以严密的社会组织化手段来建立它的控制,尤其是保持其武装力量的机动性[③]。这意味着,在历史较长时期内,海权国家较多地使用结盟、建立势力范围和附属地及国际贸易等方法,陆权国家较多地使用领土兼并、人口控制和资

① B. J. C. Mckercher and Lawrence Aronsen, *The North Atlantic Triangle in A Changing World: Anglo—American—Canadian Relations*, 1902—1956,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 p. 110.

② Eugene V. Rostow, *Toward Managed Peace: The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1759 *to the Pres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5.

③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 64 页。

源占有等方法。在后冷战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英国和日本等海权国家仍很重视在"边缘地带"强化针对"心脏地带"的结盟方法的使用,并以北约东扩等扩大势力范围和掌握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方法进一步确立以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试图将中国和俄罗斯等其他大国纳入它们的国际游戏规则中去。中国和俄罗斯等陆权国家则对结盟等方法抱持着一定的戒心,开始提倡"新安全观",并建立新的区域安全合作模式。当然,除了上面所谈到的陆权和海权谋求国际政治权力和施加国际政治影响的方式不同之外,二者在以海陆关系的互动来追求权力的更大效果方面还有另外一种较为复杂的情形。一般而言,陆权势力在陆地范围最容易获得权力的支配效果,海权势力则自然容易在海洋范围获得同样的效果,当一方进入对方的活动环境时,情况则不一样了。这样就阻止了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各自发展完整的控制权,最理想的是一个国家要具有在陆域和海域彼此相当的力量,能够使它对陆地的控制成功地转向对海洋的控制,或者相反。总的来看,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都处在如何妥善处理海陆关系,如何更好地利用海权和陆权对国际政治的作用方式的过程中。

第三,国际政治的基本舞台就是大陆空间和海上空间,受制于这两个基本空间,国际格局的演变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轨迹。在历史上,海陆二分对国际格局的主要影响是:海洋权力经常出现单极结构,陆地权力经常出现两极结构或多极结构,也就是存在着海洋单极和陆地两极、多极的规律性现象。它意味着,历史上有过海洋霸权,但鲜少有陆上霸权。正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指出的,"地理因素为海洋问题划定了相当明确的界限"①。19世纪初,海洋权力格局是单极,英国海军力量大于所有其他国家海军力量的总和。英国这时的国家观念正如契伦所说的是:"海洋世界只许有

①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

一个主人而不是多个主人"[①]。当然,海洋权力格局也会发生若干变化,其基本线索是围绕着海洋单极格局和两极、三极格局之间的关系互换进行调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单极海洋权力结构变为两极,后来成为三极,正式表现是1922年华盛顿会议英、美、日主要舰只比为5:5:3。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至50年代,海洋权力结构再次成为单极化,占压倒优势的是美国(也包括空中的优势)[②]。"而在大陆(尤其是欧洲),形成苏美对峙的两极对立。从60年代末至70年代,这个状态发生了变化。由于苏联大量部署洲际导弹,使美国的海空优势近于终焉状态。美国虽然在海军力量上仍拥有绝对优势,但综合航空战斗力考虑,不能不说海上和空中的单极时代已告结束"。加上中国的崛起,促使了大陆权力结构的变化,地缘政治格局开始向海空的两极格局和大陆的多极格局交织的状态发展。"从大陆的势力分布情况来看,从60年代中苏对立以来,在不考虑中国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分析美苏的军事力量变得十分困难。1971年富有戏剧性色彩的美中和解,即缘于这样的认识。这样,70年代以后,在大陆上的双极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除此之外,一体化的欧洲和选择加强军备道路的日本都是多极的主要角色。其结果,"20世纪末的国际政治就是由美、苏、中、欧、日五个大国展开古典式强权政治的世界"[③]。因此,海洋权力结构与陆地权力结构是不一样的,存在着"海洋国际政治格局"和"陆地国际政治格局"之分[④]。这是我们观察和分析国际格局时需要加以注意的。

第四,地缘政治中枢地带或地缘政治交集点常常在陆地与海洋的交汇处,它们都涉及到如何处理海陆关系的问题。例如,1950年至1953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在地缘政治上可以看做是一场典型的陆权与海权之

---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58页。

② 参见《权力与相互依赖》,第181—183页。

③ 《世界系统》,第132页。该书作者还认为,"海上及空中是双极,大陆是多极的状态是发生战争可能性小的时期。"

④ 参见《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第35—37页。

间的斗争①。这就是因为朝鲜半岛是欧亚大陆和太平洋之间的重要的交汇处，也是许多世界大国利益的交汇处。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在地缘政治中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再度使它成为处理海权和陆权之间关系的课题。又例如，自 1991 年南斯拉夫暴力解体后，巴尔干出现了新的地缘政治形势，成为东南欧"新均势"的关键地点②。对于海权强国美国来讲，巴尔干的稳定变成了美国的战略利益，虽然美国没有稳固的政策来保护自己在这个地区的利益③。对于陆权强国俄国来讲，即使有固定的政策，也不能保护自己在此地区的利益。所以，巴尔干成了一个海权与陆权之间特殊的利害关系的反映。同样，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由于地缘位置和能源储备的因素，也已成为海洋方向和欧亚大陆之间的地缘政治交集点，各方势力的竞争颇为激烈。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一直反对俄罗斯把中亚、外高加索国家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俄罗斯则极力保护自己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另外，就是在欧亚大陆发生重大地缘政治变动的同时，还有一个实际上被忽视的重要地区，即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中美洲这个为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今天已经成为强权的势力范围和影响范围，其重要性大大增加。而加勒比海的重要性，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明的那样，它过去是西班牙、英国、法国的势力范围，后来是美苏的势力范围。现在，中美洲大陆和加勒比海的关系是：谁掌握加勒比海，谁就能掌握中美洲④。它们体现了一种不能忽视的海陆关系的特殊性。因此，可以看出，地缘政治的中枢地带或地缘政治交集点均在海陆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均已成为国际格局发展演变中的枢纽。

---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 146 页。

② Ola Tunander, Pavel Baev, Victoria Ingrid Einagel, *Geopolitics in Post-War Europe: Security, Territory and Identity*, London: Sage Pub., 1997, p. 217.

③ Gerald R. Pitzl, *Geography: annual editions*, 2000/2001, Connecticut, USA: Dushkin/McGraw-Hill, c2000, p. 125.

④ Philip Kelly, *Checkerboards & Shatterbelts: the Geopolitics of South America*,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7, p. 163.

第五,能源和资源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一些聚集能源和资源的地区也已成为地缘政治的交集点,特别是地缘政治竞争体现在对油气地缘政治真空的争夺上,而且这种争夺十分激烈。例如,对于外部世界来讲,中东地区的石油问题成为引起地缘政治问题的爆发点;而对内部来讲,水资源的问题十分严重,成为"水的地缘政治"的起因。在中东地区,能源和资源既被作为斗争的目标和工具,也是引起冲突的根源①。又例如,里海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已经引起了"油气管道政治"问题(the pipeline politics),美国、俄罗斯、欧洲国家和土耳其等都卷入其中②。国内学者认为,目前在环里海地区,围绕油气资源和跨地区运输控制权展开新的油气地缘战略竞赛是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一个地缘政治问题③。而且,在"油气管道"问题上,"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通道"(Turkey—Afghanistan—Pakistan Route)已经使西亚和中亚地区变成了地缘政治竞争的主要地区之一,能源资源重要性的提高直接带来了地缘政治很大范围的扩张,引起了激烈的地缘政治角逐。此外,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和远东部分、东北亚地区、南中国海地区、高加索地区、波罗的海、中欧和黑海等,都是与能源和资源有重要关系的地区,已经成为地缘政治新的交集点,潜存着引发地缘政治紧张和危机的土壤。

当然,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尽管以上几点的确反映了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对国际政治的启示意义,但是地缘政治仅仅是国际政治的一个方面,而不能等同于国际政治的全部;仅以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来说明国际问题,包括在空间意义上说明国际问题,是很难解释清楚国际政治的本质和特征的,也很难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前景进行成功的预测。随着国际政治的迅速发展,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暴露出极大的弊端和局限性。

---

① 参见 Hussein A. Amery and Aaron T. Wolf, *Water in the Middle East: a Geography of Peac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0, p. 7, pp. 48—49.

② 参见 Shams—Ud—Din., *Geopolitics and Energy Resources in Central Asia and Caspian Sea Region*, New Delhi: Lancer's Books, 2000, p. 5, p. 18, pp. 32—33.

③《新世纪的油气地缘政治——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第 41 页。

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在改变着地缘政治面临的环境，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而自然界对人类活动的限制相对变弱；所以，战后国际政治的发展出现了超越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新情况，需要从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地缘政治的作用。正如采用广义地缘政治学观点的学者所指出的，战后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进步以及科技的迅速发展，在相当深度上改造了地缘政治学的认识角度和要素结构，在其所关注的地理构成、人口和资源分布等传统课题之外，经济、社会、技术和生态等问题更受到重视。地缘政治并不仅仅意味着纯粹自然地理的空间运动轨迹，它还更多和更细地可以分解为经济空间、政治空间、社会空间、技术空间和生态空间。值得提到的是，这种“广义地缘政治学”所揭示的新的研究主题和内容，可能会对地缘政治学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需要结合它们来重新审视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也就是说，在承认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学术价值及其对现实层面的应用价值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揭示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在理论思维上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意味着其在理论上存在着一些不容回避的弊端和痼疾；而只有对其进行必要的超越和扬弃，才能进一步推动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也才能更好地认识国际政治和从事国际政治的实践。

第二节　从决定论思维到互动论思维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第一个弊端和局限性是具有明显的决定论的思维导向。这一导向意味着，它片面夸大地理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忽视或抹杀其他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更为极端的是，它仅只把某一种地理因素（如大陆或海洋，“大陆心脏地带”或“边缘地带”）作为影响、甚至决定国际政治的单一因素，过分强调由此衍生出的某一种国际政治权力（如海权或陆权，“大陆心脏地带”的权力或“边缘地带”的权

力)对国家行为的终极性影响。用这种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生活,很可能歪曲其本质和特征。由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所具有的决定论思维导向根深蒂固,所以我们必须从源头上予以揭露和批驳。

从理论根源来看,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与"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一脉相承的。在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theory of determinism of geography)那里,地理环境被解释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原因,也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制约因素。由于时代和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地理环境决定论"在早期地理学界非常盛行,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偏执的反映。孟德斯鸠认为,地理因素、尤其是气候条件对不同地区人群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甚至国家政体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名言是"气候王国决定一切"。在他的所谓"法的精神"那里,寒带地区、温带地区和热带地区分别与进取型的强制、自由制度和专制政体相对应[①]。传统地理学的鼻祖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李特尔(Karl Ritter)也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类的空间分布及其活动方式,在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他们还把地域空间的差异与地理条件的差异结合起来,认为这是导致相互区别的人类行为及其不同结果的基本原因。对早期地缘政治学影响最大的拉采尔则走得更远,因为他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作了最为系统的论述。根据达尔文关于生存竞争的进化论,他视地理环境为人类行为的控制性因素,不仅人类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受其支配,而且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形式也由其决定。由于拉采尔被视为近代地缘政治学的开先河者,可以想见他的理论在这一领域所产生的持续后果。除此以外,美国地理学者 E. 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也可归属地理决定论者的范畴,他的主要观点表明生物遗传、文化天赋和地理环境是文明的主要动力[②]。当然,与明确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并存,还存在着隐晦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有条件的地理环境决

①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278 页。

② Ellsworth Huntington, *Mainsprings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Wiley, 1945.

定论”,前者认为地理条件多多少少具有控制历史的真实含义;但它也承认,人在受到地理环境影响的同时也具有某种选择权;后者则在给予地理环境某种先验性质的同时承认,通过人的自由意志或意志的自觉努力可以获得对自然环境的成功利用。总而言之,无论哪种形式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都强调所谓“对走向世界统治道路的因果报应”。在这种因果关系中,大空间范围的地理政治进程起码可以认为是已被注定的,“地理性质以种种方式控制了或至少是引导了历史的走向”①。

“地理环境决定论”对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在于在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的因果关系上,决定论的因果观明显地支配着二分论的逻辑起点和展开。按照这种因果观,一切国际政治行为都取决于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对国际政治产生的是一种单向的决定作用。政治家从地理形势中吸取东西,犹如安泰从大地吸取强大力量一样。正如国内学者的评论所指出的,过去的地缘政治学家设定,国际行为是由某些基本上改变不了的因素决定的,例如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资源状况等。一个国家的位置自然影响着它的国家能力及其对外政策的方向;地理决定了各国的选择,限制了可供选择的对外政策方案②。而在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豪斯浩弗所赋予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传统中,我们不仅看到它们直接取源于“地理环境决定论”,而且都进一步抽取地理因素中更为单一的成分,从而把决定论思维的导向推至宿命论的境地。如果说拉采尔仅仅从生物的规律看待地缘政治基本单位国家的成长和变化,那么马汉孤立地从海洋角度看待地缘政治,麦金德和斯皮克曼单纯从地理的大空间与历史事件的背景上看待地缘政治,以至于把某一种地缘政治因素的作用夸大到极限,都反映了他们在思维上的狭隘性和学术上的某种偏执。这使他们的基本观点和立场经常以下断语的方式加以表达,并以此作为其理论的起点和基础来解释国际政治的发展规律和各

① 《二十世纪的地理政治思想》,第27页。

② 《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85页。

种现实的国际问题。

然而,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所带有的决定论思维导向是不符合实际的,也为历史实践所证实带有重大的理论偏颇。通过对国际政治历史的了解,我们会认识到,地缘政治学中的决定论思维与“地理环境决定论”一样,同样有违科学的逻辑和历史的逻辑。实际上,虽然人类的活动,包括国际政治行为,都只能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和限度内进行,地缘政治学反映的是国际政治行为所可能达到的地理边界;但影响国际政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对地缘政治施加作用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不是单一的或个别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对其他因素,如政治经济条件、科学技术对地理关系的影响估计不足,甚至对地理因素中某一种成分的过分强调,都使其结论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斯特劳斯—于佩(Robert Starusz-Hupe)认为,“地理条件决定历史发生的地点,但创造历史的永远是人”,因为有史以来地理条件被人类不断改变。因此,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不论其对内影响还是对外影响均不能视为决定性的[①]。作为现实主义者的摩根索也有针对性地指责说,地缘政治学“把地理因素抬高到绝对地位,认为地理决定国家的权力,因而也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它的基本概念是空间。然而,空间是静态的,生活在地球空间的人则是动态的”。尤其是,那种片面赋予某一种地理因素的作用以历史规律的地位,并认为国家相对权力取决于这种地理因素所决定的空间关系的做法,证明地缘政治学是一种“伪科学”[②]。由此可以看到,理论界始终存在着对决定论思维的各种批评,虽然有些批评的言辞过于尖刻,但人们认定,国际政治中的许多事实,仅仅依靠地理因素是无法解释的。虽然地理因素必不可少,但不足以全部解释国际政治体系产生和发展的缘由,更不足以精确解释其变革的动力和过程。尤其是,地理因素以积合起来的形式尚且不可能对国际政治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片面提取某一种

①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81页。
② 《国家间政治》,第213页。

地理因素,如海洋或陆地,“心脏地带”或“边缘地带”,更不可能就此认定它(们)对国际政治具有决定性的或终极性的意义。归结起来,由于决定论思维具有先入为主的特点,所以必然引起一些逻辑推理上的混乱。虽然地球是由海洋和陆地组成的,虽然它(们)确实反映了某一方面的地理状况,但地球上的事物和所产生的各种事物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国际政治就是其中非常复杂的一种。国际政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种复杂多变和充满活性因素的互动过程,其中原因与结果相互交错、彼此制约,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因果关系链。而且,国际政治及其变化会经常地受到其他多种多样的因素的影响,海陆因素及海陆关系只是其中能够说明其缘由的某一方面的条件,只有结合其他各个方面才能解释国际政治及其变化的全部条件。毋宁说,那种把某一种地理因素解释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思维倾向,将国际政治置于狭窄的解释空间,成为容易导出武断结论的催化剂。国际政治一定要考虑而不可忽视地理环境,它可能解释国际政治的一些条件;但如果认为“人是世界地理的奴隶”,国家行为只能绝对服从地理环境的安排,那就必然走向“宿命论”。同样,国际政治一定要考虑全部地理因素,而不能仅只考虑单一的地理因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会使“宿命论”走向极致。

当然,另一方面,虽然我们反对地缘政治学的决定论思维,但是不应回避地理环境的永恒性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因此地缘政治学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我们借鉴和参照的部分,特别是地缘政治学的某些论点或论断早已成为制定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必备要素”。在否定“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决定论和单一化倾向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另外一种倾向,即对地理因素和条件对社会生活和国际政治的影响估计不足,可能滑到“地理无定论”的一边。“对地理决定论的批判常常伴随着一种虚无主义的过低评价,甚至否定分布学,或者确切地说是否定区域性的存在。”①这种观点即使在西方也是存在的,并在学术界

① 参见《地理学的理论问题》,第149页,第160页。

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地理学中的二元论就是一种唯心主义的“非决定论”。因此,我们不能武断地把所有的地缘政治学理论都同“地理环境决定论”归于一类,很多地缘政治学家在论述其主要观点时就直接否定了任意夸大地理因素的倾向,例如斯皮克曼就反对“欲以一简单权力因素——地理”来解释国际行为的倾向,并说这是“地缘政治学中的最大谬误”。就算是其地缘政治学理论植根于“决定论”的麦金德也说过,“研究人对自然的反作用,将是地理学中最迷人的篇章之一”,这实际上对人在地理环境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予以了部分的肯定①。与此相映衬的是,作为国际政治分析学派的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主张在研究中应把地缘政治学摆在优先的中心位置,因为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有形世界,他强调人和有形世界的互动关系,但反对把单纯的地缘政治因素夸大到极限,有形世界意味着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总会得到适当的反映。对“地理无定论”的批评和有关地缘政治学家自己的态度,会使我们认识到“由于对地理的无知而付出的代价是绝对难以计算的。”

我们知道,在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包括如何认识地缘政治的作用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了最成功的论述,提出了最精辟的观点,从而最准确地把握了地缘政治的本质和空间关系的实质。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一个以“地缘政治学”命名的理论,但是他们对国际政治中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有过许多论述,这些论述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基本观点的出色体现,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关系,关于地理环境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准确把握。第一,马克思主义正确处理了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前提和自然条件,是人类从事生产活动和诉诸政治行为的基本空间环境。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经常强调,地理位置,如同一般的地理条件一样,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②。列宁甚

① 《历史的地理枢纽》,第39页。
② 《地理学的理论问题》,第153页。

至说,在现实世界中,各种"自然现象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着的,这是很明显的",它们对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影响必须给予高度重视①。由于国际政治也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并且在符合和满足空间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地理环境同样是国际政治发展演变的重要前提。国家所处的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是它们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基础,国家的内外行为和所能存在的状态都会受到其虽非决定性的、但却十分重要的影响。在特定的时间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地理环境对国际政治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国际政治的各个层面都有不可抗拒的制约性。因此,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考察国际政治,需要看到国家间的空间分布、海陆位置、资源人口等地理条件对国家的经济、政治实力乃至对整个国际政治所具有的明显制约作用。当然,另一方面,国际政治对地理环境也有反作用,它所包含的诸多内容也会引起地理环境的变化。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指出的,地理位置具有稳定性和不可更改性,但在国际政治发生重大变化时,不仅地理环境有可能改变,而且地理位置在重要性上也有可能出现变化。总之,国际政治的性质使地缘政治具有很强的动态特征,地理条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很大的,对这种影响既不能估计过头,又不能因对它估计不足而不可避免地引起令人痛心的后果。因此,地理环境和国际政治存在的不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是存在着动态的互动关系。

第二,马克思主义正确处理了地理环境和人的关系。马克思说过,人类一半属于社会,一半属于自然②。根据这一判定,一方面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超越自然的他物。人类显然具备社会属性,但人类在自身发展中也需要经常面对地理环境的机遇和挑战,需要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地理环境不仅包括"纯"自然要素,同时也包括人及其活动的结果,它是人与环境互动的综合体。也就是说,人类活动,包括国家的行为,也必然影响地理环境。虽

① 沈伟烈、陆俊元主编:《中国国家安全地理》,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② 《地理学的理论问题》,第136页。

然"人定胜天"这句话有点唯意志论的味道,但人类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利用和改造自然。而作为以人类群体形式组成的国家(按照国际政治学理论的理性原则,国家可视为"国家人"),它(们)在国际政治中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并对其他国家的环境条件产生重要影响。也就是说,地理环境本身所蕴涵的一定规律取决于社会条件和人的作用,地缘政治所包含的一定规律仍然受到国家("国家人")行为的制约。因此,地缘政治学的核心课题是,国家("国家人")在多大程度上能适应和改变地理环境,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地理环境满足自己的需要。虽然地缘政治学理论时常在严格的决定论与或然论(possibilism)之间徘徊,但承续启蒙运动的传统,我们应该进一步明确,地理环境是可以改变的,国家("国家人")在与地理环境相处时能够发挥"自由意志"。这样,所谓地缘政治的作用既不能被无限夸大又不能置之不理,应该把它摆在适当的位置上,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它与人、国家的主观能动性之间存在着辨证的互动关系。

第三,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际政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在二者相互作用的方式上,对地缘政治的认识应该从决定论思维转向互动论思维,即应该从决定论的因果观走向互动论的建构观。互动论的逻辑在解释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的因果关系时采取的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它能够帮助人们脱离单向的因果关系、而从多方面的因素来辨证、全面和动态地认识地缘政治问题。首先,地理环境和国际政治之间存在的是双向制约的因果关系,而非单向制约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在地理环境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而发生某种因果关系时,国际政治也在对地理环境产生影响并发生另一种因果关系。二者之间经常存在着的是复杂的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原因对应于一个结果的关系。一个原因可以有多种结果,一个结果也可以由多个原因引起。在此意义上说,双方的关系不是由单方面限定的,而是由复杂因果链产生的共振效果决定的。起主

导和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前者还是后者,取决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也取决于不同的主客观条件。因此,地理环境和国际政治之间是发展变化的动态关系,二者的关系是在运动中产生和发展的①。其次,即使就地理环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来说,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历史条件下也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情况。因为在历史上,地理环境所能发挥作用的条件也一直在变化,会受到地理因素本身之外的许多其他因素的制约。按照这种看法,地理环境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说明它只是一种"可变的量",虽然它是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和施加作用的重要变量,但决不是唯一的变量。当地理因素之外的其他许多因素在发挥作用时,地理环境和国际政治就发生了一种新的互动关系,地理环境的作用在整体上受制于这种关系。总之,互动论对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之间关系的解释是多向的和动态的,即二者互为条件且可以相互转化,要在一种辩证的整体过程中认识和把握其相互关系。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讲,这种相互关系已经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循环关系,而实际上是一种超越了因果性质,依据内在联系运动的、并且始终处于动态的建构关系。

第四,根据互动论所揭示的逻辑,正如"可能"一词在地理学文献中频频出现一样,地缘政治学所使用的语言应该是概率语言,而地缘政治就是国家充分利用可能性的艺术。这意味着,在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的关系中,地理环境为国家提供了显然存在的可能机会,这种"可能机会"既可能是有利的,又可能是不利的;而对此国家所拥有的是众多可能性中的自由选择权利。虽然这种自由选择权利受制于不同的客观和主观条件,但国家在地缘政治中表现出的是一种积极角色,是利用可能性的主体力量。它们会充分意识到,如果被可能性所左右,那就会使自己遭遇困境,从而会失去自己所要实现的目标;而如果能够利用好可能性,则会大大改善自己所面临的环境,从而能够达到自己所要实现的目标。费朗兹·波兹(F. R. Pitts)曾经指出,所有自然环境条件,只是给人类活动

① 《战略地理论》,第18—19页。

提供了一个可能利用的范围,在此范围内人们可以自由地选取和利用它们。可能性给人们一种很直观的感觉,即大多数关系似乎都具有相等的机遇。但是在人同自然的关系中,从来没有在同一自然环境中,人们会感觉到相同的可能性范围。例如,早期的美洲印第安人、中期的西班牙人和后来的美国白人殖民者,虽然都生活于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或西南部的沙漠中,但是对于这个相同自然环境的应用范围,却是很不相同的。每一种类型的人,都有自己特定的利用方式或感受到不同的限制。每一类人对于同一的自然条件会有不同的感应,并能创造出截然不同的文化景象①。同样,在地缘政治中对决定论思维的逆向反应是国家对可能性的利用。在处理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时,国家比那些个体的人或由少数人组成的群体更能表现出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力量,因为前者比后者更能判断地理环境为自己提供的各种可供利用的可能性范围,更能选择最适合其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条件。因此,互动论不仅从多元的角度,而且从动态变化的角度来分析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它不受限于地理环境的单一因素和单独作用方式,而是采取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高度辨证的态度。

基于此,沿着互动论的逻辑正确认识和研究地缘政治的实质和形态,对思考和确定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定位和方向,对避免可能出现的"由于对地理的无知而付出的代价",有着明显的好处和价值。对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可以抛弃其不合理的成分,留下有用之物,以供我们借鉴。其理由有二:首先,就地理学基础来说,由于地球的基质即海陆二分和以海陆二分为基础的各种空间形态的二分,是地缘政治二分事实的物质空间前提,所以二分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一定的学理来源和学术基础的,也是有着一定的事实基础的。透过二分论,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认识到地缘政治发展演变在静态空间意义上的自然形态。其次,正如理解牛

① 参见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9—22 页。

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关系一样,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层次上理解二分论与超越二分论的其他理论之间的关系。二分论在静态空间的意义上有一定的价值,但在动态空间的意义上则可能无法对国际政治作出成功的解释。由于地缘政治不可能是由国家所进行的一种完全静止的活动,它还会受到地理因素之外的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实际上它所呈现出的一直是地理空间的动态过程。这就需要在动态空间的意义上、而不是静态空间的意义上说明地缘政治的存在及其发展。超越二分论有着现实中的需要,也有着理论上的需要。再次,确实有一个如何从主观上和理论上对地缘政治的事实作出正确和辩证反映的问题。根据地缘政治的"地理学基质",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等人的主要观点对地缘政治的基本主题和特征作出了比较过激和夸张的反映,得出了比较武断的结论,这是我们应该予以否定的;但另一方面他们的一些观点也是具有某种超前性的,"确实具有超越世界历史进程的能力,或者确切地说是有些影响了历史进程的方向"①。他们所提出的"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著名公式,形成了地缘政治学理论中的某种特定模式,深刻地影响了国际政治的进程。因此,应该认为,他们依据决定论思维对地缘政治控制力所下的某些断语是不可取的,但他们的理论中所可能包含的合理的、有学术和实用价值的部分我们还是要给予必要的理论观照,有些被国际政治实践证明有用的重要观点和论述我们还是要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特别是他们所强调的某些特定的、具体的地缘位置的重要性至今仍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实际上,在总的理论线索上,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缘政治因素及其作用的论述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世界经济体系的二分、海陆关系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世界政治划分为两个方面(如宗主国和殖民地、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俄国和欧洲的海陆二分,以及恩格斯和毛泽东对地缘军事或军事地理与海陆因素的关系所作的论述。他们对地缘政治学理论的论述和探索是十分全面的、丰富的和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 27 页。

完整的,对地缘政治现实所可能涉及的两个对立方面进行了辩证的、对应的和互动的研究。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着有关地缘政治学的论述的话,那么这种论述是充满唯物论和辩证法精神的,也是具有互动论的实质的。因此,在谈到地缘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时,我们既反对极力夸大地缘政治的作用、认为它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因而把地缘政治学奉若神明的做法;又反对对地缘政治持简单的否定态度,因而把地缘政治学贬得一无是处或打入冷宫的做法。在谈到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价值时,我们既反对无限抬高其地位和盲目迷信的非科学态度,又反对对其一概否定和不加分析的做法。因为我们所反对的这些做法都反映了某种极端和褊狭的态度。进一步地说,就理论有价值的深入发展来说,以新型的地缘政治学观推动该领域的进步,需要对已有的理论遗产进行必要的清理,并进行一定程度的创新和再造。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确实有严重的理论缺陷,其"地理决定论"倾向和把某一类地理因素夸大到极限的做法必须否定;但对于地缘政治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还是要看到的,对于某一类地理因素在不同空间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也还是要清晰地加以认知的。对地缘政治学的背后所带有的哲学思维导向、政治目的和实际效用的不同判别,是研究地缘政治学首先必须明确的价值判断问题;而采取超越的态度是必然的选择。

第三节　从对抗性思维到融合性思维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第二个弊端和局限性是对抗性的思维导向。对地缘政治学最有代表性的几种理论做比较,会发现它们的不同点、甚至对立点十分明显。马汉强调海权的重要性,麦金德和斯皮克曼、豪斯浩弗强调陆权的重要性;麦金德注重"大陆心脏地带"的历史作用,斯皮克曼注重"边缘地带"的现实作用;麦金德、斯皮克曼和豪斯浩弗等把空

中力量的发展视为对海权国家不利的因素和对陆权国家有利的条件,海权论者则强调空权时代海空一体化的价值并排斥陆权在新的时代的作用,空权论更把空中力量当作决胜的根本条件。由此可以看到,以上几位人物的理论具有十分明显的对立性、甚至对抗性。

值得我们重视的不仅是以上人物在基本理论观点上的对立,而且是他们所代表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对国际政治现实的危害性,这就是决定论的思维容易导向地缘政治现实中的对抗性,容易在所谓理性原则的前提下使国家以自私的本性处理相互间的关系,从而把国际政治变成一种充满对抗色彩的"零和游戏"。早期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本身就带有被视为"生存法则"的扩张性和弱肉强食的侵略性。拉采尔和契伦等人在系统地提出"生存空间论"时坚信,地理环境制约着国际政治现象,国家是一个生物单位,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必然要求向外扩展其疆界,通过对外扩张争取"生存空间"。这在他们看来是国家生存的基础法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由此,他们主张强国不可避免地要侵占其他国家的领土,就像生物的生长需要一定的空间一样。怀有大日耳曼主义情绪的拉采尔更认为,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一个国家向外扩张领土不仅是应当的,而且强国和弱国恰恰是因为地理上的原因形成了控制和服从的世界体系。这显然是机械搬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Spencer)社会有机论的结果,也显然是一种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逻辑。在那些实施侵略扩张政策的国家看来,对地缘政治方面某一类因素的强调是毋庸置疑的,它(们)可以成为"强权的支柱";即使这可能导致国际政治中的对抗结果也是文中应有之义。

应该说,决定论的思维延伸到地缘政治学领域必然导致其带有十分明显的对抗性,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在内涵上便处处体现出这种性质,并把它演绎成一套完整和系统的逻辑。马汉的"谁控制海权,谁就能控制世界",麦金德的"谁控制东欧,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控制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世界",斯皮克曼的"谁控制边缘地带,谁就控制世界"等基本论

点,都带有很大的决定论式的片面性,它们不仅容易使人落入宿命论的窠臼,被某种"地理咒语"所左右,而且必然使地缘政治的实践在地理空间上被导向空前的对抗性局面。按照二分论的逻辑,人性恶是政治学的基本假定,也是达尔文物竞天择精神的体现。由于地缘政治是融合了生物和地理因素的基本概念,由于生物界和地理环境普遍存在着弱肉强食的竞争法则,所以国家很难消除自私的本质,它们在相互关系中诉诸"以邻为壑"的行为是必然的和排他的选择。海洋和陆地,"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这些词汇,就最直接和最充分地反映了地缘政治中显著的对抗本质。由于这些不同的地理因素之间存在着很难达成和谐的历史惯性,根据不同的地理因素进行国家利益的判断,就必须把对方看成是魔鬼,只能采取置其于死地的做法。而根据这种逻辑,世界不是没有敌人的世界,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一个敌人。这甚至被认为是地缘政治实践中的铁律。由此,国际政治实际上就变成了海权对陆权、"大陆心脏地带"对"边缘地带"之间不容怀疑和反复进行的斗争,它们不仅被视为是国际政治的永恒主题,而且也被视为国际政治实践的基本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说,地缘政治学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重术不重道"的学问,或者干脆被说成是"国际政治的厚黑学",恰恰是因为二分论只给"以邻为壑"的国际政治行为寻找理论根据,也只给国家间关系的"零和对抗"提供理论上的注脚。在二分论对世界历史的解释中,人们很难找到相互合作的内容,相反到处是排斥合作和视合作为禁脔的现象。帕克认为,20 世纪的大部分地理政治学思想中有三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潜在的对立意识,二是二元论观点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为多数其他观点奠定了基础,三是世界中心和世界边缘:一内一外的霸权模式持续存在,它的世界秩序是为增进具有支配地位的地理区域之利益而设计的①。

在以对抗逻辑影响国际政治和国家行为方面,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有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 191 页。

着它的潜在路数。马汉的海权论和麦金德的陆权论，在给美英等强国提供地缘政治指南方面突出了两种权力的对抗性质，因而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政策选择。在影响希特勒称霸欧洲和世界的对外政策方面，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走得更远。摩根索曾经指出，“地缘政治学的德国学派，由于热衷于显示德意志民族负有征服‘中心地带’这一统治世界的地理宝座的使命，就把地缘政治学的原理与人口压力的论点结合了起来。德意志民族是‘缺乏空间的民族’，并且他们为了生存必须占有的‘生存空间’，这就吸引着他们去征服空旷的东欧平原。”[①]实际的历史情形确实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地缘政治学的二分逻辑曾为赤裸裸的法西斯侵略扩张服务，成为西方强权政治和侵略行径的一种方便的理论工具。贯穿在侵略行为和海陆对抗中的，是所谓“草原强盗”和“海上强盗”之间的争斗。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影响就在于，陆权学说和海权学说都曾促使那些大国依托某种地理因素去寻求控制世界的条件和力量。乔治·里斯卡（George Liska）在考察国际关系中的均势时指出，地缘政治学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是大陆与海洋、东方与西方的对抗与冲突的思想。这种传统从地缘政治学形成开始就延续不绝，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一种怪异的发展[②]。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苏争霸也产生了或明或暗的、但显然是重要的影响。这不仅因为按照二分论的逻辑，人们习惯于以对抗的逻辑解释两极格局所代表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特别是以地理上的对抗因素加以说明。例如，昔日“草原强盗”和“海洋强盗”的争斗仍然在继续，只不过这种争斗场面被说成是北约对华约、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以及东方对西方等的较量。而且因为美苏双方都循着二分对抗逻辑制定出了冷战战略，从“心脏地带—边缘地带”的冷

① 《国家间政治》，第213页。

② George Liska, *Quest for Equilibrium: Americ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on Land and Sea*,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Press, 1977, p. 4.

战图表中可以看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都很明确地认知相互间的对峙实际上是地缘政治上的对峙,并十分鲜明地再现了地缘政治的二分逻辑:国际格局的地缘政治分布呈现出二者之间的包围与反包围结构,其中隐藏着海权论和陆权论,"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之间的对立。具体地说,凯南的"遏制战略"、尼克松—基辛格的"大三角战略"和斯大林的"势力范围"政策,都有因地缘政治学二分逻辑所引起的对抗性倾向。西方学者指出,斯皮克曼继承了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特别是他的"边缘地带学说"深刻地影响了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而"多米诺骨牌理论"所注重的地缘政治的连锁反应逻辑则直接成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制定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政策的重要根据。与此同时,苏联对"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关系的认识,则显然是其控制东欧的"势力范围"政策、南下政策和入侵阿富汗行动的根源之一。由上面可以看出,美苏的冷战战略都被打上了地缘政治二分布局的明显印痕,它们恰恰通过在两个带有地理对抗性的地带上确保实力地位,进行霸权的争夺,并去寻求对世界的控制。美苏在地缘政治上的对抗带来了有史以来罕见的冷战局面,国际政治长期内充满了紧张和危机。就美苏两极对峙的必然性而言,地缘政治学家注意到其地缘政治方面的条件,他们认为决定美苏关系的基本因素是融合了海权与陆权、"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地缘政治形势。这不仅使它们很难进行成功的政治和经济合作,而且不断加深着相互间的敌视。因此,美苏争霸的过程实际上隐含着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理论根源,从中我们都可以嗅到对抗性逻辑的味道。

此外,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地缘政治含义,即陆权和海权,"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的矛盾,还存在着另一个明显的特征。这就是,地缘政治上的二分分野与国际格局的二分特征具有相当大的契合性。地缘政治上的二分对国际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美苏争霸斗争的两极性也体现在地缘政治上的二分特征上。同时,地缘政治组合的配置方法与国际格局的配置方法几乎是同样的,例如,结盟与反结盟、军备竞

赛、建立势力范围与缓冲地带均是在地缘政治的线索上进行的，基本上与“大陆心脏地带”、“边缘地带”和中间地带相吻合，都带有明显的两极性和由两极性所带来的对抗性。乔治·里斯卡对这种对抗逻辑作解释时指出，“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在性质上殊异，无论是相互竞争还是彼此交往都不能消除二者的天然差别。一旦前者变得强势，就要扩张疆界和争取出海口，以扩大均势的范围来建立对海洋的优势体系。而海上强国势必对此下定决心进行抵制，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之间由此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①。

在后冷战时期，大国间的角逐仍然折射着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中对抗性思维的印痕。北约东扩和美日安保体制扩大化在开始构筑新的国际格局的同时，也包含着对“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海洋与大陆之间对抗关系的考虑。美国及其盟友尤其注重在“边缘地带”和海洋方向对“心脏地带”和大陆方向施加压力。而处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与中国这两个大陆型国家则通过建立所谓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共同采取的“军事领域信任措施”，缓解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特别是这两个国家所谋求的新安全模式，也已经在“大陆心脏地带”构成和发展了一种内聚式的国际格局布置。对此，有些学者认为，地缘政治的冲动可能促使新的陆权在近期形成。另一些学者则发出了从麦金德那里召回那些“小天使”的警告，他们认为，地缘政治学中海陆二分的逻辑并未完全失去市场。以苏联解体等历史事件为标志的地缘政治剧烈变动，很可能再现“大陆人”与“海洋人”之间的传统对抗。当然，地缘政治方面的角逐也掺杂进来其他的因素，与纯粹以自然因素为主的地理分布有所不同，地缘政治与经济、文明因素的地理分布又产生了新的互动关系。因此，虽然新的地缘政治中的对抗不可能完全重复“草原强盗”和“海洋强盗”之间冲突的脚本，但人们仍然关注着地缘政治二分现象对国家战略及其行为的现实影响。

---

① *Quest for Equilibrium: Americ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on Land and Sea*, p. 4.

从历史上看,地缘政治的对抗与获取国际间权力的问题紧密有关。按照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逻辑,国际间权力竞争的本质永远是冲突和对抗。地缘政治本身所具有的二分性质,体现在国际权力竞争方面便是陆权与海权之间的对抗,"大陆心脏地带"权力与"边缘地带"权力之间的对抗。由于地理因素是难于更改的,国际间的权力对抗甚至是很难避免的。这种涉及国际政治广泛领域的对抗,使那些从事对抗的国家认识到,国际政治中的对抗源于敌对的和不稳定的环境,国家的战略所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限定的地理范围内以最有效的方式追求、聚集和扩大权力。由此,国家诉诸追求、聚集和扩大权力的行为模式是一种典型的零和博弈:一方的权力所得便是另一方的权力所失,更具体地说,陆权的所得是海权的所失,海权的所得便是陆权的所失;"大陆心脏地带"权力的所得是"边缘地带"权力的所失,"边缘地带"权力的所得便是"大陆心脏地带"权力的所失。在这里很难找到双赢博弈或共赢博弈的形式及其结果,国家行为考虑的主要是自己与他人相比所可能得到的更多的收益(即"相对收益"),而不是自己与他人都能得到多少收益(即"绝对收益")。与此同时,地缘政治的对抗性质容易导致国际政治中的极权主义,即聚集更多的权力是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好保证,无论是占据海权的优势还是占据陆权的优势,无论是占据"心脏地带"的优势还是占据"边缘地带"的优势,都是谋求国家利益的基本手段,最好是同时拥有海上的霸权或陆上的霸权,或同时拥有"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霸权。这样,权力的对抗不免带有恶性循环的性质,而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给国际政治实践所带来的对抗性导向,使一些强国易于采取地缘政治上的极端做法,也使它们的国家行为带有追逐权力和实行霸权扩张的惯性。

不过,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所揭示的对抗性逻辑并不完全能够反映国际政治的全部内容,不论是就历史的纵向角度还是就某一时间段内的横向角度来说,都是如此。实际上,国际政治本来就一方面存在着对抗和冲突,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合作;一方面存在着战争,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和

平。也就是说,国际政治始终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内容,而不是一个方面的内容。如果仅只强调一个方面的内容,就片面地阉割了世界历史的真相,或至少是对世界历史采取了截取部分而推之到绝对化的做法(二分论就以截取部分地理剖面加强了这一点)。很明显的是,海洋和陆地以及"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被主张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人视为无法避免冲突和对抗的地理因素,而海陆关系以及"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关系更被他们视为一种永久性的对抗关系。但是,作为人类的居所和国家活动的基本场所,地球上海洋和陆地两个部分本来就都可以被利用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也都可以发挥服务于国际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功能。在很多的时候,海洋和陆地都会表现出地理上的融合性质,它们可以帮助和推动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相互间的共处和合作;海陆关系因而能够具有由这种融合性质所带来的和平特征。实际上,在海陆关系中,在国家间存在竞争和对抗的同时,它们相互的合作也是大量和频繁地存在的:不仅有海上范围与陆上范围经常进行的国际贸易,如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以及欧亚大陆桥,而且海陆之间的和平贸易更是国际间经济关系的常态。这种常态促使国家间进行合作和建立有关合作的国际制度,甚至是必然的。除了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域的情况之外,即使在军事和安全领域也存在着海陆关系中的大量合作现象。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洋型国家的英国与大陆型国家的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洋型国家的美国、英国与大陆型国家的苏联,相互间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都存在着战略合作甚至结盟的关系。"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在历史上所显示出来的合作情形同样如此。因此,仅仅把对抗视为地缘政治学的主题或地缘政治中的"普遍现象",是对地缘政治发展历史的扭曲,也抹杀了它应有的主题。

应该说,在历史上的多数时间里,海陆之间的对抗与合作所存在的实际上是一种相互交替的关系,而不是彼此绝对替代和简单排斥的关系;二者之间所表现出的因而是一种历史性的双向互动过程。也就是

说,在某些时候海权与陆权之间很难避免对抗,而在另一些时候海权与陆权之间也可能被驱使走向合作。如19世纪英国和俄国就在欧亚大陆的中亚地区进行了十分激烈的地缘政治角逐,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们却团结一致反对德国,虽然这种合作过程也有一些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陆权国家德国与海权国家日本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另一些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而后面这些国家完全超越了所谓海陆关系中的对抗因素进行了成功的合作。又如上面提到的美国和苏联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两个国家共同组建了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进行了卓越的战略合作,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但在冷战时期它们却从事着地缘政治上的尖锐对抗。这以反例(从反面)说明了海陆关系中对抗与合作的交替性质和过程(实际上,这种对抗尽管与地缘政治密切相关,但两极均势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也是其主要原因,以核武器为主的军备竞赛是另外一个主要原因。特别是后者使过去那种"草原强盗"和"海洋强盗"之间的对抗变成了两个武装到牙齿的核巨人之间的对抗)。至于说到地理上彼此邻近而地理素质不甚相同的法国和英国(英国是典型的海岛型国家,而法国是大陆型国家,虽然它也具备海陆两种素质),在历史上它们之间的对抗与合作也是常常处于交替状态的,在战后以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以合作为主调。战后德国与美国在北约组织中的联盟关系大致也属于同样的情况,人们无法再用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的对抗,或海陆关系的对峙来解释这种关系。从此可以看到,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之所以能够进行战略上的合作,是因为它们存在着共同的战略需要,而这完全可能超越地缘政治上二分的限制。总之,循着地缘政治的发展线索,可以看到,因受地理因素的制约,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存在着对抗的潜在的或者说诱发性的原因,但相互间的合作也经常出现,只要具备战略上合作的条件或潜力,它们走向合作还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因此,历史的总体景观是,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之间的对抗与合作是彼此交替的复杂现象,二者之间的绝对对抗并不见得是地缘政治的

常态。其中,到底是对抗为主还是合作为主,是一种复杂的国际政治互动过程,取决于多方面的条件和经常变化的因素。

更深入地讲,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所揭示的对抗性逻辑并不完全能够反映国际政治的全部性质,因为该逻辑意味着国家间的互动是按照零和博弈的规则来进行的,而实际上这种互动也常常是能够按照双赢或共赢博弈的规则来进行的。国际合作的存在就说明国家间关系具有双赢或共赢的性质。从历史上看,冲突与合作、对抗与和平都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也都反映了国际政治的本质,不能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所揭示的对抗性逻辑很难从历时性角度(历史)涵盖国际政治的本质和特征,也很难从共时性(空间)角度涵盖它们。把一部国际政治的历史说成是海权与陆权、"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永恒对抗的历史,是对国际政治本质的一种粗暴的解释;把横向的地理空间因素当成国家间冲突和对抗的客观基础,同样是对国际政治本质的一种简单化的歪曲。因此,准确地把握国际政治的本质,应该看到国家间在发生冲突和对抗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彼此合作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而且,随着国际政治的深入发展,冲突正在走向合作,对抗正在走向缓和与和平;合作与和平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趋势,也成为国家间互动的本质特征。在当代国际政治中,即使是那些在地缘政治中带有二分特征的权力因素也已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性质和特点,陆权和海权的概念已并不完全再带有谋求霸权和对外扩张的天性,"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也已并不会完全重复包围和反包围的对抗逻辑。虽然它们很难脱去自身的地理外壳,并且在表明国际政治的地理空间区分和间隔分布方面这些"地理外壳"仍然具有显见的价值,但在内容上,它们已经融进许多的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和文化等因素,不再以军事安全因素为主。基于此,我们所说的和平、合作与发展是国际政治的主题和本质,应该更多地反映在地缘政治学的理论中;换言之,从对抗性思维转向融合性思维是地缘政治学的必然走向。

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自己面临的地理环境有了新的认识。这种新的认识,是一种以地球为家和善待地理环境的思想。而这在国际政治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就是国家树立了要与自己面临的地理环境善处,要与其他国家共存的融合性思维。这样,过去那种以人性恶为假定的地缘政治学思维需要修正,虽然人性中总难排除恶的一面,国家之间也总会有提防的一面,然而地缘政治学理论完全可以把和谐共处的融合性思维、而不是对抗性思维作为新的主题。我们看到,即使是地缘政治学中的理性主义也强调,二分论所谓的"现实政治"公式是可以被推翻的,因为合理地构建地缘政治关系有助于和平局面的营造。基于这样的认识,地缘政治学在道义和现实层面都不应该仅仅是为侵略扩张政策张目的工具,在内容上它并不都是"生存空间"的邪说和国际政治的厚黑学,它也有为人和国家所利用的"为善之道",即它可以变成一种国际社会和平与合作的理论。这已经成为今天理解地缘政治学时的一个新的价值判断。确实,由于地缘政治学观念的变化,由于其他多种因素的渗透,地缘政治本身出现了软化的逻辑和柔性的特征。特别是,决定论思维导向的削弱,直接导致地缘政治学中对抗与冲突的两极性原理的退位,和谐共处与相互融合的逻辑正在逐步占据了市场。换言之,地缘政治学中的对抗性思维开始被融合性的思维所取代,从而具有了某种人文主义的导向。帕克新近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地缘政治学的景观已经因其多样性和精妙而显得温和并具有人道的和人性化的特点,这与意识形态对抗时期的严酷和单调乏味形成鲜明的对比①。应该说,传统地缘政治要素的整合已经面临着新的必要条件,一直发展着的地缘政治学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理论角度以适应国际政治现实的巨大变化。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新时代,以融合性思维代替对抗性思维将使地缘政治学迎来其新的发展阶段。

---

① 《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80页。

第九章 总结：现实层面的超越

除了在理论思维层面辨识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弊端和局限性外，我们还应从现实层面揭示和评估它的弊端和局限性。因为国际政治的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仅仅按照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逻辑很难理解和分析我们所面对的情况。从现实层面超越地缘政治学二分论，需要看到以下至少两种因素的变化。

第一节 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新变化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地球上的探索活动几乎基本完结。地理学家约翰斯顿（R. J. Johnston）说过，尽管麦金德在1899年感到因他是登上肯尼亚山的第一人而应当将此事确认为他作为地理学家的一项荣誉；然而，人类在整体地了解到世界的

地理空间后,探险的重要性减弱了①。应该说,约翰斯顿所谈到的这个事实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类所认知的地理空间得以迅速扩大,二是与此同时世界的距离空间骤然缩小,人类的活动领域已经遍及陆地、海洋、内层空间乃至外层空间。现在,航空和航天技术的进步可以使人的活动逾越一切地理障碍,在历史上曾经起至关重要作用的陆地和海洋等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地理屏障价值,国家战略的边疆已经超越疆域的限制而大大扩展;例如,国家活动的空间,包括战争的空间,已经从三维空间向四维空间拓展。在这样的情况下,马汉对控制进出狭窄的海洋通道来施展海军力量的论述,麦金德对依靠发达的铁路网有效控制"心脏地带"的论述,在导弹和远程飞机足以打击远方目标的条件下均已经变得过时。摩根索曾经指出,现代战争技术对美国的地理位置意味着什么?制导导弹和超音速飞机对美国与其他大陆隔绝的地理位置有何作用?在何种程度上美国将失去,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它将保住传统上不受海外进攻的地利?同样的技术发展对苏联领土上的地理位置意味着什么?这些因素在何种程度上降低了宽广的俄国平原的防护功能?在这种情况下,自英国有史以来保卫着英吉利海峡的作用又将如何呢?他还说,现代战争技术已使海军丧失了无可争议的制海权。空军的出现不仅宣告了英伦三岛坚不可摧的历史的结束,而且把人口和工业集中在紧邻欧洲大陆的一块相对狭小的土地上这一有利条件变成了不利条件②。

确实,地缘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在过去是难以克服的,但在今天却是能够超越的。在技术条件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在横向可以扩展到全球,几乎可以覆盖地球的每个角落。特别是随着核武器系统的整个发展,其中的爆炸系统与投射系统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投射系统渐占上风,从而使核威慑的能力超出了空间距离的限

① 《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80页。

② 参见《国家间政治》,第204页,第426页。

制。由此,必然对地缘政治产生重要影响。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说过,“弹道导弹的出现使苏联向西欧目标发射导弹只需6至7分钟的飞行时间,向美国加利福尼亚或得克萨斯州发射导弹只需30至35分钟的飞行时间,两者之间已不存在重大差距。”“再大的海洋,再高的山脉都无法阻挡导弹的弹道,各国无论地理位置多么独立,都同样难逃被摧毁的命运。”①可以说,核武器的投掷效果和运载工具的投射能力使地缘政治的时空骤然缩小,空间距离和地理障碍都不在话下。而且,今天衡量空间大小、距离远近的地理标准也与过去迥然不同。“在这个新的世界上,主要用于军事目的的开发空间和占领空间的技术必将改变各种问题的轻重缓急次序和衡量实力的标准。”②这意味着,对拥有先进技术的强国和技术落后的国家来说,都需要应对地缘政治的新特点。落后的国家姑且不用多说,如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在美国远程打击和精确制导武器系统的攻击下,甚至到了“丧权辱国”的悲惨境地。而对目前拥有最强大的技术条件和经济实力的美国来说,它可以凭借经济、科技优势巩固并扩大在全球的影响力,并可超时空地推进地缘政治的改组。在出现对美国的现实威胁时,它还可以不受时空阻碍去消除这种威胁。例如,“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就袭击了远在千里之外的阿富汗山区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但是,美国自身也面临着在新技术条件下地缘政治因素变化所带来的新的重大问题,在过去地理上的得天独厚曾经使美国免受攻击,但今天恐怖组织可以凭借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突破地域限制对其本土发动直接的攻击,打一场不计代价的不对称战争。因地缘政治的瓶颈被打破之故,美国即使在战争中可以取胜,但胜利决不是廉价的。特别是,对于美国来说,现代技术的扩散,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已经对它形成了非对称的、也是超越时空的威胁。这也是美国自

① 〔美〕基辛格编:《国家战略问题》,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2页。
② 《空间战争》,序第1页。

己把反恐和保卫本土安全作为头号任务的重要原因①。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仅仅依靠地缘政治学二分论认识国家的实际处境和国际政治的现实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大大忽视了技术进步和发展所带来的许多变化。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严重缺陷在于,它几乎不能预测和估计技术所带来的变革速度及其结果,特别是这种变化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帕克指出,地缘政治学应该考虑包括飞机、火箭、卫星与核武器在内的新技术对地理形态的影响。在今天的核时代,虽然地缘政治学思想试图与未来最现代化的、最尖端的和最致命的技术结合,但并没有摆脱过去的思想倾向②。因此,超越地缘政治学二分论需要考虑到技术条件的变化所带来的结果。这就在于:

第一,技术的发展已经导致了海陆关系的重要变化,二者的相互关系变得更加相互依赖和一体化。虽然海陆两种地理形态都是许多国家,包括那些大国摆脱不了的地理因素,但是随着技术条件的发展变化,过去那些足以分离和隔绝海陆两种地理因素的自然和技术障碍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被克服和逾越,海陆空间因技术条件提供的便利具有了相当大的通达性,也就是变成了可以被打通的或被贯通起来的地理空间。因此,孤立地看待并且利用其中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显然是有着重大偏颇的,会使国家遭到被动挨打和最终失败的命运。早期法国的衰落是因为它从未准确地认识过自己所需要解决的海陆关系问题。当代英国的衰落在于面临新的海陆关系时,它没有适应这一变化而改变自己的现实选择。现在,受到技术进步的刺激,美国在提出自己面向 21 世纪的陆军建设目标时,要求建立所谓的"战略陆军"或"全球陆军"③。其目的就是通过全球作战的部署加强在海外的威慑效果,提高全球战略的机动

① 道兹指出,核扩散自 1945 年以来已经从有限的国家扩大到世界的主要地理上的"地区"。见 Klaus Dodds, *Geopolitics in A Changing World*, Prentice Hall, 2000, p. 97.

②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中文本序,第 2 页。

③ 张立栋:《21 世纪陆军》,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4 页。

性和打击能力。这种能力能够使海空的短暂优势转化为永久性的优势。同时，美国等大国还十分重视在海洋范围采取行动的能力和效果。实际上，许多国家都认识到，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武器技术含量的增加，昔日难以逾越的陆地上的地形障碍（如高山、沙漠和大河等），现在完全可从空中机动而迅速地跳过。与此同时，海洋地理环境和海上交通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海洋地理对军事行动的限制同样在减弱。海上力量的机动性不仅取决于在近海行动的能力，而且取决于在远洋行动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海陆关系所表明的不再是静止的地理位置的概念，而是一种流动的大空间的概念。在技术发展的促使下，二者已经成为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在这种统一体中，陆地和海洋以及二者的关系主要受到了技术发展的严重影响。

另外，虽然说地缘政治海陆二分的基本性质并没有完全过时，但在新的技术条件下，陆地地理范围和海洋地理范围在空间意义上发生了一次极大的扩张，它甚至导致了地缘政治格局版图的变化。研究国际格局的学者把这说成是一种结构性或体制性的变革，强调在战后的国际政治中，陆地的地缘政治范围的扩张十分明显，传统的民族国家已被大陆规模的国家所取代，这不仅仅是由国家领土结构的变更造成的，而且是由现代科技和军事力量的超时空超规模发展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条件的变化导致的。美苏两极体制被认为是由大陆规模的超级大国主宰的全球体制的第一阶段。今后，其他超级大国如中国、统一的欧洲、巴西和印度将有可能崛起，最终要与美国和俄罗斯平分秋色。由此，地缘政治的组合已经改变传统的模式，更大的组合模式已经在技术条件的装备下成为可能。特别是，由于美国、苏联（俄罗斯）以及中国这些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最主要角色，其本身的领土面积是大陆型的，它们可以充分利用技术进步带来的方便，进行跨越洲际的地缘政治活动。而与此同时，海洋的地理范围也在扩张。现在，不仅海洋技术和海军力量的发展导致了大国可以在更大的海洋地理范围采取行动，而且这种活动还能够深入到远洋

区域和海底世界。无论是陆地地理范围的扩张还是海洋地理范围的扩张,都意味着它们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扩大,而且可以集中更多的技术和资源,并把这些变成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因此,在现代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代,国际体系在地缘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扩张。正因为如此,陆地和海洋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对立隔绝,而是在不断形成相互连接和交义的新的关系形态,也就是说技术的条件已经把它们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空间关系。对此,我们可以说海陆关系的空间特征已经是一体化的了。因此,应该从海陆二分的关系把握转到海陆一体化的把握上,这就需要超越地缘政治学在海陆二分方面的固执观点。

第二,如果说在20世纪初航海技术的发展曾经使交通手段发生过重大变化,给海陆关系投入了新的因素,那么在今天航空和航天技术的使用价值骤然上升时,海陆关系的互动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也使对这对关系的处理进入了更复杂更微妙的历史时期。国内有学者认为,在历史上,由于技术的限制,军事斗争曾经长期被局限在地球的表面。但在1903年,世界上第一架飞机试验成功,人类进入了航空时代,使军事斗争由平面走向立体[①]。斯皮克曼则更早就针对技术条件变化所导致的欧亚大陆的海陆立体化特征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地缘政治区域,比欧亚沿海地区更受空中势力发展的影响。没有空中势力,海上势力就不再有效了[②]。而且,不仅如此,当今的地缘政治立体化特征还体现在,除了核武器、导弹和反导弹系统的出现,各种有军事用途的航天器和攻击卫星把外层空间的斗争和较量带进了国际政治的领域,外层空间有可能继海陆空战场后成为一个新的交战场所。应该说,战争的立体化特征甚至将外层空间变成了一个更重要的并具有决胜性质的战场。因此,当今时代的技术条件所带来的时空变化,已经使地缘政治的领域和范围大大超

① 王文荣主编:《战略学》,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323页。
② 《和平地理学》,第100页。

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地面空间限制;如果还以传统的平面的海陆关系考虑战略问题,必然置自己于无法施展战略意图和实力的被动境地。正因为技术条件的变化,出现了带有全面性质的新军事变革,国家战略的时间和空间概念被融合进许多革命性的内容,许多国家都开始提出新的战略思想,例如"海陆空一体化"和合成作战等新的战略思想。这意味着,在海陆一体化的基础上,还需要树立海陆空一体化的观念,从而超越海陆二分的传统观点。

第三,不仅如此,针对技术迅猛发展的事实,战略学家提出现在国家的战略空间(包括战争空间)还有可能已经突破"海陆空"所展现的有形物质空间,而进入无形的非物质空间。例如,有关"陆海空天电一体化"的战略思想就是以"五维空间"为基础提出的新型战略思想。它很难再以三维空间的概念和尺度来加以衡量,因而大大突破了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所限制的地理空间。在"陆海空天电"中的"陆"是指陆地空间,"海"是指海洋空间,"空"是指陆地与海洋的上空,"天"是指外层空间,这些都是物质性的有形空间。而"电"是指什么样的空间则很难以前者来加以衡量,因为它是一种非物质性的无形空间,或者说是"信息空间",人们很难确定它的有效存在形态。但是,它又无处不在,作用非凡。比海陆空力量更强大和有效的是,以军用微电子技术、军用光电子技术、军用计算机技术和精确制导技术组合起来的军事高技术和高技术武器系统,不仅可以被用来独立地发展一些装备,用于侦察、遥感、导航、通信等,而且可作为制导、火控、信息处理等的基础。由其所实施的强大的电子战可使敌方雷达致盲、通信中断、指挥失灵、武器失效,甚至整个战争机器瘫痪。因此,其打击的目标和重点从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转变为以摧毁敌人的高技术武器装备、瘫痪其指挥系统为主要目标①。在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它所发挥的威力,特别是对战

① 参见吴秀鄰:《高技术战争与国防现代化》,国防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144页。

争结局的致命性影响。因此,在许多大国的战略思想中现在已经出现了"陆海空天电一体化"的概念,也出现了"信息战争"的概念,这些概念旨在有效把握国家战略和战争空间中的非物质无形空间。这就需要对地缘政治学二分论进行更大程度上的超越。

当然,一方面必须对地缘政治学二分论采取超越的态度,另一方面并不能由此信服"地缘政治学过时"的论点,因为一些基本地理因素的作用并没有完全消失,地缘政治作为影响国家行为的重要条件也并没有完全丧失其价值。例如,虽然技术有了飞快的发展,特别是核武器、弹道导弹与卫星技术成为大国足资利用的优势条件,但核武器和导弹的发射仍需要陆上基地和航空母舰的支持,而陆上基地的配置和航空母舰的调遣依然受制于地缘政治的各种条件。其实,各国在战略上仍然重视地缘政治,仍然会全盘考虑地理因素,包括海陆分布以及战略纵深等问题。正如斯皮克曼所说的,虽然技术条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特别是不能怀疑或否认空中势力的重要性,但必须"从地理角度来仔细研究其重要性的实际意义"。大陆与海洋,"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的地理差异从来就具有、而且将来仍具有彼此很不相同的现实意义。吉尔平也认为,现代通讯与现代技术极大地降低了空间的意义,可是"实力受损程度"理论并没有失去它在当代世界的说服力和现实意义。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洲际弹道导弹主宰的世界,但是,地理位置和距离仍然是对国际关系有重大意义的要素[①]。就此而言,地缘政治在战略上的作用只是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而不是单纯地减弱自身存在的价值。虽然国家凭借技术条件可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地理因素的限制,即它们利用和改变地理环境的能力也在增强,但国家行为仍不可能完全摆脱地理上的限制。因此,只要人类最基本、最频繁的经济活动乃至政治军事活动仍然离不开地球表面的陆地与海洋,马汉和麦金德所提出的关于地缘政治的一些根本准则与基本划分方法就仍有一定参考价值。总之,需要根据已

① 《和平地理学》,第 33 页;《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 59 页。

经大大变化并日趋复杂的现实条件，通过超越二分论去建构更高层次的地缘政治学理论框架，并在新的历史时期推动“海权论”、“陆权论”和“空权论”的更新和发展，并对“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重要性有新的认识。

具体来讲，我们可以分别从对海权、陆权和空权的理论进化上来加以说明。在当代各种因素和条件下，对于海权和陆权的理解，已与过去不同。新的海权时代的到来，一方面是因为整个海洋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海上交通和航运技术发达的缘故。随着陆地生态环境的恶化，既有资源的枯竭和人口的膨胀，海洋资源将成为各国日益重视并激烈争夺的宝库。在当前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中，石油和天然气的使用占了63.3%，各国经济的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仍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消费。例如，中国曾是石油出口国，而现在因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逆转为每日进口石油80万桶的石油进口国。可以说，海洋中的能源和资源是提高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主要源泉，从而成为获取国际政治权力和地位的关键。同时，从全球范围看，海洋领域有许多战略要地，重要的海上通道、海峡、运河和重要的岛屿、群岛，仍然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大约有200多个重要的战略地区，包括政治重镇和重要的军事基地和海港，都处于海洋与大陆之间的“边缘地带”①。尤其是，海上交通和航运技术的发达，使海洋变成当今国际贸易最主要的运输途径和场所，海上交通线仍然是工业发达国家的生命线。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海洋的重要性和海权的战略价值由此上升，控制海权是占据关键的战略位置进而发挥世界影响力的所在。只有那些具备海上航运技术和海上军事技术优势的大国才能在海洋领域展示这种力量和威望，才能在拥有海权方面占有先机。因此，这也是戈尔什科夫的海权论不同于马汉的海权论的时代背景；这种时代背景说明海洋的战略地位在未来只会加强而不会减弱，而技术条件是彰显国家海权地位的必备手段。新的海权论必须结合

① 朱育莲等：《世界重要战略地区图说》，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技术因素对此作出反应,着重说明如何来维护和发展国家的海洋权益和如何具备采取行动的能力。

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陆权的重要性并未降低,相反它以新的空间结构和形态特征影响着现实的国际政治。布热津斯基在先后几部著作中对欧亚大陆的战略天赋和潜力作了不断的而且极其充分的讨论,其原因就在于认识到以陆权为背景的地缘政治空间结构和形态已经发生变化;亨廷顿则从文明分布的角度加强了对这方面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的讨论。在今天,拥有陆权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获取更多的领土和掠夺更多的人口,而是主要看能否利用技术条件来控制战略性要地,能否扩大本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使之超过本国范围。这是大大不同于麦金德时代陆权论的基本背景。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谈到需要新版的“陆权论”时,常常提到欧亚大陆上的地缘政治变化,“心脏地带”因苏联解体、能源问题重要性的突出和北约东扩等因素变得更为重要,也因中亚地区已分裂为五国和受伊斯兰教世界化的影响而引人注目。这些事实都使得“心脏地带”成为大国竞争的棋盘。目前,俄罗斯已经衰落,无力扩大影响(但俄罗斯的陆权并未削弱);欧日距中亚十分遥远,鞭长莫及;中国与中亚相邻,但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又受制于其他大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陆权的重要,已经更多地体现在中亚问题和西亚问题上面,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以东欧为首要的着眼点。同时,就陆权大国的地位而言,欧亚大陆上的主要陆上力量已经变成了中国和俄罗斯,而不再是俄国和德国;中俄的战略性组合(或者结盟或者形成某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或者分裂对抗)是关乎整个欧亚大陆上陆权整合的关键,也是关乎整个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全局的关键。但是,由于受到技术因素的影响,中俄都无法像美国那样能够发挥有效作用;美国在技术与政治的互动上是颇为得手的。这些都需要结合新的技术条件以新的陆权论加以解释。

进入导弹和核武器时代,空权的概念大大地不同于杜黑和德塞尔斯基时代的概念,新时代更需要“导弹型空权理论”,空权的重要性在于它

的综合性。导弹和核武器的发展，反导弹防御系统成为“最具革命性的项目”[①]，都使地缘政治因受到技术发展的影响而呈现出立体感更强的特征。由于受到技术因素的影响最大，空权已经处于被极大地改变了的地面和天空之间的关系，也极大地改变了的防御与进攻的关系之中。空间距离和技术因素更多地结合在一起，影响着国家的行动能力，具备强大的空权将成为最能显示国家力量的主要领域。但是，由于各国、尤其是大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仍然存在差距，所以空权领域有可能成为垄断性很强的领域。特别是在 C_3I 系统（Communication, Command, Control and Information System，即通讯、指挥、控制和信息系统）[②]和 GIS 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即地理信息系统）[③]的发展下，空权更使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成为一种特殊的力量，成为控制国际秩序规则的权力要素[④]。当然，还应该指出的是，现在是海权、陆权和空权高度结合的时代，只有充分把握这三方面的国际权力和国际影响力，才能在国际政治中占有优势的地位，发挥更大的作用[⑤]。因此，空权的重要性已经在于它的综合性，地缘政治学理论需要根据这种综合性来进行构建。

经历几十年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特别是到了后冷战时期，海权与陆权、“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的争夺不再仅仅限于军事安全方面，而是扩展到经济、能源、文明、民族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在技术

---

① 《空间战争》，第 2 页。

② Peter J. Hugill, *Global Communications since 1844: Geopolitics and Technolog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39.

③ Tor Bernhardse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9.

④ John Rennie Short, *New World, New Geographies: Space, Place, and Societ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93.

⑤ 不过，需要指出的有两点，一是针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那样典型的掌握制空权的成功例子，至今尚未有像样的理论总结，从而去发展新型空权理论。二是与在导弹时代的到来时并未出现新型空权理论形成反差的是，出现了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以地面上的海陆二分为论述线索的新型二分理论，证明以地面为基础的海权和陆权仍然是国际权力的主要来源。

发展可以提供更有效的行动能力的情况下,这种争夺实际上是一种地缘政治上的全面竞争。例如,过去美国很难深入到欧亚大陆,但现在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拥有无人能够比拟的技术优势和与之配合的军事力量,这使得它现在能够直接进入欧亚大陆的腹地,甚至可以在"心脏地带"的部分地区采取行动或控制其中的某些关键部位。美国在"9·11"事件发生后对阿富汗所采取的军事打击行动,再次充分而有力地证明,美国进入中亚地区已使它在欧亚大陆占据了甚至比俄罗斯还强大的地位,并将可能产生政治、地缘、经济和军事多方面的综合效应。可以说,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战略目标是全方位的,其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但技术给它带来的便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地位已经受到技术条件的扩张性影响。

从马汉、麦金德关于海陆关系的论断,到斯皮克曼、豪斯浩弗对此的扩大性论述,再到布热津斯基对欧亚大陆软腹部(包括欧亚大陆的巴尔干问题)和亨廷顿对"文明断层线"的分析,可以看到"边缘地带"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一趋势伴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日益显露,因为海空力量可以被迅速而有效地运抵这个地区,导弹和远程作战飞机也可以掠过它的大部分。从理论的角度讲,"边缘地带"的提出本来是对海陆二分关系的深化,因为在这样的地带需要处理海陆之间的特殊关系,海陆关系在这里也交汇出一些特殊要害的地缘政治交集点。今天,"边缘地带"中特别是位居于海权和陆权交汇处的地方,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的要害之处,是各家必争之地。换言之,"边缘地带"的重要性会更加突出地体现在处理海陆关系方面。但是,由于核武器和导弹的发展,"边缘地带"已经成为从空中实施攻击的危险地带。该地区一些地区性大国不顾国际限制,着力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和核技术,便是对这一事态的针对性反应。因此,在欧亚大陆上,从中东、西亚、南亚到东南亚和中国,"边缘地带"的国际政治组合对欧亚大陆整体形势走向的影响至关重要。过去的苏联要从这里夺取海权,今天的美国要从这里夺取陆权,更多的国家和政

治势力则要在海权和陆权势力之间左右逢源。“边缘地带”重要性的突出，还在于这样三点：(1)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出现“黑洞”现象的同时，“边缘地带”及其外围则出现了军事政治同盟强化的事实，二者之间的反差极大，而“边缘地带”对“大陆心脏地带”形成很强的压迫之势，“边缘地带”对“大陆心脏地带”的威胁是前所未有的，“大陆心脏地带”对“边缘地带”的地缘政治反弹也可能是空前的。(2)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边缘地带”范围内出现了三条地缘冲突地带或三条危机弧带，它们是释放地缘政治能量的主要场所。这些危机弧带有人也称为“破碎地带”(shatter zone)，但实际上“破碎地带”有可能变成地缘政治的聚合地带，而不可能继续“破碎”下去。因为在中亚、西亚和南亚等地区地缘政治的组合正在继续进行，其结果可能是导致地缘政治新的结构出现[①]。(3)与上述情况相关，特别是考虑到该地带是地区性强国聚集的主要场所，是它们发挥强势作为的关键区域，因此地缘政治的某种“聚合”还是刚刚开始，并且要持续下去。而该地带的一些地区性大国发展核武器的事态是值得重视的所在，核技术的扩散将给它的地缘政治注入新的因素。

总之，地缘政治学虽然把重点放在地缘政治因素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上，但很难忽视技术条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国家是技术进步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它们利用自然环境和地缘政治的能力与技术进步的结果成正比例关系。国家在地缘政治中的活动既具有明显的限度，又有在技术条件进步的情况下把握地理空间和地缘政治的可能。受到历史背景的限制，“海权论”、“陆权论”和“心脏地带学说”、“边缘地带学说”等都强调了单一地理因素的终极作用和二分对立的现实，并把它们看成是支配国家行为的动力和缘由；这些论说虽然在地缘政治学中是根深蒂固的，但显然都是极为片面的做法，没有能够看到技术的发展会带来地缘政治条

① “破碎地带”的概念本是科恩所提出的，就其原义来讲指的是中东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后来指中东地区。应该说，在不少存有歧义的解释中，科恩的观点是正确的。

件的极大改观这一显著的历史事实。虽然国家在战略上倾向于挖掘和利用自己的地缘政治优势,并尽可能地回避和减弱可能的不利因素;但技术优势却已经超越地缘政治的时空,并可能实际地改变地缘政治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从而使国家必须把技术因素的作用放到战略的高度上加以考虑。特别是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那些长期被认为是优势的因素可能变成不利的因素,而相反那些劣势的因素也可能变成可资利用的优势因素。对于技术进步给地缘政治带来的诸多变化,国家战略必须作出适当的反应。因此,从技术发展变化的角度看,那种以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看待问题的观点和方法是过时的,也是必须要进行超越的。

第二节　全球化的时空超越

地缘政治学发源于欧美国家,明显地具有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有限地域色彩;加之二分论常常以某一类地理因素或某一限定区域作为论述的基础,它还被进一步加剧了有限时空的范围特征。这些均意味着它只能是一种时空概念具有狭隘性的理论,很难说明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现实。例如,马汉海权论和麦金德陆权论在分析英国海上霸主地位和"大陆心脏地带"的重要性时,他们所认知的世界仅仅限于较小的、特定的地理时空。当时,人们对欧洲之外的地区充满了神秘和恐惧的心理,因为实际上未知的地理世界仍是很大的。这也使过去那些地缘政治学家所得出的理论观点十分狭隘。哈特向曾经指出,麦金德的"枢纽图"虽然是地理学对人类有关自身的政治世界观念所作出的最著名贡献,但当它被曲解为"普天之下的大陆腹地"这一宿命论说教的时候,它因所认知的地理空间过于有限而带有很大的局限性①。斯皮克曼比马汉和麦金德视野更为宽广,因为他把北美大陆始终考虑到自己的理论中;但是他的视野仍然仅仅限于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两块主要的陆地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 127 页。

(特别是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没有意识到拉丁美洲大陆的存在,也没有对非洲大陆过多的观照,更没能够从全球化的时空观念和相互依存的角度考虑地缘政治的各种问题。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无法指望旧时代的地缘政治学家解释当今时代的地缘政治现实。

毫无疑问,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很难反映国际政治的全部现实,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显露出其明显的局限性。随着技术和社会条件的发展,无休止地发现和扩张边疆的时代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已告封闭而完全开放的全球系统。相对于马汉、麦金德那样地理时空有限的时代,现在是整体的世界地理体系,或者说是进入了“地理的全球化时代”。基于此,地理学家的共同看法,是世界已经完全作为一个地理空间的整体而存在。由于这种整体性带来了国际政治的相互依赖特性,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已经是一个紧密联系的实体,那些在过去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今天可能对国际政治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由此,地缘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以全球化的时空超越作为基础。

我们可以从地理和国际政治两个方面加以认识。就地理方面而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世界以整体空间的面貌首次出现在人类面前,世界业已成为一个星罗棋布的棋盘,而且这是行将收盘的世界。因此,地球的面貌“已经从推测的混乱状态变成科学的完整体系”①,人们可以以整体论的空间模式解释这个地理和历史交织在一起的世界。从这个角度讲,“历史变成了地理”②,时间因素与空间因素已经在全球意义上聚合在了一起。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讲,地缘政治学应该重新思考国家与地理环境的相关位置的中心论题,应该从整体地理空间的角度重新思考地缘政治中的各种关系。质言之,由于全球化改变了地理时空,地缘政治学需要适应其所带来的变化,特别是时空条件的变化,来重塑自己的理论要素;正如地图被反复绘制一样,需要把重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0页。
② 同上书,第37页

要的技术和地理因素结合起来完成对地理和空间关系的新构想，以新的世界观来观察地缘政治。例如，即使对世界上各个大陆之间和各个海洋之间的关系也需要从世界整体的角度来加以认识，而对海洋与大陆之间的关系更需要这样的认识。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才真正不是平面的，而是球面的。它的地理含义意味着，各个大陆之间、各个海洋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海洋与大陆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是与世界整体相联系的。这样的认识会对在更大的范围内深化考虑海陆关系和地空关系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对东西半球关系的认识也是如此。斯皮克曼早就指出，有必要在地理上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整体，因为现在不仅由海上，而且也由空中把它统一起来了。我们对西半球地位的重视，已使我们歪曲了东半球事物的真相，因为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而把欧亚大陆分为欧洲和远东两个区域，来估量它们的力量对我们的关系。但是，“要想研究东半球各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首先必须重视这一事实：那就是整个地球表面现在已成为政治势力活动的单一场所。从地理上讲，世界全部已了如指掌，而一个区域内势力的布局发生变化，就一定会影响其他区域内势力的配合。海上势力的发展使西欧国家的政治势力伸展到了最遥远的大陆的沿岸。一个大陆上的实力情况必然也反映在另一大陆上的实力分布中，不论哪一国的外交政策，都会受到发生在世界所有地区的事故的影响。”①斯皮克曼尚且还能有这样的认识，今天我们更应该看到，所谓全球化首先是地理空间上的全球化，而地理空间上的扩张要求必须采取整体性的空间模式来认识这个世界。因此，必须超越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在地理空间上的狭窄视野和缺乏扩张力的分析方法。

就国际政治方面而言，世界在地理上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因而也就成为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这就需要以全球化的视野看待地缘政治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注重政治和社会因素的作用及其变化。克劳斯·道兹

① 《和平地理学》，第64—65页。

指出,地缘政治应该认识到,世界政治要求对诸如“国际的”和“世界的”术语有一个根本的重新考虑。“国际的”是国家间的,“世界的”关心人类在世界范围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①]。如果说传统时代的狭义地缘政治学将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单位进行研究,那么全球化时代的广义地缘政治学则从整体空间的角度研究全部政治行为。因为只有这样的研究才会使人们把大部分注意力从孤立的国家行为转到相互依赖的关系上来。全球化时空的超越意味着,人类活动的空间范围不仅得到扩大,国家间的相互交往不仅在规模上得以扩张,而且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具有了更强的“密度”。因此,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上已经出现了国家间关系的相互依赖特征。现在,所谓地缘政治上经常呈现的对立壁垒,已经被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所取代。经济全球化已经把全球范围内的各种经济要素紧密组合起来,国家和地区间的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十分频繁,相互间的影响也是经常性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发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动会对另一个国家或地区产生连带的后果,谁也无法摆脱这种后果。这一点由于地理上的全球化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剧。虽然自然疆界是国家的生存空间、地理限制和法定区域,但全球化代表着一种放大和流动的时空,它跨越了国家的自然疆界,突破了国家管辖权的边界划分。因此,全球化包含着两个方面的事实:在地理方面,国家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它们更是相互依赖的。而且,两个方面的相互依赖存在着结构性的嵌入关系。对于地缘政治学来说,正如考克斯(Michael Cox)所认为的,它更应该关注社会内部相关位置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变得重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现在人类生存的最重要的事实,是社会的空间差异,而不再是自然界的空间差异。正是不同地方的人群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创造了人类占居地球表面的种种模式[②]。应该说,地理全球化已经在国际政治上产

① Klaus Dodds, *Geopolitics in A Changing World*, p. 7.

② 《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第 127 页。

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它所带来的重要结果,就是形成了国际政治的全球体系,形成了国际政治中的相互依赖关系。由此,对地缘政治中的各种关系,包括海陆空关系,都必须从全球体系和整体空间模式上来加以理解和认知。而且,地缘政治中的各种关系,包括海陆空关系都已经处在相互依赖的状态和过程,也必须从相互依赖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和认知。例如,海权、陆权和空权就已经在相互依赖关系中具有了融合的性质,三者的关系是立体化和一体化的关系。

另外一个主要的事实,是区域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出现的重新板块分布。现在,无论是欧洲地区还是亚太地区,抑或北美地区,都在整合自己内部的实力和资源,并加强着内部的合作。其结果,在全球范围出现了三个大的经济圈。就相互对比来说,它们对经济资源和实力的整合突破了国家的传统界限,已经在区域和洲际范围呈现出更加均匀的态势。应该说,全球化时代的区域化虽然是在特定地理空间范围所开展的一种国家间合作,但它所引起的变化是全球经济的空间结构出现了新的形态,它带有明显的区域性和洲际性,但正在向全球范围延伸;它带有明显的受到限制的地理性,但更多地表现出经济活动极强的动态性。同时,它对国际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就对军事和安全问题来讲尚且是有限的,但国际政治在整体上显然在经常地受到来自超越国家单位的范围,或者准确地说是扩大到全球范围的作用。特别是,虽然区域化是相互依赖的局部化表现,但作为到目前为止最为有效的作用方式,它给国际政治注入了更大意义上的和更大范围上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因素。在谈到空间布局、区域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关系时,安德烈·梅尼埃(Andre Meynier)认为,基本的地理结构并没有受到影响,但空间布局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当前发生的变化,基本上与现今世界的重新组合紧密相关。正是从这种形势分析出发,地理学家阐明了区域化的新形式对在全球范围建立有效空间布局安排的方法,以及可能采取的现实政策。区域化是全球化时代的空间形式的新表现,它突破了以国

家为单位思考问题的方式[1]。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地理比自然地理更为重要，由于区域化与全球化是相互联结的空间过程，它们从放大的经济空间中释放出来一股巨大的力量，影响着地缘政治的再度发展。其中，所带来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地缘经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或者说地缘经济先于地缘政治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地缘政治则需要适应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说，地缘经济的先期变化使地缘政治变得融合起来，其所反映的全球化的相互依赖性质，使得地缘政治的争夺不再像过去那样血腥残酷，尽管这种争夺仍然十分有力。质言之，虽然地缘政治仍然与国家的利害密切相关，但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了软化的逻辑。

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受到区域化、相互依赖和世界一体化的影响，国家更注重彼此间的合作以及与此有关的制度化安排，这就减少了国家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对抗性，也减少了国家在地理空间和地缘政治上的对抗性。由于国际格局是按照经济、政治和地理的要素组合来划分的，所以在国际秩序中，国家倾向于遵循国际制度和采取国际合作的方式来诉诸自己的行为，而不是按照过去那种地缘政治的规律以武力争夺领土和资源。同样，由于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均面临着所谓全球性的问题，如核武器、世界贫困、经济地区化以及资源和生态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单个国家无法解决的，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集体力量，才能避免出现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全球性问题的存在和为解决这些问题所采取的全球性制度安排，使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十分牢固的关系，国际合作因而带有毋庸置疑的必然性。其结果，人们在理论上越来越多地从综合的、多角度的视野来考察地缘政治的现象，并把地缘政治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虑，注重国家间的均势、国际制度和集体安全等对地缘政治安排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总之，全球化给超越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奠定了时代的基础，提供了新的历史空间的

---

① 〔法〕安德烈·梅尼埃：《法国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237 页。

背景。

综上所述,通过对地缘政治学从 19 世纪末开始,到整个 20 世纪及后冷战时期一百多年发展过程的考察,本书提出在地缘政治学基本理论中一直存在和延续着二分论的主脉,它既体现在海陆关系的二分上,又体现在"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二分上,还体现在地面权力体系与空中权力体系之间的二分上。在理论层面上,地缘政治要素可以从海权和陆权及其相互关系、"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及其相互关系,及至地面权力体系和空中权力体系及其相互关系等空间角度加以说明。在现实层面上,国际政治的发展演变受到了这种复杂的二分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各国的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也受到了这种复杂的二分关系的影响和制约,从而会体现出一定的地缘政治规律性运行的轨迹。因此,本书把二分论看做是传统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主旨和要害,也是我们探寻其对地缘政治某些规律性现象解释的入手处。

同时,对地缘政治学主流理论中的二分论应该采取超越和"扬弃"的态度。前面我们说过,对地缘政治学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所导致的决定论思维和对抗性思维必须予以否定,对其为某些大国的霸权政策和对外扩张政策的"服务功能"必须表明反对的态度。但是,对待地缘政治学,我们在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态度的同时,还需要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对地理因素与国际政治之间关系的论述主要是从本体论上进行的,同时也充分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正如马克思主义对待自己前人及其理论的科学态度一样,我们对待地缘政治学的主流理论应该是采取超越和"扬弃"的科学态度。所谓超越和"扬弃",就是吸收其合理成分,剔除其不合理成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这方面,马克思和列宁都给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概念、尤其是辩证法的概念进行过扬弃,从而创立了唯物辩证法。而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一文中,马克思对俄国由内陆国

家向外围寻找出海口的历史性努力作了几乎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精到分析，其论述比麦金德的"大陆心脏地带学说"更精彩、更透彻、更到位，甚至也可以说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版本的、批判意义上的"心脏地带学说"，而这恰恰是在超越和"扬弃"某些西方学者的地理论述基础上完成的[①]。列宁对霍布森(J. A. Hobson)的著作《帝国主义论》也进行过同样的"扬弃"，他曾针对自己撰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说过，"论帝国主义的一本英文著作，即约·阿·霍布森的那本著作，我还是利用了的，并且我认为已经给了它应有的注意。"[②]实际上，列宁自己著名的"帝国主义论"虽然借用了霍布森的某些概念，但他在更科学的意义上对之加以改造，就此，他在完成了对后者的"扬弃"工作后创立了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理论。马克思和列宁的科学做法，给我们的启示是，对地缘政治学的已有成果采取超越和"扬弃"的做法，既是正确的态度又是科学的方法，实际上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看待地缘政治学理论。这意味着，对地缘政治中的二分现象以及地缘政治学对此的理论反映，只有以超越和"扬弃"的态度和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才能进一步推动地缘政治学的发展。

根据超越和"扬弃"的辩证法意义，本书认为：地缘政治学基本理论中所涉及的几个重要人物的共同点是创立了地缘政治学中海权论和陆权论、"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的最主要的和最经典的概念和最基本的学派。在对待他们的最主要的和最经典的概念方面，我们反对在意识形态意义上使用海权、陆权、空权和"大陆心脏地带"、"边缘地带"等概念，而只是在国际政治意义上加以使用。因为如果按照前者，这些概念就会与霸权(即海上霸权和陆上霸权)概念同流合污。我们在后者的意义上使用，乃是希望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国际政治中的地缘因素，因为这些因素是我们在研究国际政治问题时回避不了的。同时，

① 参见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80—83 页。
②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序言。

对于他们的主要理论要结合国际政治的实际情形,进行重新的评估和整合式的研究。

因此,所谓超越和"扬弃"的做法实际上要求一种理论上的整合。就此,在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虽然按照地缘政治学的传统,长期以来就有人认为真正的地缘政治都是二分的;但实际上,在二分中还是出现了多元倾向,因为地缘政治的某些因素是二分的,但世界却是多元的。一方面,地缘政治的某些因素之所以是二分的,乃是因为其地理基础是地球上只存在海陆两种主要"载层",地面与天空的二分也是依托于地球地面所形成的空间。另一方面,地缘政治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受到经济、政治、社会、技术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它的发展变化也取决于后面这些因素的发展变化。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地缘政治中的多元成分越来越多。在现代意义上,地理环境的概念已不再囿于习惯上的自然地理环境,在空间范围和组成要素上,它已经"由过去单一的自然环境,拓展到人类的整个生存空间。今天,'地理'一词的意义可以理解为与人类活动有密切关系的、无机与有机自然界诸要素有规律结合的地理环境;是在空间上存在着地域差异的地理环境;是在人的作用下已经改变了的地理环境,即经济、文化、社会地理环境"①。因此,由于受到经济、政治、社会、技术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地缘政治中的二分与多元会有一种趋于平衡的关系,特别是多元因素会更多地融进地缘政治的结构之中,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一种复杂和多样化的地缘政治结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地理位置,只有在多元因素的作用下才可能转成地缘政治上的位置,从而具有地缘政治的特性。至此,可以简单归结的是,对地缘政治学所要进行的新的整合,应该是在二分论与多元论之间找到"必要的张力"和有效的结合形式。

20 世纪是地缘政治学主流理论全面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21 世

① 《战略地理论》,第 5 页。

纪则是它们结合新的地缘政治要素和条件进行“新的综合”的时期[1]。刚刚跨过21世纪的门槛，国际政治就已经呈现出更复杂、更丰富的特征，而在总体上国际体系又表露出了一种结构性变革和质变的趋势。理论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永远来源于实践，社会意识只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因此，对于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发展来讲，将有着更多的“新的综合”的具体内容。归结起来，我们认为：一方面地缘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将既会受到二分论主脉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它又会较多地融合进多元的要素，使传统的理论要素被赋予新的内容并具备新的张力。应该说，地缘政治学理论将会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扩张而得到更全面和崭新的发展，从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发展进入“新的综合”的时期，中国学者应该考虑和研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更主要的是考虑和研究中国自己的地缘政治问题。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上讲，中国地缘政治战略是中国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地缘政治学则应该自己的地缘政治战略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智力的支持。

① 所谓“新的综合”是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对学科发展的总趋势的一种新的提法，其意指一个学科的发展要融合其他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特别是进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的交叉与互动。

第十章 中国地缘政治：从地缘二分到地缘整合

本章是本书的"兼论"部分，之所以专门要写有两个理由，一是虽然本书主要研究地缘政治学理论中的二分论主脉，并不必然需要单辟章节来论述"中国与地缘政治二分"或"中国与地缘政治整合"这样的题目；但是，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应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并以自己的理论视角观照、借鉴和批判地缘政治学二分论。这是构建和发展中国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学术需要。二是在地缘政治的现实意义上，中国与二分论所论述到的那些世界大国一样，也具有地缘政治上的重要价值；特别是，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特征且"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跨越特征都十分突出的世界大国，研究和分析中国的地缘政治问题应该说与本书所揭示的研究主题十分吻合。在战略选择层面，中国自身需要高度重视本书所揭示的研究主题的重要性，以便更完整地认识自己在海陆关系和"心脏—

边缘”关系中所处的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从而更好地从地缘政治方面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

第一节 地缘政治学家眼中的中国

中国是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的重要大国,在地缘政治上这意味着,它具备陆权大国和“心脏地带”大国的天然素质,同时具备海权大国和“边缘地带”大国的基本条件。这种双重的重要性,历来受到地缘政治学家的高度重视。从马汉、麦金德到斯皮克曼、豪斯浩弗,一直到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等经典论述看,“中国”一词出现的频率逐步升高,其在地缘政治上的认知价值越来越显著。由于中国显然处于一个陆权和海权之间的枢纽位置,也显然横跨并连接着“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所以,无论从控制两种权力的角度,还是从结合两大地带的角度,中国都可以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这样的事实自然会激发地缘政治学家的想象力,使他们在自己的理论中都用了适当的篇幅来加以观照。

马汉承认自己对中国知道的相对较少,但他曾从控制海权的角度提出,中国的地理位置蕴涵着巨大的潜在力量,也使中国人这个种族有着非同寻常的忍耐力。在历史上,那些想征服中国或在此划分势力范围的西方列强都很难达到目的,因为中国的地缘政治特点使海陆强国都无法在中国内陆充分施展其军事力量。中国虽然在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中失败了,“但这并未改变这个事实:中国拥有最优秀的资源,有着众多的、在种族上是同一的人口。……可以肯定,中国的变化是相对缓慢的。但是,使相互间存在着多种不同和差异的中国人长期融为一体的因素将在未来确保他们为同一种激情所左右,从而会使任何全体意义上的变革都具有深远的影响。”[①]正是看到中国的这种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马汉曾经建议“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

① 《海权论》,第422页。

盘,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1]并强调应该把中国纳入海洋强国对海权的考虑之中。而在谈到俄国这样的陆权强国与海洋强国之间的竞争关系时,他指出处理它们在中国的关系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马汉的年代中国还正处于国力衰弱和内乱不已的年代,"幅员广大又处于动荡之中",因此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就像"层层外罩掩盖了轮廓的塑像"一样,其地缘政治地位有受制于人的地方,但是在中国的四周已经显现出"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的地缘政治构图。至于说到中国自己对陆权和海权可能存在的认识,马汉认为,历史上重视陆上侵略,证明中国经常感觉到现实中"近在咫尺的陆权比海权要可怕得多",而海上强国的力量比较遥远。但另一方面他又暗示,除了俄国,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竞争的国家基本上都以广泛意义上的海权为后盾,例如日俄战争意味着海上强国在与陆上强国的对抗中取得了主动,从而对中国产生了更大的威胁。应该说,马汉的某些论述对中国认识自己的海陆二分的地缘政治位置是有启示的,对于中国在考虑如何采取行动利用和改善这种位置时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讲,历史上中国对自己面对的海陆二分的地缘政治缺乏必要的认识,对如何处理这种关系也没有采取过有力的应对措施。在近代,中国遭受过陆上强国的入侵,而更多的外部入侵恰恰是从海上开始的。中国的衰败与它没有能够处理好海陆二分的关系不无关系。针对这一问题,马汉说过,考虑到陆地和海洋作为交通渠道的各自特点以及它们交汇之时的相互作用,对中国以及其他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来说,必须重视海洋在发展商业和军事上的重要性。例如,长江就具有将大海与其他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的作用。关于中国在地缘政治中地位的前景,马汉的结论性观点是,即使中国遭受多次的外部入侵,但它依然完好地保存着能让自己有朝一日变得强大的潜质,这部分地是由于它有着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只有通过有效地发挥这些

① 《海权论》,第258页。

潜质,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有力的世界力量①。

与马汉言及中国地缘政治的潜力时更多的是片断式的观点不同,麦金德曾用其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的最后一句话,预言了中国在"心脏地带"的重要分量:"最后,可以很明确地指出:某一新的力量代替俄国对这片内陆地区的控制,将不会降低这一枢纽位置的意义。例如,假如中国被日本组织起来去推翻俄罗斯帝国,并征服它的领土的话,那时就会因为他们将面临海洋的优越地位和把巨大的大陆资源加到一起——这是占有枢纽地区的俄国人现在还没有到手的有利条件,构成对世界自由威胁的黄祸。"②虽然这话有些危言耸听,并且缺乏对中国地缘政治独立性的认识,还使用了"黄祸"这种西方式的蔑称,但是这毕竟是一位地缘政治学大师在 20 世纪刚开始的时候看到了中国所具有的地缘政治潜力和能量;它还意味着一旦中国具备了地缘政治的独立性,中国的地缘政治潜力和能量还将超过麦金德的预言。实际上,依据麦金德的"大陆心脏地带学说",中国就处于该地带的重要位置上,因为"大陆心脏地带"包括了从中国到黑海、波罗的海这样的范围,涵盖东欧、中亚和西伯利亚等在内的广大地域,中国的部分领土本身就是"大陆心脏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由于中国所处的地缘位置与俄国不同,虽然它因部分国土的濒海特点而需要面对处理海洋和海权的问题,但它确实又具有影响海权和发挥海权作用的潜力,而这一点是俄国在完全被封闭于"大陆心脏"时所不具备的。

陆权论一般对欧亚大陆是世界权力中心这一点深信不疑,但斯皮克曼提出了与麦金德相反的观点,即影响全球地缘政治的重心不在完全居于陆地的"心脏地带",而在海陆相接的"边缘地带",因为它比"心脏地带"具备着更良好的地理条件,如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且是"心脏地带"与海洋之间的通道地区。因此,"边缘地带"是控制世界的关键,是世界权力

① 有关中国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还可参见《海权论》,第 177 页,第 224 页,第 277 页,第 248—259 页。

② 《历史的地理枢纽》,第 63 页。

争夺的要害所在。对于“边缘地带”在地缘政治中所具备的关键作用,还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而不是“心脏地带”在海洋势力与陆地势力的冲突中起着缓冲作用,因此所谓的“边缘地带”是“中间地带”;第二,由于“边缘地带”处于世界“心脏地带”的欧亚大陆和海洋中间,是海上强国和大陆强国发生冲突的主要地带,因此“边缘地带”是世界大国进行政治较量的中心地带,是各强国为控制全世界必须占有的关键部位。正是根据“边缘地带学说”,斯皮克曼对中国在战后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更加引人注目的论述,其论点的核心是认为中国在“边缘地带”上可能占据非常关键的位置,无论是作为“中间地带”还是作为冲突地带,它都可能影响全球地缘政治的全局。斯皮克曼认为,中国和俄国是欧亚大陆上两个最主要的大国,二者之间有一种互相替代的关系,俄国的问题在于如何化解自己的不安全感,中国的问题在于国家的发展和统一。斯皮克曼说到,中国的北部边缘地区将继续掌握在苏联手里,中国也还没有能力向全部亚洲沿海地区扩张、包括东南亚地区,但是在中国完成国家发展的任务和实现国家统一后,东亚地区的支配势力显然非中国莫属。“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和俄国的势力在大陆上保持着一种均衡,因为它们是这个地区仅有的两个有一些重要性的国家”①;而在中国成为东亚支配势力后,“北方的俄国势力将是大陆上对中国地位的唯一平衡。如果西方强国还想在这个地区保存一点势力,就必须为它们的实力建立岛屿基地。”②斯皮克曼的观点十分清楚地表明,中国是“边缘地带”最重要的国家之一,美国和西方必须警惕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个强盛、统一、集权和现代化的中国,因为这个东方强国将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它可能获得巨大能力把它的势力扩展到西太平洋沿岸。如果说中国当时尚不能成为“边缘地带”强国,那只是因为国家的实力不够强大和没有完成统一;但一旦国家的实力强大起来和实现国家统一,中国就将在“边缘地带”

---

① 《和平地理学》,第62页。

② 同上书,第100页。

上崛起,并将占据"边缘地带"上别人难于替代的位置,而这必然导致全球地缘政治的历史性变化。因此,斯皮克曼从地缘政治演变的角度预言所谓中国"霸权势力"在东亚的出现,并告诫这是不允许发生的,因为它对美国的战略威胁十分巨大。为了防止这种前景的出现,斯皮克曼的具体建议是:可以扶植和借助战败国日本的力量,在远东以遏制和分而治之的方法来防范中国的崛起[①]。

正是依据斯皮克曼的立论,西方地缘政治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进一步提出,"具有影响的发展是中国的诞生、苏联权力核心的东移海洋和太平洋作为地理政治活动的大中心的呈现。由于从潜在实力上看,中国要比日本强大得多,所以她的诞生是非白种人对白种人的第一次真正的挑战。""随着中国上升为一个世界强国,太平洋区域发挥了历史同样赋予地中海而后又赋予大西洋的那种作用:各大对立力量隔洋相对峙。这些话似乎就像当年豪斯浩弗曾断言政治地理世界的未来很可能取决于太平洋地区的回音。"[②]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的"主导体系由三个大国组成,即美国、苏联和中国,它们当然是世界上真正的国际性角色。"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显著出现,首先预示了"三极"世界体系的产生,而随着西欧和日本的加入,必将引导出一个"多极"的世界体系。新的世界体系的主要意义是更改国际行为准则,在地理上则是使世界实力的平衡从欧洲和西方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转移,也就是地缘政治的未来发展演变必然出现"东移"的趋势。对于这样一种过程和趋势,西方地缘政治学家中间似乎有一个共识,即中国作为独立自主的大国的出现是促进世界地缘政治舞台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这也恰恰是20世纪70年代对尼克松和基辛格努力谋求和造就全球均势产生诱惑力的地方[③]。

从斯皮克曼给美国提出的中国可能在地缘政治中崛起的警告起至今

①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20页。
② 同上书,第155页。
③ 参见上书,第155—162页。

已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斯皮克曼特别重视欧亚大陆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地位,不允许欧亚大陆出现一个统一的压倒其他所有国家的权力中心的思想却仍然影响不绝。美国一以贯之的全球战略就是必须维护欧亚大陆的均势,为此,美国积极干预欧亚大陆事务和控制该大陆的"边缘地带",就成为其战略的首要步骤。对中国的遏制和接触都是为了实现美国自己这种明确的战略目标。这些在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甚至我们从布热津斯基的欧亚地缘战略筹划中,从克林顿和布什对华政策的实践中看到了斯皮克曼早期主张的影子。

毫无疑问,不止一位西方地缘政治学家论述了中国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和角色,这自然是因为中国同时处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关键位置,是海权和陆权的重要交汇处,既因与"心脏地带"天然相连、关系密切而成为显赫的陆权大国,又因本身属于"边缘地带"而具备着掌握海权的便利。实际上,毛泽东对此很早就有清醒的意识,他的"中间地带"理论就是一种在地缘政治上的准确反映。但是,我们原来所理解的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是不太全面的,原来认为毛泽东所指主要是两个"中间地带",一个是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欧洲。但毛泽东本意中的"中间地带"有三个,第三个就是中国自己。毛泽东在分析战后国际形势时指出,"美苏冲突,中国是中间地带,斗争很激烈。"针对美国在朝鲜、越南和台湾海峡地区的军事扩张行动,毛泽东还尖锐地指出,"美国是在侵略中间地带。"这说明,毛泽东对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处于"边缘地带"的地位和作用是有所洞察的,应该说这是他后来对中国在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扮演某种角色进行深入思考的重要依据之一①。

①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2 页。毛泽东有关"中间地带"的观点还可参考《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05 页,第 485—489 页,第 506—509 页。应该说,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的概念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而"三个世界"的概念是一个有关国际格局的概念。

第二节　中国的地缘政治位置及其双重特性

中国的地缘政治位置是特定的,其空间特征涉及国家的疆域结构、相对位置和绝对位置(纬度位置、海陆位置等)及周围边界情况等。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取决于一些动态的空间条件。那么,根据地缘政治学主流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学说",如何看待中国的地缘政治位置及其特性和由此需要作出的战略选择呢?应该说,由于中国位居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的关键部分,在地缘政治上海陆兼备,处于"心脏—边缘"之间的动感地带。这一方面使它具备充当世界级大国的地缘天赋,另一方面也使它面临着较为复杂的国际环境;所以,只有更完整地认识中国的地缘政治条件,在战略选择上同时处理好海权与陆权的关系,以及"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关系,才能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

首先,从海陆空间关系来看,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陆疆和海疆都十分辽阔的大国,兼具陆地大国和濒海大国的双重身份。就陆疆而言,中国位居世界最大陆块欧亚大陆,陆地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据卫星遥感测量资料,面积约1045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15和亚洲面积的1/4,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而居世界第三位。在空间的纵横跨度上,中国的陆地国土南北相间长约5500公里,跨越30多条纬度线,东西相间宽达5200公里,陆地边界长达22800公里,是大河流域典型的陆地大国①。在广袤的陆地地理空间里,中国北部和西北部的大片国土与欧亚大陆的一些重要国家如俄罗斯、蒙古和中亚国家紧密相连,并具有延伸到欧亚大陆腹地的伸张性。这使它具备作为陆权强国的天然素质和优势条件。就海疆而言,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部,沿海地区面临着

① 孙明明等:《动荡中的国家安全》,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朝向世界最大海洋——太平洋的地理形势,是一个重要的濒海大国。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相关条款的规定,应该属于中国拥有和管辖自然资源所有权的领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的总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相当于中国陆地面积的1/3。从海洋地理形势来看,中国有一个朝东向和东南向凸出的、南北距离达4000多公里的辽阔弧形海域;其中黄海、东海和南海连接着朝鲜海峡、巴士海峡、马六甲海峡和西太平洋第一岛链。而中国的海岸线长达18400万余公里,是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在漫长的海岸线上,散布着许多优良的天然港湾,其中面积超过500多平方米的沿海岛屿有6000多个。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海区和沿海岛屿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矿物、生物和动物资源,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基地,同时它们中间的一部分也是环太平洋经济圈的重要战略通道、国际航道要冲和军事战略要地。由此观之,中国谋求和发展海权的地理条件同样是与生俱来的,或者说它具备成为海权强国的基本条件。综上所述,由于地处欧亚大陆通向太平洋的关键地带,由于地处集中了海陆关系的亚太地区中心地带,且海陆度值达31%以上①,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海陆兼备特征十分突出的大国,陆地地理形势和海洋地理形势均具有可资利用的战略价值。

其次,从"心脏—边缘"空间关系来看,中国的地缘政治二分特征十分突出,这既可能使它为两大地带所切割,又使它具备着融合两大地带的内嵌结构。一方面,中国拥有西北部和北部衔接欧亚大陆腹地,其中部分领土本身属于"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形势。由于这些地区占据着整个国家陆地面积的较大部分,并且具备向"心脏地带"的延伸扩张之势,中国是欧亚大陆上最重要的大国之一和"心脏地带"的重要组成部

① 国家的海陆度值=海洋国土面积÷陆上国土面积×K(修正参考系数)。该公式说明:海陆度值越大,国家的海洋属性越强;反之,海陆度值越小,则国家的大陆属性越强。此公式及其解释可见:《战略地理论》,第276页。

分。当然,在国内硬条件的比较意义上,这些地区的经济尚且落后,人口相对稀少,但能源资源储量和可开发前景很大,是中国后发性很强的发展中地区。作为战略后方和向西的缓冲区,这些地区对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意义重大;作为欧亚大陆桥的重要走廊,它们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的价值日益上升。另一方面,中国又拥有背陆靠海的地缘政治形势,相当部分国土处于欧亚大陆向东和东南延伸的关键部分即"边缘地带",在欧亚大陆与太平洋之间地位显著,因而它是"边缘地带"的重要大国。就国内发展而言,这些地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是技术、资金和信息的主要集散地,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最为紧密。综合来看,周围同时具备大陆和海洋两种地缘政治形势,跨越"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处于完整的(双重的)"大陆—海洋"和"心脏—边缘"二分对应关系之中,是中国地缘政治的基本位置和环境。就地缘政治属性而言,中国兼具陆权大国和重要海权国家的双重身份,是连接"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唯一大国。

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重要而复杂,这基本上决定了它在地缘政治上具有双刃剑的特性。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优势地位得益于地缘政治方面的天赋条件,但对中国国际环境的制约因素或不利因素,也主要是来自于地缘政治方面。在历史上,中国既遭到过来自大陆方向的入侵,又遭到过来自海洋方向的入侵;既直面过来自"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压力,又直面过来自"边缘地带"的地缘政治压力。每当中国在其间选择失当,就不仅会失去两者的好处,而且会使自己的地缘政治环境极度恶化。历史同样说明,无论是来自哪个方向的强国对中国都有可能产生压力,但也都有可能受制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反作用;如果中国在两者之间选择得当可以兼得两者的好处,为自己营造出最为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总之,中国的地缘政治位置是优势和劣势并存,这种复杂情况用中国人喜欢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话来形容或许最为合适。

对于所谓"双刃剑"的基本特性,我们可以分别加以考察。首先,看

看中国地缘政治所具备的优势一面:

第一,处于世界地理和地缘政治的关键地带,是北半球的地缘政治中心之一。中国所处的地球北纬23.5度至北纬66.5度的温带走廊一直是世界历史的主要场所,也一直是国际社会活动的核心舞台,不仅古代的兴盛帝国(如中华帝国、雅典、罗马、波斯)集中分布其间,而且作为工业化重镇和能源聚集地,大部分现代发达国家也会集于此。中国的国土全境都属于此一范围,这就从天赋条件上保证了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体系中的优势位置,使其具有发挥世界性影响的历史惯性。以历史眼光看,虽然在近代以来经历过盛衰交替的反复过程,但中国作为世界上国家版图结构最大的政治力量之一,其地缘政治优势基本上处于保持不变的延续和承继状态中。仅就内在的潜力来讲,中国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地缘政治位置发挥作用;而一旦遇到更多更好的条件,中国的地缘政治优势还会自然产生扩大化的效应。现在,从全球大的地缘政治形势来看,中国依托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地处美日与欧俄等强国之间,影响着北半球地缘政治中心势力的转移,是世界级的地缘大国。

第二,是海陆兼备的东方地缘大国,既可以借重陆权制衡海权,又可以借重海权制衡陆权。从陆权势力的对比看,中国在欧亚大陆所拥有的领土面积仅次于俄罗斯,作为陆权大国的地位无疑举足轻重;从陆权的地缘分布看,中国陆地空间的跨越性很强,具备问鼎大陆腹地和占据大陆边缘的双重优势。这些都给中国发挥陆权大国的作用,并以战略纵深牵制、消耗和阻止外部海权强国的侵扰创造了不可多得的空间条件。同时,中国又正处于亚太地区的中央部分,掌握着欧亚大陆通向太平洋的枢纽,具备面向海洋、控制海权的便利位置。这意味着它显然是一个具有海权潜力的重要国家,并可以海权之便影响和制衡陆权。在这方面,中国与那些陆权或海权属性过于单一的大国有着相当的不同,例如,地处欧亚大陆的东部边缘,使得中国既不像俄国和德国那样为寻找出海口而苦斗,这常常使后者遭到海权势力的压迫;又不像英国和日本那样远

离大陆,这常常使它们缺乏陆权的有力支撑。依托陆权寻求海权的重要性体现在中国自己身上,主要是影响和控制狭窄通道(如台湾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的问题。而海权依托陆权的重要性在中国自己这里,体现为不是简单地建立军事同盟或扩大势力范围的问题,而是如何发挥自身独立自主的影响力的问题。总之,中国海陆兼备的特征十分突出,是具有海陆两种地缘优势的大国,背负欧亚大陆可以向大陆腹地伸张,俯瞰太平洋可以向海洋纵深发展;作为陆权和海权的天然交汇点,它可以充分发挥陆权和海权两种地缘政治权力的作用。因此,中国在同时向大陆和海洋两面发展中所获得的地缘政治潜力是难以估量的。

第三,是横跨"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并使二者相连的地缘轴心大国,可以综合运用两大地带的权力。在地缘政治上,中国首先与麦金德所谓的"大陆心脏地带"息息相关,按照其所描述的地理现实,中国的西北部地区是通向这一地带核心的重要战略通道,有些部分属于这一地带本身,因而其战略地位和地缘政治价值从来没人敢于小觑,甚至可以说其选择关乎欧亚大陆整体的战略组合[①]。鲍德温曾经引用列宁的话,对此作出过令人瞩目的评价:"列宁曾经写道:通往巴黎之路,必须经过北京","这样,他用意识形态方面的语言,就亚洲心脏地带对控制世界在地理政治上的重要性表达了他的天赋的理解。"[②]中国处于"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位置(用鲍德温的话说是"亚洲的心脏地带"),是它获取国际政治权力和资源的主要来源,是它能对地缘政治全局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的基本条件。在苏联解体前,中国在"心脏地带"的地位仅次于苏联和历史上的俄国。在苏联解体后,中国的地位更加凸显,如果经济崛起和政治强势如期到来,那么由它来取代俄国的传统地位并不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中国还是联系"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地理枢纽,这一位置使它大大不同于俄国(苏联)和美国的地缘天性。例如,俄国

① 《中国国家安全地理》,第158页。
② 《明天的战略》,第296页。

虽然可充分利用“心脏地带”的堡垒作用,但是却因被封闭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常常对“边缘地带”作为海上侵扰和围堵的通道存在着天生的恐惧心理,也常常不得不为反弹外界安全压力而进行耗费国力的扩张。美国则远离欧亚大陆,这虽可使之免受国土入侵和边界纠纷,但要直接介入太平洋和欧亚大陆问题,又不得不在远离本土的地方建立一系列的军事同盟和军事基地。按照斯皮克曼的观点,中国处在“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交汇点,因而其战略取向是两大地带权力消长的关键因素;同时,它还处在“边缘地带”的核心位置,是“边缘地带”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之一,可以充分利用“边缘地带”兼顾海陆的双重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就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在地缘政治中实行“一边倒”的战略,与位居“心脏地带”核心的苏联结成同盟关系,这一事实使得美国和西方国家十分害怕,担心苏联势力通过中国在“边缘地带”占据战略优势,并得以进入太平洋地区。出于这一考虑,美国通过其所控制的中国周围的岛屿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结成“岛屿锁链”来防止苏联势力的渗透和苏中联盟的放大效应。同样,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与中国组成战略性质的联合,苏联极恐此举给自己造成封闭于“心脏地带”而无法突进“边缘地带”乃至海洋的地缘政治态势。因而,它采取了与印度和越南结盟,并耗费国力南下印度洋和在金兰湾建立基地的反制做法。在后冷战时期,“边缘地带”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两个方面的重要性都进一步提高。就地缘政治来说,“边缘地带”成为新的结盟现象或战略组合现象最频繁的地带,是世界级大国和地区性大国频繁活动的主要场所。其所显现的事实都与如何认识中国的地缘政治价值和战略走向有关。就地缘经济来说,欧亚大陆桥以中国为东端点,欧亚美之间最繁忙的海空航线经过中国附近水域空域,中国还控制着亚洲内陆丰富资源的东南出口,俄罗斯和中亚的能源矿物等战略物资必须经过中国这条最便捷的通道才能进入太平洋沿岸市场,这些都加强了中国在“边缘地带”上的地位和重要性。总之,中国部分地区紧靠“心脏地带”,部分地区属于“心脏地带”本

身，部分地区位居“边缘地带”；也就是说，中国具备横跨两大地带，并使二者连接的地缘政治形势。从两大地带的相互关系看，中国可以完整地依托“心脏地带”来保持自己对其他“边缘地带”大国的战略优势，可以在欧亚大陆发生冲突时与“心脏地带”保持某种间隔，也可以充分借重“边缘地带”对“心脏地带”的制约作用。

第四，拥有地缘政治上的国家规模效益，地缘政治潜力和实力具有独立的性质。一般而言，特殊的地缘位置、极大的战略纵深和综合国力潜质使中国本身在地缘政治上内存着一种国家规模效益，其地缘政治潜力带有与生俱来的性质。因此，中国不需要别国的援助就能在各种地缘政治压力下独立支撑并足以单独抗衡其他大国，包括陆上和海上两股势力及“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两股势力。当然，中国并不需要故意玩弄在两个方向上受敌的地缘政治游戏，但它足以同时从海陆关系和“心脏—边缘“关系中汲取和聚集到相当的地缘政治能量，也足以在两个方向上承受和因应地缘政治的变动，包括能够经得起大规模战争历练、充分实现国家总动员、在战时自由调度军事力量和改变战时力量对比，也包括能够在和平时期实施跨梯度发展经济和构筑多层战略防御体系。从这一角度看，国家规模效益及其蕴涵的地缘政治潜力，给中国提供了一种从内到外积聚起来的抗风险能力和减压能力。不仅如此，国家规模效益还使中国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把地缘政治的潜力转化为实力，并使地缘政治实力产生一种增值效应。这里面包含着两个含义：一是地缘政治实力增值效应的实现并不是一个自动发生的过程，或者说仅仅具备必要条件还是不够的；由于综合国力的强弱会决定中国地缘政治的优越性能否得到充分发挥，所以中国要成功地使地缘政治潜力转化为实力，并借此发挥地缘大国的作用，必须借助国家规模效益发展并壮大自己的综合国力。因此，综合国力的强大是中国取得地缘政治实力增值效应的关键，也是获取地缘政治实力的充分条件。说到底，中国地缘政治地位的提高在于综合国力的后盾作用，这也正是“发展是硬道理”的地缘政治

含义。二是地缘政治实力的增值效应在中国这里可能会出现一种特殊的效果，即综合国力的提高与地缘政治的已有优势存在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虽然中国本身足资利用海权和陆权的双重价值，也足资利用“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双重价值；但综合国力的提高才能发挥其中的优势并避免其中的劣势，从而会引发一种越来越好的“马太效应”。因此，我们说中国的地缘政治潜力和实力具有独立的性质，乃是在于它主要依靠自己而不是借助外部力量来锻造地缘政治实力的，正是在国家规模效益的全面作用下，综合国力的发展会使其地缘政治地位具有明显的增值趋势；而中国正是以此来独立自主地影响世界的。

其次，恰恰因为处于海陆二分与“心脏—边缘”二分的关系之中，所以中国在地缘政治上也显然存在一些劣势的因素：

第一，历史地看，在欧亚大陆上，既有俄国这样曾经充当陆权霸主的大国，又有印度和蒙古等潜在的陆权强手，加之周围还存在日本等海权国家，因此中国在处理海陆关系时并不总是能够左右逢源，甚至还时常可能遇到无从下手或力不从心的情形。作为海陆兼备的大国，中国在问鼎大陆心脏腹地和向太平洋纵深发展的时候，始终面临着一个典型的“地缘政治困境”：优先发展陆权，会引起俄印等大陆国家的不安全感；优先发展海权，会导致美日等海洋国家的疑虑（同样的难题曾困扰过历史上海陆兼备的地缘政治大国：法国、德国和苏联。它们的对外战略一直在大陆和海外两个方向徘徊，以至于顾此失彼，在不同的地缘政治角逐中都归于失败）。这样，在不同时期，海陆关系的处理难度长期以来伴随着地缘外交的开展，如果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处理失当，就可能转化为地缘政治上的不利处境。

第二，在陆地和海洋两个方向上都容易受到外敌的入侵，并且海陆关系的复杂性直接体现在周边环境和边界问题上。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的位置使它几乎不会受到外敌的军事入侵，中国的位置却使它千百年来屡遭外敌侵犯。美国的安全问题在国外，中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则在它

的陆地和海洋边境线上。从1949年到2000年的50余年中,中国9次卷入周边战争和军事冲突,平均每5.6年1次。其中,虽然多数属于陆地冲突,但也与越南发生过两次海上的武装冲突,与日本还存在着东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的纠纷。中国的安全威胁不仅来自于陆上方向,而且来自于海洋方向(从海洋方向看,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大多来自海上)。就此,《长城与空城计》一书指出,直至19世纪航海的欧洲人到来之前,中国在安全方面主要担心的是中亚地区,而不是沿海地区。原来是北部和西部,即陆上方向的威胁,后来是海上方向的威胁,再后来是双重的威胁。中国只是靠着"人口、疆域和地理位置构成一道长城"来抵御外敌[①]。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防御措施较弱,那么在陆地和海洋两个方向遭到外敌入侵的几率就较大;另外,从历史到现在,来自这两个方向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因素均与国内的分裂因素(如新疆问题和台湾问题)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如果这种分裂因素较强,那么中国在两个方向受制于人的情况就比较突出。不仅如此,从现实来看,海陆关系的复杂性与边界问题有着难以摆脱的联系,从而可能会影响到周边环境。中国的周围邻国多,邻国中强邻多,存在着不得不面对的而且十分棘手的边界问题。如果说美国是强国弱邻,中国则是周围强邻不止一个。而且,所谓邻国中既有陆邻又有海邻,边界问题涉及领土和领海。中国作为一个背陆靠海的大国,"与许多国家为邻,在领土、领水、领空、资源等领域与这些近邻发生冲突的机会就会特别高,但众多的近邻又与中国战略发展有密切联系。"[②]因此,虽然中国的战略态势是防御性的,但周围有一大批强大的对手和潜在的敌人,有许多难以相处的邻邦。"从势力范围的界线来看,……中国的直接领土领海利益涉及到另外的二十四国的政府。"[③]中国几乎和所有的周边国家

① 参见〔美〕安德鲁·内森:《长城与空城计》,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第186页。
② 《21世纪中国外交战略》,第196页。
③ 《长城与空城计》,第14页。

都有边界问题,如俄罗斯、日本、韩国、朝鲜、东南亚国家和印度,而且由于历史原因,边界问题十分复杂。如果这些问题影响到各自双方的政治关系,并且呈现累加的形式,就会使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出现极为不利的情形。

第三,从"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关系看,既是不同地缘政治势力借重的对象,又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在这方面,存在着一种由历史沿袭至今的不利情形,即在地缘政治中中国始终缺乏力量支点,无论是在"心脏地带"还是在"边缘地带"情况均是如此;因此,处理与其他大国(包括超级大国和地区性大国)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外交中的难题。所谓力量支点是中国在处理与某个(些)大国关系时所需要借重和依靠的另一个(些)大国,因此该问题涉及到中国处理与大国、而不是与小国的关系,中国的地缘政治劣势和明显不足,恰恰在于它因很难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而找不到力量支点。历史上,中国无法真正占据欧亚大陆的中心位置,所以很容易受制于这样的情形:在不得不借重"心脏地带"的力量时会受到来自大陆中心势力的控制,在意欲摆脱这种控制时可能会受到一种惯性的威胁;究其原因,乃在于中国在与其打交道时缺乏必要的力量支点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和筹码。而处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地理形势,使该地带的其他主要势力,包括海洋力量常常对中国的选择抱持怀疑态度,最终导致中国在意欲发挥"边缘地带"大国作用时同样很难找到可靠的力量支点。特别忌讳的是,在没有力量支点的情况下,对中国十分不利的是这两个层次的关系重叠起来并且重心不倾斜于中国一边。一旦如此,中国在"心脏—边缘"关系中便很难找到战略的着力点,也很难在外交上左右逢源。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常常发生的,在今后的时间里也仍然有其严重性。基辛格就认为,在21世纪的国际体系中,至少有六个主要的强大力量:美、欧、中、日、俄及印度,其中有四或五个集中于中国周围的地带。所以,中国与所有大国的关系,包括与超级大国和地区性大国的关系,"无疑是中国外交政策最重要和最持久的组成

部分;即使它想改变也无法做到。因为无论它的国土大小、政治地理位置还是它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大国地位,都不允许它这样做。"①值得注意的是,寻找力量支点的困难(可能也有认识不足的问题),导致了长期以来就存在的这样一种现象,即中国如果受到地缘政治惰性的影响,倾向于自然选择一种具有孤立主义倾向的外交。近代以来,在世界大国中,唯独中国经常是以一国的力量构成一个单独存在的力量主体,在强调独立自主的同时也容易自我封闭。虽然后来中国的外交逐渐开放,但仍然带有很强的内向性和自敛性。

第四,在地缘政治中缺乏缓冲区,常常使自己处于冲突的第一线。缓冲区问题在范围上涉及的主要是"心脏地带",在性质上涉及的是中国与周边中小国家的关系,而不是与大国的关系。在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一直没有可以起到与其他大国之间间隔和抵消作用的缓冲区。历史上,中国周围的一些中小国家多数受其他大国的控制,被纳入了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而在中国外交政策中从来没有势力范围的概念,也从来鲜少有建立缓冲区的战略主动性。虽然势力范围的概念带有强权和控制的含义,并不为中国战略和外交的和平性质所取,但缓冲区对于谋求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和安全条件来说还是必要的。究历史上中国很少建立缓冲区并借此营造地缘政治有利形势的原因,既是由于国力孱弱所致,又是由于在地缘政治上对缓冲区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其结果常常是,由于中国周围的中小国家多数依附于其他大国,这些大国可以借助周边中小国家的帮助或默许把其扩张的前沿推进到中国的边界,中国自己反而成了抗拒外来势力的首当其冲者,自己的边界经常变成发生冲突的第一线。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美苏冷战的最高峰时期,中国处于同美国抗衡的第一线,而苏联则处于二线。在20世纪60年代美苏反华大合唱时,中国在自己周边和前沿地带遏制和抵消着至少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20世纪50、60年代和70年代,在边界地区,中国还与印度和越

① 〔瑞士〕卡普尔:《开放中的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2页。

南这样的地区性强国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直接发生过武装冲突。在后冷战时期的另外一种可能前景是:当中俄与美国抗衡时,中国有可能处于第一线;当中美与俄罗斯抗衡时,中国又可能成为远离欧亚大陆的美国的挡箭牌。中国可以单独抗衡来自两个方向的地缘政治压力,但代价极大,可能会因此招致经济上的持续落后和国际地位的绝对下降。在地缘政治的布局上,中国与美国不同的是,它完全贴近"心脏地带";而与苏联或俄罗斯不同的是,它自己有相当部分的国土属于"边缘地带"。因而,它更容易成为被陆上力量攻击的直接目标或成为由海洋方向组成的包围圈的前沿。在没有缓冲区起到减压作用时,中国的地缘政治常常处于十分被动的不利处境。

综合比较而言,中国穿越海陆之间,连接"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在地缘政治整体上的二分对应特征十分显著。这一特征包含着双重性的含义。一方面,就最大限度整合地缘政治的潜力和权力而言,中国具备世界大国的天赋条件。海陆关系交叉的要害位置,使它既是陆权走向海权的跳板,又是海权依托陆权的靠山,足资运用海陆两种权力资源;作为"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联动性最强的中间地带,它既是"心脏地带"的枢纽大国,又是"边缘地带"的聚合力量,足资运用"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两种权力资源。加之中国自身单独的分量大,具有地缘政治的规模效益,可以依靠自身的发展变化影响世界。因此,中国的战略选择关乎地缘政治的整体布局,如果运筹得当可掌握改变地缘政治整体布局的关键锁钥。正因为这样,有些学者才明确指出,中国夹在美俄两大势力范围之间——所有这些因素说明中国地理位置的困难,但又说明它的战略地位重要,而且有能力实现它的对外政策目标。在这方面,中国跟印度、巴西、印尼之类的其他发展中大国不在同一档次,并且其重要性将超过日本、俄罗斯和加拿大①。

① 《长城与空城计》,第22页;〔美〕埃兹拉·沃格尔(傅高义)主编:《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序第1页。

当然,中国具备作为地缘政治大国的必要条件,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海陆关系和“心脏—边缘”关系的复杂性也使它面临着一些不利因素,以及由此而来的地缘政治压力。特别是,如果处理不好这些不利因素,那么它在地缘政治上的劣势就可能呈现放大效应。因此,中国在具备地缘政治大国的必要条件后,还必须具备地缘政治大国的充分条件。而中国只有以我为主地充分利用海陆关系与“心脏—边缘”关系中双重的正面效应,特别是经过主动整合以发挥其中的优势和避免劣势,才能获得地缘政治方面的充分条件,取得地缘政治的增值效应。

第三节 中国在地缘政治中的复合型战略选择

地缘政治位置和环境作为一种客观现实,是制定地缘战略的主要根据。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既不简单地等于它的优势,也不简单地等于它的劣势;如果要想给自己的地缘战略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就应该全面地衡量自己地缘政治条件的优劣,加以辨证看待和精确计算。由于我们上面所分析的中国地缘政治具有“双刃剑”的特性,即作为一个置身于海陆和“心脏—边缘”双重关系中的大国,中国既有在地缘政治上得以挥洒的很大空间,又有受限于地缘政治极大制约的一面;所以,中国首先要做到的是趋利避害,在充分认识自己面临的地缘政治二分现实的前提下,需要以超越姿态对其中的各种要素进行必要的整合,其目的是求得最优化的结果。

中国的地缘政治特性决定了它的地缘战略目标及其选择方向。就地缘战略目标而言,保持强大的陆权,发展强大的海权,依托“心脏地带”以形成固本之势,稳居“边缘地带”以形成固城之势,是中国谋求地缘政治权力之所必须。就地缘战略选择方向而言,需要兼顾大陆与海洋之间、“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东向与西向之间的关系。这意味

着,中国所应做出的是一种复合型的战略选择,即尽管中国在地缘政治的空间特征上是一分为二的,但在做战略选择时则必须合二而一,需要兼顾海陆,贯通"心脏—边缘",平衡东西两向。在这样做的时候,中国在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选择所需注意的是:

1. 海陆统筹,保持强大陆权和发展强大海权

在这方面,首先要改变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树立海陆并重的战略思维。由于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和大部分国土受限于陆地的现实,国人重视大陆国土而轻视海洋国土,关注大陆权益而怠慢海洋权益,更谈不上有海权意识。不用说秦朝的"长城意识"、明清的"闭关锁国"和"海禁"政策,都是封闭性很强的典型大陆意识;就是当代我们所熟知的"一边倒"和"大三角"等政策,也实际上受到大陆意识的左右。在这种意识下,长期以来中国在地缘战略上停留于陆权思想,而没有发展出海权思想。但是,海陆兼备的地缘现实,要求中国必须以海陆并重的全方位思维取代重陆轻海的传统单一思维;在强调大陆国土意识、陆地权益意识和陆权意识的同时,特别是要树立海洋国土意识、海洋权益意识和海权意识。与陆地国土一样,海洋国土是中国国家领土和地缘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大陆权益相比,海洋权益是中国国家利益在地缘政治上的深化;海权则与陆权同样都是中国地缘政治实力的必要保障。虽然这种认识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此走向海洋扩张的方向,但面积较大的海洋国土和较高的海陆度值,国家利益的延伸和国家地缘实力的增长,要求人们树立鲜明而强烈的海洋国土意识、海洋权益意识,也要求具备经略海洋的海权意识。当然,中国与过去传统陆权国家的俄国和德国不同,在改变重陆轻海的思想时并不应重复先陆后海的老思路;中国也与纯粹海权国家的英国和日本不同,不能简单地重蹈"海权论"的覆辙。也就是说,海陆统筹的思维是一种全方位的思维,即使中国发展海权仍需以对海陆关系的合理整合作为依靠。

其次,保持陆权优势和发展海权是中国地缘战略相互倚重的两翼。

依地缘政治的惯性，陆地空间是中国地缘政治权力的基本来源，中国能够作为地缘政治大国，端在于陆权资源所提供的积存已久而且颇具纵深的战略空间，这意味着依托陆权是其地缘战略的必不可少的一翼。按照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思想，在空中力量出现并且变得强大的时候，陆权的作用并未削弱反而增强，因为海空力量更加依赖于陆地的支撑。因此，中国应该通过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加强核威慑的能力，并以核武器和陆上力量的紧密结合，扩大陆权的地缘政治影响范围。当然，另一方面，以全方位的战略视角看，中国需要在继续保有并发挥陆权优势的同时，转以海陆关系为背景把发展强大的海权放到战略位置上；因为发展海权已成为中国增强地缘政治实力的关键。由于历史的缘故，中国虽然具有海陆兼备的国土特征，但海权一直处于潜存的状态，但其可开发性极强。根据马汉所说的“海权国家”要素，中国内部有着很强的战略纵深，海陆关系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这一切早就预示着一种从陆权向海权转变的前景。而如何开发海权，必须从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上认清海军力量与海权战略地位的关系，海军力量的发展关系到中国能否成功地获得海权。从这一角度看，海军力量的发展势必应放到地缘战略的重要位置上，其功能已不能仅仅满足于近海防御，而必须从近海防御转向远洋防卫；其行动能力也不能仅仅受限于第一岛链之内，而应该突进到第一岛链之外。因此，“海军要在提高第一岛链内近海综合作战能力的同时，逐步转向远海防卫型，提高远海机动作战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满足获取海权的战略目标。如果只能达到前一个目标而不能达到后一个目标，不仅在未来的地缘政治竞争中无法与美、俄匹敌，也会落后于日本和印度。由于保卫海洋国土和保证海洋权益与中国的崛起已有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必须有自己强大的海权来加以保证。因此，中国应该加强海权的实体建设，并使之与已有的陆权优势相匹配。

再次，中国处理海陆关系时应力求在海权和陆权之间取得平衡，不要偏重于一面而忽视另一面。由于海陆度值较高所带来的海陆关系的

开放性,中国可以避免俄国那样始终被围堵在内陆的局面,以综合运用海陆两权来达到相互制衡的结果。但是,要想达到最理想的状态,中国仍需要以全方位姿态合理处置海陆关系,最好是使二者达到稳定的平衡。需要注意的是,在后冷战时期,北约东扩、美日安全同盟强化和美国进入欧亚大陆,加之苏联解体所造成的欧亚大陆"黑洞"问题,已使海权和陆权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其结果,美日等海权国家与中俄发生了地缘政治上的深刻矛盾,美国所采取的欧亚两栖的地缘战略,在大陆方向和海洋方向均对中俄造成巨大的地缘政治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面临的陆权难题不在于俄罗斯衰落所引发的种种问题,而在于美国直接进入了欧亚大陆腹地。中国在海权方面所受到的限制同样与美国有关。现在,美国的地缘战略扩张在客观上阻止着中国和俄罗斯两个陆海兼备的大国从大陆走向海洋,北约东扩封堵着俄罗斯在地中海和北海的出海口,美日安全同盟则给中国走向太平洋的努力设置了障碍,至少是要把中国限制在太平洋"第一岛链"之内。这样,中国在处理海陆关系时可能会遇到困难。但是,"从地缘政治的逻辑来看,海洋力量与陆上力量的长期对抗,使得中国所处地域仍有可能成为一块'中间区域';仍有可能继续处于海陆两强各自战略主攻方向的侧面,而不使自己成为主要的战略攻击目标;仍有可能继续成为在两方之间左右斡旋、东西平衡的一支中间力量,这似乎是今日中国对外战略必不可少的一个地缘政治前提"①。所以,中国在处理海陆关系时,应该充分利用"中间地带"所具备的宽广的活动空间,适度增加地缘外交的灵活性,以取得左右借重和相互平衡的效果。在这方面,虽然中国需要同时具备陆权和海权,但它首先需要的是保持强大的陆权,其次是发展强大的海权。

2. 固本于"心脏地带",固城于"边缘地带",并以贯通两大地带来扩大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存在

中国需要同时加强在"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地位,但在地

① 冯绍雷等:《国际关系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10 页。

缘战略的安排上应有具体的针对性。首先，就中国与两大地带的关系而言，加强在“心脏地带”的地位更显紧要，至少在目前应该有力依托“心脏地带”以形成固本之势。为此，中国需要寻找力量支点和建立缓冲区，以坐实和巩固自己作为“心脏地带”大国的地位，不致在地缘政治发生变动时使这种地位被撼动。进一步地说，无论在欧亚大陆存在有利形势（“心脏地带”核心大国力量削弱）时还是出现不利形势（“心脏地带”核心大国变得强势从而形成对中国的战略牵制）时，可靠地造就地缘政治的固本之势都是十分重要的。就后冷战时期来说，由于苏联的坍塌，长期以来对地缘政治全局产生影响的“心脏地带”较大面积地缩小，“边缘地带”也出现了地缘政治板块移动的现象。比较而言，前者给中国带来的有利机会多于后者，也更便于把握。因为俄罗斯地缘政治作用的式微，使中国面临的来自“心脏地带”的直接威胁大幅度下降；中亚地区在地缘政治上的重组，也使中国有了西进的机会。在此情况下，中国依托“心脏地带”加强自己地位之势悄然而成。当然，鉴于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中国并不可能坐享其成，要加强自己在“心脏地带”的地位，取决于这样的先决条件，即在地缘政治中建立起适当的缓冲区，并寻找到对自己起支撑作用的力量支点。值得注意的是，“心脏地带”出现内部坍塌和部分裂解的情况，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即其历来寻求的缓冲区得以扩大，那些可以充当缓冲区的国家与“心脏地带”核心大国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傅高义（即埃兹拉·沃格尔，Ezra F. Vogel）认为，苏联解体后蒙古与俄罗斯以伙伴关系取代了结盟关系，蒙古自然成为中俄之间的一道重要屏障。而中亚国家的独立，使它们成了继蒙古之后又一个起战略阻隔作用的区域。由于中印关系的复杂性，巴基斯坦作为中国的盟友在地区局势中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而如果印度继续实行多极化的等距离外交，也不失为中国与美俄等大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区。当然，中国与印巴关系如何同时涉及到“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地缘政治，但目前对中

国与“心脏地带”的关系影响更大①。毫无疑问,上面这些国家本来就具有缓冲区的潜在价值,如果这种地位更加明确,那么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就会得到大大改善;因此,中国地缘战略应该不失时机地作出建立缓冲区的系统安排,并以国家间契约的形式加以固定。同时,“心脏地带”的变化也给中国寻找力量支点营造了重要机会,借此机会,中国应超越国家双边关系的限制而加强与某些地缘政治大国的战略合作,以营造以我为主和对我有利的地缘政治布局。鉴于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历来存在着强强型关系,即强国和次强国较多,确立力量支点的必要性毋庸置疑;而现在更是应被提上日程的紧迫事项。在这方面,可能的模式有:中俄联合或中俄结盟(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同盟模式和现在以新安全观为基础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美战略联合阵线(20世纪70年代毛周时期,当时因中美联合而导致形成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对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影响最大)、中国和俄罗斯、中亚国家组成的上海六国合作组织(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及中国与“心脏地带”地区性强国的结合(还没有过)②。就目前而言,中

① 《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第16页。此外,傅高义还认为,朝鲜历来是中国的一个缓冲区,但这个缓冲区是否能够维持下去要视中国同美国的关系而定。当然,朝鲜是中国在“边缘地带”的主要缓冲区。

② 布热津斯基认为,对于中国战略家来说,对抗美欧日三方联盟的最有效的地缘政治格局可能莫过于形成中国自己的三方联盟,把中国与波斯湾和中东地区的伊朗及前苏联地区的俄罗斯联合起来。这对于不满现状的其他国家具有潜在的吸引力。在某些情况下,伊朗和俄罗斯也可能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而决定加入以中国为首的这样一种三方联盟。它等于中苏集团的死灰复燃,但意识形态被代之以广义的抵制不公平的全球现状,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以往的主从地位也颠倒过来了。中国也可有第二种选择,即确定远东主要大国的地位。这将导致与日本的对抗,形成重要的区域争夺,成为区域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同时,不排除中国对中亚冲突(特别当冲突发生在靠近中国的地区时)和新的印巴冲突作某种卷入。另外,有的中国学者提出中国寻找力量支点的三种选择模式:1. 与美国结盟,对付日本;2. 与日本联合,与美国对抗;3. 中国与美日都对抗。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文集》,第18页。对于其中的2,需要解释的是,这种模式并非完全虚幻的,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有过“中日轴心”之说。

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上海六国合作组织在以上各种模式中可行性较大,并且是已经做了的;其效果是使中国在"心脏地带"获得更可靠的安全保证,基本上起到了使中国固本于"心脏地带"的作用。此外,中国和某些地区性大国的战略合作关系也是可能的考虑对象,在审视这些国家对华政策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在选择它们作为力量支点方面采取更积极的做法。应该说,今后只有通过发展和加强与某些大国或地区性大国的战略关系,才能确立和坐实有效的力量支点;只有处理好同中小国家的关系,才能把缓冲区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并在范围上得以拓展。当然,就"心脏—边缘"关系的复杂性而言,这样做首先应面向"心脏地带",但也可以同时兼顾"边缘地带"。但无论如何,这两件事做好了,可以使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保持高度自主的固本态势,并能够由内而外地充分利用"心脏地带"的内聚性,也能够由内而外地充分利用"边缘地带"的外张力。

其次,在加强在"心脏地带"地位的同时,中国在"边缘地带"造什么样的势就显得重要了。质言之,中国不仅需要加强在"心脏地带"的地位以形成高度自主的固本之势,而且需要加强在"边缘地带"的地位以取得固城之势。在这方面,中国一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边缘地带"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战略风险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战略摇摆,二是可利用自己在"边缘地带"的核心位置保持已有优势,特别是利用"边缘地带"的外张力扩大自己的实质性存在,以营造更富有进取性的地缘政治态势。后冷战时期,在地缘政治的板块移动中,一方面"心脏—边缘"两大地带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种联动性很强的张力。这种变化使两大地带的地缘政治都发生了重新的整合,从较早的时间来看,"心脏地带"的整合比较剧烈,而近一段时间内"边缘地带"进入了关键的整合期。在这一过程中,"边缘地带"已经显现出来一种很强的外张力,主要表现在它对欧亚大陆整体的外推作用更强,其走向海洋方向的前沿价值和连接海陆的战略联动价值也更为突出。人们注意到,在欧

亚大陆“心脏地带”的“黑洞”现象不断显露的同时,“边缘地带”及其周围出现了联盟体系重构和大国重新洗牌等战略组合变化,例如,美日安全同盟强化、中俄美日印大国关系的变动等,它们直接提升了“边缘地带”的外张力,并且使其范围也得以扩大。借助这种惯性,“边缘地带”可能会左右两大地带的地缘政治走势,包括牵动海陆关系的走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明确自己在“边缘地带”的枢纽地位,也必须审慎地处理好自己在“边缘地带”上同其他大国的关系。鉴于“边缘地带”外张力的扩大,中国可能会扮演比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特殊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角色,这种角色在一定程度上也非美国和俄罗斯所能取代。即在“边缘地带”与“心脏地带”发生的正反方向推力运动中,唯有中国可以起到合力的作用;在“边缘地带”所连接的一分为二的海陆关系中,唯有中国占据着合二而一的机会。当然,这种有利的态势并不是自发随意形成的,而是需要中国在“边缘地带”建立起稳固的战略防御体系,既能突破或至少降低其他大国的战略遏制,又能经得起其他大国战略联盟的考验。相对于“心脏地带”的固本战略,我们可以称此为“边缘地带”的固城战略。具体来说,针对美国在“边缘地带”周围强化军事同盟在客观上可能对中国形成战略挤压的情况,中国不仅需要扩张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功能和范围,以阻遏美国在“边缘地带”找到突破口并进入“心脏地带”的机会;而且需要处理好与东盟、朝鲜半岛及印度的关系,在某些时候可以用“问题领域”联盟或契约的形式与相关国家构建特殊的战略联合关系。这样做的目的是将美国领导的同盟尽量阻挡在“边缘地带”的外侧。此外,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边缘地带”的外张力量,即以两面推进和左右逢源的办法,加强和凸显自己在“边缘地带”的作用和分量,使自己在欧亚大陆与太平洋之间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从而为自己在这里发挥更大的作用创造新的有利条件。

再次,中国应该取以自己为中的态势使两大地带得以贯通,在做法上适应于两大地带的战略组合变化,需要主动以构建新型战略联合来扩

大在地缘政治中的结构性存在。从历史上看,“心脏—边缘”两个地带都是各个大国间战略组合变换的关键所在。古代所形成的几个帝国和帝国联盟,冷战时期以超级大国为首的联盟体系,如欧亚大陆的华约和北约以及沿海边缘的军事条约网,都曾分布在这两大地带上。从今天来看,带有地缘政治含义的战略组合仍可能在这两个地带跃然出现。其中,中国在这两大地带上是各个大国确立战略组合,包括结盟和反结盟的重要对象。特别是在后冷战时期,虽然中国采取“不结盟”、不搞集团政治和不针对第三国的政策,但在战略组合方面它的取向仍是地缘政治走势的关键,对于打通两大地带的战略连接,也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种情况在相当程度上使中国在战略组合发生变化时很难置身其外。当然,中国不需要结盟也能拥有以“心脏地带”为依托的高度自主态势,但如果缺乏主动构建战略联合的意识及其作为,就很有可能为失去先机而付出代价。由于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的变动基本上是结构性的,换言之,基本上是以战略组合的变动为特征的;所以,中国针对变化的情况所需采取的也应是结构性的办法,即应以战略联合的行动应付战略组合的变化。这样做并不见得重复传统结盟的惯例,但所采取的行动必须具备战略组合的功能,能够起到塑造地缘政治结构的效果。在这方面,中俄已经形成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目前“心脏地带”最重要的战略组合,以中俄为核心的上海六国合作组织进一步烘托了这种战略组合的积极意义。它们以近距离大陆型战略联合的态势,将有力地形成新的“心脏地带”,并会对“边缘地带”产生很大的辐射效果。因此,加强面向“心脏地带”的战略组合,提升其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功能,应该是中国地缘战略的主攻方向。与此同时,中国有意识地在“边缘地带”构建某种类型的战略组合,也是在地缘政治整体上造势的必要之举。因为只有当“边缘地带”的战略组合形成时,才能彻底改变中国在地缘政治变化的情况下被动应付的局面,转而变得可以主动造势和富于进取。进一步地说,如果中国能够把“边缘地带”在战略上的全部潜力挖掘出来,可能会

掌握住撬动两大地带地缘政治的杠杆。总之,中国可以利用自己在"心脏—边缘"地带上的特殊位置,打通这两大地带的关节,并使之实现战略上的相互贯通;其目的是以形成"心脏地带"带有内聚性的和"边缘地带"带有外张力的战略组合,掌握地缘政治变化的锁钥。只有当两大地带都形成了战略组合,并都具备了地缘政治方面的功能时,以中国取自己为中态势的两大地带才能真正贯通起来。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所谓地缘政治方面的功能,本身即要求赋予它们作为新型战略联合的含义。

3. 平衡东西两向,实行东西两个方向的扇形推进战略

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后冷战时期中国的地缘战略而言的。因为冷战结束的巨大变动主要表现在地缘政治方面,而且大都集中在围绕中国全境的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其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小视。第一,中国的地缘政治主轴已经发生变化。在冷战时期,中国的地缘政治以南北方向为主轴,北有苏联陈兵百万,南有美国打越南战争,加上短时期内与两个地区性强国即印度和越南关系的紧张,中国主要受到呈现为南北方向的地缘政治压力,因此地缘战略考虑的关键问题是南向和北向怎么样。但进入后冷战时期,中国的地缘政治主轴转到了东西方向。由于北向苏联解体、俄罗斯自顾不暇,南向美国失去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加之中越关系的改善(越南收缩战线并几乎放弃了同中国的陆上之争);所以,南北方向上的地缘政治威胁基本上消失或减弱。但与此同时,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东西方向上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威胁明显地增长。在东向,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主要来自于美日安全同盟强化、朝鲜半岛危机和台海局势紧张等重要事态;在西向,则主要来自于苏联解体、北约东扩、中亚地区关系重组和美国进军中亚地区等连锁性事件。由此观察,伴随着中国原来面临的那些旧的地缘交集点在南北方向的消失或大幅度减弱,在东西方向一些新的地缘交集点已经大量出现并强势成长;围绕它们,中国的地缘政治主轴实际上由南北方向转到了东西方向,新的地缘政治环境正在迅速地落定。

第二,恰恰是地缘政治主轴向东西方向的转变,中国所面临的海陆关系和“心脏—边缘”关系被全部集中起来,其对比性更加鲜明,且动态性和开放性相当强。虽然就一般情形来说,中国拥有海陆兼备和连接“心脏—边缘”的双重特性,但在以南北方向为地缘政治主轴的时候,中国主要局限于“大陆心脏地带”,海陆关系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或半封闭状态,“心脏—边缘”关系也主要倾斜于前者。但是,在以东西方向为主轴的情况下,这种双重关系在横向间的对比清晰度大大增加,二分对应的地缘政治形态更加凸显。由于从南北主轴到东西主轴的变化意味着地缘政治发生了一种强有力的运动,与中国有关的全部地缘政治要素在激活的情况下重新整合,因而这种双重关系处于罕见的动态变化过程。不仅如此,它们还突破了原有的空间界限而展现出向不同方向开放延伸的特点。例如,沿着东西方向,海陆关系和“心脏—边缘”关系在地缘政治走势上显露出横向的关联性,并且都不再受限于彼此间的地理限制。即使在东向的横剖面上,海洋与“边缘地带”的联系更紧密,既促使了海陆一体化的态势,又使“边缘地带”得以向海陆两个方向伸张。这些情形意味着,在中国的东西两向已经形成了新的地缘政治结构,地缘政治时空具有了极强的可塑造性。因而,中国所面临的是一种整体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变化,所进入的是一种动态性的而非静态性的过程,所应对的是一种开放性的而不是封闭性的局面。其中的复杂性可能给中国带来地缘政治上的新课题,但其中的机遇性又可能使中国扩大自己的战略纵深。因此,中国如何应对既显得更加敏感又显得更加重要。

应该说,地缘政治主轴是确立战略坐标系的基本要素,因为这关系到上面所论述的海陆关系和“心脏—边缘”关系的全部。对于中国来说,在经历后冷战时期的巨大变动后,只有明确地缘政治主轴的变化,才能找到自己的战略基点并规划出正确的战略选择方向。现在,应该把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分为东向和西向两个部分,并在认识到它们各自性质和特点的前提下,以超越地缘政治二分的姿态进行国家战略的合理

选择。

首先,中国应该在整体上平衡东西两向。从消极的方面讲,如果不能在整体上平衡东西两向,中国就会面临两种不利情形:一是在同时遭受两个方向的地缘政治压力时,会陷入一种结构性挤压的困境;二是在仅遭受一个方向的地缘政治压力时,会同样存在结构性的问题,至少会发生结构性失调的现象。这就需要中国以平衡东西来减缓两个方向的地缘政治压力,并防止顾此失彼。在冷战时期,特别是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中国曾经面临过南北两个方向的地缘政治压力。这段历史说明,如果同时面临两个方向的压力,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就很坏。如果中国只面临一个方向的压力,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就好坏兼有。如果两个方向的压力都不存在,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就最好。因此,中国地缘外交的第一个忌讳是不能在两个方向上同时卷入危机或冲突,无论南北方向,还是东西方向;更不能实行两面出击的做法,因为这只能造成自陷于穷于应付的两难困境;第二个忌讳是不能只顾一个方向而忽视另一方向,也不能简单地迷思于所谓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片面效应[①]。从积极的方面讲,中国以整体性的做法平衡东西两向,不仅会保证中国在地缘政治变动中尽量不受损害,而且能够使它充分利用地缘政治的利益倍增规律。在当前,这意味着中国自身所具有的地缘政治优势,加上资源和潜力,使它具备着趋利避害从而获得两面好处的潜在条件;但只有平衡好东西两向,才能够使这种效果变得现实,并取得利益倍增的最大化效应。在这一意义上讲,这里面有一种地缘政治方面的“马太效应”,平衡好东西两向是保证中国在地缘政治中变得更加自如和发挥更大作用的关键。

第二,在东西方向为主轴的情况下,中国不仅需要采取海陆统筹和兼顾“心脏—边缘”两大地带的两栖战略,而且需要采取在更高层次上

①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美国和俄国那里。在地缘政治上,美国有在两洋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俄国有在两线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

将这两种关系统合起来的复合型战略。虽然上面分别对适应于这两种关系的应对办法作过探讨,但这里仍需要进一步强调,认清和把握地缘政治二分的现实仅仅是中国战略选择的准备性条件,包括以上所谈到的两栖战略还大体上是适应现实的成分居多;而更重要的是应该超越这种现实,以更宏观的视野看待二者的关系,以更具有扩张力的行动统合二者的关系。特别是,由于东西方向的地缘政治走势给二者融合进更多和更强的开放性因素,中国绝不能在现实面前止步,也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仅只满足于单向度地考虑问题,更不能再做保守的单一型选择。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以南北方向为主轴的时候,中国的战略导向以陆权为主,很少问津海权,因而很少兼顾海陆关系的整体;并且基本上自闭于"心脏地带",停滞于"边缘地带"。例如,"一边倒"政策就是这种方面的典型代表,事实证明这种一面倾斜的战略并不是中国最好的选择。现在,地缘政治向东西方向的转轴,要求中国充分兼顾和整合各种地缘政治因素,采取全方位的复合型战略。就此而言,前面所说的海陆并举的战略和控扼两大地带张力的战略,都可以进一步归结为东西两向的扇形推进战略。所谓"扇形推进战略"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在东西方向扩大"势力范围"或"生存空间",而是要建立攻守自如和具有相当弹性的战略纵深。它也不意味着重复清朝末年"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左宗棠语)的传统安排,这种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均分力量的做法;而是要根据东西两向的地缘政治结构作出有系统的安排,即:一方面要更主动和更积极地适应地缘政治二分对应的现实,东西方向的地缘政治态势使中国所面临的这种现实更加明显,如果不能采取更主动和更积极的行动加以适应,就会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处境,甚至可能遇到被二分切割的情况。而这是中国在战略上应该极力避免的;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在地缘政治上是一分为二的,但在地缘战略选择上则要合二而一,兼顾东西,平衡两向。因为恰恰是东西两向的地缘政治态势给中国利用和整合二分对应的现实,并营造对自己有利的地缘政治结

构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就此,在“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互为犄角、海陆彼此借重的基础上,中国应该主动实行在东西两向同步扇形推进的复合型战略,塑造朝向两个方向的地缘政治多层次梯度结构。这种结构包含着三个相互联系、互有重合的关联层次,即海陆空间、“心脏—边缘”两大地带及海陆与“心脏—边缘”的叠加关系,也包含着中国与西向的俄罗斯(面向“心脏地带”腹地并制衡“边缘地带”)、中亚国家(面向“心脏地带”裂解部分)、印度(兼顾“心脏—边缘”两大地带的关系)和东向的美国(处理海陆关系并主要面向“边缘地带”)、日本(处理海陆关系并主要面向“边缘地带”)等形成的多重复加式的战略合作机制。中国唯有实行这种复合型战略,才能将地缘政治上受制于人的一分为二局面转变为以我为主的合二而一局面,并由此扩大中国的地缘政治空间;才能在地缘政治变化的情况下占据主动位置,进而提升自己在整个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的地位。

第三,在东西两向的地缘政治上,中国当然首先需要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营造好周边环境。中国的地缘政治位置决定着其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的轻重缓急,与邻国确立“睦邻友好”的关系不仅可以使中国在较长时期内获得良好的周边环境,以使自己全力以赴地进行现代化建设,而且可以使地缘战略的长远安排无后顾之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中印等周边大国之间相继签订“军事领域信任协议”、“边境裁军协议”和“在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中越两国的关系也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由此中国与周边大国和地区性大国的关系进展顺利;而近年来中国更一再强调要建立“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周边关系,也使中国与周边中小国家的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做法,因为营造好周边环境是中国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这一目标的达成保证了中国在东西方向地缘政治上的脚跟可以站得更稳。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中国的边疆既包括陆疆又包括海疆,陆疆问题主要涉及到在西向与相关国家的关系,海疆问题主

要涉及到在东向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在这两个方向都潜存着未来与邻国发生纠纷的可能,特别是东向的东海划界问题、大陆架问题和钓鱼岛问题可能比西向的陆疆问题更有爆炸性,如果一旦出现将是十分棘手而又必须加以处理的问题。因此,应该充分考虑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安排好问题处理的轻重缓急顺序,并事先准备好解决问题的预案。

第四,在东西方向的地缘政治上,还存在着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一是东向的中国统一问题,一是西向的与中亚地区的关系问题。如果中国实施向东西两向同步推进的战略,这两个问题必须加以妥善处理。在东向,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国家统一显然是中国国家战略中的重要课题,不仅应该从国内政治角度对待这一问题,而且应该从地缘政治角度寻求解决之道。中国所面临的海陆关系的特殊性表明:中国必须完成国家统一,保持国家领土的完整性,才能发挥自身的全部地缘政治潜力。换言之,这是中国的一条地缘政治铁律。从地缘经济意义上讲,正如亨廷顿所言称的,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区回归中国后,大中华圈的经济实力将按几何级数成倍地增长,并将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地缘政治现实①。从地缘政治意义上讲,正如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所认为的:"台湾、西藏和香港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如果落入敌对国家手中,便会威胁到中国的安全。"②而一旦中国完成国家统一,中国将可以从容地走向海洋并掌握海权的钥匙③。我们知道,虽然中国的海域辽阔,但半封闭的地理特征亦很明显;要想真正捍卫中国的海洋权益和国家安全,中国对海洋的影响力必须能够到达周边的海峡和重要水道;而国家统一的完成将极大地改善中国面临的海洋形势,不仅会使中国迅速提高控制

①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83页。

② 《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第39页。

③ 如果仅就两岸之间的(内部)关系而言,中国大陆与台湾并不明显具有海权与陆权相互制衡的关系性质,因为台湾并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对大陆构成所谓海权的威胁;但如果加进美国(或日本)的因素,则两岸关系就带有这种关系的背景了。中国大陆方面因此也就需要从海陆关系整合的角度来考虑两岸双方的关系。

近海的战略能力,而且会在更大程度上满足自己对海洋经济利益的需求。进一步地说,中国统一将使台湾成为中国走向太平洋的直接跳板,中国进而会成为真正和完整意义上的海权大国。国内研究地缘政治的学者曾经明确指出,从陆地与海洋结合的角度看,台湾处于欧亚大陆与太平洋的结合部,背靠亚洲大陆,面向广阔的太平洋,恰好介于陆权与海权两大地缘政治单元的边缘区域。西连亚太地缘中心的祖国腹地,东临战略性海域(菲律宾海),是亚洲大陆通向太平洋的桥梁,也是太平洋通向亚洲大陆的踏脚石①。因此,台湾问题是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问题,对中国地缘政治具有战略意义。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在地缘政治上的矛盾和角逐。例如,美国对中国统一实际上采取了拖延战略,即尽量延长中国统一的时间,以便在地缘政治再塑造过程中降低中国的地位和份额。同时,它充分利用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对美国的地缘政治价值。正如一位美国将军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台湾,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将后撤到夏威夷。这同斯皮克曼在60多年前警告强盛和统一的中国将成为东亚最主要势力的看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处。鉴于斯皮克曼式地缘政治主张的影响,直到今天,美国对中国统一问题的干预程度将以其所划出的地缘政治警戒线为标准。对此,中国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即台湾问题作为一个地缘政治交集点在未来可能会更突出;随着岛内“台独”势力的膨胀发展,两岸关系的危机引发地缘政治问题的可能是存在的。但是,中国更应该清楚并加以追求的是这样两个目标前景:一是中国必须完成国家统一,才能真正在“边缘地带”站立起来,才能在拥有陆权的同时走向海洋并掌握海权;二是中国在实现国家统一的过程中,要稳健地处理好地缘政治环境的问题,特别是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关系。换言之,通过处理好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关系,尽量减少美国因素对台湾问题的干扰,以营造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外部条件。总之,在中国的所谓“三个部分”,即中国大陆、香港

① 《中国国家安全地理》,第342页。

和台湾三个地区中,中国大陆正处于最根本的和总的变化中,因而将充当起领导国家统一的使命[1]。这就需要中国更妥善地处理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问题,为国家统一目标营造良好的地缘政治条件;这也需要中国在解决自己的国家统一问题时,要以海洋方向作为主要的地缘政治背景。

第五,在西向,中国同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已经进入了务必整合的关键时期。中国只有同它在政治、经济和安全诸方面建立起强有力的关系,才能在欧亚大陆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就此而言,中亚地区在地缘政治上的属性值得关注,因为这关系到它的地缘政治走向,对中国而言甚为关键。在某种意义上说,中亚地区是地缘政治的裂解地带,而不是有人借用科恩的话所定义的"破碎地带"(实际上,科恩本人认为,后冷战时期只有中东地区仍然是"破碎地带")。由于苏联变成俄国,中亚国家从原苏联中分离出来,"心脏地带"的"黑洞"首先在中亚地区出现。而美国在"9·11"事件后借发动阿富汗战争得以进入中亚地区,并保持一定的军事存在。这一切说明,中亚地区并不是所谓的"破碎地带",不是那种被地缘政治变动挤压和撕碎后凝固不变的地带;而是一个新的处于动态变化中的"裂解地带",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中亚地区会给地缘政治带来一种显见的发酵效应,给酝酿新的战略组合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场所。基于此,对于中国而言,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价值并未因苏联解体后的动荡而下降,反而有所上升。由于具有地缘政治裂解地带的属性,中亚地区可以成为中国与"心脏地带"核心大国间的缓冲区,也可能成为制约美国在欧亚大陆作为的平衡空间;它不仅对中国保持陆权优势具有意义,而且对中国处理海陆关系有很强的借重作用。当然,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关联变得更突出,并不表明它就能在此成功地扮演重要角色。中国需要

① Ralph A. Cossa, *The New Pacific Security Environmen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Washington, DC., 1993, p. 103.

妥善处理同中亚地区的地区性强国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妥善处理同这个地区有利害关系的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但是,中国在战略方向上必须明确的是,它有意识地整合与中亚地区的关系,尤其是建立某种战略性质的合作关系,是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关键;这同历史上俄国或德国掌握东欧的道理是一样的。中国借力中亚地区的战略前景和给地缘政治带来的后续效应,必定对欧亚大陆和全球均势产生重大的影响,其中对美国和俄罗斯的影响最大[①]。中国必须能够承受美俄等进行反制的结果,也必须进一步寻求适当途径和机制来加强与中亚地区的战略合作关系。现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关系和能源合作关系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在中亚国家的经济影响随处可见,而能源则成为相互吸引的黏合剂。这给中国提出了两个课题:一是中国如何把经济影响转化为地缘政治上的存在,二是如何把能源合作巧妙转化成地缘政治上的相互依赖关系。由于经济问题和能源问题的重要性,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联系在地缘政治上的潜力不可小觑。西方学者认为,现在,除了围绕里海地区油气资源的竞争而出现的"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通道"(Turkey—Afghanistan—Pakistan Route)外,已经开始有了一条经过中亚地区主要地带的"中国通道"(China Route)。就此,他们指出,中国正在按照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在中亚地区推进,至少在经济贸易关系上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亚共和国的主要伙伴[②]。加上新疆北疆铁路贯穿哈萨克斯坦通往欧洲,具备着在中亚地区乃至里海的石油开发中占有重要份额的极大可能。如果中国在这片富有油气资源的"心脏地带"取得主动权,不仅下世纪的经济增长有了能源保证,而且可借此向北制约俄罗斯,向西牵制中东乃至欧洲,使中国在欧亚大陆和"世

---

① 徐小杰:《新世纪的油气地缘政治——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

② Shams—Ud—Din, *Geopolitics and Energy Resources in Central Asia and Caspian Sea Region*, New Delhi : Lancer's Books, 2000, p. 199.

界岛"的地位日趋重要[①]。显然,今后中国应该把双方的地缘经济联系适时转化为地缘政治的合作,突出双方在地缘政治上的借重价值。这是中国与中亚地区建立战略合作的主要途径。

第六,中国自己仍然是发挥更大地缘政治作用的基本源泉,但需要妥善处理自己崛起与地缘政治的关系。如前所述,中国的地缘政治实力具有独立的性质和相当大的规模效益,其崛起所带来的综合国力增长会转化为地缘政治上的巨大作用和对世界的影响力。当然,中国所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必须兼顾自己崛起与地缘政治的关系,特别是要善于处理崛起后的地缘政治后果。在相当意义上,中国崛起本身就是具有重大地缘政治意义的事件,因为这会带来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变化。正是因为如此,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的对华政策争论才把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含义看得十分严重。换言之,美国和西方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主要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这实际上从反面说明,中国崛起产生的地缘政治增值效应,主要是指其在海陆关系和"心脏—边缘"关系中所具有的地缘政治潜力能够全部焕发出来,由此将同时改变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从而改变地缘政治的整体格局。而这有可能让美国感到斯皮克曼有关"不能让任何一个国家在欧亚大陆获得压倒一切力量"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因此,美国对中国崛起存有戒备心理并予以反制,是其地缘战略考虑的必然逻辑结果。有鉴于此,中国必须从现在起做好准备以应付自己崛起所可能带来的地缘政治后果,特别是要善于处理这种后果。尽管中国宣称自己的崛起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不会重复历史上"霸权国—挑战国"的对抗模式(即会跳出"大国兴衰的周期律");但是,到了一定时候,中国必须应付和处理自己崛起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及其后果。一言以蔽之,中国应该统筹兼顾崛起战略和地缘战略,使之具有良性的互动关系。

第七,根据对东西方向地缘政治关系的综合分析,中国需要在国

① 《新世纪的油气地缘政治——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第40页。

内发展方面也采取兼顾东部和西部两个大局的均衡战略。这既是对历史和现实要求的积极回应,也是理顺国内发展与地缘政治之间合理关系的主动措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国内发展布局与外部环境而言,国内理论界发生过"走西口"[①]还是走向太平洋的争论。尽管当时还不可能完全从地缘政治上考虑争论的性质,但问题的尖锐性实际上一方面集中在国内发展的布局安排上,另一方面已经涉及到在地缘战略选择上到底是依托海洋方向还是依托大陆方向,特别是其实质已触及了如何应对东西方向的地缘政治走势,以及如何就此合理配置地缘政治的力量和资源。针对有关争论,邓小平同志曾有预见地提出,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要兼顾东部和西部,这是两个带有根本性质的大局。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发西部"和"中原崛起"及"东西均衡"等新型国内发展战略的提出,便是积极回应了二十多年来的历史课题,并给予这一历史课题以结论性的回答;因为它们不仅使国内发展的布局更加合理和均衡,而且使国内发展布局与地缘政治的关系衔接得更紧密。综合来看,由于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全国经济和技术最发达的地带及人口和信息的集散地,并且它对内陆地区的经济开放和增长也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在它的带动下,过去完全以内陆为依托的大三线建设布局已经被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所取代。这为中国主动融入世界经济的良性循环,提高综合国力营造了必要的先机。从发展前景来看,海洋方向(东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大,经济发展的重心势必由内陆转向海洋;这就要求地缘战略选择跟着发生变化。但是,仍然有两个原因涉及到内部与外部关系的复杂性,而使我们不得不以东西方向再进行整体上的选择。一个原因是,按照经济发展梯度推移的理论,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发展也有着不容置疑的重要性,虽然它带有后发性的特点,但将会在国家

① 一个更明确而正式的表述是"开发大西北"。

整体经济中占据更大的分量①;只有中西部跟着东部完成崛起的过程,才能实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或者说这种崛起才是完整的崛起。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高经济成长地带离东向风险区近,而离西向缓冲区远;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西向的地缘政治比东向更带有后冷战的特征。这就使得中国的地缘战略在东西两向进行选择具有一定的难度,或者说是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特别是,这两个方向对中国而言,都不仅具有回应地缘政治和安全方面挑战的含义,而且也都具有回应地缘经济和战略资源方面挑战的含义。因此,中国在国内发展方面以东西两向进行布局,兼顾东部和西部两个大局,在国内意义上可以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促进经济发展在整体上变得更合理、更均匀,并实现东部和西部相互扶植、彼此呼应的均衡目标;在国际意义上可以适应东西方向地缘政治变化的张力,包括以海陆关系及"心脏—边缘"两大地带的整合来考虑经济发展布局和地缘政治布局的关联,并促使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利益兼容。总之,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的发展,既涉及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又涉及国家地缘政治的平衡。要使国内发展和地缘政治环境的关系更具有适应性和弹性,必须充分兼顾东西两个大局,实行东西并举、梯度跟进发展的均衡战略。

在最近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全面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新趋势新特点,深刻阐述了新世纪新阶段国家战略的要旨。这次会议强调,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妥善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②。这些论述是对邓小平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主动营造

① 西部的地理概念如果仅指所谓"大西北",就包括达300余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相当于5个半法国,有9000多万人口和近20个民族。西部的发展并不仅仅是摆脱落后面貌的问题,而更是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战略安排问题。同时,它也关系到国家安全、地缘政治及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

② 《人民日报》2006年8月23日。

长期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以及统筹兼顾国内发展的东部和西部两个根本大局等思想的新发展,是对我们的国家战略富有远见的总体部署,必将产生十分重大的和极其深远的影响。根据国家战略的新精神,从东西两向全方位把握地缘政治的走势,将使中国更从容地整合海陆关系,更稳妥地扎根于固本之势,更积极地拓展于固城之势;也将使我们把国内发展的有效需求与国际环境的有利条件更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只有当国家的发展战略、崛起战略和地缘战略高度统一起来时,我们才能够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确定战略方向,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战略机遇期,以便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推进国家的快速发展、全面崛起和国际地位的强有力提升。

主要参考文献

中文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说明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

3.《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列宁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6.〔德〕阿·魏根纳著：《大陆和海洋的形成》，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7.〔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著：《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8.〔苏〕B. A. 阿努钦著：《地理学的理论问题》，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9.〔美〕爱·麦·伯恩斯著：《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10.〔法〕安德烈·梅尼埃著：《法国地理学思想史》，

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11.〔英〕奥沙利文著:《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1 年版。

12.〔美〕巴里·诺顿主编:《经济圈》,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

13. 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世界地理》编写组著:《世界地理》,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

14.〔美〕鲍德温著:《明天的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

15.〔美〕保罗·肯尼迪著:《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 1988 年版。

16. 薄贵利著:《国家战略论》,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4 年版。

17. 陈坚等著:《图说美国弹道导弹防御》,解放军出版社 2001 年版。

18. 陈洁华著:《21 世纪中国外交战略》,时事出版社 2001 年版。

19. 陈鸿猷主编:《现代防空论》,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

20. 陈鸿猷著:《防空战略学》,解放军出版社 1999 年版。

21. 陈力著:《战略地理论》,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版。

22. 程广中著:《地缘战略论》,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23.〔英〕大卫·哈维著:《地理学中的解释》,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24.〔美〕丹尼尔·J. 布尔斯廷著:《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年版。

25.《地理学词典》编写组编:《地理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 年版。

26. 董良庆著:《战略地理学》,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27.〔英〕哈·麦金德著:《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28.〔英〕哈·麦金德著:《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

29.〔美〕R·哈特向著:《地理学性质的透视》,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30.〔美〕R·哈特向著:《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31.〔美〕汉斯·J. 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32.〔美〕亨利·基辛格编:《国家战略问题》,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33. 侯小河、张晖主编:《美国弹道导弹防御计划透视》,中国民航出版社 2001 年版。

34. 胡鞍钢等著:《大国战略——中国利益与使命》,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35. 胡启生著:《海洋秩序与民族国家——海洋政治地理视角中的民族国家构建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36. 胡兆量著:《地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地理系 1987 年铅印稿。

37. 胡兆量著:《地理环境概述》,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38.〔英〕杰弗里·帕克著:《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版。

39.〔英〕杰弗里·帕克著:《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新华出版社 2003 年版。

40. 靳怀鹏、刘政、李卫东著:《世界海洋军事地理》,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41. 金应忠、倪世雄著:《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42. 军事科学院著:《战略学》,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43.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著:《战略学》,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44.〔阿根廷〕劳尔·普雷比什著:《外围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

45.〔德〕克劳塞维茨著:《战争论》,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46. 梁守德、洪银娴著:《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47. 刘继贤、徐锡康主编:《海洋战略环境与对策研究》,解放军出版社 1995 年版。

48. 刘一建著:《制海权与海军战略》,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49.〔德〕鲁登道夫著:《总体战》,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

50. 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51.〔美〕罗伯特·吉尔平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52.〔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2 版。

53.〔美〕罗伯特·R. 莱昂哈德著:《信息时代的战争法则》,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

54.〔法〕马尔索·费尔当著:《空间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7 年版。
55.〔美〕马汉著:《海军战略》,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56.〔美〕马汉著:《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 1997 年版。
57.〔美〕迈克尔·奥汉隆著:《高科技与新军事革命》,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
58. 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著:《战略评估》,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59. 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编:《军事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60.〔美〕米切尔著:《空中国防论》,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
61.〔英〕W. C. 穆尔编:《地理学辞典》,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62.〔澳〕J. K. V. 普雷斯科特著:《海洋地理政治》,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
63.《全国经济地理学与教育研究会经济地理教学研究班论文》,1982 年 7 月。
64. 秦天、霍小勇著:《中华海权论》,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65.〔埃及〕萨米尔·阿明著:《不平等的发展》,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
66.〔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
67. 沈伟烈、陆俊元主编:《中国国家安全地理》,时事出版社 2001 年版。
68.〔德〕施密特著:《均势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69.〔美〕斯皮克曼著:《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
70. 司徒慕文编著:《全球海军走势》,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71.《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总编译组选译:《战争与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72.〔日〕田中明彦著:《世界系统》,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0 年版。
73. 王恩涌等著:《政治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74.〔英〕R. J. 约翰斯顿著:《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75. 王普丰主编:《现代国防论》,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
76. 王文荣主编:《战略学》,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77. 吴春秋著:《大战略论》,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78. 吴纯思著:《威慑理论与导弹防御》,长征出版社 2001 年版。
79. 吴秀鄰著:《高技术战争与国防现代化》,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80.《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0 年版。
81.〔苏〕谢·格·戈尔什科夫著:《国家的海上威力》,三联书店 1977 年版。

82. 徐小杰著:《新世纪的油气地缘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83. 姚有志主编:《二十世纪战略理论遗产》,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84. 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85. 〔日〕伊藤宪一著:《国家与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86. 〔美〕约翰·柯林斯著:《大战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78年版。

87. 〔英〕R. J. 约翰斯顿著:《地理学家与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88.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

89. 张立栋著:《21世纪的陆军》,国防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0. 郑云山主编:《中外史地知识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91. 周廷儒著:《古地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92. 〔意〕朱里奥·杜黑著:《制空权》,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93. 朱宁著:《变乱中的文明——霸权终结与秩序重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94. 朱育莲等:《世界重要战略地区图说》,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95.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竞赛方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版。

96.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97.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英文

1. Allen, John, and Philip Sarre, *Human Geography Today*, Doreen Massey, Polity Press, 1999, UK.

2. Amery, Hussein A., and Aaron T. Wolf, *Water in the Middle East: A Geography of Peac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0.

3. Aron, Raymond, *Peace and War*,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1966.

4. Bergman, Edward F., and William H. Renwick, *Introduction to Geography: People, Places, and Environment*, Prentice Hall, Inc., 1999.

5. Bernhardsen, Tor,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9.

6. Bradshaw, Michael, *World Regional Geography: The New Global Order*,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2000.

7. Chapman, Graham P., *The Geopolitics of South Asia: from Early Empires to India, Pakistan and Bangladesh*, Aldershot: Ashgate, 2000.

8. Cossa, Ralph A., *The New Pacific Security Environmen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Washington, DC., 1993.

9. Cox, Michael,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Superpower Without a Missio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UK., 1995.

10. Cohen, Saul B., *Geography and Politics in a World Divid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3.

11. de Blij, H. J., *Human Geography: Culture, Society and Space*,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6.

12. de Seversky, Alexander, *Victory Through Air Pow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42.

13. de Seversky, Alexander, *America: Too Young to Die*, New York: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1961.

14. Dodds, Klaus, *Geopolitics in A Changing World*, Harlow, England; New York: Prentice Hall, 2000.

15. Doel, Marcus, *Poststructuralist Geographies: The Diabolical Art of Spatial Scienc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16. Douhet, Giulio, *The Command of the Air*, Dino Ferrari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42.

17. Driver, Felix, *Geography Militant: Culture of Exploration and Empire*,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1.

18. Fik, Timothy J., *The Geograph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gional Changes, Global Challenges*, 2nd ed. Boston: McGraw-Hill, 2000.

19. Graham, Brian, and G. J. Ashworth, J. E. Turbridge, *A Geography of Heritage: Power, Culture and Economy*, London: Arno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0. Gray, Colin S., and Geoffrey Sloan, *Geopolitics, Geography, and Strategy*, Chichester; New York: Published in association with Scott Polar Research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by J. Wiley, 1997.

21. Gray, Colin S., *Geopolitics of the Nuclear Era: Heartland, Rimlands and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Crane, Russak and Company, Inc., 1979.

22. Huntington, Ellsworth, *Mainsprings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Wiley, 1945.

23. Johnson, Donald 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acific*, Praeger Publishers, London, 1995.

24. Kelly, Philip, *Checkerboards & Shatterbelts: the Geopolitics of South America*,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7.

25. Hugill, Peter J., *Global communications since1844: Geopolitics and Technolog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26. Liska, George, *Quest for Equilibrium: Americ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on Land and Sea*,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27. Livingstone, David N., and Charles W. J. Withers, *Geography and Enlighten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28. Mackinder, H.,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Geographical Journal*, 23 (1904).

29. Mackinder, H.,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Peace," *Foreign Affairs* Vol. 21 (1943).

30. Marullo, Sam, *Ending the Cold War at Home: From Militarism to a More Peaceful World Order*, Lexington Books 1993.

31. Mckercher, B. J. C., and Lawrence Aronsen, *The North Atlantic Triangle in A Changing World: Anglo-American-Canadian Relations, 1902—1956*,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oronto, Buffalo, London, 1996.

32. Modelski, George, *The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8.

33. Modelski, George, "The Promise of Geocentric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XXII, No. 4 (July 1970).

34. Nester, William R., *Power across the Pacific: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American Relations with Japa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35. Pacione, Michael, *Applied Geograph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

36. Parker, Geoffrey,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Washington: Pinter, 1998.

37. Rostow, Eugene V. , *Toward Managed Peace: The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1759 to the Pres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3.

38. Shams-Ud-Din, *Geopolitics and Energy Resources in Central Asia and Caspian Sea Region*, New Delhi :Lancer's Books, 2000.

39. Short, John Rennie, *New World, New Geographies: Space, Place, and Societ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8.

40. Sloan, G. R. , *The Geopolitics of Anglo-Irish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s Century*, London: Washington, D. C.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41. Sloan, G. R. , *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 1890—1987*, Suxas: Weitershief Inc. ,1988.

42. Spykman, Nicholas J. , *The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Harkert Blais Inc. ,1942.

43. Tuchman, B. , *The Proud Tower*, Hamish Hamilton, London, 1966.

44. Tunander, Ola, and Pavel Baev, *Geopolitics in Post-War Europe: Security, Territory and Identity*, Victoria Ingrid Einagel. London: Sage Pub. ,1997.

45. Wallerstein, Immanuel,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46. Wallerstein, Immanuel, *Modern World System I. II. III*,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47. Whittlesey, D. , *The Earth and the State*, New York, 1944.

ON THE DICHOTOMY
IN GEOPOLITICS


ISBN 978-7-301-12627-1
9 787301 126271 >

定价：38.00元